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新阶级斗争

Nouvelles luttes de classes

〔法〕让·卢日金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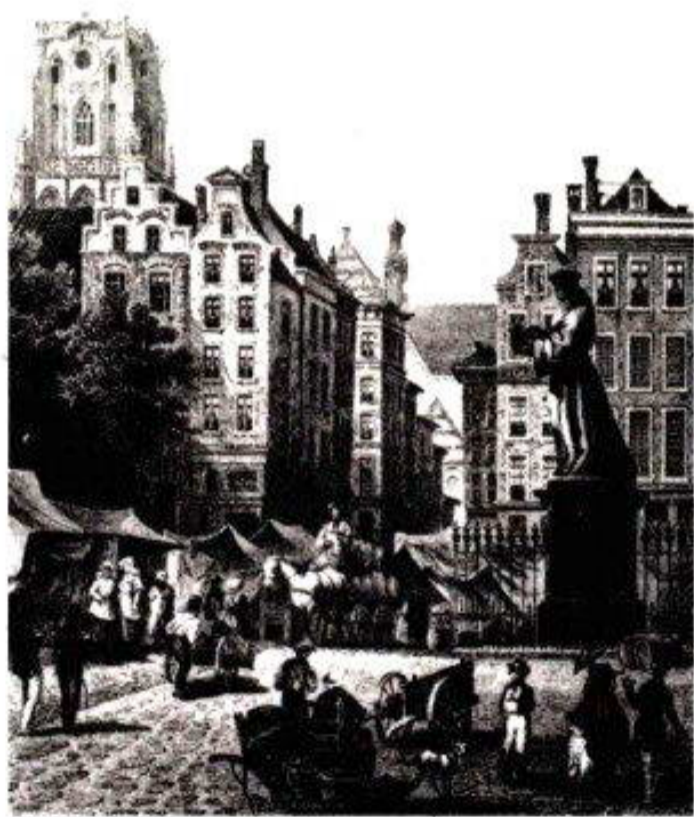
〔法〕皮埃尔·库尔-萨利 主编

〔法〕米歇尔·瓦卡卢利斯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 Lojkine,

Pierre Cours-Salies et Michel Vakaloulis

陆象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Nouvelles luttes de classes

1995年以来社会运动的高涨重新激活了关于法国阶级斗争的争论：我们是否面临1980~1990年代被忽略的各个社会阶级的“复出”？鉴于近30年来社会学已经颠覆了有关社会冲突主要角色的理论，这种“复出”是否只是错觉？

今天雇佣劳动在走向普遍化乃至全球化的同时，也在走向分化。智能职业与操作性劳动、受到身份保护的员工与临时工之间深刻的文化差距，使得各种形式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汇流变得尤其困难。然而，“运动主义”的集体行动难道不是扩大公共空间的一个因素？从中难道不可以窥见政治合法表象重构和社会解放新前景重建的一个强大因素？这部集体著作提供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社会学反思的基础，特别是重现了2004年《今日马克思》杂志组织的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学分组的热烈争论。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5097-0715-9



ISBN 978-7-5097-0715-9

定价：39.00元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新阶级斗争

Nouvelles luttes de classes

〔法〕让·卢日金内

〔法〕皮埃尔·库尔-萨利 主编

〔法〕米歇尔·瓦卡卢利斯

Sous la direction de Jean Lojkine,

Pierre Cours-Salies et Michel Vakaloulis

陆象淦 /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 · 主编/陆象淦

新阶级斗争

主 编 / [法] 让·卢日金内 [法] 皮埃尔·库尔-萨利
[法] 米歇尔·瓦卡卢利斯

译 者 / 陆象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5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江利亮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7.5

字 数 / 27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715 - 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7 - 176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① 恩格斯的这一名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本质特征，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发展、不断丰富和升华的历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是革命的和社会批判的，具有科学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品格。1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迎击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始终挺立潮头，永葆青春，其原因就在于它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相对低潮时期，一些西方理论家急不可耐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失败，并断言这种失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但是，正当他们弹冠相庆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以及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毋庸置疑的强大活力和时代价值，虽历经时代的磨砺和考验，却愈益迸发出真理的光芒，宣告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破产。

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完整体现。如果说毛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2版，第681页。

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其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飞跃。当前深入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无疑首先应该立足当代中国的实践，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懈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丰富经验，着重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从新世纪和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做出准确而又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及其最新成果的认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应该以世界的眼光，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际范围内的理论交流与联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把握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建立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势必要接受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的检验。关注、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诠释各国的实践，或者面向时代问题，探索当代世界的发展及其规律性的趋势，其中虽然观点不一，良莠不齐，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吸收的观点和论说。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近20年来其格局出现了诸多变化。一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欧洲的一些原本实力很强的共产主义大党出现急剧分化，党员数量、动员力和影响力锐减，在经过调整逐步稳住阵脚后，纷纷对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新的探讨和反思。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问题成为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阵

营的首要课题。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左翼学者开始了新的集结，建立起广泛的国际联系，在1993~1996年间，分别在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伦敦等地召开了“国际科学家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联合会议”、“国际马克思大会”、“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社会主义国际大会”等一系列参与性很广的国际会议。其中由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筹备和组织、欧美的十多家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刊物共同发起的“国际马克思大会”已经定期化，成为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性大型学术会议，从1995年迄今已举行了五届，参会者愈益增多，包括了欧美和亚非拉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涌动和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话语和社会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演变，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就业临时化和失业阴影的笼罩、生活的不稳定、阶级和种族矛盾等资本主义固有弊病越发突出，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在1993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所谓新秩序，依然像马克思生前一样，千疮百孔，存在着一系列无法愈合的伤口。正因为如此，欧美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更多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着重探讨阶级关系、种族矛盾和各种新的社会运动，批判新自由主义及其灾难性后果。四是通过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手段，建立极其广泛和密切的网络联系。以法国的“今日马克思”研究小组为例，它自称“既是一个刊物、一套丛书、一个研究和聚会的场所、一个研究小组，又是一个向经常性的讨论开放的网址、一个在线论坛、一个国际网络”。它又在2002年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多家刊物一起创建了称为“K计划”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欧洲网络”。“K计划”这个名称，取自德语“阶级”（Klasse）、“资本”（Kapital）、“斗争”（Kampf）和“共产主义”（Kommunismus）四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其宗旨是“通过重要的文献、研究成果和争论的流通，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作出

贡献”。这个“K计划”网又是作为“世界社会论坛”欧洲分部的“欧洲社会论坛”网络的组成部分。五是研究组织带有较浓厚的民间色彩，派别界限淡薄，观点呈现多样化，但其共同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用《今日马克思》杂志和丛书的主编、巴黎第十大学教授雅克·比岱的话来说，马克思的理论今天之所以对西方青年一代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因为它“不仅是分析现代世界不可或缺的，而且前景广阔”。其迫切的现实价值还在于“资本主义在其当前的全球化阶段重又凸显出其初期的野蛮性……虽然有着再度扩张的闪光外表，却又显现出没落的征兆”。^①

总之，当前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格局虽然仍处于一个分化、聚合、动员、调整和整合的过程，但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倾向和趋势，以及对于当代世界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有益探讨、分析和见解。本着进一步开阔眼界和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关系，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中的时代价值，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的宗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库》以问题为主线，重点译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解读及对当代世界分析探索的著述，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探索的涌现，为我国学术界提供一个相关的比照和参考。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现实问题，深入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创新才有所可能。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陆象淦

2008年11月于北京

^① Jacques Bidet, *Explication et reconstruction du Capital*, Introduction, PUF, 2004.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目 录

总 序	/ 1
导 言	皮埃尔·库尔-萨利、让·卢日金内、 米歇尔·瓦卡卢利斯 / 1

第一部分 横切进路

第一章	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阶级关系与政治危机 让·卢日金内 / 11
第二章	近 30 年来法国平民阶级的变迁 热拉尔·莫热 / 26
第三章	自由主义、全球化、替代性选择 皮埃尔·库尔-萨利 / 44
第四章	从阶级归属到“社会未来”，从政治上 反资本主义到意识形态上反自由主义 斯特法内·罗泽斯 / 70

第五章 集体行动的政治可能性

米歇尔·瓦卡卢利斯 / 85

第二部分 劳动的变革与社会冲突

第六章 集体动员

——词汇与话语的进路 勒内·穆里奥 / 99

第七章 社会斗争的可见性和不可见性：

量与质的问题还是视角问题？ 斯特凡·布坎 / 114

第八章 西班牙新经济从业人员的价值

——反思保守价值与进步价值

阿尔曼多·费尔南德斯·斯坦因科 / 126

第九章 从工薪阶层到临时工？

埃弗利娜·佩兰 / 140

第十章 间歇演艺人员：一个“完满的”

弹性工作制实验室？ 菲利普·库朗容 / 149

第三部分 教师斗争——反对学校中的 社会再生产？

第十一章 安于学校的不平等？ 让-皮埃尔·泰拉伊 / 169

第十二章 学业成就的不平等与阶级意识

斯特法内·博内里 / 173

第十三章	教师运动	
	——反对自由主义的争论与争取承认的斗争	
		克里斯蒂安·拉瓦尔 / 191
第十四章	重温平等	
	——2003年春的教师斗争	贝特朗·热艾 / 213
第四部分 阶级斗争的全球化?		
第十五章	美国工人阶级的重组?	玛丽安娜·德布齐 / 231
第十六章	全球化与两性社会关系: 南—北视角	
		埃莱娜·伊拉塔 / 249
第十七章	反对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归化	
	——一种颠覆性的社会学	
	玛丽亚·埃米莉娅·蒂茹 致 让-玛丽·樊尚 / 264	
第十八章	1970~2000年的印度中产阶级	
	——介乎超凡入圣与威胁之间	
		热拉尔·厄泽 / 272
参考书目		/ 303
作者简介		/ 312
译名对照表		/ 317

导 言

皮埃尔·库尔-萨利、让·卢日金内、
米歇尔·瓦卡卢利斯

1995 年以来社会运动的高涨，再度赋予关于法国阶级斗争的争论以活力：我们是否面临 1980 ~ 1990 年期间被忽视的各社会阶级的“复出”？^① 或者说，鉴于近 30 ~ 40 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主角所发生的社会学的剧变，这种“复出”是否只是幻影？“工人阶级”在经济、社会、政治、符号方面的解体，是否应该促使我们以最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复出”的论点和阶级斗争“复兴”的论点？

1900 年 11 月 26 日，当让·饶勒斯在里尔赛马场同朱尔·

① 厄斯塔什·库韦拉基斯、米歇尔·瓦卡卢利斯：《一场阶级战斗的复出》，见《人与社会》1995 年第 117 ~ 118 期（Eustache Kouvélakis, Michel Vakaloulis, 《Le retour d'une affaire classée》,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o. 117 - 118, 1995）；路易·肖韦尔：《社会各阶级的复出？》，见《OFCE 评论》2001 年第 79 期（Luois Chauvel, 《Le retour des classes sociales?》, *Revue de l'OFCE*, No. 79, 2001）；伊丽莎白·戈捷、让·卢日金内主编《社会各阶级——复出抑或复兴？》（Élisabeth Gauthier, Jean Lojkine dir., *Classes sociales, retour ou renouveau?* Paris, Syllepse/Espaces Marx, 2003）；保罗·布法尔蒂格主编《社会各阶级的复出——不平等、统治、冲突》（Paul Bouffartigue dir., *Le retour des classes sociales. Inégalités, dominations, conflits*, Paris, La Dispute, 2004）；让-诺埃尔·肖帕尔、克洛德·马丁主编《社会各阶级留下了什么？》（Jean-Noël Chopart, Claude Martin dir., *Que reste-t-il des classes sociales?*, Rennes, Éditions ENSP, 2004）。

盖德发生著名的争执时，用三个条件来定义阶级斗争“原理”。首先，必须具有“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对抗”感。但仅仅这一点还不够，“雇佣劳动者必须希望……一种新秩序降临，在这样的新秩序中，所有制不再是垄断的，不再是个人的和私有的，而将变成社会的，从而联合起来的所有生产者同时参与劳动的管理和劳动果实的分享”。最后，劳动者自身必须组织起来，建立他们自己的阶级组织（工会、政党、合作社等），以摆脱资本家阶级的束缚。

那么，我们今天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毫无疑问，始终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神话，已经风光不再。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化”，随着同所有爬高的社会阶层的混合，身份爬升到高级干部的一个庞大的工人核心群体趋于“中产阶级化”，这样的论点不是什么新东西，^①然而却对于1980年以来社会不平等的日益扩大、公共部门的智能劳动者的贫困化，乃至商业部门的干部和具有高等教育文凭的人们的不稳定化，置若罔闻。反过来说，能否像让·饶勒斯那样依然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代表“雇佣劳动者”整体同资本家阶级相抗衡的阶级来谈论？能否更有理由像朱尔·盖德那样来谈论一场“阶级对阶级”的战斗？今天，雇佣劳动者趋于普遍化乃至全球化，但同时趋于分化和多样化。雇佣劳动者群体的这种“多极性”，智能职业与操作性的雇佣劳动者（工人、雇员乃至技术人员）之间、各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如此深刻的文化差异，使得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共同目标变得极其复杂。尽管20世纪的伟大希望——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降临遭遇了可怕的幻灭，但今天正通过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动员号角以其他形式重新出现。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今日马克思》杂志2004年组织的第四次

^① 在1880~1890年代，这个论点已经成为革命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争论焦点。

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各个社会学分组活跃争论的焦点，本书注意到了这些争论。

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应用横切进路，通过近30年来社会学的、地缘政治的、文化的剧变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第二部分集中研讨劳动变革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最近的教师斗争的深远意义。第四部分则论述阶级斗争的全球化。

第一部分的特点是强调当前社会运动的各种社会学进路的“多元角逐”。对于一个没有像以往传统“工人阶级”那样的领导群体的“多极”雇佣劳动者中间的各阶级联盟的新潜力，让·卢日金内持“乐观主义”态度。但他也毫不隐讳地指出导致平民阶级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对立的重大文化障碍。同时，他批判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认为这个概念将脑力劳动者推到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一边，使工作时间机动的人员或者说教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变得不可理解。

热拉尔·莫热提出了对于诸平民阶级，首先是工人群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符号状况的一种非定性社会学分析的综合。他同时强调了“社会解除隔离”的过程，这个过程“解开”了自身封闭的古老民间文化，有利于诸平民阶级整合进——十分矛盾的——统治阶级的文化。他还着重揭示了处于社会整合和攀升进程中的平民阶级与被排除在这种社会整合之外的最贫困阶层（特别是在移民家庭中间）之间的对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新的分化。

皮埃尔·库尔-萨利致力于阐明或多或少天然的各种社会关系（性别、年龄、国籍、学业）如何更加明显地加强了社会机会和地位的等级化。自由主义摧毁了各种社会保障，导致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动力——愈益猖獗。但是，与此同时，创造了提出种种共同诉求的条件，而这样的共同诉求必然需要用马克思的某些概念来进行重新解读。

斯特法内·罗泽斯强调近十年来在雇佣劳动阶级中间占上风的意识形态反自由主义与政治反自由主义之间在表现上的断裂。这个现象缓和了必须在同一个运动中考虑社会、民族和共和体制问题的这一阶段的激进性。承袭遗产的新资本主义——股东资本主义使得职业的生成变成了无所谓的东西，通过横向扩展“社会生成”非自主方式，促使雇佣劳动阶级趋于同质化。超越阶级对抗的民族，希望保持将国家作为工具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的交错。但是，国家经过十分高层次的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妥协而完成的历史整合，今天以欧洲和外部制约的名义悄然隐退。

米歇尔·瓦卡卢利斯分析了社会运动作为社会不偏不倚的政治化因素的贡献。不满社会现状的动员活动的功绩在于松动了对于社会实践的系统控制，促进了公民对于公共事务的民主参与。但是，同政治的关系依然是社会运动的盲点。至少被解释为独立于政党和国家权力的社会运动“自治”要求，解答不了种种基本疑问。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没有高低之分的原则，乃是各个工会、协会和群众团体之间一切形式合作的先决条件。

第二部分的核心是围绕劳动变革对于社会运动的意义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勒内·穆里奥诠释了作为对“集体动员”进行分析的“多向角逐”的特点，澄清了关于当前社会运动的深刻本质的各种相互冲突的争论。否认阶级斗争，乃是以重大的集体动员作为表达的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赋予往往是看不见的过程、程序以最重要的意义吗？这样的过程和程序谋求使各种社会斗争“隐形化”。斯特凡·布坎力求清晰揭示世界范围内的进攻、暂停、休止的历史长周期，以及对资本主义统治机制起到制约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地下抵抗活动。

阿尔曼多·斯坦因科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与往往被当

作我们的社会个性化的毋庸置疑的表现的团结价值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他在对新经济部门的雇员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说明为何比较具有个性、比较独立的态度反而更能够与团结进步价值——既同个人主义自由文化相对立，又同社群主义类型的保守文化相抵触的价值相通。

劳动的另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变革，则是弹性化—临时化过程。埃弗利娜·佩兰坚持认为，当临时工化成为普遍现象，触及一部分中等和高等阶级之时，快餐业和文化用品商业中的临时工青年的新的战斗性将得不到工会组织的充分协调和后援。菲利普·库朗容对工作时间机动人员的冲突进行了重新思考，以着重指出受雇于多种多样的雇主的机动雇佣劳动者依然是一个性质模糊的对象。一些人的“完满的弹性工作制”模式（弹性而富有创意的独立劳动），实际上是以种种不平等形态和自我开发形式为特征的，与新自由主义的有选择的流动性和超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组织的神话相去甚远。

第三部分论述最近的教师斗争的意义。在研讨者面前提出的问题是既简单又令人生畏的：这些斗争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针对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的一种名副其实的动员？让-皮埃尔·泰拉伊和斯特法内·博内里强调了建立能够真正减少学校中的社会不平等的教学实践和设施的巨大困难。不仅如此，他们还指出诸如所谓“积极诱导”教学法、“甜蜜”教学法、“具体”教学法等表面看来最进步的实践，往往适得其反，只能拉大困难学生与其他学生之间的差距，而不顾及在一般文化的基础上（掌握语法和数理理念）真正进入抽象知识的要求。

这导致克里斯蒂安·拉瓦尔探讨2003年春天的教师运动失败的原因，尽管这个运动体现了强大的集体动员。这个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触及学校民主化的关键问题，没有公开面对初级中学所遇到的种种问题，没有公开抨击机

会平等理想与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日益扩大的差距吗？克里斯蒂安·拉瓦尔认为教师斗争中学校的社会隔离的职业经验与这类集体动员的反自由主义内涵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对于教学条件平等的实际关注与对于决定学校教育失败的全球的、社会的、经济的各种因素的政治意识之间，存在着十分强大的联系。教师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乃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种种关于严格的教学法变革的咒语”之间的差距，以及各种不同的学校设施之间的社会招募的偏向。克里斯蒂安·拉瓦尔还对于用唯技术论和商业的观念来评价教师的业绩表示否认。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贝特朗·热艾把地域平等问题（“所有社区、所有地区都享有同样的教育权利”）与反对学校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确定为2003年教师运动的中心议题。“所有社区、所有地区都享有同样的教育权利”，这个口号早在1998年已经成为最强烈体验到学校隔离之害地区（塞纳-圣德尼、加尔、埃罗等省）历次罢工的核心口号。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研讨阶级斗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趋于同质化的阶级斗争的汇合？反过来说，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更加凸显国家和地区的特点，譬如说南北差距，以及印度和中国等具有强大的前资本主义文化传统的一些民族国家的历史特殊性？

玛丽安娜·德布齐论证的美国案例说明必须对通常是十分矛盾的现实进行极细致的分析。一方面，在美国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个工人支柱倒塌的过程，以及融入“中产阶级”的熟练产业工人认同性的失落，与此同时，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与移民之间，各个种族、民族和性别之间的差距则更趋复杂。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最贫困和最不稳定的“蓝领”阶层的十分富有战斗性和创造性的动员。他们主要是服务业的劳动者，特别是移民打工人员。这部分人试图通过争取舆论斗争的胜利，

赢得对他们能力的认同，证明他们并不因循守旧地封闭于原始社群主义之中。

埃莱娜·伊拉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讨了全球化和性别关系的新趋势。她从对巴西、法国和日本的跨国企业所做的调查出发，强调正在导致国际劳动分工发生变化的男性/女性分工的多种形式，同时没有忽视另类世界主义青年运动所展示的希望。

玛丽亚·埃米莉娅·蒂茹的论述对智利这个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实验室进行了分析。智利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今天趋于成熟。阶级的两极分化，整个平民阶层——其中人数众多的妇女和儿童主要属于少数民族群体——的边缘化，乃是这个国家宏观经济“景气”业绩的隐性负面效应。如何协调分散的抵抗力量在未来组成强大的反现存秩序的社会运动，这个难题对于进步力量的批判来说构成了重大挑战。

印度的案例今天正在召唤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它曾经召唤马克思进行关注一样。热拉尔·厄泽卓有成效地说明了西方的“中产阶级”概念（更加确切地说，是这个概念的英文版“middle class”）如何被印度社会改头换面，变成借助高等种姓或者大地主的富有学问的婆罗门传统形象而神圣化的“核心”阶级。今天，由“作为保护人的国家”和国有大企业的白领组成的这个中产阶级的“祛圣化”，乃是城市生活环境退化、失业剧增和公共部门进行自由主义改组的结果。然而，一部分高等种姓的这种相对“无产阶级化”，非但并不有利于他们与平民阶级的趋同，反而促使趋于贫困化的高等种姓的学生和脑力劳动职业人员发起的行会主义运动的诞生。这个运动很可能将导致针对低等种姓成员，特别是由于大学招生和录取定额分配的规定而受惠得到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与法国的脑力劳动职业的动员差别如此之大的这些震撼人

心的事实，正在召唤着我们，迫使我们对我们的分析工具重新提出质疑：为什么虽然居于少数但组织得十分严密的印度工人运动像“作为保护人的国家”一样，丧失了其影响？种姓的归属为何既能同反自由主义的阶级意识，又能同精英主义和行会主义意识很好地结合？

横切进路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章

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新阶级关系与政治危机

让·卢日金内

我们生活在原有的阶级认同性解体和新的认同性可能将要重组的一个过渡时期。社会表象的旧框框已经不复适应。“工人阶级”、“干部”、“中产阶级”，这些范畴既没有考虑到工人与其他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某些新的叠盖，特别是在信息加工领域，也没有认识到劳动的临时化导致整个雇佣劳动阶级的分割和分裂。同时，工会和政治组织对于如何代表一个多元的雇佣劳动阶级也穷于应付，因为在这样的雇佣劳动阶级中，客观的趋同现象既同社会、文化、民族分裂的强大势头发生冲突，又同随同信息革命进入工薪阶级的青年和妇女的种种新的期望相左。

为了避免用唯意志论，以便从中比较清楚地辨明和测定认同性重组的新潜力，我们分两步走。首先，我们从所谓“平民”阶层（工人与雇员）与工薪中产阶层之间的对立着手，通过社会历史的视角来重新检验今天导致阶级联盟瘫痪的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分裂。然后，我们试图围绕构建替代所谓“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另一种选择，从而真正超越资本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来分析极其多样乃至分散的所谓“新社会运动”的进步性及其局限。我们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管理禁忌”

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城市公共空间的工薪阶层和市民中间依然如此强大？

“文化资本”问题分裂了平民阶级和 脑力劳动工薪阶层

皮埃尔·布迪厄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预先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力所有者（工薪阶层）等同起来，其唯一的根据就是两者都是在市场上交换商品和收入的消费者。卡尔·马克思所论证的消费品分配与生产资料分配之间的根本区别，在皮埃尔·布迪厄那里消失了。布迪厄通过这样的手段，依据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把资本归结为一种简单的“用于消费和流通的商品”。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发现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结尾论述社会阶级的未写完的那一章中确切地指出：“资本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相反，“流行意义上”所说的分配（消费品分配）“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这样的关系本身不能反映生产资料的分配关系，而生产资料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内部由生产关系一定的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①

因此，“文化资本”概念抹杀了生产资料分配关系与生产力、资本家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矛盾。文化资本理论囿于消费和收入分配领域（换句话说即是社会分层领域），不能上升到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利润、赢利）与形成中的新的需要即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能力及生产者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分析。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七篇，第五十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995页。

皮埃尔·布迪厄对于人力资本的批判，从社会关系被封闭于商品流通和分配领域的时刻开始，不能不是局限的。对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理论”，人们尽管以“构成市场特征的力量关系”的名义加以驳斥，却依然囿于马克思所说的“竞争的幻想”的樊笼，不能阐明力量关系的社会基础。他们始终漂浮在模糊和类比的概念上，其严重后果是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生产资料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平等），为各类工薪人员在收入和消费品分配方面的不平等辩解。

如果把资本家和直接生产者封闭在流通领域之中，那么他们无非是关注他们的商品的交换（经济资本对文化资本），以使商品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主体。但是，以消费者名义进行分配的这种不平等，同时意味着寻求其资本价值实现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他们自己的雇员之间的某种基本的类比平等，只需后者作为“学历”拥有者稍稍谋求使前者的“教育投资”的利益最大化。学校隔离的阶级本质被一笔勾销，以有利于实施或多或少“可赢利的投资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之间依据各自的“投机”能力进行某种竞争和斗争。

这样，文化资本理论把具有文凭的雇佣劳动者之间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归结为争取他们的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逻辑之间的简单对抗。但是，今天三种类型的事实足以揭穿这种文化“优越性”的精英主义理论。首先，文凭与社会地位（具有学业文凭的青年成群“失去社会地位”）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对所谓的文凭“通胀”的自由主义论点提出了质疑，这种理论无视培养的客观需要与赢利逻辑的反向压力之间的矛盾。其次，具有学业文凭的青年的现实态度不能归结为一种单纯的个人主义竞争：从作为1980、1990和2000年代标志的诸多社会运动中涌现出抗争和团结。最后，规模越来越大的教师的斗争（1998年的塞纳-圣德尼省的斗争；2003年春天的运动）既表现出他们的团结性，又表明他们的不稳定性和社会贬值，同大谈“被统

治的资产阶级”的种种社会学理论可谓南辕北辙。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经验指标与提供给具有文凭的青年的劳动岗位水平之间的日益扩大的差距，来验证文化资本概念的深刻意识形态性质。即使仅限于文化指标而言，由米歇尔·潘松和莫妮克·潘松-夏洛主编的《资产阶级社会学》^①无可争辩地向我们证明，资产阶级的文化资源不是公共服务部门的知识分子雇员特别是教师的资源。

除了同样也去参观博物馆、聆听音乐会和观赏戏剧之外，资产阶级的文化活动是同他们特有的社交网（联谊会、竞赛会、俱乐部等等）、教育、祖传遗产策略（例如收藏艺术品）和婚姻选择（门当户对的自我繁殖）分不开的。文凭本身的分量在这种综合优势面前无足轻重，正如上述两位学者在调查中描述有文凭而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研究人员面对富有文化修养的大资产阶级分子时，十分清楚地证明的那样。^②

皮埃尔·布迪厄赋予他们以所谓的学业“资本”和进入“工薪资产阶级”敲门砖属性的大部分“学历”（中学第一阶段结业证书，业士，高等教育文凭），^③今天只能获取某些操作岗位或者职业分类所不承认的某些新职位。皮埃尔·布迪厄列入“新小资产阶级”或者说“被统治的资产阶级”^④乃至“领导

① 米歇尔·潘松、莫妮克·潘松-夏洛：《资产阶级社会学》（Michel Pinçon, Monique Pinçon-Charlot, *Sociologie de la bourgeoisie*, Paris,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2000。

② 米歇尔·潘松、莫妮克·潘松-夏洛：《大资产阶级面面观——调查手记》（Michel Pinçon, Monique Pinçon-Charlot, *Voyage en grande bourgeoisie. Journal d'enquête*, Paris, PUF），1997。

③ 皮埃尔·布迪厄：《阶级的前途与或然因果性》，载于《法国社会学评论》（Pierre Bourdieu, 《Avenir de classe et causalité du probabl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vol. XV），1974，第36页；《区别》（*La Distinctio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1979，第152~153页。

④ 上引皮埃尔·布迪厄《区别》一书第196页注8写道：“资产阶级一词在这里被用作统治阶级的统治层的一个缩略语，而知识分子一词对于统治阶级的被统治层来说发挥着与此相同的功能。”

阶级层”的那些人（干部和教授），^①通过“中产阶级”这个欺世盗名的概念把公共服务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雇员、技术人员、中高级干部、教员以及“特别是”教授重新组合起来，因为据说他们的“文化资本”是通过持有中学第一阶段结业证书、业士文凭或是持有高等教育文凭来衡量的。我们看到在“经济资本”指标中把工资与动产和不动产收入并列起来，可能合乎情理地感到惊讶，但这完全符合极其飘浮不定的文化资本概念。

诚然，皮埃尔·布迪厄冗长地分析了丧失社会地位的过程，但他并未从中看到任何新现象，没有看到有文凭的雇佣劳动者社会意识中的任何变化。在他看来，这些永远顺服的人，始终听命于资产阶级——我们从来看不到其发挥严格意义上所说的资本所有者（生产资料所有者）作用的一个资产阶级统治层的不变的符号统治。

按照“人力资本”经济学家们的模式所说的文凭“贬值”或者文凭“通胀”，难道事实上不是完全掩盖了阶级这个根本问题，表明今天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在工资和法规分类中承认同信息革命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劳动的知识化和责任化的深刻要求吗？^②

仅仅把这样的招工活动看做寻求更加听命和很少组织起来反对剥削的劳动力，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说这样的动机主要是在雇用临时工的分包企业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么以复杂信息的流通和处理为中心的新组织运转，则要求真正训练有素的

① 皮埃尔·布迪厄：《文化的再生与社会的再生》，见《社会科学信息》第10卷，第2册（Pierre Bourdieu, 《Reproduction culturelle et reproduction sociale》, *Informations sur les sciences sociales*, vol. X - 2), 1971, 第59页。

② 我们同样可以在吕克·博尔坦斯基的著作中看到把社会事实归结为其集体表象，掩盖劳动的全部客观实在的社会学唯心主义。见保罗·布法尔蒂格《干部——一个社会形象的终结》（Paul Bouffartigue, *Les cadres. Fin d'une figure sociale*, Paris, La Dispute), 2001。

其他许多相关能力。对企业主旨在通过把持有文凭的雇员划入比他们具有的相应技能更低的职务类别来压低报酬，甚至把工作岗位外设在诸如新工业化国家那样的低工资地区（例如招揽巴西、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的信息专家）的策略置若罔闻，不啻玩火。

诚然，对于“文化资本”概念的批判并没有考虑到促使文化资源的拥有者特别是脑力劳动职业人员与平民家庭实际上处于对立地位的差距：学校位置的斗争，学校的隔离（以及根据学校的“社会环境”选择校舍的种种后果）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所谓“社会混合制”的暧昧性，尽管公开的意图宣言中言之凿凿，实践中却遭到否定。同时，如果想了解经济的不稳定化对于中间阶层行为的影响，如果想动态地看待他们的分离活动和团结活动，也就是说想了解近年来社会斗争中所产生的变化，那么我们必须从“文化资本”概念的樊笼中解脱出来，严格地把劳资冲突与文化冲突联系起来。

新社会运动——对于信息革命的两种解释

在新社会运动的本质问题上，也可以看到文化论派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同样争论。对于新社会运动的解释实际上涉及对于工人运动衰落以来我们的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变化的社会学分析。必须看到，我们频繁使用的“信息社会”、“后物质主义社会”等概念，实际上反映出对于信息革命的两种可能具有的解释。占主导地位的解释，亦即阿兰·图雷纳和丹尼尔·贝尔的解释，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概念为基础。诸如此类的概念假设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种本质的变化，出现了驾驭我们社会的范式的不可避免的演变，也就是说我们正从“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社会的、经济的主要问题（劳资冲突）让位于某些本质上是“文化的”主题。就社会角色而言，文化

论的解释宣告作为围绕劳动主题（工厂与罢工）的核心角色的工人阶级的“终结”，强调文化冲突、“社团”冲突（女权主义运动或者另类世界主义斗争的“恶搞”）的多样性，而这种冲突的活力主要来自从事信息处理的脑力劳动职业的新“中产阶级”（教师、医生、工程师、艺术家等）。

另一种解释，则是我们提出并发展的解释。^① 文化替代不了社会，控制代替不了对于劳动的剥削，毋宁说信息劳动以及信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关系的新向度震荡了经济与社会、劳动与社团之间的关联方式。不去进行了解，就不可能把握手段来解释1980年代以来动员了部分信息雇佣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运动的本质。还必须破除“信息社会”（为已经把握了它的知识精英独享的！）的神话，进而把物质劳动文化与信息处理文化、工人的经验与“针对他者的劳动”经验调和起来。

就某种意义而言，认同性的干扰始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出现了“多个运动”，因为格勒内勒谈判（没有达成协议，只有一个笔录）的1968年5月、工人的工联主义的1968年5月不是法国大学的1968年5月，也不是欧洲、美国或者日本大学的1968年5月，尽管自治的要求同样贯穿于所有的工人罢工。1968年“五月风暴”的历史主角虽然以人民解放阵线的伟大人物（对于法国总工会、法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首先是“工人阶级”）或者作为前辈翻版的新人物（塞尔日·马莱和法国民主工联的“新工人阶级”）为标榜，但在这些旧装束下，社会角色事实上已经不复是1936年的人物。

在1936年甚至直到1950年代初，法国的雇佣劳动阶级无论在数量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以工人群体为主；到了1960年代

^① 让·卢日金内：《信息革命》（Jean Lojkine, *La révolution informationnelle*, Paris, PUF), 1992。

和 1970 年代则相反，以一个新型的雇佣劳动阶级——服务业，在法国主要是教育、研究、医疗卫生、文化和信息的大公共服务或私人服务机构的雇佣劳动人员——的极端高速增长为标志。

恰恰是在作为知识和信息的这些新的集中点之一的大学里，爆发了 1968 年“五月风暴”。像接力赛跑一样蔚为壮观的工人罢工，掩盖了这个社会运动不同于 1936 年或者 1947 年罢工的新特点。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工厂，除了有关工资的传统要求之外，对于信息和决策的社会控制被提到了日程上，当时不属于共产党的左派人士称之为独立于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自治”，因为无论是法国共产党还是法国总工会依然走不出历史幽灵的阴影，尽管基层的许多战士已经在试验新的组织形式，展开对劳工组织乃至经济管理的争论和探讨。^①

阿兰·图雷纳的功绩在于很早就觉察到了信息处理的关键作用：

在一个第三产业越来越发达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在信息处理在其中具有同自然资源的处理在工业化初期曾经有过的同样的核心作用的社会，最严重的浪费形式乃是对于决策的参与性的缺失。具有征兆意义的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参与决策的首要条件是信息……获得信息，不仅是指知道正在发生什么，而且应该了解决策的背景、理由和方法，而不仅仅是援引来为某个决策辩护的事实。这说明为什么工会或者企业委员会要求审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了

^① 无论如何，热拉尔·亚当主编的《1970 年的法国工人》（Gérard Adam et alii, *L'ouvrier français en 1970*, Paris, Armand Colin, 1970）的调查表明：从实地调查来看，不是技术人员，而是职业工人最赞同自治（包括扩大工人进行投资和财经管理的权利；扩大劳工组织的权利）。从比例上来说，不是法国民主工联的支持者，而是法国总工会的支持者最赞成由全体人员管理企业。

解各种不同类别的收益的演变。事实上，信息是进入决策的通道。^①

正如图雷纳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获得信息“已经假定出现了一种新的诉求态度”，从而打乱了社会——为工会所保留的领域与经济——为管理者所保留的领域之间的旧界线。但它同样假定“承认经济的合理性”，换句话说，也就是承认资本主义管理的准则（赢利性准则，表面的劳动生产率）。那么，这是否就像马克斯·韦伯和今天的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要求把经济的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假定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个东西）等同起来呢？

这里，预兆的诊断让步于神话的话语。图雷纳的推理像贝尔和富拉斯蒂耶在经济领域里的推理一样，是建立在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类比的基础上的，尽管前者是以用于生产的劳动（以及劳资冲突）为基础，而后者是以信息和战略信息的持有者和非持有者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这样的类比就像在贝尔的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② 是指一种替代：“恰如”产业革命时期产业工人替代农民一样，今天居于处理信息中心的社会主体（教授、研究人员、学生、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在主导社会的新的核心冲突中“同样”替代了工人阶级。

因此，在图雷纳和其他许多文化论派的社会学家看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失去了其重要性，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再成为后工业社会生产的核心问题；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斗

① 阿兰·图雷纳：《新老社会阶级》，载于《后工业社会》（Alain Touraine, *Anciennes et nouvelles classes sociales*），dans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Paris, Éditions Denoël, 1969, 第88页。该文写于1965年，收入乔治·居尔维茨的纪念文集《当代社会学前景》（*Perspectives de la sociologie contemporaine*, Paris, PUF, 1968）一书。

②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Daniel Bell, *Vers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6）。

争替代了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斗争。

今天，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只需考察一下资本的运动如何左右着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企业的战略如何在一夜之间使得不仅是一个工厂，而且是一系列技术、知识和才干的集合都化为乌有，就足以衡量诸如此类同严肃的经济分析毫不相干的社会学推理何等脆弱。

但是，新的社会运动——从铁路工人总罢工到中学生、大学生运动以及教师、研究人员和艺术家的斗争——的本质是同文化论派的论点完全相抵触的，以致图雷纳一派的社会学家断言它们“不是社会运动”。从1986年开始同大学生的各种政治示威相衔接的集体动员，被指责为工团主义，缺乏真正可供选择的方案，来替代社会党左翼政府或者右派政府所提出的种种“改革”。

事实上，“物质主义的”要求（就业、工资、教育、社会保障）与“社会性的”要求（社会正义、同等待遇、公共服务）的深刻叠合，有力地驳斥了劳动边缘化和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业已终结的论点。相反，这种现象意味着对于今天的信息劳动及以往的“工人阶级”和“干部”的不同组成部分、各种脑力劳动职业之间交织而成的模糊而复杂关系的一种新的反思。

劳动的变化从两方面对工业劳动的旧界线提出了质疑：信息劳动的内容和女性大量进入服务性雇佣劳动，完全更新了劳动的意义本身。从事信息工作，事实上意味着同他者的一种特有关系，但也是对于调动我们全部主观能动性的感觉的一种诠释。无论是对于窗口前的一个营业员还是对于站在他的班级学生面前的一个教师来说，信息劳动始终既是一种针对自身的劳动，又是一种针对他人的劳动，不管在最标准化的信息劳动中他的创造性、创新精神受到多大限制。

然而，“历史的幽灵”在雇佣劳动者自发形成的表象中造成

了混乱。人们把循规蹈矩的行政管理人员称为“新的第三产业熟练工人”，甚至用“音乐熟练工人”来贬称交响乐团的常任演奏家；^①人们把电话呼叫中心的工作等同于“生产线”的工作，尽管对于劳动力的剥削方式已经完全改变。凡是劳动的痛苦涉及工人的“泰勒制”的地方，不再是指对于劳动的厌倦（闭上你的嘴，埋头干活！），而恰恰相反，是指新的“参与式”管理或者服务的社会关系推动下的主观的超常投入。

因为信息处理，或者说全部信息处理无不意味着整个信息链上的每个雇佣劳动者的主观投入，而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所鼓吹的“效果责任”不能通过外部的强迫和任务的指定来获得，所以信息资本主义安排了一种完全模棱两可甚至矛盾的机制，即所谓受监控的独立。提倡创新是真实的，独立的空间也是真实的，尽管受到限制，但必须在内心牢记的赢利目标却是由领导层单独规定的，监控则是“后发制人”，落实在目标的实现上。

应激、抑郁情绪的日趋严重，服用精神治疗药物，乃是所有遭遇这种内心强制下的投入的雇佣劳动者强烈感觉到的名副其实的认同性危机的最剧烈的表现。信息资本主义引发的对于劳动的快乐和痛苦的反常感受，阻塞了以往形式的工人对劳动强度增大和不稳定的反抗；在劳动本身确实令人感兴趣，使人产生实实在在的快乐的的同时，工资、劳动条件和职位的压缩引起了不安。这种不安表现为既反对临时化，又反对退回到原来的无限期受雇于单独一个雇主的全日制就业规范。在艺术和表演行业中尤其如此：希望个人独立与觅求职业保障之间的张力最为强大。

^① 菲利普·库朗容：《法国的音乐演奏家——一个职业肖像》（Philippe Coulangéon, *Les musiciens interprètes en France. Portrait d'une profession*,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4。

在企业干部中间，“电子牵狗绳”——手提电脑把他们同管理指令热线牢牢地拴在一起，因此他们的张力主要表现为如何界定工作时间，甚至生活时间。但是，正是女性在信息工作中的地位日渐高涨，对这种个人时间完全从属于企业目标的情况提出了质疑。在1930~1950年代的干部中间，为了企业的目标不遗余力地主观完全投入，实际上是建立在从事职业工作的丈夫与担负家务劳动和子女教育的妻子之间的任务严格分工的基础上的。从他们的优先分工开始动摇（失业、临时工化）之时起，青年干部——其中持有文凭的女性越来越多——拒绝免费劳动，要求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来参加家庭活动和培养子女。

更广泛地说，信息革命动摇了职业任务与家庭任务之间的性别分工。我们认为，信息革命与女权革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已婚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市场或者继续工作，绝非偶然。女性的劳动震荡了西方工人运动的两大基础——男性的战斗性的工会组织和作为保护人的国家的作用。^① 由于职业女性、女性作为养家糊口者的单亲家庭以及双方混合从事以往男人垄断的职业和女性覆盖新的服务行业的夫妇（丈夫工人/妻子雇员，丈夫干部/妻子教员或者护理人员等）的数量的日渐上升，男人作为养家糊口者的传统模式势必趋于动摇。

主导服务职业的各种关系功能，以及转向“激励”而不再是靠等级森严的命令来指挥的参与性的新管理，在传统上为女

^① 关于这个主题的女权主义文献极其广泛。例如，见雅克利娜·洛费尔、卡特琳·马里、玛格丽特·马卢瓦尼主编《性别劳动》（Jacqueline Laufer, Catherine Marry, Margaret Maruani dir., *Le travail du genre*, Paris, La Découverte-MAGE, 2003）一书。反之，将信息劳动的新内容与女性的就业联系起来的研究则较少；也许对于护理人员工作的研究除外（有关法国的情况，见弗朗索瓦·阿克、安娜-玛丽·阿尔博里奥、达妮埃勒·凯尔戈阿的研究）。

性保留的家务劳动中得到了特殊的反响，却同工会和政治组织的等级森严的家长制结构相抵牾。

结 论

1991年苏维埃制度陨落后，人们可能以为社会民主主义大获全胜。诚然，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今天在全世界进步力量中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共产党正在走向低潮，但社会民主主义今天也正在经历严重危机，这是诸如同托尼·布莱尔关系十分密切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等社会民主主义主要理论家再三强调指出的。^①

社会民主党以担任公职的所谓“中产阶级”为中坚而确立的“作为保护人的国家”（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也曾经得到工人运动的支持，但今天正在被那些声称要求继承社会民主主义遗产的人一部分一部分地瓦解；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家们以托尼·布莱尔、米歇尔·罗卡尔和雅克·德洛尔为榜样，不仅没有严词指责苏联的国家主义，而且对于西方公共服务的国家化、最初的社会民主计划的破产、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失败、所有公共部门向竞争和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开放的必要性等问题，也含糊其辞。

其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断裂，不但在各个平民阶级之间，而且在各个所谓的“中产阶级”及其政党代表之间，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共产党，都没有能超越以“工人阶级”为历史参照的窠臼。弃权，投某些民粹主义政党的票，凡此种种表明多极化的雇佣劳动者的深刻混乱，他们既不再把自己看做工人阶级，也不认为自己是今天深受工作不稳定化触动的“中

^①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雅克·德洛尔作序本（Anthony Giddens, *La troisième voie. Le renouveau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préface de Jacques Delors, Paris, Seuil), 2002。

产阶级”。

这种政治代表性危机的深层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信息劳动作为非集中化和等级化网络劳动的彻底变革，并没有始终得到委任制的、精英主义的、金字塔式的和永远是经验批判主义的政党组织的重视，尽管它们的领导人发表过诸多表明这方面意图的声明。另一方面，信息资本主义通过利用信息革命来散布一种“绝对自由的自由主义”，既搅乱了社会批判的方向，又不致减弱对于雇佣劳动者剥削方式的残酷性，从而在雇佣劳动者中间造成了巨大混乱。

弹性工作制意味着工作的临时性，现在不但在私人部门，而且在公共部门，定期任务合同取代了固定在一个企业中受到保障而对结果不承担义务的全日制工作；而新一代的工薪阶层乐此不疲，丝毫不愿放弃自主择职的流动性，也不愿放弃个人投入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工作中的幸福和痛苦，转移了对于自由主义的抵抗，正如我们通过工作时间机动人员的所谓“完美的弹性工作制”这个象征性形象所能看到的那样。

这说明为什么在工作和住所临时化的猛烈冲击下中产阶级神话的破产^①根本没有导致“工人阶级”的“复出”，不能由此而得出一种简单化的观点，断言出现了把工人、雇员、脑力劳动工薪阶层乃至自由职业者（医生、护士、法官）很好地重组起来的同质化的无产阶级。事实恰恰相反，1980年代以来开始出现的关于脑力劳动职业阶层的社会争论，对于社会的所谓“中产阶级化”的论点和纯粹文化论派的新社会运动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劳动与资本的冲突（无论是同全体教师相关的“物质”要求还是医院工作人员的工资）依然存在，但通过捍卫公共服

^① 克里斯托夫·居吕伊、克里斯托夫·努瓦耶：《社会新断层地图——被遗忘和不稳定化的中产阶级》（Gulluy Christophe, Christophe Noyé, *Atlas des nouvelles fractures sociales. Les classes moyennes oubliées et précarisées*, Paris, Éditions Autrement), 2004。

务、寻求新的教学或医务组织的活动，采取了新的形式，其中包括一个符号的、文化的向度。

那么，是否应该说“另类世界主义”组织（世界社会论坛——FSM，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ATTAC，等等）能够取代软弱无力的政党组织，并重构能够代表多极化的全体新雇佣劳动者的新的社会认同性呢？我们认为远非如此。这些组织只动员了部分脑力劳动者，而同半个世纪以来始终代表着就业人口60%的平民阶级（工人和雇员）依然是割裂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存在着许多障碍，抑制着工薪阶层和公民大规模干预他们的企业和城市的生活。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压制着工薪阶层意识的意识形态障碍（自由主义思潮）和经济障碍（失业和工作临时化的重压）。^①

我们只在此探讨政治的障碍，即代议制机构对于建立允许人们对企业或国家的管理进行真正干预的名副其实的参与性民主意图的抗拒。另类世界主义运动和部分工会运动都要求确立新的民主形式，但除非这样的新的民主形式确实能构建足以替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真正可信的选择（除了不要商品的乌托邦），否则就没有意义。而1995年法国铁路工人反对朱佩提出的社会保险改革的运动，如果说产生了直接民主的某些独特的形式，却在寻求能够替代自由主义改革的具体选择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

^① 让·卢日金内：《管理的禁忌——介乎争议与建议之间的工会文化》（Jean Lojkine, *Le tabou de la gestion. La culture syndicale entre contestation et proposition*,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1996。

第二章

近 30 年来法国平民阶级的变迁

热拉尔·莫热

在政治中“言即行”，而所谓“行”，首先就是使人认识和承认社会分化原则。这说明为什么在“危机”和“社会问题”重现、马克思主义衰落和新自由主义兴起 30 年后，社会阶级问题依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在政治领域，社会观的保守还是变革的斗争是同旨在守旧还是对政治进行变革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在社会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霸权已经被打破，不管其结果是好还是坏。^① 如果说不平等在近 30 年来不断加深，^② 而资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使人觉得作为一个受到动员的阶级出现，^③ 那么各个平民阶级今天却是作为一个“一盘散沙”的世界呈现

① 在长期遭到冷落之后，社会阶级问题看来重新引起社会学家们的关注。例如，参见《没有阶级的社会？》，载《社会联系与政治家》第 49 期，2003 年春季号（《Des sociétés sans classes？》，*Lien social et Politiques*, n° 49, printemps 2003）；见前引伊丽莎白·戈捷、让·卢日金内主编《社会各阶级——复出抑或复兴？》，2003）；前引保罗·布法尔蒂格主编《社会各阶级的复出——不平等、统治、冲突》，2004；前引让-诺埃尔·肖帕尔、克洛德·马丁主编《社会各阶级留下了什么？》，2004。

② 见前引路易·肖韦尔《社会各阶级的复出？》。

③ 米歇尔·潘松、莫妮克·潘松-夏洛：《大资产阶级的符号霸权》（Michel Pançon, Monique Pinçon-Charlot, 《Hégémonie symbolique de la grande bourgeoisie》），前引保罗·布法尔蒂格主编《社会各阶级的复出——不平等、统治、冲突》，第 141-156 页。

在世人面前的。^① 如何描述最近 20 年来各平民阶级的地位的主观和客观的多方面的变迁?“钢铁部队”如何变成了“被排除在外的人员”，“红色郊区”如何变成了“困难社区”？^② 笔者想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其办法是首先提出主要应归功于理查德·霍格特^③，后来又经奥利维耶·施瓦茨^④修正的关于平民阶级的表象，然后力求揭示改变其形态的各种力量，以勾画出新的表象的大致线索。

“旧时代”

如果想在霍格特划定的地域、社会和文化范围内描述平民阶级的世界，那么必须研究作用于这个世界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
- ① 热拉尔·莫热：《工人——一个一盘散沙的世界》，为利昂内尔·迪鲁瓦《在一个工厂应聘》一文所写的导言，载于《社会科学研究文献》1996年12月第115期（Gérard Mauger, 《Les ouvriers: un monde dé-fait》, Introduction à Lionel Duroy, 《Embauché dans un usin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115, décembre 1996）。
- ② 关于这个问题，见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Olivier Schwartz, *La notion de «classes populaires»*, *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 en sociologie*, 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en-Yvelines），1998；除此而外，还有热拉尔·努瓦里耶：《法国社会中的工人》（Gérard Noiriel, *Les ouvrier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1986；罗伯特·卡斯特尔：《社会的不安全——什么东西得到保护？》（Robert Castel, *L'insécurité sociale. Qu'est-ce qu'être protégé?*,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2003；《社会问题的变形——雇佣劳动阶级编年史》（*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 Une chronique du salariat*,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1995；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基亚佩洛：《资本主义新精神》（Luc Boltanski, Eve Chiapello,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limard），1999；斯特法内·博德、米歇尔·皮亚卢：《工人地位再探索——索绍-蒙贝利耶标致汽车厂调查》（Stéphane Beaud, Michel Pialoux, *Retour sur la condition ouvrière. Enquête aux usines Peugeot de Sochaux-Montbéliard*,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1999。
- ③ 理查德·霍格特：《穷人文化——英国平民阶级生活方式研究》（Richard Hoggart, *La Culture du pauvre. Étude sur le style de vie des classes populaires en Angleterr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1970。
- ④ 见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

由于甘于自我排斥，平民阶级受到的隔离日趋严重，可以说变本加厉。奥利维耶·施瓦茨写道：“外部世界的微弱的开放由于对这个世界的微弱的开放，由于一般所说的被统治群体的种种形式的集体孤岛状态而得到加强。”^①

向心力

平民阶级顺从于社会隔离（学校和劳动的隔离）和空间隔离（被赶进工人住区和郊区）的强大机制，处于一种受封闭的地位。摆脱这一地位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被认为是不透明的、不可渗透的或者敌对的外部世界似乎超出了力所能及的范围。奥利维耶·施瓦茨写道：“平民阶级的生活世界首先是以封闭和被排斥在机会领域之外为其特点的。外部世界，社会地位不同于他们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关闭的。”^②

平民阶级经受的这种隔离，由于甘于自我排斥而变本加厉。一般来说，拒绝“僭越”和“越位”，这是同平民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这种既被统治又受隔离的地位，涵化为一种心理，主观的希望几乎是随客观机遇而调整。皮埃尔·布迪厄写道：“必然性确立了对于必然的东西的一种追求，也就是说确立了某种形式的对于必然的东西的适应，从而接受必然的东西，顺从不可避免的东西。”^③ 这种自我排斥首先表现为学业的自我淘汰（在小学结业后的自我淘汰或者留级的自我淘汰），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前了平民阶级的“流放”。皮埃尔·布迪厄和让-克洛

①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76页。被分离世界的模式符合被统治阶级的实际地位，亦即1960年代之前毫无疑问在绝大部分工人阶级中占据主导的状态。按照阿兰·德韦尔普的说法，1950年代初标志着“工人生活方式的顶峰”。见阿兰·德韦尔普《1880~1950年的法国劳动界》（Alain Dewerpe, *Le monde du travail en France 1880-1950*, Paris, Armand Colin), 1989。

②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77页。

③ 前引皮埃尔·布迪厄《区别》，第433页。

德·帕斯龙写道：“尽管结局是同样的，但平民阶级的学生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放弃进入中学（‘那不是为我们准备的’）而自我淘汰，得不到中学教育，并非是在进入中学之后才自我淘汰，更不是因考试失败受到明文规定的处罚而遭淘汰。”^①

这种自我排斥同样表现为“对于必然的东西选择原则”的品性上，“也就是说既是‘实际的’，又是‘看来并不过分的’”；^②表现为对于某些形式的有保障的集体生活（家庭^③和社区^④）的自省，以及“他们”与“我们”——保持“防护层”不可或缺的——之间的不同世界的表象。^⑤这种“自我幽禁”的逻辑^⑥旨在避免——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使自己面对经济和文化统治而毫不设防。奥利维耶·施瓦茨写道：“孤岛状态发挥着对于所受统治的防卫机制的作用。”^⑦如果说进入外部世界——包括它的地域、利益和生活方式——的机会是有限的，那么这样的限制涵化为一种心理，而且按照把必然性当作德行的逻辑，深入或者参与这个世界的意图也是有限的。

依据同样的观点，我们可以对是否存在各种形式的“文化

① 皮埃尔·布迪厄、让-克洛德·帕斯龙：《再生产》（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Passeron, *La reproductio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0, 第186~187页。

② 前引皮埃尔·布迪厄《区别》，第441~442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见奥利维耶·施瓦茨《工人的私人世界——北方的男人和女人们》（Olivier Schwartz, *Le monde privé des ouvriers, Hommes et femmes du Nord*, Paris, PUF), 1990。

④ 关于这种构建“封闭的地方社会”的倾向，见卡特琳·帕拉代斯《社交与阶级文化》，载于《法国社会学评论》（Catherine Paradeise, 《Sociabilité et culture de class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第21卷，1980。

⑤ 前引理查德·霍格特《穷人文化——英国平民阶级生活方式研究》。

⑥ 居伊·巴尔比雄：《即时文化与平民文化》，载于《书法学——献给米歇尔·韦雷的文集》（Guy Barbichon, 《Culture de l'immédiat et cultures populaires》, dans *Philographies. Mélanges offerts à Michel Verret*, Saint Sébastien, QCL Édition-Société Crocus), 1987, 第125~136页。

⑦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77页。

相异性”、“文化分离”、惯例、习俗、业已确立的秩序的价值“积极否定”、“相对独立的逻辑”等等，提出质疑。^① 对此，皮埃尔·布迪厄着重指出：“工人阶级成员对于阳刚气概价值的赞同，成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肯定自身的最自主的形式之一”，^② 而所谓阳刚气概价值表现为民众对于体力——劳动力或者战斗力——或曰“心直口快”秉性^③的赞赏。

离心力

然而，正如奥利维耶·施瓦茨强调的那样，很难“设想被统治群体能够在业已确定的合法性形式下持久地处于文化完全相异的状态中”。^④ 我们可以看到主流文化形式渗透进平民阶层的多种多样的表现。除了罗伯特·卡斯特尔所说的它们同“工薪社会”的日益扩大的整合（今天受到质疑的整合），我们既不能忽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克洛德·格里尼翁、让-克洛德·帕斯龙《学者与民众——社会学和文学中的悲惨主义与民众主义》（Claude Grignon, Passeron Jean-Claude, *Le Savant et le populaire. Misérabilisme et populisme en sociologie et en littérature*, Paris, Hautes Etudes, Gallimard/Le Seuil), 1989。

② 前引皮埃尔·布迪厄《区别》，第448页。他写道：“应该思考一下，民众把对于体力的赞赏作为他们的阳刚气概及产生和支撑这种阳刚气概的一切——诸如在养料和味道上都是‘有劲的’食品和饮料——的基本方面，或者说他们的劳动和力量的使用，难道同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关系：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比其他任何阶级更加依赖于再生产和劳动市场规律将之简化为肌肉力量的一种劳动力；不要忘记像工人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只有劳动力财富，除了提取这种力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同其他阶级抗衡，其战斗力依靠其成员的体力和勇气以及人数的众多，也就是说依靠他们的觉悟和团结性，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依靠他们的团结意识。”（第447页）

③ 皮埃尔·布迪厄在《说出想说的话——语言交流经济学》（Pierre Bourdieu,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2）一书中写道：“在平民阶级的案例中，说话的方式显然具有同基本上拒绝‘客套虚礼’或者‘扭扭捏捏’（亦即讲究说话方式和形式），体现阳刚气概——赞赏‘自然’态度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性格的表露——的群体相关的特点。”（第90~93页）

④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5页。

视社会化的进步，也不能不看到不断要求纳入大众消费规范的呼吁，以及社会生活的“心理化”。^① 皮埃尔·布迪厄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错误地无视借助一切新的治疗道德的媒介实施的道德化（或者去道德化）行动的名副其实的政治后果”。^②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笔者根据1970年代下半叶对平民阶级青年所进行的调查提出的“适合于”平民阶级的生活方式空间的三个极：^③ 阳刚气概极（是同譬如说纠察队的战斗世界或者运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中产阶级化极（是同获得财富的企求或者“为自己打算”的企求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化极（是同多种多样的自学^④——组织活动的、艺术的、科学的或者文学的自学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与“我们”

对于在他们中间发生作用的这些离心力量，这个群体不仅通过加强其内部的凝聚力，而且还通过其排斥力来回应。“保持同‘他者’的距离”，拒绝同他们为伍，拒绝同他们相类似或者向他们提出某种要求，对于来自“他们”的东西或者他们可能说和做的一切采取公开的怀疑主义态度，如此等等，表明他们拒绝放弃自我，体现了“一种自我意识和自尊诉求”。^⑤ 于是，

① 罗伯特·卡斯特尔、让-弗朗索瓦·勒克雷夫：《“心理”现象与法国社会——走向一种新心理文化》，载于《争论》1980年第1期（Robert Castel, Jean-François Le Cerf, 《Le phénomène “psy” et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Vers une nouvelle culture psychologique》, *Le Débat*, n°1, 1980），第27~38页。

② 前引皮埃尔·布迪厄《区别》，第447页。

③ 热拉尔·莫热：《平民阶层青年的异常生活方式空间》，载于克里斯蒂安·博德洛、热拉尔·莫热主编《平民的青春——危机的几代人》（Gérard Mauger, 《Espace des styles de vie déviants des jeunes de milieux populaires》, dans Baudelot Christian, Mauger Gérard dir., *Jeunesses populaires. Les générations de la crise*, Paris, L'Harmattan), 1994, 第347~348页。

④ 克洛德·F. 波利亚克：《自学者的志向》（Claude F. Poliak, *La vocation d'autodidacte*, Paris, L'Harmattan), 1992。

⑤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77页。

通过弗洛朗斯·韦伯所分析的“嫉妒/自负”的辩证法,^①“回归秩序(‘秩序为谁而建?’‘它不是为我们这样的人而建’)”的号召被视为顺应主义原则,旨在鼓励民众进行所谓‘合理’选择的唯一公开规范”,而且“还包藏试图防止平民阶级通过与其他群体认同——要求地位的平等一致,来凸显自己欲望的意图”,^②因此适得其反,成为召唤归队的力量,加强了平民阶级的封闭性。

同这种保持文化认同性相呼应的是建立一种政治认同性。就这一视角而言,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庸俗化学说的“理论效果”进行探讨:这种理论“创造了工人阶级”,并且通过使人相信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而存在的学说丰富了自身,从而达到了同“工人救世主主义”和“工人主义”相联系的昭雪平反的符号效应(推翻了沉重地压在本是“世间受苦人”转而成为“人类赎救者”的工人身上的污点),^③作为一种“世俗宗教”及其仪式(例如“五一节”)、英雄(民族的和国际的)和教会(党组织及其总书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所支撑的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效应,同党的基层组织、工会分支和多种外围社团,简言之即是同构建工人阶级的政治工作相关的工人社交(政治的、工会的、社团的)效应。^④

① 弗洛朗斯·韦伯:《次要劳动——工人人种志学研究》(Florence Weber, *Le travail à-côté. Étude d'ethnographie ouvrière*, Paris, INRA-EHESS), 1989。

② 前引皮埃尔·布迪厄《区别》,第443页。

③ 贝纳尔·皮达尔:《组成政党——法共历史社会学》(Bernard Pudal, *Prendre parti. Pour une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 PCF*, Presse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9。

④ 关于这个主题,见让-诺埃尔·雷蒂埃《工人的认同性——1909-1990年布列塔尼一个工人社区的社会史》(Jean-Noël Retière, *Identités ouvrières. Histoire sociale d'un fief ouvrier en Bretagne 1909-1990*, Paris, L'Harmattan), 1994; 安妮·富尔科主编《1920-1960年的红色郊区》(Annie Fourcaut dir., *Banlieue rouge 1920-1960*, Paris, Éditions Autrement, série Mémoires, n°18), 1992; 让-菲利普·厄尔坦主笔《战斗友情》(Jean-Philippe Heurtin, *Fréquentations militants*, Politix, n°63), 2003。

身份失落、消除隔离、分化

如何描述近30年来平民阶级地位的客观和主观的变化？简单地说，可以认为这些变化产生自三个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是工人群体社会身份的失落，另一方面是平民阶级的隔离消除，最后则是平民阶级内部的分化。

工人群体社会身份的失落

近30年来工人世界中发生的这种身份的失落，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和符号的。^① 工业生产的整个部门（矿业、冶金、纺织等）的重组和消失，新技术和老板的新战略的确立，^② 造成了工人就业数量的缩减，传统工人技艺的毁灭和他们赖以就业的技术证书的贬值导致大规模失业，不稳定性、“缺乏社会保障”的加剧，以及越来越频繁发生的贫困化，随之而来的，归根到底也就是“简单劳动力”（诸如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力）和“阳刚价值”地位的丧失，而这些东西过去被认为在“工厂文化”中，或者更普遍一点说在平民阶层的传统阳刚认同性的界定中占有核心的地位。

与工人世界的这种经济上的身份失落相伴的，乃是政治上的身份失落。这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现实社会主义”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形式的政治救世主义的价值丧失联系在一起，也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热拉尔·莫热《处于危机中的民众环境的再生产》，载于《城市—学校—一体化》1998年第113期，（Gérard Mauger, 《La reproduction des milieux populaires en crise》, *Ville-École-Intégration*, n°113, 1998）；以及前引论文《工人——一个一盘散沙的世界》。

② 关于这个问题，见《劳动中的新统治形式》，载于《社会科学研究学报》1996年9月第114期；1996年12月第115期（《Les nouvelles formes de domination dans le travail》, *Actes de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114, septembre 1996; n°115, décembre 1996）。

是与工会和政治代表机构的危机及这些机构作为代言人的贬值，工人群体在失业、对临时工施加的必须服从的要挟和打工者的竞争威胁下动员和抵抗能力受到破坏联系在一起的。^① 斯特法内·博德和米歇尔·皮亚卢写道：“在最近 15 年间，工人群体的集体先进性的观念已经丧失。在社会主义类型模式的基础上社会关系彻底改变的政治希望也随之消失。”^② 因此，抵抗精神，“共产党—总工会文化”对于跻身“城市青年”的年轻打工者来说变得不可理解，尤其是这些人抱着“过客”的生活态度来处世，或者希望获得稳定的工作，并且被消费主义的价值所误导。^③

平民阶级特别是工人不但在经济和政治上，而且在符号上也遭遇身份失落。这不仅表现为同“莽夫”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阶级种族主义”和草率地充当国民阵线选民，^④ 而且从种种迷失方向的举动中凸显出来：不仅在政治和舆论领域，而且在思想领域，在所谓“正名”的名义下，诋毁工人、工人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等传统用语，而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欺骗性说法（“熟练工人”被称为“计算机”，“技工”被称为“检测仪”，工厂被称为“企业”，罢工被称为“社会运动”，解雇被称为“社会计划”，工头被称为“监视器”，老板被称为“企业家”，如此等等）取而代之。“行话”的丧失不仅引起话语的混乱，而且贬低了被认为是没有前途的历史。

-
- ① 斯特法内·博德和米歇尔·皮亚卢在前引《工人地位再探索——索绍—蒙贝利耶标致汽车厂调查》中指出，政治化是与这样的信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工人群体构成决定性的社会力量，因为它拥有“劳动力”（第 330 页）。
- ② 前引斯特法内·博德、米歇尔·皮亚卢《工人地位再探索——索绍—蒙贝利耶标致汽车厂调查》，第 364 页。
- ③ 斯特法内·博德、米歇尔·皮亚卢：《城市暴力、社会暴力——新危险阶级的产生》（Stéphane Beaud, Michel Pialoux, *Violences urbaines, violence sociale. Genèse des nouvelles classes dangereus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3。
- ④ 安妮·科洛瓦尔：《国民阵线的民粹主义——一种危险的逆动》（Annie Collovald, *Le populisme du FN. Un dangereux contresens*, Bellecombe-en-Bauges, Éditions du Croquant), 2004。

这种符号身份失落首先是学校的大众化和工人子弟进入中等教育的普及化的产物,^① 传统的工人世界在不稳定化、失业和重新跌入贫困所造成的下沉解构同时,也开始通过觅求学业成功而赢得社会尊敬的上升性分解。学业价值的贬值在替代了平民阶级自我淘汰的同时,迫使工人或者雇员接受无需熟练技能的岗位,从而有效地加剧了平民阶级的符号身份失落。^② 这比另一种观念更有毁灭性:按照自然主义的“智力”观念(即所谓的“天赋意识形态”),学业的失败几乎从来都被认为是天生注定的,即使同一个家族的兄弟之间学业成绩也有所差异,尽管这种论断似乎淡化了社会出身的因果。工人子弟通过同学校的接触,习惯了中学生的生活方式,吸收了轻视体力劳动和工人地位的评价准则。一般来说,延长学业意味着社会阅历的扩大,同虽然从社会层面上说疏远,但地理上接近的动因的社会关系的确立。工人家庭内部据以同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参照(由于受到“青年文化”的影响而加强)社会空间的扩大,改变了工人家庭所处的社会坐标轴线,促进了工人群体的自我贬损,加剧了“充当工人或者继续充当工人的耻辱感”。

因此,奥利维耶·施瓦茨得出结论说:“一直在消耗精力却日益贬值和没有任何改善前景的繁重任务中挣扎的年过四十的工人们,现在不但被人视为已经年老,没有前途而遭遣散,而且他们自己也如此认为。20年前他们对工厂具有强烈的集体对抗和认同能力,今天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却被一种无能为力和身份失落的感觉所左右。这些气馁、筋疲力尽和丧失信心的父

① 工人群体经济、政治和符号地位的丧失一方面扩大了与学业普遍延长相联系的他们对职业能力和社会地位上升的希望,另一方面说明了日益增强的就学需求,通过长期学习来赢得社会尊敬的追求。

② 前引斯特法内·博德和米歇尔·皮亚卢《工人地位再探索——索绍-蒙贝利耶标致汽车厂调查》,第159-287页。

辈，也接受了工人阶级没有前途的观念，而他们的子女今天跨进了学院、中学乃至大学的大门。”^①

平民阶级的消除隔离

平民阶级的这种经济、政治和符号的身份失落感的逐步内化，显然削弱了他们保持赖以瓦解和对抗回归“顺从原则”压力的“自我封闭”能力。此外，学业的延长和扩展，就业的第三产业化，是否有钱作为衡量社会杰出的尺度这种准则的内化，^②个人化和破坏集体的多重机制，无不使这种“自我封闭”文化受到质疑。因此，霍格特关于平民文化世界的观点（隔离的世界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适合，昨天“内倾的”平民阶级今天已经变得“外倾”。^③

自1960年代以来，平民世界通过同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和时间越来越长的聚合，“获得了装备”；^④对于最现代和最熟练的

①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134页。

② 皮埃尔·布迪厄在前引《区别》一书第183页中写道：“所有的相关群体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朝着同样的目标——财产奔跑，这是在赛跑中占据第一位的群体设定的目标……这种制度给予信贷这样一种地位绝非偶然：通过竞争斗争确立合法性，而种种文化教化行动，亦即靠着作为牺牲者的共谋来施行的温柔的暴力使得这种所谓的合法性光彩倍增，因为它们能够赋予任意确定的需要以消费者所说的自由主义使命的表象，从而引发一种奢望，仿佛需要先于相应的满足手段而存在；社会秩序一般承认一切贫穷的人有权获得各种满足，但需要时日，只能经过很长的时期才能达到，而这种奢望同此相反，要么选择信贷，这样做虽然可以立即享受想要的消费品，却丧失了前途——作为现在的继续的前途，要么接受仿制品——假的豪华汽车和装模作样的豪华假期。”

③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75页。

④ 让-皮埃尔·泰拉伊主编《法国的学校建设——校舍设备批判》（Jean-Pierre Terrail dir., *La scolarisation en France. Critique de l'état des lieux*, Paris, La Dispute), 1997; 斯特法内·博德: 《80%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然后呢? ——学校民主化的后代》（Stéphane Beaud, *80% au bac... et après? Les enfants de la démocratisation scolair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et Syros), 2002。

工人家庭来说，所关注的是动员一切力量来保证子女在学校获得成功，使他们的职业地位或者社会地位得以上升。从1980年代开始，上学的“可能”变成了“必须”：^①随着失业的上升和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调动一切力量——往往是倾其所有——送孩子上学，对于平民家庭来说变成了一种越来越强制的命令。平民子女在学校体系内部逗留时间的延长，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学校体系及其影响在平民家庭内部的扩大。^②这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学业资本通过学业的成功渗入平民家庭——即使不是多子女家庭，至少是扩大的家庭，这本身导致走出传统文化，接受另一种文化，以及竞争或者抵抗，或者至少是不稳定化。学校的大规模普及，开辟了从出身地位中解放出来的前景，尽管这样的前景是脆弱的，但其可能性本身使得基于领域不再缩减为阶级命运的简单再生产。奥利维耶·施瓦茨写道：“换句话说，学校在被统治阶级的生活世界中树立、渗人的，乃是并非已经在集体命运中载入和铭刻的一种个人历史的表象。”^③

此外，社会—职业结构中的变革——第三产业部门特别是意味着同公众或者顾客交往的“服务关系”的发展，导致平民阶级的一大部分人，特别是女性，从事服务业。^④由此至少产生了随着学校大规模普及发展而有利于平民阶级消除封闭，向主流文化“开放”的两个结果。一方面，同外部世界的多样化互

①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122页。

② 让-皮埃尔·泰拉伊：《家庭—学校互动社会学》，载于《当代社会》1997年1月第25期（Jean-Pierre Terrail, 《La sociologie des interactions famille-école》, *Sociétés contemporaines*, n°25, janvier 1997）。

③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131页。关于这个问题，见皮埃尔·布迪厄《阶级前途与或然因果性》，载于《法国社会学评论》第15卷，1974年第1期 [Pierre Bourdieu, 《Avenir de classe et causalité du probabl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XV (1), 1974]。

④ 阿兰·舍尼：《雇员们》（Alain Chenu, *Les employés*,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94。

动的发展（从公交车司机^①到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查票员^②，再到助理护理员^③），使得互动能力的发展变成一种“交往资本”，从而促使“心直口快”和传统平民阶级男子的阳刚价值贬值。^④另一方面，婚姻关系的相对异杂，^⑤发展了同经常投入“人性事物世界”^⑥的女职员的女性世界的接触。

① 见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

② 玛丽-埃莱娜·勒希安：《一个窗口职业——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查票员》，载于《解剖刀》1999年第4~5期（Marie-Hélène Leichien, 《Un métier exposé: les contrôleurs de la SNCF》, *Scalpel*, n°4-5, 1999），第73~110页；并见《人道主义实践——战斗性的介入与职业投资》，“社会学学位论文”，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Pratiques humanistes. Engagements militants et investissements professionnels*, Thèse de sociologie, EHESS），2002。

③ 安娜-玛丽·阿尔博里奥：《世俗知识与社会鉴定——医疗机构中的助理护理员》，载于《发生》1996年3月第22期（Anne-Marie Arborio, 《Savoir profane et expertise sociale. Les aides-soignantes dans l'institution hospitalière》, *Genèses*, n°22, mars 1996），第87~106页。

④ 奥利维耶·施瓦茨在前引《“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一书第101页中写道：“在从事服务的平民阶级中间，一些劳动状况易于产生互动行为的能力，众所周知，这样的能力对于平民阶级的成员来说并非天生就有的。这些人处于这样的地位，特别是他们属于上学时间较长的几代人，能够扩大他们的交往资源，也就是说他们同外部世界接触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校大规模普及和第三产业化的双重效应能够从文化上改变至少是部分平民阶级的成员。”

⑤ 工人的经济、政治和符号的身份失落也许同样也意味着他们婚姻限制的打破：我们实际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平民阶层的青年女性在学期限的延长，使她们“更能接受”掌握文化资本或者经济资本所具有的诱惑，促使她们转向，看不起身强力壮和阳刚价值的“自然”魅力。换句话说，体力和阳刚价值可能像在劳动市场上一样，在婚姻市场上也贬值了。

⑥ 涂尔干把“物质事物的世界”同“人性事物的世界”对立起来。本着同样的精神，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将“物的物质”或者“惰性的物质”、“物质化的人性”与“从其人格和人性来认识的人”区别开来，见莫里斯·阿尔布瓦克斯《社会阶级与形态学》（Maurice Halbwachs, *Classes sociales et morphologi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第58~94页；《物质与社会》；第95~111页；《中产阶级的特征》。与施加于“物质事物世界”（“锉刀”的肮脏和喧闹的世界）的“体力劳动”相对立的，乃是施加于“人的世界”的“体力劳动”（从理发师到助理护理员），两者又都同施加于“物质事物世界”的“脑力劳动”（“指令”的安静世界）和施加于“人性事物世界”的“脑力劳动”（各类“倾听顾客”的职员）相对立。

平民阶级的“资产阶级化”这个论点并非是什么新东西。早在1960年代，亨利·科英就指出，在一些工人家庭中，拥有现代化的住房刺激了与“追求舒适和现代主义标准”的可能性乃至迫切需要联系在一起的购买欲望。^①居伊·格鲁和卡特琳·莱维则认为，^②工人阶层拥有房产在1980年代前半期依然显示出十分强劲的势头。^③在同样的意义上，学业的成功越来越被看做是经济成功的条件和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尺度的经济资本。马利卡·古伊里尔在对摩洛哥移民家庭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指出：“能够成功地进入学校”等于“可能在学业上获得最大进展”，而“学业获得进展”和“不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就是“富人”；“大学是一个未分化的世界，在那里从来没有学习问题，而只有获得文凭的问题……进入大学是为了得到知识，也就是说首先是为了不在工厂工作，而得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没有再陷入失业的风险，以便挣钱”。^④因此，可以从经济资本所支配的社会世界的单向度的观点来理解学业的“工具性”。一般来说，默顿关于1950年代美国社会的论述看来可以应用于20世纪最后20年的法国社会。默顿写道：“有人说金融的成功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这无异于下结论说美国人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诸如此类的狂轰滥炸：人们有权利乃至义务向自己提出这样

① 亨利·科英：《城市更新与社会变化》（Henri Coing, *Rénovation urbaine et changement social*, Paris, Les Éditions ouvrières), 1966。

② 居伊·格鲁、卡特琳·莱维：《工人的财产——从简陋的小屋到房产（19～20世纪）》（Guy Groux, Catherine Lévy, *La possession ouvrière. Du taudis à la propriété XIXe-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1993。

③ 关于这个问题，并见《住房经济学》，载于《社会科学研究通报》1990年3月第81～82期（《L'économie de la maison》，*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81-82, mars 1990）。

④ 马利卡·古伊里尔：《外来者的子女——社会化与法国的摩洛哥移民工人子女家庭的轨迹》，“社会学学位论文”，巴黎第十大学（南泰尔），1997年12月（Malika Gouirir, *Ouled el kharij: les enfants de l'étranger. Socialisation et trajectoires familiales d'enfants d'ouvriers marocains immigrés en France*, Thèse de sociologi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 décembre 1997）。

的目标，不管结果多么失望。”^① 人们梦想着系统灌输所谓的“青年文化”，以使香榭丽舍时髦的“店铺”变成培养“青年文化”的伊顿公学，这是“青年才俊的化身”，人人梦想跻身其间，尽管能够成功者只是寥若晨星的特殊人选。

最后，必须指出形形色色的机制是如何促使集体感解体的，或者像弗洛朗斯·韦伯所说，是如何瓦解同传统的民众气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平等要求”的。^② 笔者只限于指出其中的两点。一方面，学校等级森严，或明或暗地不断鼓励竞争：它通过扩大工人和平民群体成员可能具有的社会命运的差异，来刺激个人的野心，鼓励各种各样的个人奋斗的计划和策略。另一方面，劳动世界的新的统治策略（即所谓参与式管理）旨在既鼓励个人的独创性，又摧毁所有的集体，其办法就是更多地设置各种身份：从无定期合同工到定期合同工，再到临时工。^③

平民阶级内部差别的加深

随着平民阶级向“主流文化”的开放，以及这种开放所意味着的传统气质的贬值而来的，乃是平民阶级内部的差别的加深。从无定期合同工与定期合同工之间的差别开始，这样的差别或多或少同法国人与移民、男性与女性、青年与老人之间的差别相叠合。

1960年代，一方面是旨在消灭贫民区和转口城的“大建筑群”的加快建设，以及安居政策的出台，另一方面是非熟练雇员失业的逐步扩大，从而加剧了1970年代的城市隔离：在地位上升

① 罗伯特·K·默顿：《社会结构、混乱和异常》，载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基础》（Robert K. Merton, 《Structure sociale, anomie et déviance》, *Éléments de théorie et méthode sociologique*, Paris, Armand Colin/Masson), 1997, 第168页。

② 前引弗洛朗斯·韦伯《次要劳动——工人人种志学研究》。

③ 热拉尔·莫热：《嵌入政策——促使劳动市场不稳定化的悖论》，载于《社会科学通报》2001年3月第136~137期（Gérard Mauger, 《Les politiques d'insertion. Une contribution paradoxale à la déstabilisation du marché du travail》,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136-137, mars 2001), 第5~14页。

的平民阶级搬离廉租房城的同时，贫困阶层（首先是移民家庭）不得不依然留在条件越来越恶劣和千疮百孔的贫民窟。^① 根据诺贝尔·埃利亚斯的观念框架，“定居者”与“边缘者”之间（常常也就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与移民之间）的张力加剧：^② “街

- ① 奥利维耶·马斯克莱指出了可以用来分析“敏感社区”出现的三个发生机制。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间工人城的更新与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行动同时发生：工人住房的改善提高了进入的门槛，从而加剧了住房的升级象征着集体地位上升的法国技术工人（所谓“可尊敬的工人阶级”）与熟练工人和马格里布苦力之间的断裂，后者被认为只是“暂时”逗留——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没有“定居”的奢望，因此注定要住在贫民区、“夜店”、简易房，再到转口城。在瓦莱里·吉斯卡·德斯坦总统的7年任期期间，新的住房政策特别是1977年的巴尔法，为平民家庭购买房产提供了方便。因此，技术工人和中产阶层大量搬出廉租房，“大建筑群”则降低身份，不再体现“工人的成功”。“替补顾客”、马格里布家庭进入大建筑群，加速了其降级，“独立住宅工人”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分化进一步加剧。第三个机制是从1970年代下半叶开始，工人的条件恶化。一方面是群众性的失业和非技术工人的不稳定化；另一方面是学业的延长和进入劳动市场的门槛的提高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其中包括平民阶级的青年的“脱工人化”（“青年文化”规范的内化）和（学业、职业、家庭的）“一无所长”，因而注定热衷于“街头文化”的青年的大量增多。关于这个问题，并见皮埃尔·布迪厄《房产效应》，载于皮埃尔·布迪厄主编《世界的贫困》（Pierre Bourdieu, *Effets de lieu*, dans Pierre Bourdieu dir., *La misère du monde*, Paris, Seuil), 1993, 第159-167页。
- ② 诺贝尔·埃利亚斯、约翰·L. 斯科特桑：《排斥的逻辑》（Nobert Elias, John L. Scotson, *Logiques de l'exclusion*,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7。伊莎贝尔·库唐指出，日益严重的不容忍，抛弃私了争端，对于权利的诉求，产生自“定居者”与“边缘者”之间的力量对比的改变（特别是居住空间中的“街头文化”的确立），以及压在定居者心头的对于地位下降的焦虑。[见《司法制度与平民阶层青年的道德教育：对于两个机构——一个法院和一个青少年司法保护推广机构的人种志学调查》（*Institution judiciaire et éducation morale des jeunes de milieu populaire. Enquête ethnographique sur deux dispositifs: une Maison de Justice et un dispositif d'insertion de PJJ*, Thèse de sociologie, EHESS, 2003)]]。参见热拉尔·阿尔塔贝过去所研究的廉租房家庭及其子女的相互诉讼案《作为问题的住宅》，载于热拉尔·阿尔塔贝、克里斯蒂安·马尔卡代、米谢勒·德拉·普拉代勒、莫妮克·塞兰《城市化与日常问题——今日法国的民族学阵地》（《*La résidence comme enjeu*》, dans Gérard Althabe, Christian Marcadet, Michèle de la Pradelle, Monique Sélim, *Urbanisation et enjeux quotidiens. Terrains ethnologique dans la France actuelle*, Paris, L'Harmattan), 1993, 第1-69页。作者提出抱怨，这是重申自己属于“富有家庭”，并且试图通过司法机关来加以认可，但也许主要是为了获得公众对于以他们作为价值基础的规范的肯定。

头文化”的发展所形成的“不安全感”，加强了社会不安全感，而“逃命吧”的呼喊加强了居住地和学校的社会与空间的隔离。

“现时代”

今天如何描述平民阶级的生活方式空间？笔者在试图阐明想以多种方式走出霍格特描述为地域、社会和文化上封闭的世界的平民阶级地位的客观和主观变化之后，感到有必要一方面明确地指出文化的吸纳从来不是一个群体单纯地与它所接触的文化同化：文化的吸纳不排斥文化扬弃意识（表现在接收水平或者接收方式的差异上）；奥利维耶·施瓦茨写道：“作为文化吸纳的两个方面的扬弃和嫁接继续在文化吸纳过程内部产生着其效应。”^① 另一方面，一切“同化战略”意味着“异化战略”：统治集团想尽一切办法促使文化实践活动平易近人，这是它们固有的手段，旨在按照沟通和区别的辩证法来重新界定精英主义的新活动。最后，正如纳坦·瓦克泰尔着重指出的那样，^② 文化吸纳往往是通过文化的补充和修订，而不是通过消灭原有文化或者用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的方式来进行的：一些新的因素被吸纳进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改变的原来的实践活动的系统中。文化的升华并非同经济的上升不可相容，阳刚文化不排斥“金钱文化”。^③

考虑到前述种种现象，今天如何描述平民阶级空间？笔者

① 前引奥利维耶·施瓦茨《“平民阶级”概念——社会学研究的指导概念》，第137页。

② 纳坦·瓦克泰尔：《文化吸纳》，载于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撰写历史》第1卷，《新问题》（Nathan Wachtel, 《L'acculturation》, dans Jacques Le Goff, Pierre Nora dir., *Faire de l'histoire I, Nouveaux problèmes*, Paris, Gallimard), 1974, 第124~146页。

③ 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Thorstein Veblen, *Théorie de la classe de loisir*, Paris, Gallimard), 1970。

首先认为，以往的三极结构，亦即所谓的阳刚极、资产阶级化极、知识化极依然存在，但今天离心力试图压倒向心力。而且，在这种三极结构上叠合着“定居者”与“边缘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定居者”——“有独立小屋住宅”的工人和职员，通过他们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相对积累以及学业的成就而不同于以往；^①“边缘者”——通常属于移民的工作不稳定的工人和职员，只能把已经贬值的阳刚价值置于优先地位。

^① 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指出，无形的、同针对自身的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同其载体不可分割的，而客体化的经济资本的积累是可以同它的持有者分离的，因此似乎可能偶然落到任何人头上（由此而归因于手段、机遇和偶然性的作用）。

第三章

自由主义、全球化、替代性选择

皮埃尔·库尔-萨利

只要人们给予它和平地繁荣发展的可能，现代技术的精神正恰恰于促使人类具有更大的能力把握自然和社会。

——皮埃尔·纳维尔

若干年来，我们在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目睹了一种悖谬的状况：对于右翼自由主义或者社会自由派的资本主义管理政策的实际上的拒斥，并没有通过展现某种前景的集体意识表达出来。颇为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提出同公众思考替代或者至少有力地矫正这种制度的社会变革目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同这种极端谨小慎微的态度相对抗，看来已经提到日程上，这样的对抗被认为是必要的、有益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些局部的战斗和连续的失败可能正在为彻底逆转做好准备。

然而，反对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政策和行动从未停止：从1995年12月到2005年5月29日全民公决对《欧洲宪法条约》说“不”的结局，超过70%的居民几乎毫无例外地支持历次罢工。那么，如何理解大多数人共同反对自由主义政策的态度与各种社会斗争力量分散、各自行动的现状之间的这种反差？尽管对所有的政治组织都不信任的这种说法也许部分是真实的，

但它依然是一个错误的“解释”。毫无疑问，它关系到一个本质的问题：缺乏围绕共同目标的统一行动，而争论对于达成这方面的成果有害无益。怎样更好地理解至今已经延续了十来年的这一现实呢？本文在重新解读的基础上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论述，延伸和重新检验以前的若干论说，^①对四个更加不合时宜的命题进行讨论。

现实的阶级统治由于深刻动摇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各种社会保障，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看不到为共同目标进行斗争的可能性。与此叠合的是被错误地用简单的标签归功于“自由主义”的大规模的国际和国内变革。因此，我们试图在坚持对马克思的论述进行重新解读的基础上，阐释民主创新的要求如何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最后，将从多极世界及雇佣劳动关系的视角，提出若干前瞻性的看法。

等级划分和招安——统治的支柱

群众斗争从其再起之日起就隐含着重新消失的苗头。它们彼此分裂，变成进行伪社会学的道德说教的借口。许多作者

^① 皮埃尔·库尔-萨利：《劳动自由》（Pierre Cours-Salies, *La liberté du travail*, Paris, Syllepse), 1995；《劳动、经济与政治》，载于《共产主义评论》1998年第152期（《Travail, économie et politique》, *Critique communiste*, n°152, 1998）；《劳动时间与新的社会分裂》，载于《劳动社会学》1999年第74-75期，重新收入克洛德·迪朗和阿尔兰·皮雄主编《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Temps de travail et nouvelles segmentations sociales》, *Sociologia del lavoro*, n°74-75, 1999, repris dans Claude Durand, Alain Pichon dir., *Temps de travail et temps libre*, Bruxelles, De Boeck), 2001；《昨天的社会权利》，载于托尼·安德烈亚尼、米歇尔·瓦卡卢利斯主编《改造政治》（《Droits sociaux d'hier》, dans Tony Andréani, Michel Vakaloulis dir., *Refaire la politique*, Paris, Éditions Syllepse), 2002；《以前的未来与现在》，载于皮埃尔·库尔-萨利、米歇尔·瓦卡卢利斯主编《集体动员——一场社会学论战》（《Un futur antérieur et un présent》, dans Pierre Cours-Salies, Michel Vakaloulis dir., *Les mobilisations collectives. Une controverse sociologique*, Paris, PUF, coll. 《Actuel Marx Confrontation》), 2003。

把对于依然可能有多如牛毛的解释的资本主义虚假表象的批判同资本积累情势的分析混为一谈。但是，这一矛盾依然比其他矛盾更有决定性意义，它迫使绝大多数的雇佣劳动者就范，而不出现重大偏离，并保持相对的生产效率。归根结底，每个男女的价值取决于马克思称之为“拜物教”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通过其再生产、变革、继承和演进而自我延续的核心现象。^①

最近的一本书《等级的底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个过程的一系列完整的考察。^② 其中的12篇研究，加上4个综合报告，描绘了一个四分五裂的概图，提出了可能的团结统一原则。为了理解某些特殊情况，我们必须以某种“形态”——借用诺贝

-
- ① 让-玛丽·樊尚：《拜物教与社会》（Jean-Marie Vincent, *Fétichisme et société*, Paris, Antropos), 1973；斯塔弗罗斯·通巴佐斯：《从经济分析看时代——资本中的时代范畴》（Stavros Tombazos, *Le temps dans l'analyse économique. Les catégories du temps dans le capital*, Paris, Éditions Société des saisons), 1994。
- ② 皮埃尔·库尔-萨利、斯特法内·勒莱主编《等级的底层——等而下之状态的社会构建》（Pierre Cours-Salies, Stéphane Le Lay dir., *Le bas de échelle. La construction sociale des situations subalternes*, Toulouse, Éditions Éres), 2006。其中的至少8篇研究是在生活在“平民区”的群体中进行的，或者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气息，这绝非偶然。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它在相关领域的效应，或者至少是向城市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了问题。这部几乎完全是经验的著作，由对于个人轨迹的分析组成：阿梅德，40年前出生在巴黎一环线的一个社区；由克里斯蒂安·莱奥芒和妮科尔·索托-莱奥芒选定的社会人物；伊莎贝尔·塔蒂在塞纳-圣德尼进行的50多年的研究；埃马努埃莱·拉达观察得十分细致的青年——姑娘和小伙们的工作；卡利马·冈富多年研究的成为“职业轻罪罪犯”的人们，而萨巴赫·谢伊布则指出了绝大部分不同身份移民妇女的双重伤痕；让-克洛德·邦弗努蒂对于麦当劳的青年工人的研究和穆斯塔法·普瓦拉兹对于小区建设推动者的研究，阐释了作为隔离的牺牲品的青年如何积累了最不值钱的技艺；利斯·克斯关于退休人员之家中的助理护理人员的研究，扬尼克·勒康特雷克关于办公室职员的研究，克里斯蒂娜·塞萨尔关于国民教育部工人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所有临时工的相近的职业状况。总之，不论他们以前有什么个人的希望，得到相对稳定的工作的青年男女，用流行的话来说，“比其他人运气更好”。这多少也说明了从事信息处理的男女青年的状况，他们怀着避免自己的“专业技能”失去认证的希望，不得不接受无疑是最差的工资待遇。

尔·埃利亚斯的表述来说^①——作为参照。这部著作通过这种基本的关注，阐明了一些经济的或者司法的设置、社会保护法规或者就业政策，乃至一些职业的迅速演变如何最终趋于相互补充，相互结合。这创造了某种“拼贴画”，其中几乎每一篇研究都可能是从专业角度来论述的；但整体的画面揭示了上述各种因素彼此是如何相互支撑而趋于稳定的。由于缺乏潜力，这些因素中没有比较突出者。

这些研究报告特别关注的贫困社会阶层的人们，超出了上述相近性效应和以“天然”秩序为参照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分化，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沉重地压迫着整个社会的意识。对这些研究报告进行比照，这样的选择本身尽管不是我们的初衷，但它阐明了处于形形色色不稳定状况的数量极其庞大的人们希冀稳定的愿望，如何推动每一个人去牢牢抓住现在抓在手里的东西。劳动关系，不论是直接形式的还是被迫否定的，都可以同其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共存。每个人无不感觉到这种统治关系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影响。“等级的底层”显然发挥着使那些站得较高而能够具有更大的弹性、批判活力和强烈诉求的人们趋于稳定的作用。

每个人都在社会的鼓动下觅求个人获得“功成名就”的可能，认为这是一种先于一切的个人能力。这样的幻想使人们忘记了诸如此类成功的极其残酷的环境，^②以及将会遇到的障碍，而将失败的缘由归结为个人的偶然际遇；把各种因素同批判的社会分析割裂开来，这种做法在招安中起着十分强大的作用。人人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安分守己”，丧失了发现“可能

① 诺贝尔·埃利亚斯：《个人的社会》（Nobert Elias, *La société des individus*, Paris, Fayard, Pocket), 1991, 袖珍本。

② 贝亚特丽斯·阿佩：《成功独裁——受控制的独立性与不稳定化的悖论》（Béatrice Appay, *La dictature du succès. Le paradoxe de l'autonomie contrôlée et de la précarisation*, Paris, L'Harmattan), 2005。

近在咫尺”的机会的意志和能力。

由此可见，稳定的劳动关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为在校学习的青年描绘着远景，并因此而在他们的父母和家庭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分量，这是由这些家庭本身的情况及对于自己子女的希望或者担心所决定的。关于社会不安全问题的大量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对服从于一种只容许“相互承认”框架内的“受驱动”关系的研究，^① 还是对培训与就业之间的过渡的研究，^② 无不如此。由于缺乏稳定的雇佣劳动，社会势必更加“依靠”这样一种雇佣关系：它不仅包含对于劳动力的直接分配及其在消费权利网中的长期存在，而且注重凯恩斯主义管理阶段视为民主安全规范的人权。

为了衡量诸如此类的分化，我们必须提出一种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分析：一个分层和等级化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在日常生活中的相对合理性。确实，就总体情况而言，与此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缺乏对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政治争论。^③ 由于缺乏共同目标，人们是“幼稚的”，就像年岁多少偏高的妇女，或多或少带有仇外乃至种族主义的特点。

大家知道，“等级的底层”发挥着一种讽喻的作用。如果狭义地加以解释，只注意某种特殊情况的定位，那么就罕有机会

① 克洛德·迪巴：《社会化——建立社会与职业的认同性》（Claude Dubar, *La socialization, construction des identités sociaux et professionnelles*, Paris, Armand Colin, 2002（第一版，1991），第213页。

② 露西·唐吉主编《培训—就业的难以寻找的关系——法国的一种研究态势》（Lucie Tanguy dir., *L'introuvable relation formation/emploi. Un état des recherches en Franc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86；弗朗西斯·韦尔涅：《从学校到就业——期待与表象》（Francis Vergne, *De l'école à l'emploi: attentes et représentations*, Paris, Syllepse/ Nouveaux regards, 2001。

③ 米歇尔·瓦卡卢利斯、让-玛丽·樊尚、皮埃尔·扎尔卡：《走向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确立一种解放政策》（Michel Vakaloulis, Jean-Marie Vincent, Pierre Zarka, *Vers un nouvel anticapitalisme. Pour une politique d'émancipation*, Paris, Les Éditions du Félin, 2003。

找到批判这些社会关系的原则。但是，如果允许几百万个人聚集在一起，附着于社会等级体系的某一个点，那么就要求揭示一个比点状批判世界的贫困和社会问题变形更加强有力的原则。诚然，各个雇佣劳动者群体或者附属于社会体系的个人之间的差异，可能不再作为诸如年龄群体、性别群体所固有的那种自然等级划分原则出现，而是作为各自固有的经验出现，而且一旦具有广泛的集体行动的机会，它们就成为旨在改变生活世界的经验，能够开辟和正确引导集体行动的道路。

简而言之，这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存在一个作为所有人——不论男女——的日常生活和前景的方向标的决定性的冲突维度，也就是说存在一种阶级冲突，这是一个需要加以修正的概念，因为必须整合一系列现实情况的特征，以实现可能的超越。从对于现实状况的抗争到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无不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团结。必须超越对于阶级体系的各种不同理解，而这样的转变不可能自动发生。这一转变包含着诸多相互联系着的因素，我们在此可以简单地加以概述，其中一个比较困难的因素无疑就是同历史分期相关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相异见解的鸿沟从何而来？我们概略地阐释一下 20 世纪下半叶的一个分期。我们必须请大家重读一读皮埃尔·纳维尔在 20 世纪 60 年代转折时期，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信息革命”之初的著作。^① 在此期间，他的分析得到了验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启发价值。皮埃尔·纳维尔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新事物：出现在工业中的自动化能力——他在提出具有实践价值的命题同时，强调了其关键性的作用。当时研究诸如此类趋势

^① 皮埃尔·纳维尔：《走向社会自动主义？劳动与自动化问题》（Pierre Naville, *Vers l'automatisme social? Problèmes du travail et de la'automation*, Paris, Gallimard), 1963。

的有马德琳·吉尔伯特、乔治斯·弗里德曼和皮埃尔·纳维尔。无需在此展开一场关于劳动社会学的关键性争论，我们知道马德琳·吉尔伯特强烈希望分割成诸多小部分而使人疲劳的劳动能够借助更加聪明的机器而有所改变，减少异化的性质，希望形形色色的重复性任务消失，在未来通过不同于强加于人的机械动作的其他手段来加以整合。

皮埃尔·纳维尔对于乔治斯·弗里德曼的乐观主义保持批判的距离，指出随着自动化的各种发明，为劳动组织开辟了两条道路。最积极的一面是有可能降低强制劳动的地位，也就是说由于生产率的获益而减弱资本主义工薪关系的作用。^①这可以使个人在各种无名的劳动岗位上进行替换，从而超越对于把个人封闭在过分排外的特殊的操作知识中的技能的膜拜，有可能集体介入一种促使自由时间更多的劳动的社团组织。他用自己的声音呼吁超越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链锁，但不同意对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所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不加分析，而提出新的劳动组织的种种问题。皮埃尔·纳维尔写道：“不论悲观主义者如何说，新技术乃是自由之胜利……它们宣告随着对于它们的掌握，社会条件的不断改善。”^②他还指出了为何“两性之间的关系能够由此而得到机会，来寻求新的形式”。^③

皮埃尔·纳维尔强调各种潜在的力量，揭示了一系列基本矛盾。在管理的名义下，工资变成了价值相对微小的可变资本。皮埃尔·纳维尔写道：“高度自动化的企业乃是人力劳动成本降至最低的企业。”^④事实上，即使几个人的报酬比在某些不同情

① 皮埃尔·纳维尔从1958年起还论证了随着生产率的飞跃，工资不减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从1964年开始，他还建议工会运动在跨职业的范围内注意企业内外的终生智力和职业的独创性培训的要求。

② 前引皮埃尔·纳维尔《走向社会自动主义？劳动与自动化问题》，第45页。

③ 前引皮埃尔·纳维尔《走向社会自动主义？劳动与自动化问题》，第251页。

④ 前引皮埃尔·纳维尔《走向社会自动主义？劳动与自动化问题》，第175页。

况下更高，由于对于可以产生巨大“相对剩余价值”的机器的投资，也只需花费极微而产生巨大的“附加值”。此外，“通讯领域将作为一个统治着社会的小社会，支配生产领域”，^①而企业不再是一系列独立的单位。“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事实说明“自动化的人”是罕见的。皮埃尔·纳维尔写道：“直接或者间接受自动化控制的男人和女人占非技术职位的80%。”^②由此，他强调指出，如果不去努力回头看一看雇佣劳动者在进入工厂、办公室、工作岗位之前的状态，就不能理解劳动关系。显而易见，实际上屈从于资本主义逻辑，这并非始于进入工作岗位之时。同样，减弱这种从属性，甚至在社会化和自治的框架内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除非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的多维的改变，否则就不可能。

相反，在我们看来，皮埃尔·纳维尔的另一个假设对于许多人来说正在变成现实：开发少数社会承认而令人感兴趣的技术劳动岗位，而对于其他所有人特别是绝大部分女性来说，则开发可以相互转换的动作，亦即一种“非技术的劳动”。^③在大多数人看来，能够有助于减弱资本主义统治的手段，自战后“重建”以来便掌控在领导阶层手中。由此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不仅表现在消费水平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组织上。在许多欧洲国家中，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运动的爆发正说明了这一点。^④但是，经过30年后，应该说领导阶级按照其自己的方式重组了社会环境和社会政治选择体系：自动化，

① 前引皮埃尔·纳维尔《走向社会自动主义？劳动与自动化问题》，第231页。

② 前引皮埃尔·纳维尔《走向社会自动主义？劳动与自动化问题》，第28页。

③ 里夏尔·塞内：《非技术劳动》（Richard Sennett, *Le travail sans qualité*, Paris, Albin Michel), 2000。

④ 居伊·斯皮塔埃尔主编《欧洲的社会冲突》（Guy Spitaels dir., *Les conflits sociaux en Europe*, Semaine de Bruges, Collège d'Europe/Marabout), 1971；皮埃尔·库尔-萨利：《民主工会联合会——一段代表未来的历史》（Pierre Cours-Salies, *La CFDT. Un Passé porteur d'avenir*, Paris, La Brèche), 1988。

碎片化，大规模失业，以及企业、规章和得到承认的技能的主要等级划分。^① 这个阶级现在造成了雇佣劳动者最缺乏保障的环境，并试图按照它的口味来重构作为社会保障的劳动法。20世纪60年代的转折时期没有取得成果或者失败的种种斗争，比人们以通常认识现实或者“可能”的方式所想象的更加沉重地压迫着社会意识，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把一切希望看做是打上了“非现实主义”烙印的要求。

因此，我们比较尖锐地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以免把自己禁锢在“现场调查”之中，因为这样的“现场调查”往往画地为牢，残缺不全，有时甚至听信政府的承诺。苦难的现状，各种各样的诉求，在生产关系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凡此种种不能割裂开来，否则就有陷入客观主义或者其变种——宿命论的危险。在人们开始怀疑阶级的概念还能否提供一个共同理解的原则的同时，透过诸如技术革命能给予的机会等多样调研所进行的对大量下层情况的全景分析，使我们可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出现一个社会阶级，只要亮出其进行重组的轴心思想，就能把所有被统治者凝聚在一起。^②

马克思经典分析的一个特殊案例

马上出现的是各种不同的“质疑某些价值”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对于被剥削群众来说不构成一个时间的参照系，而只是

① 马泰奥·阿拉卢夫：《苦力时代——劳动社会学中的培训、就业和技术资格》（Mateo Alaluf, *Le temps du labeur. Formation, emploi et qualification en sociologie du travail*, Bruxelles, Institut de sociologie, Éditions de l'ULB), 1986；玛塞勒·斯特罗邦茨：《操作技术与劳动能力——才能能够生产社会学》（Marcelle Stroobants, *Savoir-faire et compétences au travail. Une sociologie de la fabrication des aptitudes*, Bruxelles, Institut de sociologie, Éditions de l'ULB), 1993。

② 前引皮埃尔·库尔-萨利《以前的未来与现在》。

一个符号的参照系。否认“自由主义”最终表现为团结、公正的诉求，而诸如此类的诉求不包含可解析的对抗因素；人们因此而怀疑阶级概念是否还能提供一个共同理解的原则。如果更加仔细地考察各种情况的实际的差别，那么我们会理解为什么对于阶级的统一反应依然是困难和缺失的：“临时就业人员”的社会状况同“固定工”的状况相差甚远，何况在后者中间也有很大的差别，而在这两种情况之间还存在被封闭在“劳力租用”状态之中的人员——大部分女性——的情况。^①

我们将确切说明这些人员在 2700 万潜在就业人口中的数目。除了几百万处于劳力租用关系的人员之外，约有 500 万“临时就业人员”。他们挣扎在顺从听命和为“不落入更低层”而努力奔忙之间，体验着使他们丧失以后生机的长期失业的悲剧，因为人人知道，在雇主眼里他们失去了就业的资格。这个“贫困陷阱”包罗了作为同时登记为临时工的社会设施的受惠者（150 万），毫无疑问还包括部分时间工作的钟点工（200 万或者更多）。总计有 600 万或者 700 万人没有被算作失业者，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妇女。所谓的“稳定工薪人员”处于第三极，这个表述覆盖着十分复杂的多种情况；但我们使用它首先是为了

① 这些是前引《等级的底层》一书中使用的术语。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概要说明：“临时就业人员”（*surnuméraires*）一词首先是强调长期失业者与一年中有部分时间临时受雇者之间的差别；还有很多其他个人的情况在分析时可以改变组合：部分失业者属于年老力衰或者没有学业证书的青年长期失业人员；还有没有进行失业登记的领取社会最低保障补贴（最低收入补助，临时提供补助，残疾人补助）的人员；此外，还有作为“社会计划”牺牲品的提前退休人员，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免除求职”，有的没有住所，有的是干几小时“黑工”，以及相信在目前情况下没有希望过得更好而听天由命的妇女。所谓“劳力租用”是指在 1946 年劳动法甚至是 1936 年以前的形式下的雇佣劳动的实际状况 [参见阿兰·叙皮奥《劳动法批判》（*Alain Supiot, Critique du droit du travail, Paris, PUF, 1994*）]。这个术语表明临时工作状况和“社会设施”所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多重性：临时替工，定期合同工，受救济季节工，协议合同工，编外合同工，零工等。他们的共同点是抓住一些付酬的岗位来保持一份薪水、从而获得维持日常生活而不依赖他人的手段，免得落入被救济的境地。

便于重新归纳不同于前两者的一种社会地位，而它本身也经受着巨大的压力。那么，450万公务员和830万用工在5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雇员以及1190万用工在200人以下的企业雇员又有什么共同点呢？在这些处于登记底层之上的固定工中间，如果描绘一下其色调的话，那么色差也是十分鲜明的：从大工业和商业企业的“非技术”工人或者女雇员，直到具有2级和4级或者5级中等技校证书有时能找到某些具有刺激性岗位的男女青年。

每一个人都想通过进入所谓“劳动市场”看到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而对于“劳动市场”来说，个人的才能看来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缺乏共同目标参照的这种等级化，将各个群体和个人封闭在马克思早已分析过的对于资本的“实际顺服”或曰“从属”的关系之中：^①陷入再生产和制度强化过程中的商品拜物教力量的日常社会关系之中，不能自拔。拜物教和从属的这些形式本身正在改变。它们是在所谓的“光荣的三十年”期间确立起来的，在那个时期作为世界分裂成两大集团和冶金工业中自动化程度还很低的大规模生产发展阶段开始的大众消费潜力的产物，西方民族国家和社会欣欣向荣。在同一时期，跨国公司初露头角，我们试图在这里着重指出，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1975年具有关键作用的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建立而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转折，很有必要进

① 安托万·阿尔图：《劳动与社会解放》（Atoine Artous, *Travail et émancipation sociale*, Paris, Syllepse), 2003；吕西安·塞夫：《从目的着手——共产主义新问题》（Lucien Sève, *Commencer par fins. La nouvelle question communiste*, Paris, La Dispute), 1999；吕西安·塞夫主编《构思中的人格——我/建立在个性之上》（Lucien Sève dir., *La personnalité en gestation. Je/ Sur l'individualité*, Paris, Messidor/ Éditions sociales), 1989；前引斯塔弗罗斯·通巴佐斯《从经济分析看时代——资本中的时代范畴》；米歇尔·瓦代：《马克思：面向可能性的思想家》（Michel Vadée, *Marx penseur du possible*, Paris, Méridiens Klincksieck), 1992；让-玛丽·樊尚：《另一个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之后》（Jean-Marie Vincent, *Un autre Marx. Après les marxismes*, Lausanne), 2001。

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争论。^① 这个劳动市场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因为它决定着国家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再生产的可能性。今天，由于以“全球化”的名义所进行的选择以及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它不再受各国本国法规的严格制约。但这并非是面对新事物的抱怨或者哀叹，而是试图描绘一种前景。

我们不能把这种讨论同 1990 年以后随着国际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有支付能力的市场和“劳动市场”之间的竞争加剧而加速推行的政策所划定的新框架分割开来。对于各种政策如何构建了“全球化陷阱”——被当作所谓新时代的论据并被滥用来推行“反人民的金融体系”的“陷阱”——已经描写得很充分了。^② 简而言之，在今天的世界上，57% 的最贫困人口拥有的财产只相当于最富裕人口的 1% 的财富，而 560 个大企业和大资本家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世界 10 亿人口的财产。在 1970 ~ 1995 年这一不很长的时间内，根据世界银行 1995 年的数据，交换总额从占世界纯产值的 25% 上升到 45%；这主要来自出口中的加工产品部分的增长：从 1970 年的占 20% 上升到 1990 年的 60%。此后，一些服务的非本地化也出现了同样的势头。于是，一些被剥削者，通常是最贫穷国家的妇女出于她们的现实状况，把在服装厂或者小冶金厂的“做工机会”看做是一种意外收获。^③ 我们因此立即产生

① 米歇尔·克罗齐耶、塞缪尔·亨廷顿、德井丞：《民主的危机》（Michel Crozier, Samuel Huntington, Joji Watanuk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前引皮埃尔·库尔-萨利《昨天的社会权利》。

② 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德·舒曼：《全球化陷阱》（Hans-Peter Martin, Harald Schuman, *Le piège de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Actes Sud), 1997；埃里克·图桑：《钱包或生活——反人民的金融体系》（Éric Toussaint, *La bourse ou la vie. La finance contre les peuples*, Paris, CADTM & Syllepse), 2002。

③ 奈拉·卡贝尔：《第三世界的劳动者们——赞成或反对劳动的基本权利》，载于《劳动界》2006 年第 1 期（Naila Kabeer, 《Travailleuses du tiers-monde: pour ou contre l'instauration de droits fondamentaux du travail》, *Les Mondes du travail*, Amiens, Université de Picardie, n°1, 2006)。

了沉浸在马克思对于他那个时代的思考的画面中的感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中写道：“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他又马上补充道：“它（赤贫）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①

我们不想随便夹杂一种论战的色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随着大规模失业和就业不足而来的世界形势是一种革命的形势；但并未造成制度的崩塌。我们不得不做略微长一点的引证：事实上，马克思在那些与其说被真正读懂毋宁说被经常引证的作者的名单中可谓名列前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第十五章中这样写道：“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只要不再需要每天使用劳动力 12 ~ 15 小时，劳动力就已经过剩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如果实际上能使整个国家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②

大家知道对这段引文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人说，你们清楚地看到情形并非如此。但是，我们在这里依然坚持认为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如此受人非议和不被承认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尽管人们对此有种种疑问。大家想必知道马克思因此而提出了一个被认为与事实不符的预见：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的投资者无不寻求增殖他们的资本，进行着一种与模仿相伴的竞争；到达一定的时候，利润的边际导致放弃某个部门，资本家的投资转入新的生产或商业领域，于是重新赢得高利润率。资本主

① 雅克·比岱：《〈资本论〉诠释与重构》（Jacques Bidet, *Explication et reconstruction du Capital*, Paris, PUF), 2004；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7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93页。

义的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造成“只有两个集团的两极化”。^① 马克思似乎以简单化的方式来预见革命的倾向：一小撮剥夺者最终将被受剥削的群众排除出权力，而受剥削群众通过他们的职业训练而有能力取代这个世界的强权人物。因此，我们看到不止一个评论家断言“马克思大错特错了”，因为据说“雇佣劳动者的新中间阶层……不断发展，从而缩小了两极化论点的作用”。^② 根据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没有理解“社会现代化”的效应。^③ 总之，诸如此类的观点颇为流行。^④ 一个以埃里克·奥林·赖特的著作为标榜的智利作者写道：“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非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出现两极化趋势。”^⑤

① 让-皮埃尔·迪朗：《马克思的社会学》（Jean-Pierre Durand, *La Sociologie de Marx*, Paris, La Découverte, coll. 《Repères》），1995，第99页。

② 让-皮埃尔·迪朗：《马克思的社会学》，第99页。

③ 让-皮埃尔·迪朗：《马克思的社会学》，第107页。

④ 就法国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否定1975年以来属于“工人”社会—职业范畴的个人绝对数量的减少，而用这些脱离其环境的孤立的数据得出的多少有些草率的统计资料来进行社会和政治的分析，这可能使人感到吃惊。应该谨慎从事的呼吁很少得到响应。如果只参照西欧的4~5个国家来描述整个世界，那么这些“数据”显然是错误的。在法国，总体上是如何计算的？2001年，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分类目录中的“工人”为714万人，尽管自1952年以来一些职业的分类和类别之间的界限有所改变，但这个数字是否应该作为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参照予以单独考虑？就工厂或者手工艺作坊的体力劳动者而言，机械化和后来的部分自动化改变着数据。如果考虑到下游的情况——同生产相关的执行任务，那么毫无疑问应该在工人（80%为男性）之外加上一大部分雇员（80%）——为人们服务的服务业乃至更加广泛的商业的雇员，还有一大部分企业秘书部门的雇员，总计约占520万雇员的2/3。同样应该更好地考虑为了生活而必须出卖或者出租自己劳动力的男女，近30~40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中间职业”，其中包括100万技术员、80万“家教”（2/3是女性）和100万护士。能够把他们归入“中间阶层”吗？许多分析都倾向于否认这种分类〔见让·卢日金内《别了，中间阶层》（Jean Lojkine, *L'adieu à la classe moyenne*, Paris, La Dispute），2005〕。于是，我们面临一个悖论：大约1600万雇佣劳动者，即占总就业人口的60%的人，从属于资本主义特有的雇佣关系。我们姑且暂不讨论教师和“干部”这两个不同质的职业群体问题（见前引保罗·布法尔蒂格《干部——一个社会形象的终结》）。

⑤ 莫罗·巴索雷：《阶级的终结？》，载于《今日马克思论丛》2004年9月第2期（Mauro Basaure, 《Fin de las clases？》, *Actual Marx Intervenciones*, n°2, Santiago, septembre, 2004）。

我们要重提马克思的这段比较长的论述。为了以另一种方式来重新进行某些研讨，说明其确切含义，鼓励重新解读并非是无益的。事实上，我们能够从中获益，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① 因为马克思本人善于提出确切的问题，从《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的标题开始就表明了这一点，我们在这里要重复他的完整的表述：“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及其反趋向。”必须再次提及，在这些构成《资本论》材料的反思中，马克思关心的不是提出预见，而是如何描述演变固有的主导逻辑和避免直接冲击制度的多维危机。他很好地理解了从他那个时代就开始制衡“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组合法则和六个政治因素，而且指出这只是一种“趋势”，而不是自然科学所说的规律。

第一个法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资本越来越同榨取剩余价值的场所分离；建立某些管理机构，促使资本家不再直接与保障工厂日常运行的管理者等同。例如，今天的跨国公司的“控股公司”（holdings）类似局部的参谋部，使得竞争变成子公司经理之间的一种“竞赛”，在各种生产战略和选择互补或者相反时，能够适应挑选的需要。

同样使人笃信和加以美化的第二个法则：企业主的管理活动或多或少直接并和谐地同本国或者国际的框架相协调。我们只需想一想我们这一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② 大国际机构——包括大企业以及联合国之外的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① 在此进行一系列研讨对于澄清马克思在这些片段——后来由恩格斯颇费心思地汇集成卷——中的真实思想是必要的（见前引米歇尔·瓦代《马克思：面向可能性的思想家》）。即使马克思乐观地一再重复说一场决定性的危机终将产生，但只要细读这段论述，就可以看出他同宿命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且也不是进化论者。

② 阿内-卡特琳·瓦涅：《全球化的新精英——到法国镀金的移民一族》（Anne-Catherine Wagner, *Les nouvelles élites de la mondialisation. Une immigration dorée en France*, Paris, PUF), 1998。

金组织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等之间的互动，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资本既同这些机构联系在一起又保持很大的独立性，既同生产场所联结又相当独立地待机移动，并已经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就利用了《资本论》中准确地加以区分的六个因素：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增加。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花费时间来检验这张清单是否完全，这些因素又是如何演变的。

但就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而言，我们只限于指出，我们不想走那些过分草率地试图摆脱马克思的工具的作者的老路。为了更好地保证与“等级的底层”的描述及其效应的联系，我们在此仅限于对这六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进行再研讨。实际上，劳动的强化，一大部分流动资本的价值下降，产生了相对过剩人口的结果，而对外贸易的变化足以促使传统的大都市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出现马克思所说的“能够以便宜价格获得的供自由支配的雇佣劳动群众”。

我们要确切地指出，我们研讨的主旨是试图用马克思的论述来对当代资本主义做一个整体的分析。为了将我们的立论同当代的其他一些分析进行比较，我们将快速地对一个武断的判断，亦即对作为当前具有迷惑力的主要话语之一的《帝国》一书中的主要论点进行解读。根据内格里的观点，我们时代的主要标志实际上是“工厂的工业劳动的作用减弱，通讯、合作和建立相互关系的工作占有优先地位”。^① 由于我们并非要在这里对比展开争论，所以只限于做一个比较概括的回答，只能留待以后有其他机会再重新进行这样的争论：其实他所说的只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他不但断言，而且试图使人

^① 安东尼奥·内格里、迈克尔·哈尔特：《帝国》（Antonio Negri, Michael Hardt, *Empire*, Paris, 10/18），2000。

相信这是全新的事物？资本主义并未死亡，只是在运动、变化着，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统治。为什么当数亿人在中国、缅甸、印度、泰国和其他地方的工厂里干活的同时，断言工厂劳动已经被超越的诸如此类的评说会出现在工厂雇佣劳动的历史上？为什么不去探寻资本主义总过程为何能够说明这些特殊的情况？

与其讨论这种所谓“超越”按照资本主义适应性的主轴而发展的东西的似是而非的论调，倒不如研究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资产阶级以什么方式来尽量促使从前两个世纪继承下来的雇佣关系消失？资产阶级产生了面向“普遍理性”的趋势，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而安东尼奥·内格里加以阐释的那样；^①但是，领导阶级同时也要避免这种超越制度的可能状况的出现。由此产生了通过一大部分人口的就业不稳定化来加以强化的多方面的变革，至于这种变化的后果，我们已经在前面研讨过。新的消费，追求作为个人命运的成功，对于未来的恐惧和稳定过程的严酷性，缺乏替代性选择文化的多方面竞争，关于另一种社会计划的争论，制度的矛盾，凡此种种无不加剧。马克思早就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真正的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依赖劳动时间和使用的劳动总量，以及劳动者的强壮……它毋宁说取决于科学的普遍水平和技术的进步，换句话说，也就是取决于这种科学应用于生产。”诚然，“这种类型的生产提出了资本主义占有的合理性问题”。然而，正如让-玛丽·樊尚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庞大的社会自动机看来没有太大困难驯服处于矛盾统一中的‘普遍理性’。”由于另一个世界的可能的幻影和支

^① 《以前的未来》杂志 (*Futur antérieur*) 发表了一组文章，引发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见该杂志第10期上保罗·维尔诺、安东尼奥·内格里、莫里西奥·拉扎拉托的文章；第19期上让-玛丽·樊尚的文章，以及莫里西奥·拉扎拉托的新文章；第35-36期上洛朗·穆瓦诺和卡罗·韦尔塞洛内合写的文章。

撑，以及像一张张网一样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依赖的幻想，现实本身隐藏着可能性，并产生相互分割的各种假现实主义。

在对于制度的批判同集体反对失业和就业不稳定化的现象相结合有可能变成群众行动的同时，为什么断言各种问题同劳动无关？同样，为什么看不到企业的工人和雇员集体的发言可能而且应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可能——已经能够做到——促使自由时间和自由的多样活动的涌现？正是这种民主重构着全部生产资料和交换的社会化的各种因素，以及建立不同于强制劳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另一种同自然和所在空间关系的必要手段。然而，人人都回到唯恐失去“各种经济制约”的老路上，同时又从这世界及其种种矛盾的现实出发，理解亨利·勒菲弗十分正确地指出的想法：“创造或者创造性的愿望是作为社会需要而出现的。”^①

《哥达纲领批判》的现实意义

我们扼要研讨了两个无疑应该说是“辩证的”矛盾因素：随着劳动关系——不论你是否工作，工作是否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日常统治进一步加强；同时，一些相反的潜在力量要求得到承认，而且它们实际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反之，在三边委员会建立以来的30年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围绕美国的强权，压力、冷战和热战、专断的和以“安全”为借口的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对于宗教的形形色色的乞助政策的发展。^②

① 亨利·勒菲弗：《侵蚀——从楠泰尔到高层》（Henri Lefebvre, *L'irruption, de Nanterre au sommet*, Paris, Syllepse), 1998 [1968]。

② 吉贝尔·阿什卡：《新冷战》（Gilbert Achcar, *La nouvelle guerre froide*, Paris, PUF), 1999；《蛮族冲击——恐怖主义与世界的无序》（*Le choc des barbaries. Terrorisme et désordre mondial*, Bruxelles, Éditions Complexe), 2002。

我们不准备在本文中分析这一方面的政治活动，只是稍加提醒，旨在强调各种潜在势力越是较少显示其可见的现实价值，就越是可能逃过观察家们的法眼。

然而，一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的预兆围绕着我们。当然，它们不像只需灵巧地堆积在一起就能拼建成功的某种积木游戏。它们要求一种严肃的政治活动，以免有时被“个人创造性”的意志所左右，转向它们的反面。这种所谓的“个人创造性”是由大学文凭的生产机构制造并在其内部发展起来的，显然很可能使人产生命运取决于个人“天赋”的印象。它把个人加以分门别类，以“关注自我”的名义使他们四分五裂，虽然这种“关注自我”很可能反过来引导人们从随机应变对待和交流一生变化的观点，来发展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然而，这里存在一个文化和政治斗争的维度，缺少了这种斗争，种种苦难，即使是来自于共同的根源，也不能重新凝聚成行动。如果对于雇佣劳动者的生产的分析不是像皮埃尔·罗勒早就指出的那样理解为是在“雇佣制国家化”的框架内实现的，^①那么这种“个人的成功”始终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以社会学的批判距离来考察每一个人的成功概率，表明它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培训，以及受雇岗位和从社会化的报酬（社会保险、对于各种不同的借贷手段、住房的补贴等）方面得到的“收益”的选择。

反过来说，对各类青年和雇佣劳动者进行划分的这同一原则，也可能刺激合作的强烈意愿，不过，这种合作并非是科学技术“精英们”所理解的不同于竞争和对其指挥能力作出评判的“经理人”角色的其他社会机遇。许多研究者围绕克里斯托夫·德茹尔的开创性著述呼吁人们注意的敢于对弱者和下属施

^① 皮埃尔·罗勒：《劳动与雇佣制》（Pierre Rolle, *Travail et salariat. Bilan de la sociologie du travail*,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88。

恶的满足感，按照今天决策理性和讨雇主喜欢的标准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它无情地鞭挞着各种矛盾：即使没有东方的古老的罪恶帝国，胜利的西方阵营自身也足以产生种种灾难，既不能保护自己的居民，也不能保护地球。同时，由于侵蚀企业和服务业决策组织和管理框架的合理性的某些原因，许多管理状况引起这些工薪人员的不满，使他们产生批判意识，正如保罗·布法尔蒂格和让·卢日金内的著作所揭示的那样。正因为如此，领导阶级过去能取得其合作，或者至少能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的一些阶层，也加入了对抗的运动，当然是在社会中出现并非虚幻而较有保障、更富有人性、彼此不相排斥的其他形式的合作可能性和动议的条件下。

因此，在这里很有必要重新解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并且领悟其极其迫切的现实意义，从中找到更加清晰地思考当代若干问题的工具。让我们撇开把这部著作描述为确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前言和附录，来进行解读：这些为后来的自我辩解的争论所做的附注同正文风马牛不相及！马克思摒弃了围绕应该“共享”的“劳动”利润的实现而趋于平等化的论点：由于社会中的权力的转变，生产关系的改变可以产生其他的多种可能途径，来摆脱同商品化不可分割的各种表象。在马克思看来，也就是说允许每一个人“具有同世界和其他人的多方面的丰富联系，向最大限度的交换开放”。^①

作为今天一些研讨领域里的凸显问题的公共财富和免费受益，遍及从公共服务的新设想到必须投入更大的力量维护的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从1875年提出上述观点之时就指出了这一点。他摒弃了拉萨尔的“公平分享产品”的命题。他指出，国

^① 让-玛丽·樊尚：《与安德烈·戈尔兹的对话》，载于《变化》杂志，2001年第1期（Jean-Marie Vincent, 《Dialogue avec André Gorz》, *Variations*, n°1, 2001）。

家必须对再生产、应对突发事件的保障、增加生产资料作出预见，所有这些实际的东西属于集体选择的范围，具有特殊的制约性，而不是“公平分配的基础”。至于属于消费的东西，“在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必须扣除“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这一部分费用“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以及“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等”。马克思指出：“这一部分从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直至“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①商品化也随之最终消退。因此，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它伴随着从劳动作为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活动过渡到满足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进行自由活动的社会需要的发展，马克思在此根本没有谈到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任何“阶段”或者“社会主义”。^②

对于一些人——毫无疑问是当代社会中的绝大部分“后备军”或者受剥削最深者来说，物质需要是压倒一切的需要，无力顾及另一些人从一开始就着眼于通过劳动及劳动使用来改变自己地位的关注。两者的共同点在于，满足通过社会机构而同社会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社会需要。人们不能不顾及劳动，但可以通过社会化的保障过程来改变劳动，从而发展一切人——不论男女——同劳动活动的关系。^③至于劳动工具，马克思提出确立这样的目标，即看到它们“转化为公共财产”。应该补充说，马克思这个文本的功绩还在于拒绝把国内的现实看做是同国际的参与相割裂的。他写道：“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19~20页。

② 前引吕西安·塞夫《从目的着手——共产主义新问题》。

③ 这个文本无疑将重新翻译：马克思在不同语境下和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术语看来只是在翻译中近似地得到表达。

行一种国际的政策。”^①

在国际经济和交换的现实状态下，随着或多或少乐于付出代价来按照各个时代和地域确定社会关系的民族国家的普遍化，若干当代问题显而易见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证范围。自从回到凯恩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稳定资本主义制度而加以抨击的食利资本主义的老路以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缓和不稳定生活的重压，如何缩小这种钳制，证明即使不解决失业问题也能走出商品世界？然而，至少近两个世纪以来，这是民主果实里的蛀虫：对于所有个人来说，缺乏能够实现其个性的强有力保障，因为他们不能被抛进“不可雇用者的”行列，他们作为人的大多数侧面组合在一起，产生出多方面的负面形象。同样，公共财产能否免费享有？以另一种方式实施社会化并受到民主监督的生产资料，能否实现另一种类型的增长？这样难道不是将有一个广阔的空间，促使个人从强制性的劳动束缚和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解脱出来，拥有以另一种方式发展生态诉求的可能？

各种权利、全球化和替代性选择

经常在“多极世界”里占据支配地位的法国—法语国家的争论，是否能够和应该把局部与整体联系起来？无需分析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在赞同“经济现实主义”的国际框架的当权者头脑里，十分简单地再三重复着一个核心论点：如果一切都被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秩序所左右，那么我们就照搬这个逻辑。唯意志论也许是讨人喜欢的，但不足以解决问题。

从比较经典的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在这里确切地指出领导阶级结构的相对新的因素，这个集团对于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凝聚力具有相对敏锐的意识。近几年来，社会学家们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23页。

够看到正在发生的变革，同国际化相联系的暴富。国际化促使一个国际资产阶级的出现。^① 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加以展开，除了必不可少的提示之外，略谈一下皮埃尔·布迪厄的权威性著作《国家贵族》（*La noblesse d'État*, 1989）的主要论点：担任高级公职的领导阶层和大企业领导阶层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基本上是在很小一部分人口（据估计约占世界总人口的5%~10%）内部繁殖生长。这部分人口拥有世界总资产的50%、世界总收入的38%，而占世界总人口50%的最不幸的人，只拥有世界总资产的6%~10%。

在这种极少研讨的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之外，人们是否对于社会范畴的等级化与作为社会权力的所有制关系之间的联系有所充分了解？人们是否估量过这些国际活动家——地址和电话簿能够敲开一切人的大门的大老板，以及国际高级公务员行业代理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态度，来研究和了解包括世俗的和宗教的自由主义反革命变种及其美国模式在内的各种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

我们不能长期回避军备费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的关系，以及各种不同的尽管打着“独立于任何附议”的幌子却或多或少加以肯定大西洋主义计划的政治思潮。许多政治势力，包括左派在内，无不认为世界贸易组织似乎不受联合国控制；因此，不必承担必须考虑劳动法、保健法等规则的风险。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种种类似现象正在扩大，譬如说，民众在西欧历史发展过程中争取到的社会和政治保障，却正在被试图

① 前引米歇尔·潘松、莫妮克·潘松-夏洛《资产阶级社会学》；苏珊·德·布吕诺夫、伊莎贝尔·加罗、克洛德·塞尔法蒂、阿内-塞西尔·瓦涅、皮埃尔-保罗·扎利奥：《资产阶级——一个统治阶级的状况》（Suzanne de Brunhoff, Isabelle Garo, Claude Serfati, Anne-Cécile Wagner, Pierre-Paul Zalió, *Bourgeoisie: état d'une classe dominante*, Paris, Syllepse), 2001；前引雅克·比岱《〈资本论〉诠释与重构》，第269~274页。

把另一种世界秩序强加于人的政治意志所毁灭。这是30年来延续至今的一贯政策。

我们已经相当充分地描述了摆在集体意识面前的分裂倾向和障碍：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特征之一。因此，它引导我们得出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结论。就观察到的斗争及其策略的争论而言，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种始终从头再来的重构倾向。摒弃自由主义政策是一致的态度，因为它表明了在这个社会中遭受苦难的人们之间的一个共性。在各种社会动员不引起怀疑之时，就会凸显出维护团结制度和同情的态度。但是，我们在这里登上了通往我们的分析的另一个方面的列车。哪些目标，哪些原则能够回答最大多数人日常关注的问题，从而确立一个团结尽可能多的人的阶级的牢固统一？

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提法没有对可以预见到的政治对抗形式和过程表明立场：它假设各种共同诉求造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要求进行社会和体制的变革。面对这样的集体动员，今天执政的领导阶级又将如何行动？这个问题只能依然在这种表述的框架内提出来，而且很显然，它首先取决于是否可能有一个广泛和统一的社会运动来吸引主要的社会力量在多个国家同时采取行动，并通过它的一般目标和直接活动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实际上，这样的社会运动既不能同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共同的社会和政治要求（旨在积极地对待多少拖延已久的整个移民问题）相割裂，也不能同一系列社会变革相游离，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美利坚帝国”的统治，^①并且规制贸易规则，来制止按照短期的和破坏性的资本主义的所谓合理算计来掠夺地球和毁灭地球。

^① 萨米尔·阿明：《建立一个多极的世界》（Samir Amin, *Pour un monde multipolaire*, Paris, Syllepse），2005；萨米·纳伊尔：《面对多样性的帝国》（Sami Nair, *L'Empire face à la diversité*, Paris, Hachette），2003；克洛德·塞尔夫蒂：《武装的全球化——恐怖的失衡》（Claude Serfati, *La mondialisation armée. Le déséquilibre de la terreur*, Paris, Textuel），2001。

事实上，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同 20 世纪工人运动的以往各个阶段有着很大不同：在我们的时代，这样的问题正出现在许多国家和各个大陆。但我们不会忘记，工人运动的连续性的整个重构和阶级的现实存在的重新肯定，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天，从统计学的角度可以证明的包括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阶级，正处于构建的文化历史过程之中。整个“另类世界主义”运动以迫切要求扩大同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密切联系的态度，提出了同跨国公司及其对于各种机构的控制的实际权力相对抗的替代性选择的建议：批判自由主义话语，构建另外的目标，构建将直接斗争与改变生活的诸多手段联系起来的团结统一。可能性不会提前发挥作用。

就了解特殊情况的研究战略和社会学分析的视角而言，我们应该是清醒的观察家和保持必要距离的批判家，以便了解各种运动及其特殊的行动阶段，尽管我们更关注它们的整体逻辑。为了避免误解，在本文旨在透视相互联结和自成体系的各种统治形式的问题的同时，我们坚持在一切动员过程中对“等级底层”的所有状况和整个权力关系进行准确调查的必要性。但在这些调查中，必须防止将现实与日常关系混为一谈，千万不能忘记可能选择的多样性。在对于各种运动的分析中，我们应该善于了解对于另一种社会关系的希望或者梦想乃至怀旧是如何渗透其间的，尽管现实的统治关系依然存在。

在对于权力现状的分析和点状调查中，存在一个不能把各种集体动员在政治策略、个人变化及其日常交往中的作用分割开来的问题：各种社会权利保障一切人有权追求超越马克斯·韦伯在 1917 年的一个文本中十分正确地称之为“伪民主”^① 的虚伪性这

^① 马克斯·韦伯：《俄国走向伪民主》，载于《韦伯政治著作集（1859 - 1919 年）》（Max Weber, 《Le passage de la Russie à une pseudo démocratie》, [1917], *Oeuvre politiques 1859 - 1919*, Paris, Albin Michel), 2004, 第 229 - 250 页。

个政治目标，而这是与上述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让-玛丽·樊尚指出的那样，^① 我们应该从这个仍然没有过时的观点来研讨“未完成的民主”。最近的诸多情况像不同的历史经验一样，使我们意识到一种潜在的力量，或者亨利·勒菲弗所说的意义上的一种“可能”。

^① 让-玛丽·樊尚：《马克斯·韦伯或曰未完成的民主》（Jean-Marie Vincent, *Max Weber ou la démocratie inachevée*, Paris, Éditions du Félin), 1998。

第四章

从阶级归属到“社会未来”， 从政治上反资本主义到意识 形态上反自由主义

斯特法内·罗泽斯

近十年来，研究法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分析家，不能不对这样的现象感到大惑不解：舆论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始终对自由主义表现出势不两立的反对态度，但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却越陷越深；对这种事态持批判态度的被统治者与试图进行干预并每年或好或坏地加以调和的当权者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步甚至推波助澜。但试图研究这种矛盾的原因并加以超越的学者，同样不能不感到震惊的是，这种反自由主义的态度事实上并没有引发政治上的反资本主义。以往，凡是阶级不平等和这种不平等的感觉加剧的地方，就不可能不体现为阶级意识的萌生。毫无疑问，今天的震荡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为了思考当前阶段变革的彻底性，必须把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置于运动之中。在大多数的时候，由于政治的或者学术的原因，我们只关注阐释法国情势的这个三角的一部分。

然而，2005年5月29日在全民公决中对欧洲宪法条约说“不”，这一胜利无疑是上述三个侧面汇合的最有力的说明。它表明投票表决在社会动员和政治供求中的直接否决作用。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新进程，即股东权力大于管理者的资本主义，孕育了一种起因于社会未来不可控性的反自由主义。于是，这引

发了一种愿望，试图借助市场来质疑共和主义公约，保存将个人处于张力之下的各种社会关系。

经理人资本主义：从“现状” 到“社会未来”

影响工薪阶级的各种变化并非是什么新现象。但近十年来，集体代表意识问题引发了劳动界的新的不安。各种各样的认知概念改变着范型，扩展至各类雇佣劳动者阶层，影响着公民的态度。经理人资本主义和当代个人主义首先模糊了阶级的集体认同性——产生自资本—劳动对抗的认同性。

产业工人阶级受 1970 年代中期开始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影响尤深。工会运动不仅受工会支柱的消失、分包的发展或者不尊重工会权利的严重影响，它还在其他生产部门的文化战斗中败下阵来。企业领导层将 1968 年后的青年把劳动中的独立性视为个性向量的愿望整合进企业的管理之中。这样，资本主义能够有意识地提供和实现部分承诺：通过允许工薪阶层投身于与企业的前途一致的职业前景的目标来实现自我，从而获得个性的充分发展。

生产工具的现代化，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疏远，劳动代表机构的非政治化，凡此种种削弱了阶级的集体代表意识，加强了当代个人主义。个人能够用按照个人创造性来设计“社会未来”的承诺和表象来抹掉原来的阶级属性。经理人资本主义下的市场，倾向于允许个人在商品化进程中求得市场手段与个人目标的一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产工具的现代化和政治现代性的许诺越是占上风，告别工人阶级的行动越是觉得无足轻重。雇佣劳动者开始转向。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子女能够提前享有一种上升的职业流动性。确立一个中产阶级和政治上和谐的核心共

和国梦想，应运而生。^① 诚然，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失业的幽灵到处游荡和扩展；但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核心”的企业及其运转和许诺似乎基本上能够给予雇佣劳动者以保障。

从经理人资本主义向承袭式资本主义或者说股东资本主义的过渡，彻底改变了内部的发牌方式。它转移了企业内部的权力，改变了劳动过程，中断了雇佣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默契的协议，动摇了企业在行业方面的代表性、老板的权力、行业的运行和工会运动。

承袭式资本主义：从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 到意识形态的反自由主义

自1993~1994年初开始，雇佣劳动者经历或者验证了加速兼并和异地生产的发展，特别是赢利企业中的解雇风潮。在雇佣劳动者中间，不仅弥漫着失去社会归属的恐惧，而且觉得经济逻辑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变得不可解读、不可把握，劳动集体因此而失去了支撑。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默契的协议被撕毁。假如像我们从历次的交易所职员被辞退的风潮中所见到的那样，一个企业在赢利的时候可以辞退职工，那么在分享价值创造基础上的争议和妥协就被彻底推翻了。大多数法国人因此而害怕被排斥在社会之外，成为“无家可归者或者长期失业者”。雇佣劳动者首当其冲，最早感受到这种社会未来对于一切人变得不确定的普遍想法。一只“不可预料的手”替代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这种观念在各阶层的雇佣劳动者中

^① 斯特法内·罗泽斯：《从共产党霸权到工人全国阵线选举》（Stéphane Rozès, 《De l'hégémonie communiste au vote FN des ouvriers》），载于前引伊丽莎白·戈捷、让·卢日金内主编《社会各阶级——复出抑或复兴？》。

间占据了主导地位。^① 干部地位的动摇，乃是那个时期最具象征性的现象。在此之前，干部把劳动集体纳入与管理者共同确定的目标框架：赢利、占领市场、对他们群体的回报手段。他们由于在企业中所处的地位，最早觉察到经理权力向股东权力转移，从经济向金融转移。法国所特有的“干部”这个社会群体，从此痛感到对于他们的“社会未来”的威胁。作为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之间的交叉界面而构成的社会理性变得不符合时代要求，而当每一个雇佣劳动者必须成为自己适合的创造价值的场所之时，其经济效益变得相对有限。

干部们看到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能够期望进入企业参谋本部，逃过兼并—集中化过程的侵袭。他们逐步脱离了同这种新的承袭式资本主义的联系纽带。但他们暂时继续掌握着某种话语权，表明他们负有一定的责任，参与事物的进程，以及同其他雇佣劳动者的区别，尽管他们的态度开始显示出某种疏离。^②

于是，他们在权衡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的轻重时开始回归家庭领域，随后在个人交谈、社团集会时吐露自己的不安，最后则在确立每周35小时工作制之前进行量的调研。在35小时工作制出台之前，干部们扬言他们反对这种安排。他们认为自己不能从中得到好处。但谈判过程使他们产生动摇，并接受35小时工作制。凡此种种仿佛表明干部们意识到企业领导层对于他们的疏远，开始转变态度，以接受私人领域和赞同非干部的共

① 斯特法内·罗泽斯：《自由主义的失魅》，载于《1993-1994年的法国国情》（Stéphane Rozès, *Le désenchantement libéral*, *L'État de la France 1993-1994*,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3），《政治为何处于危机之中？》，载于《解放报》1994年8月26日（《Pourquoi la politique est-elle en crise?》, *Libération*, 26 août 1994）。

② 斯特法内·罗泽斯：《脆弱化的斜坡》，载于《法国民主工联干部》杂志第367期，1995年3月号，干部专号（Stéphane Rozès, *La montée d'une fragilisation*, *Cadres CFDT*, n°367, mars 1995, numéro special cadres）。

同观点的姿态来替代以往对企业的参与、投入和报答的观念。^①

从这时开始，干部们大多数表示他们感觉到对于全体雇佣劳动者比对于企业领导层更加亲近。这种观点说明为什么工薪阶层并不把企业当作资本主义剥削的同义词，而是当作劳动者集合的场所。至于大老板，则感到自己遵循的不是企业的逻辑，而是金融市场的逻辑。反之，小企业家对此感受尤深，他们的认识占据着主导地位，因为他们经受着全球化的风云变幻。

自由主义的许诺的这种失魅和经济的不可预料性，导致人们回归手艺、同业公会和劳动的团结。工薪阶层在日常的操作中觅求实现自我的基本手段。他们在职业活动中寻求协调和实用原则，寻求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不复具备的个人与集体、特殊与普遍之间的联系。^② 中产阶级从 1994 ~ 1995 年开始同各个民众阶层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在国内开创了一个表达我们民族的不安的反自由主义的新周期。这样，最初从文化观点（诸如各国人民之间的接近，等等）和消费的视角（诸如信息新技术，等等）得到正面理解的全球化，开始让位于一种负面的观念，而与这种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面临工厂外迁和社会倾销的风险而感到风雨飘摇的工薪阶层的强烈不安。正因为如此，法国人支持另类世界主义运动，例如农业工团主义者的行动。^③

这说明为什么从 1993 ~ 1994 年的海员—捕鱼工人、公路司机、法国航空公司、职业准入合同（CPI）等冲突，以及 1995 年秋季的反对朱佩计划的罢工开始，全国上下举行了“间接罢

① 斯特法内·罗泽斯：《干部意识形态例外论的终结》（Stéphane Rozès, 《La fin de l'exception idéologique des cadres》），载于前引保罗·布法尔蒂格《干部——一个社会形象的终结》。

② 雅克·卡普德维尔：《行会主义的现代性》（Jacques Capdevielle, *Modernité du corporatisme*, Paris, Presse de Sciences - Po), 2001。

③ 斯特法内·罗泽斯：《对于全球化的不安》，载于《反潮流》杂志，2001 年第 2 期（Stéphane Rozès, 《Malaises dans la mondialisation》, *Contretemps*, n°2, 2001）。

工”，通过各种民意测验和游行示威来支持工薪阶层的具有警示作用的社会运动。舆论就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共和制度的意义等集体价值对当权者提出了质询。^①

这种关于“社会未来”的经济上的不可预料性在中产阶级和民众阶级联合集团的内部孕育了一种反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新的社会政治观念。从此，在以社会对抗（劳动与资本的对抗）为基础的左—右对峙上面，叠盖了一个新的表象：顶层与底层的对立，或者说精英与民众的对立。这样的对立并非基于社会身份或者社会地位，而是基于“社会未来”。“顶层”人物——大企业领导、银行家、记者、法官、高级公务员、大老板等，他们把握着自己的社会未来，而其他人，亦即占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则不知道什么样的前景将等待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女。“社会未来问题”作为社会和意识形态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近十年来，社会战斗性，社会不安的种种表现，对待各种社会运动的态度，拒斥事物进程，凡此种种以不同的方式不断表达出来，对于这样的现象的本质应该进行探讨。我们可以从最近的现实着手来思考，因为随着2005年欧洲全民公决的争论的出现，围绕什么是欧洲和法国希望的东西的讨论，进入了国家政治化的最激烈的阶段。

说“不”，表明拒绝拱手交出 “社会未来”和政治自主

2005年5月29日对于欧洲宪法条约说“不”的胜利，乃是

^① 斯特法内·罗泽斯：《支持社会运动的间接罢工表明舆论的一个意识形态新周期》，载于米歇尔·瓦卡卢利斯主编《雇佣劳动与社会冲突》（Stéphane Rozès, 《La grève par procuration à l'égard des mouvements sociaux révèle un nouveau cycle idéologique de l'opinion》, dans Michel Vakaloulis dir., *Travail salarié et conflit social*, Paris, PUF, 1999）。

“民众”与“精英”之间由于各自的“阶级”规定性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裂痕的最直接的票选表达，但这里所说的阶级规定性具有新的含义，亦即“社会未来”的意义。^① 公决运动成为国家弹冠相庆强制正面占有公器的一个顶峰时刻，而在2005年5月29日这一天，投票“赞成”和“反对”的分界线是按照某些纯粹的社会—文化规定性形成的，其出发点则是规划自己未来的能力，因为在当时的欧洲，无论从政治、国家还是其延伸进程来说，未来二字有着诸多不同的意义。

投“赞成”票的选民把握着自己的未来，因此期待国家和欧洲在全球化的框架内大开方便之门，获得更多机会。投“反对”票的选民则亲身感受到缺乏经济和社会保障之害，无力规划自己的未来，期望一个能够面对全球化给予保护的国家和欧洲。投“赞成”票的选民不如说缺乏能动性或者高居社会—文化顶层，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所处的圈子是圣洁的，法国和欧洲的进程也是如此。他们投票的头两个动机是“欧洲在世界中的地位”（50%）和“法国在欧洲的作用”（38%）。于是，他们把包括25个国家的欧洲，把欧洲空间视为欧洲走向强大的希望。

投“反对”票的选民不如说是能动的，他们属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通常是青年。他们把目光集中在欧洲形势的进程上，并不认为扩大的欧洲是一个强大的欧洲的希望，而是视为经济全球化的特洛伊木马入侵法国的危险。他们投票的头两个动机是“社会不安”（55%）和“文本内容”（24%）。^② 因此，

① 斯特法内·罗泽斯：《欧洲争论的新的民族化色彩》，载于《争论》杂志第136期，2005年9~10月号（Stéphane Rozès, 《La renationalisation du débat européen》, *Le Débat*, n°136, septembre-octobre 2005）。

② 这些出自投票箱的民意测验数据，来自法国视听最高委员会第三研究所、法国电台和《巴黎人报》于2005年5月29日对5216位在选民名单上登记的人员的调查。

投“反对”票首先受到社会预防的原则指引。事实上，欧洲和民族的维度不是分离的，而是在观念上紧密叠合的。因为，近年来就当权者而言，欧洲往往为国家内部经历的社会衰退辩护。这样的进程先是以欧洲建设的名义被接受，随后当所谓的欧洲建设烟消云散之时又遭拒绝，正如欧洲宪法条约的第三部分所述。人们作为工薪阶层为自己的工作岗位担忧，作为社会福利的受益者则为社会保障制度担忧。

但是，投“反对”票同样也符合民主预防的原则。他们的选择把欧洲宪法条约并非视为欧洲各国代表之间妥协的产物，而是迷失在巴黎、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卢森堡……之间的一个迷宫，一旦获得通过，其倾斜的路线使我们的当权者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其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依靠唯一的劳动收入的投“反对”票的选民，并不是按照支持者或者媒体的逻辑来行动，而是通过旨在保存一种社会与政治错综交叉的共和主义模式的阶级反思作出抉择的。他们试图保存这样一种机会：政治平等有可能矫正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他们毫无疑问同意，他们的国家目前也许并无最好的社会制度；这无碍于公民通过当选者来掌握这个国家。他们认为，民族主权依然允许一些人正常地说出自己的不满，或者有时表达自己的满意。

民众所期望欧洲推进国家延伸的场所，恰恰是精英们期望解开国家缆绳之处。这是国家危机的根本所在，说明欧洲为什么颠簸不定，一再出现说“不”的声音。因此，欧洲公决的一刻揭示了这种悖论：意识形态的反自由主义虽然通过“否决”者的胜利表达出来，但同时又是以投“赞成”票阵营早已倡导的方式显示的，它首先旨在捍卫我们的社会模式，近十年来我们与其说同这一模式彻底割裂，毋宁说正在向它复归。也就是说人们期望同依托欧洲的各种制约的国家政策所实施的自由主义的断裂分离。说“不”，首先是投票赞成社会保守，而不是政

治激进。它透过集体政治表象来表明个人要求保持对社会未来的把握的意志。

资本主义的去地域化：国家反对民族

大多数人的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象与政治上的反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反馈到一个超越左翼阵营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客观问题上。在去地域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进程中，要思考这种断裂，就必须把社会问题同国家和民族的本质问题联系起来。在我们的观念中，国家组成先于民族，民族始终是借助某种外在的东西（神权，专制帝王，启蒙运动，近几十年的欧洲）来规划整个生活，其政治内容置社会问题于不顾。直到19世纪，处于地下行进状态或者受到压制的社会问题，才终于通过工人运动的战斗和饶勒斯的政治著作引入法兰西共和国内部。对于雇佣劳动者来说，前进和退却无不取决于政治；政治垄断了国家的普遍利益和借助国家工具实施社会妥协，而置工会运动和社会问题于不顾。

因此，我们通过对19世纪和20世纪进行分期，回过头来讨论一下国家和法兰西共和国所面对的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基础。19世纪末的大革命的特点是共和派资产阶级同民众和工人一起进行革命，以稳定这个国家，然后又反过来反对民众和工人，直至巴黎公社起义。这导致民众同国家的公开对立和对于政治的不信任，从而孕育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和高水平的阶级觉悟。从19世纪末到1970~1980年代，社会党人借助工人运动的压力，自上而下通过立法——饶勒斯法案，在法兰西共和国国家机器内部来整合社会问题。随后，政治上的特别是市政的共产主义，以及法国总工会内部的共产党人斗士的工运活动，把革命的空想同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利益结合了起来。

各阶级之间隐蔽的历史妥协，是借助国家在民族内部勉强

达成的：“旨在达到反对社会和解的最大多数人的繁荣。”这可以使每个人客观地重新找到并耕耘各自的意识形态和认同性园地。在法兰西共和国得到整合的社会问题（形式上的投票平等从趋势上矫正着各种社会不平等）和共产主义使得无政府工团主义回潮。资本主义在其敌人的制约下自我完善而趋于文明的能力，对于雇佣劳动阶级和制度本身的活力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经理人资本主义表现出强大的能力，来整合社会权利、物质利益和个性化方面的种种诉求。这反过来保证了“繁荣30年”间的反周期经济机制，并促使资本主义取得了对于现实社会主义的胜利。从来没有过一种文明能像西方资本主义民主那样积累起如此发达的知识、实用技艺和个性充分发展的希望。

然而，近30年特别是近15年来，一个崭新的现象是国家不再确立民族内部的各个阶级之间的社会—政治妥协，因为这种社会—政治妥协是通过高度的资本—劳动的妥协凝聚而成的。经济发展、社会融合、民主之间的协调一致趋于破裂。进步的观念受到质疑，希望渺茫，社会未来问题成为各种表象的核心问题，因为它在现实中变成不确定的东西。共产主义对手的终结使得民族国家的建设变成过时之物。在欧洲一统的遁词和布鲁塞尔货币框架下，欧洲各国实施自由主义的不作为。

今天，国家不复进行镇压。它不阻止，而是袖手旁观。雇佣劳动阶级期望的民族主权要求保存社会契约、各种权利和社会平等。今天，貌似挑战极权主义的保证和民主的动力市场，对此提出了质疑。市场与民主之间的这种矛盾，乃是阿隆与费雷的继承人之间思想分野的基础。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回眸研讨法兰西共和国，却避而不谈这个国家的社会基础，而把笔墨集中在“它的精神”上。这种对于共和制的虔信引导他们走向怀旧，大谈道德，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则回归保守主义。于是，他们重新回到了自由主义的出发点，赞同主权国家与道德规范之间的分裂，而随着作为再分配者的国家离去，这样的道德规范

必须强化。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赞颂法兰西共和国变成了一声灵魂的叹息，对于那没有灵魂的商品世界的哀叹。走出商品的异化，毋宁说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共和社会契约。

面对市场，个人在主观上重新发现了自己作为“公民”的身份。社会权利平等的诉求再度提了出来，而他们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契约却背道而驰。工人阶级——今天所说的工薪阶级——的“自我阶级意识”没有重新出现，而不平等和不稳定却与日俱增。这种悖论出现的原因表面看来在于：近几十年来，共和制国家为了调和其代表们就普遍利益问题争论不休的各个阶级，通过政策以及国家内部对法律、公共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投票表决来建立社会—经济妥协而作出的努力。在国家不作为而退出的时刻，整个民族表达了近十年来的愿望，强烈要求国家复归。对于国家的需要是国内大多数人的意愿，不仅表现在主权方面，而且表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社会契约复归的这种需要首先基于它的原则。

欧盟的体制对于各国来说变成应对各民族像指数一样上升的社会诉求的“气囊”。布鲁塞尔的货币和预算政策发挥着自动领航的作用，否决了各民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妥协。以能动的方式将各阶级之间的妥协加以物化的普遍利益被置于民族之外而面对欧洲，使得国家摆脱了以前承担的规划原则和行动、目标和手段、期望和可能的职能和责任。公民批判体制，但期望法兰西共和国的复归，或者更确切地说，期望它的使命、价值和规划复归。

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本质，表明国家在布鲁塞尔的逻辑下越来越少体现共和国的职能和社会妥协。人们不喜欢政治，因为它不再做其应该做的事情。面对民族的社会诉求，当权者只是在布鲁塞尔许可的范围内，一味依赖以国际市场定位的欧盟货币和预算政策，把人们向往得到的东西当作单纯适应的一个变量。

欧元乃是同每个民族内部的社会妥协的货币变量脱节的货币表现。按照这样的逻辑，统一的货币变成了独立于各国政府，亦即超乎各国内部的社会妥协之上的欧洲中央银行所保障的欧洲经济优先项目。欧洲各民族向优先关注增长和就业趋同，有着其体制、预算和货币的背景。这是通过2005年5月29日全民公决中说“不”而遭拒绝的欧盟对于民主的扭曲的基础。

历史陷阱：公民期望欧洲延伸和加强他们民族的价值和社会妥协。但是，欧盟的各种机构表明它们具有自己的政治框架和社会诉求。历史的陷阱：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体制被认为旨在通过议会中借助技术结构进行的直接社会交易政策的自治，而使资产阶级和社会关系走向现代化，但今天表明其效果恰恰相反，远远背离了民族的诉求和矛盾。以往服务于普遍利益（在其所构建的意识形态划定的主要社会范畴的有效指导下，确立民族内部各阶级之间的社会—政治妥协）的最高国家职能，今天却服务于超乎民族之上的外化。

因此，国家和以往占统治地位而今天唯一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逃避有希望做到的事情和对国家的有效管理。当权者们表面上垄断着某种可能性，却逃避有希望做到的事情。被统治者常常面对的只有国家推卸经济和社会责任，拒绝承担为普遍利益服务的职能的空话，以及种种为自己开脱的辩词，说什么事物的进程不再可能走向“最好”，而只能争取“唯一的”“可能”。

然而，公民们拒绝政府变成全球化灯塔和金融市场的守护者。这种拒绝的态度通过选举的武器，以及对于社会运动和另类世界主义运动的实际的或者舆论的支持表达出来。至于在欧洲宪法条约公决中说“不”，笔者想起了一个“颠倒过来的1789年”。像凡尔赛之于以往的贵族一样，布鲁塞尔剥夺了各国的统治阶级左右事物进程的权力，反过来给了他们以开脱责任的方便。像昨天的专制王朝一样，今天的欧盟机构通过这样做，

把以往的当权者变成了特权阶层，尽管无论在国家还是欧洲内部并没有出现一个新的阶级。历史的陷阱：民众要在 2006 年保存民主和政治家们的权力，而政治家们对于一心只关注市场和全球广阔世界的精英来说，却变成已经废弃的垃圾。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对于“改革”的分歧，说明今天民主的倒错：关注普遍利益的似乎应该是民族，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和国家工具应该避而远之。统治者经常把国家的退出说成是经济和社会的“改革”，而公民将现代化理解为国家有所作为。在统治者看来，“改革”成为一个目的，而对于国民来说，它只是一个手段。对于领导国家工具来说，核心问题是“如何领导”？而国民首先期望回答的是“为什么”？

反自由主义与反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

去地域化的和全球化的金融资本主义正在运动。它导致人与事处于不断流动之中。但人既是经济的人，又是政治的人。人有着从市场——凭借财产对社会的一种管理——的效益中赢利的愿望，但又需要政治来保护人类的共同目的，而在我们国家，将这称为普遍目的。人们正在试图阐明其根源和效应的这个阶段的“激进性”，可以同我们熟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联系起来。而这种矛盾的当前的形态说明了“意识形态的反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反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

可以清楚地看到，雇佣关系充斥着法国和欧洲。但在当前的形势下，雇佣劳动者希望保持各种社会关系，而金融资产阶级和跨国贵族则想要通过撇开民族和随着欧洲的步子跳跃，来改变这样的社会关系。这似乎表明，阻碍以资本的国际化 and 去地域化现象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的，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和民族关系。法国雇佣劳动者在欧洲公决中说“不”，表

明他们捍卫民主在法国凝聚起来的妥协。这种妥协的民族形式则是“共和国”。

为了保障金融市场内部稀缺的遗产资源的效益，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置一切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保障制度于不顾。由此，由于通过国家—民族物化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原有的妥协受到破坏而十分脆弱的各阶级关于社会未来的表象，也岌岌可危。对生产关系、“社会国家”提出质疑的运动得到跨国贵族联盟的鼓励：国内的高层国家领导，布鲁塞尔的技术机构和承袭遗产的资本家，无不为了生产力的国际发展而不遗余力地把国家和社会推向无所作为的境地。

在贯穿国家上层的矛盾之上，叠盖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差异：一方面是通过公共服务（学校、保健、社区）促使花钱很少的“公益”得以生存并保持人们期望的某些规范的“低端国家职能”，另一方面是与民族的期望背离的高端国家职能。自由主义的口号是：“属于市场的一切权力”事事先行，而迷失在领导人中间。这种悖论不仅仅来源于上述种种制度的矛盾，而且也由于个人内化了这些矛盾。

精神分裂的个人

个人按照短期行为的逻辑来进行消费，期望意外收获效应而储蓄，为了生活得到保障而工作，梦想着一个团结互助的社会；为了他们的子女，他们不放弃这样的梦想。因此，是否拥有股票或者债券，这并不影响对当前类型的全球化的恐惧和敌视，也不影响对另类世界主义运动的支持和对另类世界主义运动领袖若泽·博韦的同情。生活在同时存在着社会和文化不利条件的社区里的这样的个人，在同社会心理学家的个人谈话中会坦言只要有就会离开社区的愿望，而在与同一社区的居民群体的聚会中，则又会大肆赞扬社区如何热情、社区的居民

如何团结互助、社会如何亲和、青年如何朝气蓬勃。

2005年11月发生的郊区危机，乃是在不动产市场与希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能够得到社区的庇荫——尽管那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就学条件都很不利——这两者的结合下，移民集中居住化的长期社会偏向后果的大爆发。人们脚下试图避免排异和排他，头脑却依然想着各自抱团，以共和派为标榜，梦想着一个自我调和的社会。最能谅解纵火燃烧汽车的青年的，却是在生活空间、经济和文化上同他们差距最大的人们。

总而言之，在21世纪之初，个人作为商品和地产的消费者是自由主义者，而就社会观点而言则是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又是共和派。于是，经济自由主义迷失在精神之中，却在实际事务中高歌猛进，因为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维护着它，甚至不能自拔。之所以说经济自由主义迷失在精神之中，是因为“社会未来”变得不确定，精神通过回归各种形式的调节，以使自己和子女的未来的风险化解成最小，从而能够自保；这样的逻辑今天导致精神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显示自己的特征而进行自我防护。市场今天在通过财富促使社会运转方面是有效的，但在社会未来和人类的目的的问题上却是又聋又哑。阶级的认同性正在瓦解，而对于共和国的诉求首先是个人的一种防卫性诉求。

在要求进行民主的社会变革的期望中，出现了其他的争取社会保障的形式。民粹主义，回归“种族”、地域、血统、民族主义或者宗教完整主义，成为个人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试图背靠某个社群的方式。既没有民族和世俗的社群，又没有普遍目的性，这样的个人只能把天地作为自己的锚地。

一些新的动员形式表明在民主框架内建设社会未来的意志：职业生涯的保障，环境保护，另类世界主义，重新把握民族主权。因此，政治是能够保证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短期判断同他们的社会未来相容的唯一方式。把握社会未来或者认同的特殊性，这是政治的抉择。

第五章

集体行动的政治可能性

米歇尔·瓦卡卢利斯

本文的对象是研讨集体行动在发达资本主义空间中的政治可能性。它从法国在冲突的复起和各种抗议的表现方面的丰富经验出发，来论述三类问题。首先是同 1990 年代初以来冲突性质的更新相联系的新政治化——非党派的——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功能。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经济和交换的全球化，新的社会和文化格局，凡此种种为社会斗争的重新开展创造了新的环境。^① 其次是斗争中的各种社会角色与制度化的政治的艰难会合与冲突。一般所说的政党制度下的“社会运动”的关系，就这一观点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存在着某些联系，但这样的联系是稚嫩的、不规则的、脆弱的。最后则是广义上所说的政治重组的前景，它们是同新形式的剥削和统治相对立的。^② 因此，关键

① 见前引让·卢日金内《别了，中间阶层》；让-米歇尔·德尼主编《罢工中的冲突？》（Jean-Michel Denis dir., *Le conflit en grève?*, Paris, La Dispute），2005；前引皮埃尔·库尔-萨利、米歇尔·瓦卡卢利斯主编《集体动员——一场社会学论战》；米歇尔·瓦卡卢利斯：《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批判资料》（Michel Vakaloulis, *Le capitalisme post-moderne. Matériaux pour une critique sociologique*, Paris, PUF），2001。

② 见前引米歇尔·瓦卡卢利斯、让-玛丽·樊尚、皮埃尔·扎尔卡《走向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确立一种解放政策》。

的问题是从各种政治、工会和社团角色之间的多边的延伸的冲突出发，来认识如何实施一种解放政策。我们的思考基于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一方面针对现代政治交易及其所孕育的政治统治形式，另一方面又针对当前社会运动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当代形式的反资本主义。

各种运动与政治化

不论什么样的角色承载着新的不满现状的运动——雇佣劳动者的工会运动、社团运动、政治组织、旨在维护某种争议或者诉求而组织起来的公民集体——所孕育的政治化，无可否认的是它们对公众生活的干预是在日趋严重的体制的不可预见性的环境下进行的。以前时期的凝聚力和方向标已成明日黄花。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毫不掩饰的赞赏态度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处于锐不可当的上升阶段的自负的资产阶级的推进现代化的力量时所说，至今一直看来是坚不可摧的一切东西，全都化为灰烬。

体制的不可预见性是同日趋加剧的多方面的缺乏保障联系在一起：不仅表现在社会（丧失阶级归属感、受到伤害感、去社团化）、经济（解雇、职业的贬值）和产业（异地化生产、原来工厂的消失、个人的车祸以及化工厂的灾难）方面，而且表现在环境（海洋污染、气候反常、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健康（食品恐慌、传染病和流行病的危险）和心理（犯罪的恐惧、“新危险阶级”的符号）方面。这些不安全感使人无所适从。它们结合在一起，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观念：从今往后，我们居于一个“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变革的观念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于是，高居统治地位的精英们不再询问变革的目的性、变革的内容和方向，而是只谈变革的“不可避免性”，仿佛只有一个可能的前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解释棱镜，来解读从朱佩的社会保障“救助”计划到2003年的让-皮埃尔·拉法兰政

府的退休制度改革种种为自由主义政策的合法性辩解的话语。所有的倒退政策表明所谓的“现实政策”如何消除笼罩着社会的威胁，这种政策以有限现实主义的名义浓缩了统治者阶层的观点。

最后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绝大部分“自由和自主的”个人，再也看不到周围世界的协调一致。现实显得杂乱无章，不可预见，具有威胁性。种种危机现象使人迷乱，而没有新的社会稳定因素出现。人类对于世界未来的行动从此像“脱缰之马”，既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又失去了历史的意义。不再有期望的视野，而只存在适应某种“客观制约”系统（金融市场、“全球化”、经济“整顿”等）的不断变换形式的过程。

丧失协调一致的原则，随同社会生活不同领域里的诸多矛盾和张力表现出来。试举几例。在家庭生活的框架内，所有的父母都感受到他们竭尽全力想传递给子女的教育价值与把算账视为唯一应该牢记的价值的“市场社会”的表面运作之间的鸿沟。由于缺乏进行调节的理想，个人的成功成为大家共同默认的不二法门。不是赢，就是输。在一个将能够不择手段轻而易举地赚钱的行为被神圣化的日趋扩张的商品化的世界里，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表面化和不可捉摸。

传媒的符号统治，乃是制度规范性的一个构成因素。主流传媒文化渗透出一种竞争和马克思意义上的价值化的想象。这种文化发挥着加压泵的作用，旨在生产某种超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阻止其他表象和社会观得以发展的某些诱饵。与主流信息范型不同的行为的构成是一个重要现象。面对这种把民众的政治上可辨认的一切参与改变成过时和残留的祭司形象，并用“人民”的特征来描述全世界的忙忙碌碌的精英们的浪潮，显而易见人们不懂得像以往那样搞政治。需要构建社会变革的新杠杆，构建容许被统治者掌握认知的社会关系的独立的公共空间。毫无疑问，“社会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各种交叉的知识，需要新的行动方式。

在经济层面上，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趋势的不稳定化使雇

佣劳动者陷入永远焦虑的生化反应之中，为劳动关系中的利己主义的和攻击性的行为火上加油。通过老板掌握弹性就业而建立起来的新用工制度，不断地要求直接生产者主观上紧张地投入。但并未因此而能够发展某些协调一致的劳动刺激和再分配政策，来促进创新精神和扩大雇佣劳动者的自治空间。^① 把追求短期赢利为目的的劳动量的侧面置于优先地位的逻辑，同劳动主体希望自己成为“职业优秀人才”、“使得自己的服务”对社会有益，而不是倡导金钱高于一切的价值关注背道而驰。由此产生了主流管理文化中不可解决的周而复始的裂痕，因为主流管理文化尽管披着道貌岸然的正确伪装，却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心的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的胜利很难掩饰“后现代”生产者的严重危机，亦即他们在始终存在的脆弱性状态面前所感受到的混乱：他们被封闭在这样的状态里，感到生活的各个不同侧面之间完全脱节，仿佛它们突然彼此冲突而陷入对立。

在政治层面上，我们很容易发现标榜平等和团结的普遍价值的宣言与责无旁贷地将这些价值加以具体化的共和国所不能兑现的承诺之间的鸿沟。2005年秋天的“城市危机”与“移民人口”过度集中的许多平民社区或者说贫困社区爆发的激烈冲突，有力地说明了近30年来国家状况的退化。这些事件表面看来具有喷发性的无序特征，却充分暴露了在阶级不平等急剧上升而转变为畸形的种族化和族群化的绞盘面前，政治不作为的后果。它们敲起了警钟，表明“后现代性”越来越难以忍受，越来越不可治理。一些高品质的评论家羞答答地所说的“法国一体化模式的失败”，其实无非是面对危机的政治妥协的大失败。各种政策的崩盘，其原因正在于它们不能不附着于剥削和统治关系的老根。

透过这个假设，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新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关系去政治化过程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是吞噬着缺乏激情而“多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本书中让·卢日金内和阿尔曼多·斯坦因科的分析。

余的”主体性的种种绝望感情的隐私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集中在自我封闭的“社区”中的被统治阶级的一系列群体的严格隔离状态而导致青年的愤怒的自我毁灭式的爆发，这两者暴露了人们还没有能力来发扬光大历史的可能前景。缺乏一种足以把所有被压迫的“少数”组成新的多数大众的主导政治。这是今天反制度斗争的困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颇费揣测的话中这样写道：“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这种作为革命改造的替代的“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的前景，描绘出一幅可想象的未来图景。

然而，解决矛盾、开放现实、通过能够达成共识的话语和新的行动方式来重建集体的需要，成为社会主体强烈的感受。各种社会运动对于方向感和政治化的产生的贡献恰恰在于此。这样的结论似乎有夸张、简单化乃至片面之嫌。众所周知，自1995年秋季罢工以来，法国的社会斗争在敏锐性、可见性、激进性、支持舆论方面无疑赢得了胜利；但它们还远没有跨越谈得上具有“颠覆性”的门槛。换句话说，它们还没有导致断裂。

就一般法则而言，这是自卫性斗争，旨在减弱统治者对下层阶级和群体的“恶意行动”的冲击（反对解雇和私有化的动员，“无家可归者”的斗争，维护妇女权利，维护民主和自由，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倾向上升，等等）。这是一种“保存”而不是保守的斗争。其内容是保持作为“全民族社会公约”组成部分的、民众争取到的某些果实的生存力。^② 这些斗争是同作为未来的承载者的社会“共和国”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72页。

^② 关于“舆论”表象层面上的符号斗争的综合阐述，见本书中斯特法内·罗泽斯的论文。

以勾画出新的社会胜利果实的前景。

然而，法国社会冲突——皮埃尔·布迪厄所说的“迂回曲折的社会运动”——的持久性，体现国家权力的“制度窗口”的质询方式以及抗议示威之时产生的社会批判（包括在舆论内部），凡此种确认了这样一个观念，即“运动主义”的集体行动乃是扩大公共空间的一个因素。事实上，这样的集体行动并不是不满或者剥夺感的简单表达，以揭穿政治阵营重新以自己为中心，特别是揭穿高居领导地位的精英们的思维的举动；而是政治合法性表象重构和社会解放新前景重建的一个强大因素。我们建议区分作为民主政治化向量的“社会运动”的五种功能，这样的民主政治化尽管不是以政党的形式为主轴，但并不强烈地敌视党派支持的形态。

首先是“打破封闭的功能”，也就是说把握至今完全忽略或者片面和简单地没有列入“传统”动员空间的某些问题和疑问。另类世界主义的斗争案例是富有象征性的，但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工人运动的各个历史支脉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降临分析为资本主义在整个制度范围内的政治进攻（对于雇佣劳动阶级的重新整饬，提高利润率），随后在他们的队伍中发动和推进针对这种政治进攻的日趋扩大的抗议的种种困难，乃是当前形式的法国另类世界主义的起源所在。“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ATTAC）作为特殊社团的出现，难道不是凸显出左翼进步力量和雇佣劳动者的工会运动在这方面的不足，乃至缺乏使命感？

第二是“公众化功能”，其主旨是把这些正在涌现的问题构建成新的政治交锋的对象，以引起进行公开争论的兴趣。这些斗争既富有象征性，又不乏角斗特色。尤其是争取舆论，更普遍地说争取抗议行动的合法性的战斗是决定性的战斗。^①“提出主张”与“造

^① 弗朗索瓦丝·迪歇纳、米歇尔·瓦卡卢利斯主编《传媒与社会斗争》（Françoise Duchesne, Michel Vakaloulis dir., *Médias et luttes sociales*,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2003。

势”同样重要。但是，这种交锋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一些作为选择的观念的提出者之间的竞争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运动的各种自组织形式是公众化的一个构成维度。引导个人超越一切伦理动机或者逻辑信条而达到动员的，乃是具体体现历史沉积的不公正和压迫的高度普遍性的一个集体的存在。这个集体不是自在的目的，而是通常通过打破封闭而进入公众舞台的一个手段。

第三是旨在将一些被压迫居民从他们所处的孤独状态中“解救出来”，以摆脱负罪感重荷的“互助社会化功能”。集体行动注重介入，鼓励参与，激发人们通过斗争来复苏希望。投入运动，这样的空间乃是一个亲和重组、掌握话语权、团结支持的空间。共同斗争的经验既是认同性确认（同集体的关系）的体验，又是道德重构（同价值的关系）的体验。发现相异性，并非是否定个人的维度，而是肯定个人的必要条件。衡量人类财富的尺度乃是人自身。

第四是“对抗功能”，亦即分清责任，指明逆境，舍之集体行动是不可设想的。这就是要解构作为唯一可能的秩序出现的世界秩序：只要各种统治和不公正作为“天然”现象存留在精神之中，就任何东西不会改变。一些重要的战斗正是这样进行的，自1990年代初以来在被动员起来的角色的引导下，就工薪条件、住房问题、妇女权利、无合法证件者或者无业者的地位、全球化等问题展开了抗争。这些斗争并非始终是胜利的，也并非必然达到力量对比的逆转。它们在矛盾的循环往复之中，促使人们普遍怀疑自由主义政策的效果，尽管并未开辟政治上反资本主义的道路。

第五是被动员起来的各种角色努力提出建议，甚至草拟某种替代性选择的因素的“投射功能”。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有待完成。以反体制为目标的各种运动的“全球化”尚处于邯郸学步阶段。然而，在协调各类动员的层面上，一些独创形式的参与性实验和网络构建已见端倪。毫无疑问，不可能把一切决策交付集体协商进行决议。但是，民主的要求浸润着觅求实

际效果的抗议运动的经验。社会运动的一个大趋势是争取未来的保障的需要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无保障的”民主。

社会问题与政治冲突

然而，集体行动的这种建设性的和投射性的政治化是有限的、脆弱的，可以被重新吸收进政治领域的规范运作之中或者被中和。随着各种各样的斗争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反对当代形态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暴力，并重申参与性民主和战斗中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原则本身，这种政治化无可否认地包含普遍性因素。但同时，抗议性的政治化通常依然是分隔的、耗散的，由于意识形态的、组织的和社会的深刻分歧而各自行动，分割成片。

试以社会运动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为例。谁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谁又应该被排除在外，这样做的标准是什么？诚如热拉尔·莫热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不断重新审查和修正，以划定抗议空间并决定其形态的界线的斗争。^① 应该将某些政治力量和集体体包括进社会运动还是放弃这样做，以保持其“独立性”，或者更进一步说，保持其对于体制政治的“外在性”？这种困境不是一种理论的关注，而是针对所有通过在舆论内部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在政治领域里寻找后备军乃至其他派别的盟友，力求改善力量对比的战士们们的一个实际的警示。

然而，今天作为社会运动的工会和社团的组成力量与各政党之间关系特征的是深刻的不信任，往往表现出一种简单的排斥态度。这样的一种姿态，导致一些评论家诉诸那种断言社会与政治不可沟通，从而加深两个领域之间的分割的新无政府工联主义。这一不信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① 热拉尔·莫热：《建立一种社会运动的反思政治》（Gérard Mauger, 《Pour une politique réflexive du mouvement social》），载于前引皮埃尔·库尔-萨利、米歇尔·瓦卡卢利斯主编《集体动员——一场社会学论战》。

第一种保留属于现实主义的考虑。法国的各个政党今天遭遇严重的合法性危机，2002年4月21日第一轮总统选举的结果即是这种危机的最好说明。它不单纯是支持者眼里的形象的危机，而是政治功能和体制政治的社会观的危机。实际上，体制政治具有越来越强的管理色彩，为有产者所役使。从本质上说，它是旨在取得国家权力地位的战略和策略，而不是“争取更好的行动条件，争取能够促进更大的社会创造力的、更自由的交往关系的斗争”。^① 随着自由主义右派和当政的左派接受“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似乎没有给公民提供选择或者取舍，政治信息失去了根基，变得空洞无物。政治活力论始终斗志昂扬，但一切有利于劳动界的改革前景的破裂颠覆了表象的游戏。于是，只得借助正确的为政通道和公共事务的唯意志论（“勇敢的”）管理，来为民主平反。

反过来，集体动员的工会和社团的各种角色基本上没有遇到合法性问题。舆论研究表明，1995年以来的几乎所有的社会运动得到被调查居民的大多数认可，工薪阶层更信任工会运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类世界主义者处于唤醒公民关注资本主义全球化对就业和民主前途的消极后果的阶段。这些角色的问题其实是如何证明它们的有效性，如何赢得人们信任它们影响事物进程的能力。因此，它们由于害怕自己也“重新落入陷阱”，或者说由于冲击着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而同体制政治拉开距离。工会组织唯恐重新陷入不信任政党的恐惧，常常产生一种按照少惹是非的逻辑摇摆的效应。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组织宁可“拆桥断路”，而绝不“随波逐流而一起掉进河里”。即使它们赞同某些政治动议或者创议的精神，也反对公开表明对于原则的同意，甚至反对进行积极的支持。这里可以分辨出一条预防原则，即与政治的互动降到最低限度，以避免与

^① 让-玛丽·樊尚：《劳动批判》（Jean-Marie Vicent, *Critique du travail*, Paris, PUF），1987，第156页。

表象危机相联系的可能的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还应加上对于政党竞争激烈性的考虑。政治市场就像一个夹杂着各种重组意图的名副其实的战场，每个政党都试图在那里压倒它的近邻。社会运动的碎片化（试想一下工会的分化，其中的交错换位打乱了争取独立的倾向）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无论对于右派还是左派都是这样）两者结合，使人很难理清其中错综复杂的情况。因此，许多工会干部和社团活动分子都被劝说谨慎行事，除非出于纯粹用来作为工具的打算，仿佛借助水车推动政府交替的轮子，有助于他们掌权，否则就不要去碰政治。他们为选民服务，就像他们掌握各种社会问题并进行与请愿的方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身份鉴定一样，选民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在这方面，作为多数派的左翼掌权，非但无助于密切同社会运动（特别是同雇佣劳动者的工会活动）的联系，反而使这种联系破裂。

然而，存在着另一个解释不信任政党组织的基本理由。那就是社会运动的活动分子拒绝社会从属于政治，要求与工会、社团或者公民集体的首创精神休戚相关的各种斗争具有同等的尊严。他们以反对政治操纵或者政治工具化的一切意图，具有全方位的独立意志为标榜。确切地说，社会运动的特殊原则之一，乃是拒绝封闭在严格限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框之内。

就另一方面而言，法国的各个政党承认社会运动独立于党派阵营乃是当前阶段的一个突出成果。尤其是左派的政治负责人认为，同社会运动的联系是松弛的，引起双方的许多相互猜忌。同时，他们又很难提出一个明确的特别是令人信服的观念，来构建同社会运动的新型关系。诚然，他们自称完全抛弃了将社会抗议运动工具化或者把它当作开发选票的“依靠力量”的观念。但是，否认企图控制和操纵动员的典型行为是一回事，而建立旨在进行政治替代选择的同社会运动的持久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条件，则是另一回事。因此，左翼政党在不同环境下摇摆于对形形色色的抗议表现为吸收/容纳态度与敌视态度之

间。无论如何，他们的姿态是不坚决的和矛盾的。

前一种态度即吸收的态度的表现，乃是传送带倒转的表现：进行切割—黏合，并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工会或者另类世界主义的某些诉求（法国总工会提出的职业社会保障或者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推广的托宾税），把它们不加变动地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但是，一个政党采纳了社会运动的某些诉求后，这个政党并不因此事实上在这个运动的各种角色眼里变得更加可信任。由于法国共产党缺乏一个足以抗衡当前挑战的共产主义纲领，因而为这样的幻觉付出了十分高昂的代价：运动主义的走向符合其反自由主义的立场，而且促进了大选力量的加强。相反，为了说明否定的态度，不能不令人震惊地指出左翼多数派政府面对社会运动的尴尬处境，甚至对诸如无业者和无合法证件者的斗争等某些集体行动事件的公开敌视反应。就这样的观点而言，2002年4月21日的事件远不是由于权力的不可避免的磨损或者总统选举候选人资格认定的繁复而造成的历史偶然事件。它既是一种历史的惩罚，又是得不到满足的民众诉求的表现。

鼎立与重构

在新的环境下，“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任务的分配是什么样的？显而易见，否定社会运动与政治组织之间的有机（或者“经过整合的”）联系，并不能避免旨在扩大社会民主领域和“借助上层”走出今天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的各种新链接的重构。这些目标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相信名副其实的社会变革的远景。社会运动的各种角色一致拒绝扮演动议“分包人”的角色，或者来自政治机器设定的比较“具体”因而缺乏“普遍性”的层面上的改革。社会从属于政治的时代看来已经结束，至少在这些角色的观念中是如此。

然而，社会运动的独立性不能被看做与政治的冷漠相同。

工会以及社团的活动分子日常因政治任务不充分而影响到他们自己的活动。他们迫切关注为公共活动平反。他们明白，自己也没有权利犯错误：形形色色的民众主义和社团主义正在窥视。但社会运动不能也不愿意充当政党制度重构的中间人。社会运动可能希望这样的重构，但其作用不是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更不必说参与政党的重构。这并不妨碍其活动分子可能维护某些政治选择，以及以个人的名义投身公众舞台。过分淡化政治色彩也许与从属于政治一样有害。

总之，社会运动的作用是促使政治家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用它们的观念、计划、诉求的独创性贡献来浇灌公众的争论；同其他伙伴包括政治伙伴在内，一起致力于解决有关雇佣劳动者的变革、公民自由和社会民主的前途等问题，致力于社会的重大决策。但是，社会运动的绝大多数工会和社团的组成部分，拒绝同政治家合作来促使他们肩负起政治决策责任的逻辑。同时，它们似乎因缺乏同政治组织的“规范化的”关系——既非工具化也非敌对，而是持久和直接的鼎立——而感到遗憾。

社会重组深切期望某些形式的协调。标榜自己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功能之一，就在于把这种鼎立组织成为富有凝聚力的不同部分，而不是仲裁者。但这是以推翻与传统的政治观念决裂的观点为前提的：政治组织不能满足于在官方政治中充当民众希望的代表，而应该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允许在社会中提出整个政治问题的有组织的力量。它是对于填平自现代化开始以来一直存在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鸿沟起促进作用的力量，是打破政治作为与公民分裂的独立领域的力量。就社会运动方面而言，难道能够满足于捍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而不把这些利益纳入更广的社会变革前景吗？撇开这样的前景，能够有效捍卫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利益吗？应该有什么样的共同生活的民主远景？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共同的社会规划？这些便是“社会”角色与“政治”角色之间出现的鼎立新阶段中反复出现的问题。

劳动的变革与
社会冲突

第二部分

Part 2

第六章

集体动员

——词汇与话语的进路

勒内·穆里奥

“告诉我你怎样称谓这些东西，我将说出你是什么人。”1936年秋天，法国雇主总联合会新任会长克洛德-约瑟夫·吉纽把人民阵线的“经验”特征概括为一个“革命企业”。1968年5月，戴高乐将军把造反派的暴行说成是“戴假面具的狂欢者”。1995年的“整个”秋季在阿兰·图雷纳的笔下被描绘成“大抗拒”。如果说从右派到左派都运用诸如“工人骚乱”、“罢工”、“冲突”等同样的词汇，那么其含义以及语义学和情感的内容却迥异：“一些矛盾的价值相互对立而转化为十足的意识形态符号。”^①

不可知的多义性不仅左右着一般生活的交流，而且也是人文科学所固有的。术语的便利使人可以谈论哲学、历史、社会学、政治学。事实上，每个学科充斥着一些不同词汇或者同一词汇的不同含义所体现的相互对立的问题。就社会—历史的观点而言，词汇的争议包含着某些暂时的共识、取舍、昙花一现似的传播、持久的对立和突变。无论是在理论的还是集体的斗争中，词“不

^① 米哈伊尔·巴赫蒂纳：《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Mikhaïl Bakhtine, *Le marxisme e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7, 第44页。

是作为无定形的工具或者间接的反射，而是作为角色、场地和投注”干预其间。^① 我们将尝试揭示与此相关的动员及其衍生现象，以及表达相反行动的撤销动员和表明现象复归的再动员。

遗产的或者军事的隐喻用来表示哪种冲突？

“动员”（mobiliser）这个动词出现在 1765 年的法律语汇中，用来表示通过约定（特别是婚姻契约）使得法律一般认为的不动产变为动产。1804 年的《民法典》还使用更老的（1409 年）同义词“变成动产”（ameublir）（第 1506 条）。派生名词“动员”（mobilisation）首次见于《特雷武词典》（1771 年），指耶稣会对于《百科全书》的辩驳。在民法中，它指一个不动产变为动产的转变及其结果。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它进入军事和政治语言，表示号召武装力量和公民投入战争。“全民征集”、“连续征召”乃是 1793 年使用的与动员具有等同意义的词。按照《牛津词典》的说法，在 1853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从法语的军事词汇中借用了“动员”（mobilization）这个动名词，随后经历了相同的语义演变。

通过载入《法国科学院词典》1835 年第 6 版的两种意义，动名词“动员”从民法和军事管理词汇进入经济词汇。卡尔·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人类秩序的建立》一书（1843 年）所说的经济范畴谱系。蒲鲁东在该书中确认“信用，即生产的大导体的基础，乃是可分

① 莫里斯·图尼耶：《关于罢工的一些词汇——社会词源学论》（Maurice Tournier, *Des mots sur la grève. Propos d'étymologie sociale*, Paris, Inalf Klincksieck）第 1 卷，1993，第 5 页。关于出现在夏尔·傅立叶论著中的“社会运动”一词，见索菲·贝鲁、勒内·穆里奥、米歇尔·瓦卡卢利斯《法国的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学论集》（Sophie Bérout, René Mouriaux, Michel Vakaloulis, *Le mouvement social en France. Essai de sociologie politique*, Paris, La Dispute），1998，第 14~21 页。

性和动员”（根据作者的标号，为第402段）。自1848年革命以后，意群往往被用于种种涉及提供劳动、支持经济活动的必要性的争论中。路易·雷博怀着固有的亦即保守的激情嘲笑增加国家预算的提案，指出这样的提案正在危及将预算限于最低限度：

200亿！他们顿足捶胸说，必须找到这些钱。一个简单的程序就足以做到，那就是全体总“动员”。一个词的功效何其大矣！进行动员，动员，不是波舒哀编著的词典的产物，难道没有内藏着什么奥秘？进行动员，共和国的前途决定于此！谁动员得最好，谁就将发现我们命运的奥秘！有什么关于动员的广告，不使人联想到关于抵押改革和纸券的广告！

《热罗姆·帕蒂罗寻找最好的共和国》（1848年）一书的第15章开启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这个“良好的市场”的论说，而所谓良好的市场也就是达成华盛顿共识的自由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市场。在此期间，凯恩斯主义反对“放任自由”政策，以及使得国家开支和投资合法化的“通行证”制度。动员这个术语的普及化看来得益于“加强和动员中期信贷银行”的建立（1960年）。

为了更加全面，我们要指出动员一词在19世纪末也被用于医学和生理学。首先令我们关注的，则是它在社会学语言中的出现。埃米尔·涂尔干把它转义为唤起某个个人或者群体的一切能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析机械的相互联系。他写道：“愤怒无非是可使用的潜在力量的一种动员。”^①《论社会劳动分工》

^① 埃米尔·涂尔干：《论社会劳动分工》（Emile Durkheim,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aris, PUF), 1930, 第66页。

的分析把文明的提高同社会遭遇混乱风险的增加联系起来。“最发达的社会”同样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社会，这要求“大量的资本在机器的形式下变成不动产”。这里，埃米尔·涂尔干用了“mobilisation”的反义词“immobilisation”。^①

从这个转义出发，“动员”这个术语涉及某个群体时用来指投入或者启动某一具体行动。1913年，莫里斯·巴雷斯在《富有灵感的丘陵》中提到了这一说法。但在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示威游行、集会、会议、直接行动等集体表达形式。1936年，施压、民众运动同罢工和怠工一起得到高度运用。冷战初期的斗争以反击一词作为标志。1953年和1963年的胜利罢工被统称为公共部门罢工和矿工罢工。1968年5月（或者5~6月）运用了一些有时对立的方式，这取决于斗争的性质是社会运动抑或总罢工。197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动员和劳动者动员。历次工联代表大会决议的词汇计量分析表明，各种斗争的语汇在1970年代无论对于法国民主工联还是法国总工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从第一次重新调整中心开始，遭到了以埃德蒙·梅尔为首的工会联合会的摒弃。^②

在一个增长的环境中，1950年代的美国政治学坚信美国模式的普遍性，提出了一套发展主义的理论，把动员等同于民主和消费主义规范的平稳传播。过去的光明正大价值让位于都市化、扫除文盲和通信传播。卡尔·多什在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1961年）的一篇文章中，把这个以最强烈的方式表述的问题具体化为“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自1967年开始，约翰·彼得·内特尔及其文集《政治动员——方法和概念的社会学分析》（“基础丛书”）试图使这一进路变得更加能动，更加

① 埃米尔·涂尔干：《论社会劳动分工》，第386页。

② 安娜-玛丽·赫策尔等：《公开用语中的工会运动——频率词典（1971-1990年）》（Anne-Marie Hetzel et al, *Le syndicalisme à mots découverts. Dictionnaire des fréquences 1971-1990*, Paris, Syllepse), 1998, 第178-182页。

矛盾和多样。他区分出三个长期的“总”（用的是法语原文“en masse”）动员过程，分别为宗教的动员、军事的动员和政治的动员。阿米塔伊·埃特齐奥尼在他的《能动社会》（自由出版社，1968年）一书中扩展了这样的观点，将一些形式的反对变革的抗议活动也列入其中。1968年的各种不同的抗议示威刺激了形形色色的疑问的提出，原来的革命社会学^①在一些人的笔下变成了社会运动社会学、新社会运动社会学。

在学派的斗争有时压倒促使认识进步的关注的一种过剩生产条件下，可以识别出五种在论说集体对抗的本质各不相同的思潮。^②首先，自由主义肯定个人作为尘世的唯一实在即使不能说具有霸权地位，也是第一位的。集体属于业已过时的以往社会。大众的动员来源于嫉妒、剥夺感，这是蛊惑人心的政客善于利用来进行党派活动的东西。曼库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1965年，法译本1978年）的核心，则是引导寻求免票（free rider）的利益，尽管负面的激励（强制加入，纠察队）和正面的激励（物质的和/或符号的利益的提供）都阻挠这样做。^③

1970年代的法国强烈表现出来的第二个思潮，则是在阿兰·图雷纳的一系列著作的启发下形成的。这位社会学家在判断1968年的楠泰尔巴黎大学的学生运动注定归于失败之后，依然表示支持。他为新社会运动、生态运动、地区主义、女权运动大唱赞歌。他认为1977年开始的公开的工会危机乃是工会不可挽回的制度化的必然结果。正如我们在导言中谈到的，1995

① 安德烈·德库弗勒：《革命社会学》（André Decoufle, *Sociologie des révolutions*, Paris, PUF, coll. 《Que sais-je?》），1968。

② 可以细分为大约15个派别。见前引索菲·贝鲁、勒内·穆里奥、米歇尔·瓦卡卢利斯《法国的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学论集》，第27页。

③ 对此的批判，见阿兰·卡耶《利益社会学有利吗？》，载于《劳动社会学》1981年第3期（Alain Caillé, 《La sociologie de l'intérêt est-elle intéressante?》, *Sociologie du travail* n°3, 1981）。

年他把社会运动当作工团主义而加以否认，而1997年的失业者的斗争重新引起他的注意。

图雷纳的问题通常对于当代社会的各种演变颇为敏感，具有令人困惑的可塑性。^① 这样的问题有时是作为洛伦兹·冯·斯坦因的遗产提出来的。弗朗索瓦·沙泽尔坚持认为洛伦兹·冯·斯坦因可以同马克思比肩，而在雷蒙·布东主编的《社会学词典》（1992年）中则认为他是“社会运动”这一术语的发明者。我们看到的是描述某种类型表现的术语的一种书面的演变关系。图雷纳在保存马克思主义语汇的某些片段的同时，将丹尼尔·贝尔和马克斯·韦伯混合了起来。

雷蒙·阿隆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阿兰·图雷纳的论文答辩时指出，这位社会学家十分随便地运用诸多哲学范畴，^② 而且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曲解社会学方法。当他论述新工人阶级时，没有提供任何相关的统计数据。很容易从阿兰·图雷纳的著作中挑拣出一大堆没有根据乃至错误的论断。在《角色的回归》中，图雷纳宣称：“我们的公众生活的主要形象不再是公民或者劳动者，即使这些主体的形象依然是充满活力的和满载着意义的；它就是主体自身。”^③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何来这样的论断：“法国人看到一切政治计划从1991年开始消亡。”^④ 阿

① 迪特尔·鲁赫特：《作为社会运动理论的社会学理论——对阿兰·图雷纳的批判》，载于迪特尔·鲁赫特主编《社会运动研究》（Dieter Rucht, *Sociological theory as a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 A critique al Alain Touraine*），in Dieter Rucht e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 Frankfurt sur le Main, Campus Verlag, 1991, 第355~384页。

② 雷蒙·阿隆：《回忆录》（Raymond Aron, *Mémoires*, Paris, Julliard），1983, 第348页。

③ 阿兰·图雷纳：《角色的回归》（Alain Touraine, *Le retour de l'acteur*, Paris, Fayard），1984, 第10页。

④ 阿兰·图雷纳主编《大抗拒——对1995年12月罢工的反思》（Alain Touraine dir., *Le grand refus. Réflexions sur la grève de décembre 1995*, Paris, Fayard），1996, 第16页。

兰·图雷纳倾心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路线,^① 否认巴拉迪尔主义及其变形是一种政治,这使得他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同现实脱节,因此是可以任意变换的。反之,在他从这个论断中得出某些结论的同时,正确地领悟到了同自由主义对立的各派上升到计划高度的困难,而计划一词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语汇中进行超越的关键,也是埃德蒙·胡塞尔和马丁·海德格尔看重的术语。图雷纳社会学的独创性在于质疑当代的历史意义,探索变革的潜力,而其脆弱性表现在他的总体性观念之中。这个观念借助认同和对立来规定角色,而角色只是预先设想社会学家及被动员起来的群体进行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并得到完美解释。

第三个思潮既是社会学的,又是政治学的。它自安东尼·奥伯沙尔发表《社会冲突与社会运动》(1973年)一书以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称之为“理解性的”或者“积极的”思潮。它包含多种进路。威廉·加姆逊、查尔斯·蒂利、约翰·麦卡锡、迈耶·扎尔德、西德尼·塔罗的进路侧重各种资源的动员问题,亦即强调财产的而不是军事的动员。艾伯特·麦克亚当、艾伯特·梅鲁奇着重认同性的构建研究。J. 克雷格·詹金斯、彼得·艾辛格把焦点集中于机会的结构问题。在法国,奥利维耶·菲利厄勒、帕特里斯·曼、诺纳·马耶尔的名字是同探讨社会运动的构成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理解性的”思潮提供了诸如集体行动索引、动员周期(螺旋形无疑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它不回到出发的原点)、机会结构等十分有用的工具。2005年6月2~3日在法国政治科学政策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规划会议聚集了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诺纳·马耶尔等人,对“抗议、争辩和体制政治”进行研讨,旨在促使对传统的行动和非传统的行动之间关联问题的研究有所

^① 阿兰·图雷纳主编《大抗拒——对1995年12月罢工的反思》,第28页。

发展，这要求对抗议运动的原因、金融和通信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代单极世界的封锁、抗议过程的分期进行深入研究。^①

第四个思潮是由皮埃尔·布迪厄奠立的。这位社会学家尽管在政治舞台上从事若干活动，但更加关注自己的学术生涯，从而保证了他在研究方面的地位，直至进入法兰西学院，他的学术著作因此享誉法国和国外。《世界的贫困》（1993年）通过其主题导入了最初的断裂，因为此书不同于以往著作中谈论学派、中产阶级和国家贵族的批判语调。一些政治学家则由此转变为一种方法上的断裂，转向更加主观的方法。1995年，皮埃尔·布迪厄作为科学家深入社会舞台，不断对自由主义及其统治工具和效忠于它的人士发难，并提出种种疑问。^②

皮埃尔·布迪厄与1995年铁路员工罢工以来的社会运动有着密切联系，但对于这个主题并未作出论述，也没有提出问题。他对政治科学采取的相当片面的立场没有导致他思考“理解性”思潮的贡献。他写道：“全部政治科学从来只是一种特定的艺术，把科学之外形成的有关政治的自发学问交到领导阶级和政治家个人手里。”^③ 至于阿兰·图雷纳的进路，则在《教训的教训》（1982年）中被界定为“先知主义”。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社会学中，布迪厄的弟子们以某种可变的一致性和不同程度的成功转向一种构建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有关社会各阶级（其状态和立场）——而不是他们的斗争——的相对说来比较完备的观念。总体认知与统治者/被统治者对立之间的分离场的概念无

① 这些问题的发端，见奥尔东·D. 莫里斯、卡罗尔·麦克勒格主编《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边界》（Aldon D. Morris, Carol Mc Clurg Mueller ed.,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皮埃尔·布迪厄：《1961~2001年言论集——社会科学与政治行动》（Pierre Bourdieu, *Interventions 1961-2001. Science sociale et action politique*, Marseille, Agora), 2002。

③ 皮埃尔·布迪厄：《马屁精》（Pierre Bourdieu, *Les Doxosophes*, Minuit, n°1), 1972。

助于各种矛盾的定位。但这并没有妨碍布迪厄学派致力于探索政治危机动力学（米歇尔·多布里），研究罢工（斯特法内·西罗）、教师斗争（弗兰克·普波）、新社会运动和另类世界主义运动（达尼埃尔·穆沙尔，以及带有比较调和色彩的埃里克·阿格里柯利扬斯基、伊莎贝尔·索米耶）。布迪厄思潮在借鉴积极学派的同时，通过强调符号、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将投身于抗议的客观事业的各种角色采取行动的多重原因链接起来的意图，凸显出自己的特点。

最后，还存在着第五种立论姿态，尽管其人员数量有限，而且没有经过任何方式的协调。它失去了两个重要人物——克洛德·勒纳弗和让-玛丽·樊尚。今天，它在索菲·贝鲁、托马斯·库特罗、若塞特·特拉和米歇尔·瓦卡卢利斯的著作中得到表述，当然不无细微差异。其批判地吸收理解性思潮和布迪厄思潮的主要贡献的独特方式，凸显在整体揭示运动的研究上。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无合法证件者”运动，雇佣劳动者的罢工，都不是彼此割裂的动员，尽管它们是单独发生的。一切解放人们的动员（与反运动不同），无不在共同反对自由主义方面有着相互联系。

克洛德·勒纳弗认识到对于工人运动的解释性理论的多样性，谈到了所谓复调问题。他正确地没有参与刺激着学术群体的权力斗争。他用隐喻对譬如说自由派与斗士派之间有时不可消除的对立表示轻蔑。就根源而言，“复调”简单地标志着大量声音，特别是鸟叫的存在。音乐语汇似乎并不适合用来表示社会科学中的范型的冲突。其次，作为当代特点的是讨论、交锋的困难：皮埃尔·布迪厄成为牺牲品的媒体的死刑杀害，无非是那些故意搅浑水的著述的系统抹黑的产物。皮埃尔·库尔-萨利和米歇尔·瓦卡卢利斯的《集体动员——一场社会学论战》一书（2003年）乃是友好地对勒纳弗的隐喻表示敬意的极其罕见的例外。

没有社会动员的工会化：“娴熟的手法”^①

动员 (mobilisation) 加上前缀“de” (来自拉丁语“dis”) 的派生词, 意为剥夺、中止、否定, 是从 1870 年开始出现的。它属于一个相当丰富的词族, 有动词“复员” (démobiliser, 1826 年), 形容词“复员的” (démobilisé, 复员的士兵, 1931 年)、“可复员的”、“可遣散” (démobilisable, 1940 年), 名词“复员者” (démobilisateur, 1952 年)。

在动员过程与复员过程之间, 社会科学优先考虑前者。用萨特的一个表述来说, 一个群体不能长久处于融合状态。回归习惯在两种不同的局势下进行。要么动员完全得到满足或者对于其中止具有充分的重要作用; 要么动员失败, 其中程度各有不同, 从没有充分准备的失败到完全陷入泥潭。

1968 年 5 月的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复杂形势的很好例证。法国历史上的这场最大的罢工, 导致了格勒内勒协议。这个出自多次谈判的文件没有得到工会签字。法国总工会坚持认为记载了某些共同接受的观点的这份作为临时协议的“纪要”意味着有可能在工会支部和企业的层次上取得更大进展。利益是实际的, 但没有 1936 年的辉煌。认识是否有可能走得更远这个问题, 则不得而知。相反, 充斥着工会和党派分裂的运动的动力学最终导致戴高乐将军在大选中的胜利, 而这场胜利的脆弱性为 1969 年的全民公决的灾难所证实。

1968 年之后的年代继续处于社会运动的批判热潮。女权运动, 生态运动, 地区主义运动, 无不以创造性的姿态表现自己。按照 20 世纪社会史中心在 2002 年 11 月 8~9 日组织的一个研讨

^① 弗朗西斯·安布里埃: 《大空缺》 (Francis Ambrière, *Les grandes vacances*, Paris, Julliard), 1946, 第 108 页。

会的说法，工会运动达到了其“巅峰”，无论如何发挥了重大的影响。1972年，由于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中止、原料的暴涨，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上升，导致形成经济危机。出现了滞胀，经济的国际化扩大。尽管官方停止移民活动，但大规模失业持续不减。农业部类的衰减加剧。在服务业扩大的同时，工业多少有些衰退。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登台非但没有能制止自由化的进程，反而从1982年开始出于他个人的考虑重新予以启动，并在1984年后日益加剧。

工会运动由于在回答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方面犹豫不决，加之内部分裂，从而失去了拥护者，开始退潮。1984~1992年间法国总工会的宗派主义促使个人的反击活动减弱。同样应该分析法国民民主工联在诉求减退方面所起的作用。1977~1986年，埃德蒙·梅尔开始第一次中心调整，其内容包括五点：疏远法国总工会，命令的相对化，地方协调的优先性，接受整肃，工作和收入的分享。在雅克·勒戈夫的著作《从沉默到开口》（1985年）的跋中，埃德蒙·梅尔信誓旦旦地保证说：“我们从一种在企业中不说话、保持沉默的状态转入争取发言权”，特别是由于1982年的奥鲁法案的出台。分析的结果几乎毫不出人意料。1985年10月，埃德蒙·梅尔把“罢工的神话”放进了古玩店。

第二次中心调整对工会学说进行了更加彻底的修正。1986年11月的大学生动员遭到唾弃。法国民民主工联直到最后一刻才加入因马立克·乌塞金纳之死而爆发的抗议示威游行，而对铁路员工的罢工表示遗憾。法国民民主工联从此选择冷静谈判，开始归附自由主义，试图激起对于公正和人道主义特别是男女平等的关注，并在市场中进行兜售。1995年，法国民民主工联接受了朱佩计划。2002年的代表大会期间，妮科尔·诺塔在5月22日回答提问者时解释了民主工联的方向问题。她这样说道：“我们已经创立的事业，我们已经实现的事业，可以称作社会运动。习惯上为社会史的充满激情的伟大时刻，为这些抗议、罢工和示

威游行的伟大时刻——这些高度团结和富有象征性的时刻——保留着这个‘现成的名称’。但真正的社会运动不如说是集中于一个代表社会变革的共同目标的那些基层运动。”

正处于动员阶段的法国民主工联于2003年5月15日签署了一份关于退休的少数派协议。10万会员退出这个工会组织，25位老领导人痛斥这种放弃战斗的行为（见《世界报》2004年4月17日）。总会经受住了考验，2005年3月，弗朗索瓦·谢莱克发表了《改革家与急性病！》（瑟伊出版社），其攻击的主要矛头不是针对资本主义，而是针对英勇抵抗和刚强捍卫历史的言论。作者将它内部的持不同意见者加以漫画化，旨在逃避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这样的冲突难道真是不可消除的吗？法国民主工联在其提出的降低失业、分享收入等目标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断言自由主义是不可逾越的，这样的论断有助于对自由主义的维护，属于英国和美国人所说的“本身会自然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亦即一种具有自我生产能力的预言。研究解除动员的客观因素离不开研究解除动员的话语。

当代再动员的特征及其诽谤者

前缀“再”（re）用来表达一种逆转运动，反击，回归行动。1990年版的《法语语言库》忽略了“再动员”一词，但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都使用这个词（例如，见米歇尔·西蒙发表在《经济与政治》杂志2005年5~6月号，第610~611期上的文章，第5页）。它进入意为回归、再现、重启、再航、重新开始等例词。

社会斗争在当前阶段的革新属于一个长期的过程和法国的特例，从法国大革命中可以找到它的源头。继街垒战周期（1789~1871年）而来的是用两样武器——罢工和选票——组织

群众的时代轮回（1871～1977年）。一个危机阶段（1977～1995年）动摇了按照凯恩斯—福特主义逻辑构建的结构。

由苏联的衰亡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拉开序幕的21世纪，表明与那些光辉灿烂的预言截然相反。法国本土的社会运动经历了四个阶段或者说四个螺旋：1995～1997年，期望再次出现1995年的大联合；1997～1999年，促进左派多数；2000～2002年，反对法国企业运动（MEDEF）的社会重建；2002～2005年，与让—皮埃尔·拉法兰的“直管”相对抗。2005年5月29日对欧洲宪法条约说“不”，表明一种断裂，其后果还很难立即来进行衡量，尽管必须承认2005年的社会复苏意味着对于比以往的“民主逃亡”更加倒行逆施的后退行为的谴责。^①

1995～2005年十年的再动员有利于一系列新词汇的出现，诸如黑客（hacker），造反分子，静坐抗议（sit-in），自己动手制作（diy），比利时人铸造的另类世界主义，等等。集体行动革新的各个不同维度，凝聚成具有五个鲜明特点的新态势：基层的或者直接的民主，具体事物的第一性，斗争的片状化，投票与动员的分离—链接，各种冲突走向欧洲化的趋势。^②

1947年罢工之后的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CGT-FO），从第二次调整中心开始的法国民主工联反对有可能被极端分子操纵的直接民主。由1936年和1968年的运动哺育起来的个人文化，保存了对于全体人员大会的依恋，而对于所有工具的不信任强化了这种趋势。基层民主主导着罢工的运作。而手机、互联网等技术更加方便了这种实践活动，可以避免代表制度，绕过种

① 见前引斯特法内·罗泽斯《欧洲争论的新的民族化色彩》。

② 前引让—米歇尔·德尼主编《罢工中的冲突？》一书中试图概括出最初的特征描述（见该书第291～348页）。格扎维埃·克雷蒂耶、伊莎贝尔·索米耶在他们主编的《造反的法国》（Xavier Crettiez, Isabelle Sommier dir., *La France rebelle*, Paris, Éditions Michalon, 2002）中重新概括出五个特点：横向运作，直接民主，诉诸实用主义，扩大知识库和公民的不服从（第20～22页）。

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但网络的横向特性并没有消除权威现象或者戴维·福里斯特所说的“使权力不可见”现象。^①

当代动员的主导因素，本质上是紧急行动或者自卫行动。对于“无合法证件者”和企业倒闭而没有希望再就业或者转岗的雇佣劳动者来说，尤为真实。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实用的论调，觅求具体的解决办法，诸如争取最高解雇金和诉诸最有效的手段等，由此形成了某些直接目标与相当激进活动的号召之间的结合。

把紧急和可触摸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这限制了各种联盟行动，以及更大规模的力量汇聚。1995~2005年时期的种种动员，通常是分割的。例外来自于菲永针对退休金的“改革”，这场斗争促成了相当广泛的阵线的建立。相反，尽管作出了实际的努力，失业者的斗争却是与要求就业的雇佣劳动者的斗争相割裂的。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与法国电力公司（EDF）各自进行自卫斗争。2005年，舆论对于“拯救我们的追求”运动的支持，没有导致同其他斗争的任何联系。公立中学的学生们孤军奋战。

当代抗争的第四个特点乃是投票与动员之间的分离—链接。实施自由主义政策的当权者受到了票箱的惩罚。雅克·希拉克在1997年议会解散时遭受了失败。利昂内尔·若斯潘也为他的保守主义在2002年4月21日付出了代价。雅克·希拉克再次在2004年5~6月的地区选举和欧洲选举，以及2005年5月29日的欧洲宪法条约的全民公决中遭到重大挫折。“常规”记录中的这种表现并非是同“非常规”记录中的表现割裂的。两者有着关联，但同时存在着分离。各种动员并未导致权力的改变，选举的惩罚也没有引起所实施的政策的变化。这样一种态势自然引发疑问，其答案的某些因素可以在下述情况中找到：左派的

^① 戴维·福里斯特：《通信的先知主义——信息社会及其未来》（David Forest, *Le prophétisme communicationnel. 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 et ses futurs*, Paris, Syllepse), 2004, 第48~49页。

民众不够广泛，在1995年、2002年、2005年处于少数派地位（左派的“否决票”接近45%），战斗力依然有限，缺乏充分协调一致和具有吸引力的纲领，来否定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

最后，斗争趋势的欧洲化同样见诸失业者的抗争、女权主义运动和雇佣劳动者的斗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困难不少，首先是欧洲工联的畏首畏尾。不过，比利时韦沃德雷诺汽车厂事件并非是这种现象的唯一说明。埃尔夫、阿卡特、马莎百货、阿尔斯通等公司被当作走向私有化部门的路标，而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火车司机和法国航空公司飞行员的斗争被纳入了欧洲罢工的行列。^① 就世界范围而言也是如此。弗朗索瓦·邦的长篇小说（法亚尔出版社，2004年）中描述的韩国大宇公司雇员代表团到法国来重新寻找雇主的情节，人们记忆犹新。由于分包商的介入，国际竞争在规模上几乎不可想象，而在一些大企业集团的范围内，工人比较容易进行反击活动。

集体动员和持批判态度的一个左翼的再现，引起自由主义秩序拥护者的不快。抗议活动被指责为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反现实主义、排外。极左的选民被等同于极右的选民，他们的素质低下，他们对于外国人和现代化的恐惧，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横加指责。^② 2005年5月29日的“否决派”被描述为恼怒的反动派和缺乏理智，尤其是在《解放报》的各个栏目中。就这方面而言，当代并无创新。否定阶级斗争乃是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而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没有合法性，因为从心理学的意义上来说，合法性也就意味着几乎没有自由。

① 纳迪亚·伊拉尔：《欧洲工会协调的产生——铁路和公路运输部门的社会动员》（Nadia Hilal, *La naissance d'une coordination syndicale européenne: les mobilisations sociales dans le secteur des transports ferroviaires et routiers*, Paris, IEP de Paris), 2005。

② 弗里德里克·马东蒂主编《政治的因循守旧》（Frédérique Matonti dir., *La démobilization politique*, Paris, La Dispute), 2005。

第七章

社会斗争的可见性和不可见性： 量与质的问题还是视角问题？

斯特凡·布坎

我们在本文中将对促使工人斗争（或者社会斗争）变得如此“不可见”的因素进行反思。这根本不是像若干系列的长期统计资料所表明的那样的一个“量”的问题；不是在欧洲和国际范围内可以验证的一个趋势。这种“不可见化”也不是一个质的问题，尽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和社会—政治周期促使某些自卫和局部性质的诉求占有优先地位。然而，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显得细若游丝，仿佛是在集体行动的体制框架——诸如各种不同的“职业关系制度”——之外，或者背离这种框架的东西。这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斗争的相对不见性问题不如说属于一个视角的问题。时下关于这些社会斗争的流行观点，不论是学者的还是新闻记者的观点，都只是提出置疑。我们觉得，一个跨越学科领域的进路应该同对于“舆论生产”过程的批判结合起来。同样，我们还觉得不可或缺的是，把对于“各方面都是可见的东西”的分析同“真正不可见的东西”，即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的信息斗争、“地下”斗争、抗拒联系起来。我们将在本文中介绍能够在观念和经验的层面上促使不可见因素变得可见的若干著作。作为结论，我们将强调一种名副其实的、国际的和全球的进路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的进路，才能使我

们窥见各种社会斗争的意义及其具体形式的偶然性。

(1) “阶级意识”的退潮是一个一再出现的议题，无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公众中间，莫不如此。同“工人斗争”或者更普遍一点说，同社会斗争相关的问题，也是这样，尽管人们很难否定其现实存在。然而，按照一般规律，它们走向失败，不再能具有“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意义本身。塞拉泰克斯化工厂的斗争，李维斯（Lévi's）、万能（Moulinex）、欧洲钢铁（Metaleurop）、沛绿雅（Perrier）等公司的被解雇人员的斗争，以某种方式代表了“为荣誉而战”。他们的案例在道德上的正义性是以没有希望和没有能力使他们的要求取得实际满足为代价的。所有这一切是同一部残酷而无可挽回地宣告结束的历史的方向一致的。

(2) 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观念不但是简单化的，而且是错误的。它在社会问题的许多基本方面陷入了死胡同。首先，它患有历史近视症。社会斗争经历若干长周期，既同经济形势、劳动市场状况——根据失业与充分就业、岗位的丰富与稀缺的情况、集体行动方式各不相同——相关，又同集体行动的依托者（工会、政党、政治思潮）的方向和实践联系在一起。^① 社会斗争从来不只是经历工业社会过程中的一个上升轨迹，继后随着进入“后工业”出现一个下降轨迹。相反，细致的研究表明斗争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同步；雇佣劳动者的斗争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大。^②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资本与劳动之间力量对比状况的反映，尽管是扭曲的。我们往往在社会斗争和

① 约翰·凯利：《重新思考工业关系——动员、集体主义与长波》（John Kelly, *Rethink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Mobilization, Collectivism and Long Wav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② 贝弗利·西尔弗：《劳动力——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Beverly Silver,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工人阶级”的主导观念背后发现一种怀旧之情和对于过去的神话化，但只要下力气进行研究，就可以看到这个过去并非那样富有团结性和集体精神，也并非那样富有战斗精神和无往不胜。

(3) 如果局限于由于企业倒闭而陷于绝望的雇佣劳动者的冲突，那将是名副其实简单化的。仔细看一看罢工的统计（频率、延续时间、强度），那么就1995年至今而言，就可以发现一条上升的曲线一直延续至2000年，继后是罢工的天数逐步下降，但参与的比率并未下降。^①应该说，社会冲突的上升在1990年代末是相当显眼的：罢工的天数1999年比1998年增加了66%，2000年则比1999年增加了41%。就一个更长的阶段而言，统计表明罢工活动一直保持着：1989年和1995年构成了创纪录年份，折算计人的罢工天数分别达到320万工作日和580万工作日，而在1995年之后的阶段，罢工的水平则保持在每年100万至250万工作日之间。就长期而言，可以看到私人部门和国有化部门的企业占罢工总天数的1/3~1/2。1996~2000年期间，冲突不但愈加频繁，而且延续时间更长、更加连续。1999~2000年，局部冲突从35%增至57%。千人以上参加的罢工天数从1999年的38天增至2000年的54天，在此之后，则重又摇摆于35天左右。如果把把这个指标同企业的规模比照观察，那么在大企业中，自2000年的顶峰阶段之后，比率几乎保持不变（45天）；在小企业中则相反，冲突略微下降：100~499名员工的企业中，从28天降至25天；50~99名员工的企业中，从15天降至10天。2004年，罢工者占相关企业雇员的37%；这个比率在2000年达到了顶点（50%），1996~1999年期间摆动于32%~37%，而在2002年降至28%。由此可见，在罢工活动与经济周

^① 达雷斯：《2002年和2003年的劳动冲突》，载于《第一手综合信息》第18.4期（Dares, 《Les conflits de travail en 2002 et 2003》, *Premières Informations-Synthèses*, n°18.4), 2005。

期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关联。衰退年代，结构调整和失业上升年代，与罢工活动总量和参与比率下降年代相对应，但并不一定在强度上有所减弱。经济增长、失业略有减少的年代则呈现冲突特别是围绕工薪问题的冲突上升的趋势。^①

(4) 达成共识的观念不论是学者的还是“世俗的”，无不是悖论的。在我们继续认为社会斗争正在结束的同时，一系列统计资料却表明正好相反！因此，“不可见性”首先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种观念的产物，它使人一叶障目。但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必须验证它是否是一个质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更加困难。首先一个困难是形式上的。事实上，制度化本身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疏导、调和特别是扭曲了冲突？为了快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尽管得到承认并写进了法典，尽管进入制度化，各种罢工始终在发生。同时，这种制度化的冲击并非是中性的。它主要是通过规定诉求的主题和处于这个领域之外的议题，给诉求的表达套上了枷锁。职业关系把单独面对面的资本—劳动关系划入“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范畴，而一些重要问题却被排除在外。试想一想生产的选择问题和劳动组织。

(5) 诚然，应该承认这种制度化在法国从来不是十分发达。这种特殊情况的根源既在于国家机构的强大力量，把法规的生产放在优先于协商规范地位的规范等级制，也在于企业主与法国总工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的敌对状态。在企业中，长期以来这体现为往往依靠“工会之家”为支撑的一种“老板即家长”的父道主义政策（特别是在诸如标致和雪铁龙等汽车制造厂中），以及同某些工会组织“优先对话”，以避免或者孤立

^① 达雷斯：《2000年的劳动冲突》；《2001年的劳动冲突》；《2002年和2003年的劳动冲突》；《2004年的劳动冲突》，分别载于《第一手综合信息》2002年第9.1期；2003年第34期；2005年第18.4期；2005年第45.1期。

“革命的”工会运动。一旦员工开始组织工会，其他一些工会就会“自发地”出现。一些工会的强硬阻止不了（或者很少能阻止）企业同另外的所谓“改良主义”而事实上只求妥协的工会签订少数派协议。

面对由虽然处于少数却以代表群众为天职的战士网络构成的集体行动，法国企业运动选择了一种所谓的“社会重建”策略，旨在把劳动和就业领域与公共空间和政治领域完全分离开来。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圈，实际上可以通过它来莫立所谓的经济合理性的霸权。于是，法规、规范在协议的形式下——实际上是社会权利和集体保障——的产生，重新从属于所谓的经济合理性。用米歇尔·阿列塔的话来说，这样的选择有利于遗产资本主义，^①而无需立法者的保护性干预。社会保障只剩下一个普世主义类型的遮羞外壳，外加上以企业的经济状况为转移的谈判权。

(6) 可以说欧洲职业关系规划采取了与法国企业运动所鼓吹的相同的方针：一方面，一个包括一切可能的例外的最低框架颠覆了规范的等级制度，从而把协议和种种不受法律限制的例外放在优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因此表现出一种富有道德说教色彩的唯意志论。这种方针被命名为“软法律”（soft law），它支撑着因社会、生态、伦理等标签不同而有所区别的各种政策。然而，工薪状况的重组是由企业主联手进行的，而且大多是由各国的国家政权（所谓欧洲云云，只是一个遁词）引导的，它所引发的抵抗正确地倾向于促使资本—劳动关系重新走向政治化。只需列出欧洲跨行业罢工运动的清单，就足以证明这个假设，例如以针对退休金问题的跨行业罢工运动（奥地利和法国，2003年）和劳动市场改革（德国和荷兰，2004年）。资本与劳动之间对立的或明或暗的恒常性，同样意味着策

^① 遗产资本主义是各种权利独立于企业经济状况的资本主义。

略方面的方向改变有可能接替某些冲突。像堑壕战一样，它是由进攻、暂停、休战组成的。我们要提到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插曲：2004年，工业联合会（意大利的企业运动）领导的方针发生改变，选择落到了蒙泰泽莫罗的肩上，此人是费拉里汽车公司的领导人，但以批判贝卢斯科尼特别是他的使社会和解陷入危机的社会权力改革政策著称。在连续发生四次几百万人参加的跨行业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三年社会运动之后，来自雇主联合会的这种批判是可以理解的。

（7）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增殖、积累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当前坐标要求大规模的社会退却，因而谈不上真正的社会和解。劳动时间的延长，工资的下降，缺乏社会保障，乃是劳动条件退化和保持利润率的不可或缺的杠杆。唯一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要问题，则是了解工会运动的各个组织是否从思想上和动员形式上已经准备好了站在斗争的高度来反击这种既是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又是社会的进攻。对于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可能作出回答，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存在着若干矛盾的趋势。只要社会保障陷入危机（“老龄化”及其他陈词滥调）、公共服务必然通过自由化而趋于“现代化”、“全球化”“不可避免”并带来普遍利益等主流话语的内化占据压倒优势，我们就将看到各种斗争的弛缓或者相对停滞会继续下去。这样的主流话语不但压缩了可能性的空间，也就是说压缩了采取行动的余地，而且还通过工会组织接受购买和使用劳动力的苛刻条件体现出来：代工，迫使劳动力屈服的临时使用制度，加上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和能力管理、个性化的报酬政策等全部经营策略和武器。

（8）同时，必须着重指出当前阶段的第二个困难。19世纪，工人/社会斗争几乎始终构成“反劳动”，亦即反对作为剥削的社会关系的劳动，如反对12小时工作制和“贫困”工资制度（低于保障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反对使用童工，反

对老板的专横和劳动力雇佣制。逐渐地，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产生了与具有社会“就业”形式的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社会权利和集体保障。群众性失业的上升和雇佣条件的临时化，促使雇佣劳动者进行自卫。在这种形势突变的情况下，维护就业通常也意味着维护作为剥削和统治的社会关系的雇佣劳动。选择小恶的原则占据了上风，就业被当作一种要挟手段，这导致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持就业，把艰辛和限制转移到其他人头上（主要是雇佣劳动阶级的边缘地带），同意维持从社会的观点应该批判的生产活动。劳动者作出了许多牺牲（工资降低，屈从的就业条件），而且为了保持或者永久获得这些工作岗位，他们还将继续这样做，尽管实际上这些工作岗位既没有保持量又降低了质（从没有在缩短工作时间的形式下进行再分配的生产率收益的视角来看）。社会的碎片化乃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群体和阶层缺乏相互团结的结果。

因此，可以做出结论说，“斗争的质”无疑受到了保持就业的需要的侵蚀，因为这种需要使人忘记去质疑社会生产关系，而当前的社会生产关系恰恰是雇佣劳动条件普遍而又多样地退化的根源。必须再次指出，这些社会关系无不打上了资本之间竞争（在资本内部人为地发生的）的标记；对劳动市场进行竞争的标记；通过强夺超强劳动价值来进行资本积累的标记；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标记。

（9）然而，在社会冲突问题上不存在任何超决定论和社会学规律。关于竞争性和为了保持这种竞争性而必须作出必要牺牲的主流话语，最终失去了它的严密性。除了几十年间留下了痕迹的严重失败（1984~1985年英国矿工罢工类型的失败），一些部门或者单位反对这样做。于是，我们看到“受抑制者”的复出，而且大多是在出乎社会运动家和社会学家们意料之外的時候。我们可以不揣冒昧地说，在出现某种退潮的同时，1990年代初以来欧洲形成的动员周期，通过一种更新和扩大的社会

批判表现出来。之所以说这种批判是“更新的”，是因为它接续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称霸的十年；之所以说是“扩大的”，是因为它同样是以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商品化作为批判的靶子。“另类世界主义”运动通过一个“公民”运动在工会运动的边缘出现，乃是工运主义制度化（从这个词的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后果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工运主义往好处说是从来没有当政的一个对立面，往坏处说则是放弃政治阵地和放任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泛滥的工团主义的一个组件。不过，由于缺乏同社会问题的联系，另类世界主义运动存在着孤立和边缘化的危险，最终像以往的“艺术”批判一样——我们乐于将1968年运动的特点概括为一种反官僚的动员——不仅得不到补偿，而且表达出一种可怕的精神颓废。^①

(10) 对于工联主义来说，屡屡败北的积累，可耻地或者逆来顺受地接受事物的既有秩序，说明为什么集体行动部分地与劳动场所发生的事件脱节。当知识界和政界被劳动痛苦和道德困惑的论题成功搅乱之时，我们可以说这种状况得到了印证。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些方面，那是错误的。这种简单化十分类似于描述工人的状态时只记录耻辱、缺乏团结和个体化的情形。^② 阿尔贝·O. 伊尔什曼用“忠诚”、“逃避”、“诉求”三种类型来区别劳动行为的类型学，保持了重要的启发性价值。^③ 但是，这种类型学没有包含能够说明三者转换或者“混合”行为的分析因素。我们以让-玛丽·樊尚为榜样，^④ 认为一切社会斗争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反抗同社会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反抗的种

① 前引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基亚佩洛《资本主义新精神》。

② 斯特法内·博德、米歇尔·皮亚卢：《工人地位再探索——索绍-蒙贝利耶标致汽车厂调查》。

③ 阿尔贝·O. 伊尔什曼：《面对企业和机构的衰落》（Albert O. Hirschmann, *Face au déclin des entreprises et des institutions*,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1972。

④ 前引让-玛丽·樊尚《劳动批判》。

种“不可见”形式始终存在着，即使是在最“不稳定”、对老板的专横最反感的阶层中，也是如此。最近的一份在临时工中间的参与性观察调查表明，^①这些人成了“老油条”；他们“磨洋工”；把企业的器材占为己有；擅自降低定额，使自己成为中介机构不可缺少的人物，特别是他们保留着种种“诀窍”，而其他人员如果中介机构不再使用他们时，只会消极怠工。诚然，这并非总能得逞；存在着一些有效的惩罚，流传着若干黑名单，而总体说来，社会的倒退依然很突出。但是，这远非消沉和被压垮的个人的状态。人们并不是因为被统治而不再反抗。

(11) 是否应该把这些无定形的实际活动都理解为属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反抗？有人认为可以用“生产博弈”的模式来进行解释。这是唐纳德·罗伊^②在1950年代诠释并在30年后由迈克尔·布洛沃伊重新发现^③的“产出限制”的一个形式。对于布洛沃伊来说，社会关系产生的不是“自在的阶级”，而首先是赞同，因为“人们不能同时玩游戏又质疑规则；对于规则的赞同变成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赞同”。^④因此，他认为劳动行为在最好的情况下表达打破单调的意志，这是一种安全阀门，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表达使得强制变得徒劳的一种赞同态度。人们不禁感叹说，只需了解唐纳德·罗伊和迈克尔·布洛沃伊的著

① 让-路易·勒特克西埃：《流动人员对流动人员的剥削——教师回忆录》(Jean-Louis Letexier, *L'exploitation des mobiles par les mobiles*, mémoire de maîtrise, Université de Picardie Jules Verne), 2004。

② 唐纳德·罗伊：《一家汽车行里的定额限制和怠工》，载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7卷，第2期(Donald Roy, *Quota restriction and goldbricking in a machine sho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7, No. 2), 1952。

③ 迈克尔·布洛沃伊：《制造认同——垄断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的变化》(Michael Burawoy,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④ 迈克尔·布洛沃伊：《语境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下的工厂和国家》，载于美国《社会主义评论》第11卷第4期(Michael Burawoy, *Terrains of Contest: Factory and State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Socialist Review*, USA, vol. 11, No. 4), 1981, 第92页。

述，就足以使其他参与性观察黯然失色。

然而，有些参与性观察揭示了一个更加矛盾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社会实践是与劳动时间、应该作出的努力、速率、管理专断权的减弱等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认为这种“安全阀”进路或曰个体调节的进路是错误的，并发展了一种正确地把“可见”与“不可见”链接起来的进路。从对于农民社群、农奴和雇佣劳动者的横截面研究出发，他指出被统治者十分经常地发展一种“两面言语”：在统治权力在场时，被统治者表现得毕恭毕敬、忠心不二；而当统治权力不在场时，构建了一种表达正相反的态度言语（笑话、传说）、举止和文化密码。因此，在他们身上实施的统治只是表面上被接受。反抗的举止随处可见，尽管故意隐姓埋名，在暗中进行，并戴上了假面具。安全阀的假设将这样的举止理解为公开和可见的抗议的一种替代物，而在詹姆斯·C. 斯科特看来，这样的举止既能加强下属群体，又是形成公开抗议出现的一个前提条件。一些行为的秘密（或者半地下）性质，只不过是力量对比的一种体现。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中犯规的界限依然是设定的，并没有被消除。

（12）作为结论，我们说当工人和社会斗争归于失败（或者说失败比成功多）时，它们是可见的；当它们走向胜利，即使是部分的胜利，像肖松的工人冲突事件那样，^①则是不可见的。当它们毫无希望和令人失望，也就是说同全局联系在一起时，是可见的；当它们同工资、劳动条件、劳动时间等问题相关时，则是不可见的。最后但并非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它们既不能通过各种体制角色（“社会伙伴”），又不能通过传媒作为中介时，依然是不可见的。一些地下形式的反抗必然使得管理和配

^① 达尼埃尔·格拉松、贝尔纳·马塞拉：《肖松——工人的尊严》（Daniel Grasson, Bernard Massera, *Chausson; une dignité ouvrière*, Paris, Syllepse), 2004。

备干部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使得人力资源的管理部门成为“战略性的”部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规范成为有用的东西，不只是为了保持或者寻求顾客。

当大家声援各种斗争和进行斗争的人们时，这些斗争不仅是“可见的”，而且是可以理解的。试想一想行动的形式发展至破坏和越出法律的法国电力公司员工的罢工，如果把它看做是反对私有化的表现，那么就会得到更好的理解。从根本上说，不可见和可见的问题属于视角的问题，这种视角既是政治的（对于既存秩序的社会批判，向另一个视野开放），又是认识论的（能够跳出造成现实的自我遏制和社会的自我粉碎的主流科学和哲学范畴之外来进行思考）。这是不同于把下属当作失败者和历史的迷失者的另一种视角。电影《人力资源》以及大学同僚们的许多著述和分析的意义所在，是将工人世界描绘成正在风化的一个社群，指出社会倒退的广度，这只是空洞地指出以往的社会斗争失败的代价。如果只是这样做而不去认识为什么其他可能的结果没有发生，那么就离陷入把工人世界说成是“垂死”的社会阶级或者一个除了乌合之众没有集体角色的世界的拟人进路不远了。更深刻地说，这是用一种精英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工人世界或者一般的底层大众。从悲叹他们的统治到批判不反抗，其间的距离是很短的。诚然，这并没有像悲惨主义和民粹主义所渲染的那样出现，但它抹不掉“日薄西山”的历史故事色彩。

（13）另一个视角只有在其成功地脱离个别，亦即脱离 X 或者 Y 企业、地区、民族，不包含任何具体的总体的情况下，才有意义。采取这样的视角，要求将分析框架提升到全球的层次上，提升到理论和观念的层次上。这样，各种事件和命题就具有了一种不同的意义。它足以衡量超过一亿工人参加的一次总罢工的意义，比如说像去年在印度发生的那样，尽管这次罢工只有不到 24 小时，但意义深远。它足以衡量将 1989 年委内瑞拉

发生的饥荒骚乱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分隔开的十年。我们可以拉出一张很长的清单，写出一部编年史。所幸，这不是本文的对象。但显而易见的是，世界不是静止的，全球范围内有组织的剥削和统治的现实将迫使屈从于它而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男人和女人们组成一个可见的集体主体。这样的集体主体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被阉割或者扭曲的，带有他们所忍受的社会条件的烙印，但他们的行动承载着变革现实从而重新把握现实的希望。这是比可见化更加重要的问题。

第八章

西班牙新经济从业人员的价值

——反思保守价值与进步价值

阿尔曼多·费尔南德斯·斯坦因科

若干年前，东德共产主义作家斯特凡·赫尔姆林在分析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经验时这样写道：

我50岁那年有一个可怕的发现。在多少年来我以为意思明确的词句中间，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将以一个联合体来替代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各阶级和阶级对抗，在这样的联合体中，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不知道自己从何时开始阅读如此写着的这句话。我以这种方式来读它，因为它符合那个时代我对于世界的理解。许多年后，当我发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这句话的说法正相反时，不由得惊讶莫名，甚至心怀恐惧。马克思说：“我们将有这样一个社会，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斯特凡·赫尔姆林的这种混淆，过去和现在依然广泛流传于社会主义运动中。它不是理论上的误解的产物，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根源。

团结、个人主义和向资本主义过渡

准确的解释是 20 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后半叶大部分社会主义者来源于“新无产者”，也就是说来源于被迅速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后来则是福特主义）工业化的农村和传统地区的这部分人口。这个过程在地中海国家和东欧一些地区（易北河东部地区）发展得极其迅速，并造成了创伤。在这样的环境下，主流价值只能是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在这些地区，建立在等级结构基础上的家庭和社群纽带过去和现在依然十分坚固。它们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市场意识形态的政治资源。但是，它们过去（现在依然部分地）呈现出不对称形态，亦即团结的非民主形态（有机的团结）。

在这些地区，一直有强烈的社群参与，但存在权力、知识和权威的不平衡分布。权威基本上建立在对于人的统治、体力对于挣钱的极端重要意义以及对于个人主义态度的强烈鄙视的基础上，因为个人主义态度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构成重大威胁。前资本主义家庭和东方的市民共产主义（东欧的大家庭或曰 *zadruga*），农民的村社（*obschtschinas*），土地的集体开发（B 区的米尔——*mir*，C 区的公社土地）^① 长期保持着。这样，在这

^① 根据其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方式、在封建主义向现代化迈进的长期旅程中劳动和所有制的主导类型、家庭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性质，欧洲可以划分为 A、B、C 三个区域。A 区的核心为英国、比荷卢联盟、法国东北部和德国的几个地区。在这个区域内，资本主义出现得十分早，但在 20 世纪期间没有孕育最革命的资源，尽管它同样也创造了社会流动性和迅速增长的生产率。B 区覆盖了从易北河到特里埃斯特半岛的地理线，而 C 区包括从托斯卡纳南部的意大利半岛的诸地区、伊比利亚半岛的埃布罗河南岸诸地区和巴尔干半岛的若干地点。见阿尔曼多·费尔南德斯·斯坦因科《阶级、劳动和公民权——社会存在导论》（Armando Fernandez Steinko, *Clase, trabajo y ciudadanía. Introduction a la existencia social*, Madrid, Nouvelle Bibliotheque), 2004。

些地区形成了完全不同于 A 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价值体系。在 B 区和 C 区，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延续至 20 世纪下半叶，而且成为产生欧洲 20 世纪进程中社会主义重大经验基础的革命行动的主要源泉。福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上构建；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部分地说）的独裁经验和工团主义经验也是如此。曾经被冷战理论家们系统地利用来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的东欧与西欧、中欧与南欧的长期文化差异，部分地建立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现实基础上。

地区之间的这种客观不同性，同样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个人解放话语上霸权的失落。1968 年后政治自由主义占领这些地区，导致欧洲左翼的衰落，这是事出有因的。只有部分左翼传统重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的战略意义。但是，这种传统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集团中政治上是孤立的，从而造成了革命左派的革命潜力在 1980 年代不断向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转移。

自福特主义范型侵蚀以来，这似乎发生了改变。^① 笔者要进一步论述若干观念，以便从现代解放的视角更好地理解个人主义价值与集体主义价值之间的辩证法的意义。笔者将运用经验的基础来这样做：2004 年在一般所说的“新经济”从业人员中间进行的一项田野研究的成果，这是一项由德国科学部资助的题为“无界限工作的界限——就业研究新进路”的更为广泛的研究的一个部分。

西班牙新经济中的劳动

包括多媒体、软件开发和同因特网相关企业^②在内的“新经

① 见前引保罗·布法尔蒂格主编《社会各阶级的复出——不平等、统治、冲突》。

② 本文中设定多媒体部门代码为 A，软件开发部门代码为 B，因特网部门代码为 C。

济”部门，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劳动组织和社会内部的就业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这个部门对于经济周期、交易所和市场的困境反应极其灵敏。经济增长年代和危机阶段可能在几个月内彻底改变劳动的全部人文和社会条件，但同样也可能导致兼并、战略联盟、企业和控股公司的投机收购和出卖。如果说无限制的劳动和自我剥削是某些场所的一种规范（加班、周末工作、几乎没有调节的劳动条件），那么这就是在“新经济”企业中。

由于西班牙是有着最长期的失业（特别是在不满35岁的青年中间）经验和临时性劳动合同最多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也是社会支付费用在西欧最低的国家，因此它在我们的研究中尤为重要。“新经济”部门中的主要劳动法则是建立在对于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的超剥削基础上的。青年工人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劳动合同的临时性和他们的经济优势，以及在找到其他工作岗位或者在企业的等级阶梯上得以攀升之前接受任何类型的工作和人际关系的必要性。由于社会保障不发达，家庭成为提供保护和社会支撑的主要机构。其基础是具有某些不确定的和暂时的契约的代与代之间、夫妻之间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互助价值。随着劳动文化趋于以短期取向为轴心，很难对个人的生活作出计划，很难走向独立和“成长”为自立的个人。这种状况导致政治移位。

(1) 它可能导致某种幼稚化，也就是说导致“自甘于”建立在权力、权威等方面的不对称结构基础上的下等角色。这些价值有的甚至在青年中间产生保守态度的倾向，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顺从地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权力和权威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出现在家庭里，同样也见诸大多数新经济部门的企业，其原因在于这些企业都很小，不具有“职业性质”，而是建立在一种先驱思维的基础上，企业领导作为创业之父进行活动，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个人之手，偏好于直接面对自己的这个或那个“孩子”（员工）。家庭生活与企业生活彼此联系过于紧密，从而

很容易使人们的习性在两者之间转移。在诸如此类的空间里，几乎不可能有抗议、工会活动和造反举动，这并非单纯是客观状况所致，而是源于个人价值导致它们不可能发生。

(2) 这种状况同样也可能导致反抗这种事态的抗议，导致一种比较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但并非意味着像 1968 年期间一样起而造反，来反对父辈的价值，或者自动组织起工会。这只是表明一种要求独立、不认同企业一家庭的目标和搬出父母住所的激进愿望，即使这样做由于不再享受得到母亲做好的现成饭菜和父母付钱雇佣保姆洗碗和做家务的优裕条件，生活会变得比较艰难，较少有娱乐休闲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这包含着对于自身或者个人目标的追求。

那么促使他们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因素是什么？我们研究的结果表明有客观和主观的两类原因，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价值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也就是说即使客观条件相同，价值也可能不同，从而政治态度也将各异。特定的客观环境（譬如说有必须偿还的抵押款或者雇员有必须养活的自己的家庭）是决定性的（我们无暇在此讨论这些问题），但只有同特定的价值联系起来，它才能导致某些批判态度的发展。

西班牙新经济从业人员的价值

所有的访谈无不感受到新经济部门的巨大活力，感受到它始终着眼于创新的文化，从而不断给人刺激，使人产生不可抗拒的挑战感，去深入微软的密码，发现程序的错误，参与数百万人收看的某个电视插播广告或者在城市的所有大电影院预映的某部电影的制作。然而，得到认同的价值并非都适合传统的公式。如果我们运用诸如“多样化的兴趣对非多样化的兴趣”、“个人态度对有机态度”、“消费价值对非消费价值”等范畴，那么这个部门的各种价值范围就能得到更加确切的界定。毫无疑

问,“进步价值对保守价值”这种二律背反像以往一样依然存在着,但它是上述这些概念的产物,而不是诸如左派在传统上运用的“个人主义价值对集体或者互助团结价值”那样的二律背反的产物。

多样化的兴趣对非多样化的兴趣

在接受访谈中间,年龄、个人的家庭事务、成熟度或者稳定的无形关系,还有职业的认识,无不导致比较广泛的兴趣范围。对于工作和信息手段的依恋并非那么强烈,即使有人可能被它们吸引。随着人们不再专注于工作并培养一种比较多样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他们在生活中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关注。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活动保持更多的距离,这开辟了着手向自己提出某些“问题”的可能性。由于雇员们的工作动机是强烈的,而且信息手段方便了知识吸收,没有多样化的价值对于政治态度正在产生重要后果:要求无界限的工作的倾向不仅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需要和雄心而加强,而且同没有其他事情可做的状态相关。正在新自由主义的价值尺度中出现的过度专业化并非是完全无辜的。这并非是说具有多样化兴趣的雇员不热爱他们的工作,而是说他们同样喜欢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做其他事情、同其他人相处,而不只是与同事在一起。

例如,A1^①正在准备美术博士论文,不顾一切地希望找到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论文;由于他的研究课题同信息学毫无瓜葛,于是在他大学生活的范围内与完全不同的各种人会面。A2租了一个画室,不只是为了靠卖画来使自己的收入来源多样化,而且也是为了自己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还有其他事情可干。这给予他一种较有批判性的个人视角,来看待新经济部门及其节律。B3喜欢去他的乡间小屋,利用大自然和从事传统建筑。C1喜欢

① 文中的数码代表接受访谈者。

一种比较密集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经常出席书刊推介会，参与争论，等等。B4（有一个孩子的一位妇女）同样也属于这个群体。接受访谈的妇女试图使自己的生活多样化的理由，看来同家庭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B4 这样说道：

我爱自己的工作，但在工作之外我有另外的生活。我喜欢同我的小朋友一起做某些事情，我喜欢各种语言和所有的事情，但我应该相信自己反省得并不太晚，我只做唯一的一件事情，能同我的小朋友在一起。我没有把握能否用全部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以前曾在阿瑟·安德森公司上班，工作比现在多，挣的钱却更少。在这儿，你确实没有私生活可言，甚至没有愿望。一旦处于这样的境地，你开始丧失对于外部世界的控制，反过来，这给予了你以控制一个小世界的可能。

多样化的兴趣看来在多媒体部门比在其他地方更加多见，在与较多技能和商业技能相关的职业人员（A1，A2，B3）中间比在单纯技术职业人员（C2）中间更加普遍。同样，在中产阶级中间，多样化的兴趣比在下层中产阶级中间更加常见，而且同不主张消费的态度联系比同主张消费的态度联系少。B3 以批判的方式把这种缺乏多样化的单向度的、文化上局限的人定义为一种乏味的人，即西班牙语所谓的“perfil paleta”，意思是指缺乏文化与过渡消费倾向的结合。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被看做一种过于现代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迟钝和简单的生活方式。B3 说道：

我认为这种乏味的人在单纯技术职业人员中间十分常见。当人们必须旅行并同不属于同一个小群体的其他人交谈时，应该在精神上是开放的，应该对不止一件事情有自

己的看法。这不是是否做过高级研究的问题。有一次，我同一个比较年轻的同事一起旅行。她是通信技术方面的工程师，曾经在美国的阿瑟·安德森公司做过基层管理人员。除了计算机还是计算机，根本不能同她谈任何其他事情。

缺乏多样化兴趣的员工具有将几乎全部智力资源和时间集中于他们的工作的倾向，但并非人人如此。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有某种工作的马德里大区的雇员（马德里大区的63%的人口不到45岁）有着“苦干的心态”。但是，娱乐的兴趣不应该是建立在多样化兴趣的基础上，而应该是建立在用口袋里的钱进行消费的享乐主义夜生活（泡吧、蹦迪）的基础上的，通常是在下班后与同龄的同事一起前往，只是部分为了谈论工作问题。在这个群体中，对于职业生涯的关注和竞争心态特别强烈，对于金钱的价值和获得社会晋升也极其看重。具有多种不同兴趣的雇员通常比较年长，对待技术持更多的怀疑态度，对这个部门本身持比较广阔和批判的观点，对于诸如“社会”、“伊拉克战争”、“技术”等普遍性问题有着个人自己的看法。不过，单从年龄也解释不了全部现象，因为“有些年届五旬的雇员也丝毫没有多样化的兴趣”（F1/C3）。事实上，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价值。

个人的态度对有机的态度^①

具有较强的个人态度的雇员，有着发展他们自己的标准和

① “有机”一词与南欧法西斯制度使用过的一个术语相关；在法西斯制度看来，“社会团体”可以是一个民族、一个商号或者是一个家庭，等等。在这样的语境中，社会的、经济的、人身的不平等被认为是“天然的”，甚至是民族、企业或者家庭运作所必需的。同生物机体类比是基本的方法，因为一个机体具有使它能够运转的不同“器官”。因此，所谓“有机的”态度，是指不加批判地接受被认为或多或少是“天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某种社会不均等。这恰恰是同公民权相对立的。种种“有机的”形式同样也包括其成员的互助团结和社会包容，其中还包括各种父权主义关系、庇护关系，等等。

观点来作出决定和组织自己的工作 and 生活的倾向。反之，比较倾向于有机价值的雇员则较少自我肯定，而接受他们所属的机构——主要是家庭和企业——的全部价值、目标和观念。倾向有机价值的态度并非必然包括或强或弱的社会敏感性。这样的态度只是表达依恋微观机构的一种倾向，或者说表明他们能力或者兴趣较弱，不能在一个更广的语境中开放地思考和整合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在其中工作的企业或者信息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活和社会敏感性依然存在，但缩小为较小的机构，缩小为朋友和家庭圈子、他们在其中工作的设计小组或者企业一家庭。至于互助团结，其范围是指包括家庭在内的他们个人的小群体成员，其他的居民或者作为整体的社会被排除在外。因此，他们不应该被看做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群体精神。但是，他们所认同的集体价值的类型不包括同正义、社会环境或者人类相关的思想。

另一方面，持有比较倾向于个人的价值，并非必然导致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的态度，而只是产生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冷静观察事物的较有个性的观点。在接受访谈中间，持有自己的观念，这可能意味着有能力限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诸如技术、顾客、规划或者竞争性等表面上占主导地位的问题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有能力把这些问题看做是一个更广的系统（社会的）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可能危害个人健康的根本问题。雇主不喜欢雇员脱离其单方面为企业规定的一般框架（竞争性、现代性、技术）而持有他们自己的观念。

工会活动家总是竭力说服雇员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追求个人的兴趣和需要，而不仅仅寻求企业、顾客或者计划的利益，从促使他们自愿地变成自己劳动的奴隶的这种形式的有机的互助团结中解脱出来。他们用正在等待职业机会，而且一旦倾心于某种计划就准备献出自己一切的年轻人，同完全意识到高失业率和自己的部门缺乏稳定保障的雇员相比照。他们

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某些客观的原因，而且也由于一些主观的原因（C3，C4）。年龄，他们个人的家庭状况，承担的义务和婚姻，凡此种种往往终结了有机的态度，因为雇员有着单独或者个人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有着发展他们自己的个人兴趣的需要。

信息部门当然是充满有机态度的，但这种现象比这个部门本身更加深刻和更加普遍。这是南欧体制的一部分。由于雇员们年过三十依然生活在父母家里，加之这个部门的许多企业本身十分小，而且具有家庭氛围，这样的态度从家庭扩展至企业和职业生活。雇员们并不质疑他们的领导人的决策、他们为之付出了劳动的某个计划的意义；同样，他们也从来不怀疑自己的父母；当他们来到大学或者技校后，也从来不质疑自己的老师。这是乡土文化：每一件事情都按部就班，自上而下遵守一切内在的规则和种种等级制度，对它们从不提出疑问。

在中等技术学校里，谁也不议论教师的看法，即使发生了不公正的事情，也没有任何人真正提出抗议。你必须学很多东西才能有时间去考虑某些一般性的兴趣。当你抱怨的时候，就会产生自己是一头黑色绵羊的感觉。（B4）

毫无疑问，个人态度与多样化的兴趣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多样化的兴趣具有赋予雇员更有把握地驾驭他们个人生活的倾向。因此，雇员们把工作视为他们生存的一部分；他们的爱好由单向度（赫伯特·马尔库塞语）变成多向度。这种倾向可以使更有个性的态度得到发展，同他们自己的企业、自己的计划乃至自己的父母保持一定的距离。没有这种类型价值的最起码的因素，看来很难发展一种批判距离来对待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经济的法则。这只是使得雇员们作为个人变得更加成熟，但这种所谓的成熟可能产生某些深刻的政治后果，尤其是当它使

人们信任或者相信一个对民众撒谎的政府之时，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保守价值对进步价值

随着工资和其他问题通过个人谈判来解决，随着企业变革的加深，个人的态度和价值在这个部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福特主义劳动文化相比，产生了一种倾向于个人主义态度的强烈趋势。这在软件设计、因特网部门（特别是分包企业）比在多媒体部门看来更加意味深长。同样，在由于市场的压力而不得不面对日常的激烈竞争的企业中比在软件跨国公司（诸如英美的大咨询公司）中更多地见到这样的个人主义态度，其原因在于后者的企业文化和劳动关系比较规范，通常给人以一种经过整合的共同体感觉，从而克服了近乎是家庭式的小企业的恐惧心态。但是，这并未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和自由主义公民权理论所描述的那种纯粹个人主义的态度。有若干其他的因素推动雇佣劳动者走向团结互助，而且看来这些因素占据着优势。有机的态度只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一个样本。

在这个部门中工作的客观现实，对于孕育一种纯粹的反社会的个人主义来说并非是沃土，因为这个部门的劳动大多是以团队工作、社会交流和日常的相互依靠为基础的。因此，绝对的个人主义态度、竞争态度或者纯粹的反集体主义价值既不可行，也不是任何人所希望的，包括在管理领域里，因为它们通常是违反效益、健康、企业的有机文化和常识的。诸如此类价值的表面上矛盾的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子，就是发展一贯的刺激政策的困难：企业一方面需要确立同企业的整体效益相应的每个员工的奖励，因为劳动越来越具有集体性，不可能分割成个人的小块效益；另一方面，企业需要组织一个个人的奖励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产生个人效益。这个问题看来不易解决（A2）。

然而，存在着另外一些正在发生作用的更为进步的反个人

主义因素。首先，在西班牙和地中海诸国社会中存在着若干集体主义文化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超越了意识形态，而且并非同样也存在于欧洲 A 区。个人的和非个人的各种关系，个人的和共同的事业，各种生存的经验，无不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是在竞争性极强的新经济部门中，或者确切地说在同作为世界主角的跨国公司和美国生产方式没有直接联系的企业（主要是西班牙分包企业）和环境（B3），也是如此。

所谓“现代管理文化”是被移植过来的文化，它们同新自由主义文化的核心联系在一起；“唯一最佳途径”的实践者们认为这样的态度不是十分“职业的”。但事实上，它们是西班牙柔性管理模式的基石之一，十分常见于工作以及围绕工作的社会环境（家庭、朋友关系等）之中。因此，员工们不仅很好地一起工作，在工作时间之外还坐在电脑前相互帮助，分享休息时间，而且共同享受夜生活和假期，一起组织节日（A1，B1，B4，C1）。

在工作中，我们彼此分享许多信息，但同头头们并非如此。有许多电邮名单，你总是问钟点，总是向同事们请教，他们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你，而你同样这样做。有许多相互帮助，经常分享信息。这令人十分感动，营造了十分和谐的氛围。（B4）

这说明为什么接受访谈者都认为工作环境良好或者十分良好（A1，A2，B4，C1，C2），虽然他们都承认在这个部门中应激反应是巨大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例如 B3 的案例），那么原因在于同员工中间占主导地位的缺乏多样化兴趣的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心胸狭窄和农民习性。在大量的案例中，劳动关系甚至导致彼此相恋和喜结良缘。我们由此似乎不仅看到了一种前福特主义的传统方式，而且也窥见了建立在集体主义价值基础

上的一起劳动和生活的福特主义方式，这是作为这个部门的员工平均年龄年轻的产物的“青年文化”的表现。团队对于个人的态度和认同性具有决定作用，等级制度在这样年龄的人群中间不被接受而在年岁较大的人中间却是能够被接受的。不融入集体的“边缘分子”被看做另类，同团队的其他人格格不入。

如果你有意同团队保持距离，譬如说你不玩牌，大家就会对你不信任。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潜在倾向：在工作之外也应该在一起玩。不过，大家对拿多少工资的问题都讳莫如深。事实上，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但我之所以决定不同他们结伴外出，是因为希望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支配时间，发展其他的兴趣，保持工作之外的其他的其他的关系。……现在，我正投入翻译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工作，我抽出没有人能够理解的所有可怕的拉美式表述，寻找我们当代的例子，来解释它们的意义。我同样还要把今天已经不适用的概念同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其他概念区分开来。(D2)

这种自发摒弃个人主义态度的行为，并非意味着青年具有诸如集体组织起来维护他们利益的倾向，也并非意味着他们自动成为反对伊拉克战争和新自由主义的进步分子，尽管只要各个政治组织和工会能够找到吸引他们更加积极投入的表达形式，他们能够做得很好。这只是意味着集体主义一个人主义非此即彼的传统辩证法也许不再十分确切。这种传统辩证法如果同认为集体价值天生是进步的，而个人价值天生是保守的传统政治价值捆绑在一起，那么甚至很可能引起混乱。这是像斯特凡·赫尔姆林所说的那样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误解，而不幸的是，数以千计的社会主义者在20世纪正是这样践行的。

各种事物错综交织，而且以往也许更加复杂，却被简单化

了：各种传统价值不仅可能导致比较进步的态度，而且也可能导致比较保守的态度，反之亦然。不仅如此，使用把个人主义价值与集体主义价值对立起来的简单术语，看来更加适合于在两者之间进行内在的区分，例如我们的案例中所说的个人态度与比较有机的态度的对立，将前者与人们所说的新版本进步价值重新联系起来，而将后者与新版本保守价值（新自由主义霸权）联系起来。更加注重自我和具有更多的多样化的兴趣，可能意味着更加理想主义，对于内容比形式更加偏好，较少实用色彩，具有不是保守的态度。^① 凡此种种无不构成或者将成为可以称之为反新自由主义的或者另类世界主义的、现代进步文化的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

^①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当资本主义失去脑袋之时》（Joseph Stiglitz, *Quand le capitalisme perd la tête*, Paris, Fayard), 2003。

第九章

从工薪阶层到临时工？

埃弗利娜·佩兰

近 15 ~ 20 年来，若干大动荡震撼了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就业，引起福特主义时期的工薪阶层的深刻变化。我们目睹通过无限期全日制工作合同确立的“终身”就业和在企业内部长期任职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社会流动性上升的模式，缓慢而不可挽回地被否定。今天，各种所谓非典型的就业形式——钟点工、定期和临时代理合同等，成为进入劳动市场的新通道的特征。

根据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 2003 年的就业调查，有 428000 名临时替工，约占 2150 万雇佣劳动者总数的 2%，有将近 200 万定期合同工人，约占雇佣劳动者总数的 9.2%，有 273000 名见习人员，约占雇佣劳动者总数的 1.3%；因此，12.5% 的雇佣劳动者只有一种临时的身份，也就是说只有临时的收入和短期的生活前景。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通常不得不在私人部门受雇的钟点工，约占得到工作的就业人口的 16%，而其中 30% 是妇女。并且，在 1400 万签订无限期合同的工人中（有时不计 450 万公务员，而且这个数字往往被竭力缩小），许多人很可能明天或者更晚一些时候被解雇，并且很少有机会迅速重新就业。前途的这种不确定性特别沉重地压迫着非熟练工

人，构成我们社会的重大变化之一。尤其严重的是，不论形势如何，不论是处于危机还是经济增长时期，就业和收入的这种临时状态有增无减。十年间，定期合同的数量上升60%，临时工增长160%，而无限期合同数量只增加2%。

我们正在走向临时工的普遍化?

在当代生产的条件下，失业不再是仅限于一小部分工人的局部状况，而是一个雇佣劳动者在若干或长或短的就业或培训阶段之间经历的环节之一，是他们越来越经常地反复经历的环节之一。固定期限合同的终止成为遭遇解雇、进入失业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在越来越多数的雇佣劳动者中间实施的劳动力管理新模式（除了技术和研究部门的固定的技术工人之外），其基础是强制的弹性制和流动性，系统的“流动”（turn-over），或者更糟糕的是企业中缺乏经过精心规划的职业岗位。

同时，这种流动性，这些无业和培训阶段，成为创造新的需求、新的技能和新的生产合作的条件之一。莫里齐奥·拉扎托着重指出：“因此，在一个地域里流通的弹性的、见习的流动劳动力需要新形式的社会保护，这种社会保护不仅仅是抵御社会风险的保障，而且也是支付其流动性和知识的一种形式，因为这样的流动性和知识造福于经济和城市。”^①

资本主义新的组织方式^②越来越明显地建立在知识生产及其流通、脑力劳动力的动员的基础上，而这种脑力劳动力极富流

① 莫里齐奥·拉扎托：《塞纳-圣德尼城市空间的新见习工作》，给装备部平面城市建设委员会（PUCa）的报告，埃卡特，2004年6月。并见《群》杂志2004年夏季号“间歇及其各种状态”专刊（Maurizio Lazzarato, 《Les nouveaux apprentissages de l'espace urbain en Seine-Saint-Denis》，rapport pour le PUCa-Ministère de l'Équipement, Écart, juin 2004. Voir aussi le numéro spécial de la revue *Multitudes* de l'été 2004 consacré à 《l'intermittence dans tous ses états》）。

② 见前引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基亚佩洛《资本主义新精神》。

动性和可塑性，在企业内部或者离开企业而从事着不连续的工作，从一个岗位跳到另一个岗位，从一种身份变成另一种身份，时而作为工薪阶层，时而依赖失业保险制度（有许多种形式，包括工作时间机动制度），时而自己出钱来进行技能的再生产。与鼓吹具有普遍保障的收入来适应智力资本主义降临的所谓“黑金论派”的论点相反，这并非是说劳动岗位绝大部分变成脑力和非物质劳动岗位。事实上，尽管教育的进步和工作技能要求的提高，但在广泛的雇佣劳动边缘领域，特别是在使用非熟练劳动力的部门（快餐店、清洁工、保管工），依然服从于福特主义类型的劳动方法，劳动的节奏和条件十分苛重，他们的技能得不到任何承认，也没有培训的任何机会。

在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组织中，临时工体制成为结构性的东西，而对于老板来说，无异于把就业的风险转嫁到了临时工头上，排除了以往一切社会保障和抵御失业的集体担保。“法国企业运动”的社会重建计划对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不仅仅是工薪阶层，工薪劳动本身变成只是劳动力动员的可能形式之一，此外还有独立劳动者或者所谓的“自由撰稿人”等等）这样说：“培养你们的可使用性，只有你们本人才能对此负责，承担起就业风险！”

面对这样的新局势，大多数工会和左派政党行动迟缓。^① 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继续用一成不变的职业范畴的术语来论证就业的权利、生产率的增长和假设中的充分就业的再现。诚然，法国总工会通过制订使被解雇的工薪人员乃至固定期限合同工

① 埃弗利娜·佩兰：《处于社会问题核心的失业者和临时工》（Évelyne Perrin, *Chômeurs et précaires au coeur de la question sociale*, Paris, La Dispute), 2004。并见埃弗利娜·佩兰《面对临时性的工会和集体》，提交法国科学研究中心“20世纪社会史中心”于2004年11月组织的“法国的工会与协会——竞争还是互补”学术研讨会的论文（Évelyne Perrin, *Syndicats et collectifs face à la précarité*, communication au colloque *Syndicats et associations en France, concurrence ou complémentarité*, organisé par le Centre d'Histoire Sociale du XXe siècle, CNRS, novembre 2004）。

保持一种职业身份、一份收入和培训权利的职业保障计划，做了未雨绸缪的工作，但它对于从坚持权利的连续性出发来要求收入保障问题依然认识不清，强烈反对与工作无关的任何普遍收入。由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各国的“团结、统一、民主”新工会重组而成的10国团结工会联盟，依然局限于无限期合同和就业的长久性及与此相关的权利，以及在合同终止的情况下保留一份体面的收入或者工资的要求。事实上，法兰西岛大区的替工和临时工调整的主要成果是2003年夏季和秋季的广泛集体反思活动并制订一个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临时工的新的替工补助模式，建议以年参照工资为基础确定失业补助，亦即以跨行业最低生活水平工资为底线，辅以相当低的最高增长额，以免同时获取临时收入和高补助。

这个新模式^①引起广泛关注，因为它以对于各种不同而多样的临时性职业状况的具体认识为基础，乃是在没有等级制的前提下走向集体成熟的成果，而不是工会派别争斗的产物。它力求通过新的保障建议来适应这种工作临时性状态，旨在达到权利以及收入的连续性，既不同就业活动完全脱节，又考虑到个人创造力重构特别是对于大学生可能构成很重负担的自费深造的各个环节。这样的创造力重构和深造活动当前虽然不由企业主负担费用，但他们将从中获利。这个运动的活力源于它尽管发生自各不相同的职业领域，但具有其他许多部门的临时工中间不存在的职业意识。

随着替工运动、2002~2003年就业青年运动和继后的研究人员运动的爆发，出现了关于临时工的若干不同的新组织模式，第一次能够提出与价值创造的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并可以适应资本主义变化的方案和建议。

^① 参见《国际战士》(Interluttants)杂志关于法兰西岛大区替工和临时工调整的专刊。

问题在于如何开展通常分散于小服务企业的临时工中间同样的交流活动并集体提出诉求，因为在这样的小服务企业中既没有工会，而且也很少有人参加工会，极少得到传统工会的保护。如我们将在后文谈到的那样，这些斗争大部分尽管往往延续时间较长而且是坚定的，但依然是孤立的，其焦点集中于反抗针对组织工会的镇压活动或者提高工资的要求，除非譬如说法国总工会利用这样的战斗性来提出其有关职业法规的提案，或者各派工会谋求扩大请愿运动（例如要求麦当劳支付13个月工资）和为这样的运动提供复燃的前景。

临时工的反抗

近年来，我们无可否认地看到，从快餐店和文化用品商店到清洁公司和雇用新移民劳动力的其他公司的各个不同部门临时工的新的战斗行动趋于高涨，尽管他们的身份和劳动条件差异甚大。

从2000年末发生的巴黎圣日耳曼-德-普雷大街麦当劳员工延续15天的罢工到2004年的几起坚定的长期罢工，无不发生在这些部门。试举几例：

——2001年10月至2002年2月共计112天的巴黎斯特拉斯堡·圣德尼大街麦当劳快餐店罢工，起因于5名要求建立一个工会支部的员工被控犯有偷盗罪而遭解雇。罢工的结果是这5名员工终于重新被录用。

——同样是在斯特拉斯堡·圣德尼大街的这家麦当劳快餐店，因1名工会代表被解雇而爆发了从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长达一年的占领型罢工，最后这名代表终于复职。

——巴黎香榭丽舍全国文化技术产品连锁商店2002年2月发生的为期一个月的罢工，结果是该连锁网的其他商店员工的工资提高到该店同等水平。

——2001年2月，必胜客员工为争取年终奖金罢工一个月，并于2004年春再次罢工一个月，要求增加工资。

——“参加运动”体育用品公司员工要求增加工资，以及“维京”公司反对星期日加班工作并要求全年发放13个月工资而举行罢工。

——2003~2004年巴黎“弗罗格”连锁酒吧斯里兰卡裔厨工为争取改善工作条件举行数月罢工，可惜没有获得胜利。

——2002年3月至2003年2月，阿科尔集团分包商阿尔卡德饭店的非洲裔打扫女工长达一年的罢工，终于取得更合理地计算工时和减缓工作速率的胜利成果。

——2002年巴黎蒙特勒伊门大街马克西书店员工反对关闭这家商店坚持一个月的罢工，以及2004年6月里昂站马克西书店员工为获得饮水点和免费如厕再次举行一个月罢工。

这些罢工尽管相对封闭并遇到了种种困难，却标志着反对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的重大胜利，展示出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的英雄形象。这些斗争的胜利与其说是因为工会有时给予的有限或者短期的支持，毋宁说应归功于颇为广泛的跨团体和跨工会后援委员会的建立（随着第一次麦当劳罢工后援委员会的建立，这样的行动达到顶峰），从而走出了工会的狭小神殿和企业的局限，向舆论、媒体呼吁，乃至走上大街向市民直接求援。这样做可以击中这些大跨国集团的要害——它们的品牌形象。

从这些十分借重媒介的冲突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今天工会即使依然是不可缺少和不可绕过的，却不再能单独在工会组织很弱的许多雇用临时工的部门和小企业（大集团的加盟企业或者分包商）中赢得胜利，必须接受企业之外的力量的协助，而这是工会以往无法容忍的。

工会的诉求通常依然集中于增加工资和奖金，或者反对针对工会的镇压，而临时工优先提出的诉求却是尊重他们的尊严，

承认他们的工龄（一致要求每年给予13个月工资），承认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工作能力。有时（例如香榭丽舍大街的文化技术产品连锁商店的罢工），可以看到工资要求、钟点工转为全日工、定期合同转为无限期合同的双重诉求，这确认了一种“终身权利”，是同所谓的系统“流动”和缺乏晋升制度等相对立的。

罢工后援委员会试图将工资“向上拉升”的期望与废除临时工身份的普遍化的诉求结合起来，而工会却通常忙于将斗争进一步普遍扩展和建立常常囿于本部门诉求的各种斗争之间的共同阵线。譬如说，“麦当劳、阿尔卡德、弗罗格等斗争后援委员会”自2004年9月阿尔卡德（阿科尔集团饭店清洁承包商）解雇“团结、统一、民主”工联代表之后，在巴黎的阿科尔集团的一些饭店组织了多次野餐会，要求阿科尔集团终止清洁分包。

那么，什么样的收入保障应该同非传统工会和法国总工会所提出的权利的连续性结合起来？其他以临时合同为主的部门中的工人能够从替工调整行动所制订的非连续就业补偿方案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个模式能否普遍推广到其他职业部门？怎样进行反对发展分包的斗争？怎样推广给分包商签发票据人员的集体协议，或者怎样才能使分包任务回归内部管理？是否应该向大量招募临时工的企业征缴更高的税收或者要求它们承担更多份额的社会费用？凡此种种便是社会运动通过同愿意进行联合的工会结盟，依靠正在进行斗争的部门作为后盾，应该予以探讨解决的问题。待到何时才能对临时工进行调整或者组织惩治就业临时化的刑事法庭？

反思中的工薪青年——处于危机中的 一个模式的靶子

提供给青年一代的劳动和工资条件、就业状况严重地退化，而与此同时，通过更长期的教育培养和社会化的青年对于工作

的意义和质量却更加苛求。新的工薪模式囊括了所谓自由“流动”、以合法的最低工资招工、没有晋升机会、超强度的劳动节奏和劳动的“商品化”（技能和能力得不到承认）、强制推行的钟点工制度、对于终身权利的否认等成分，是同青年特别是具有熟练技能的青年的希望背道而驰的。这个新模式尤其受到属于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的机构青睐，并加以强制推行，而这些公司对于建立工会极其厌恶，竭尽全力进行阻挠。此外，在许多小企业（随着分包制和加盟制的发展，其数量越来越多）中，根本不存在工会。法国的工会组建率停留在8%左右，是欧洲最低的国家之一。

然而，工薪青年尽管很少加入工会并对于自己的权利不甚了了，却并不因此而不甚苛求，对于粗暴的等级制度和“小工头”不再容忍。他们期望表达对于工作的主观意愿，被承认为具有深刻的独立、解放乃至颠覆愿望的“劳动者”。迂回策略和“出走”战略（辞职或者脱离企业）也很常见，这说明了企业中的部分自由“流动”的原因。不过，青年们尽管不加入工会或者更少参加政党，却颇为政治化，但采取的是很难分辨的新形式，其原因是这些新形式比较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以相关的人际网络联系为基础，信任和没有等级制是这样的网络的基本原则。例如，2001年在快餐店以及商业和研究人员中组成工会的员工于巴黎创立的“制止临时工制度”网，“麦当劳、阿尔卡德、弗罗格等斗争后援委员会”网便是如此。同样，临时工近来的大部分斗争产生了“临时”后援委员会。这些委员会通过不分上下级也没有工会“领导机构”的方式来运作。

另一个矛盾笼罩着新工薪制度，那就是在诸如法国这样一个早就制定了相当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青年一代面临的“掉价”：中产阶级乃至部分高等阶级不再能够为自己的子女保持他们的地位，尽管后者得到学校培养的时间更长，而且有着优越的选择条件。我们同样看到，随着在研究人员中临时工

制度的普遍化，以及通过外包、定期合同或者在公共部门的许多场所引入临时工制度，在“繁荣的三十年”间经历了“社会上升”的各个阶层的子女面临着相对的“脱阶级”过程。然而，一个社会如果长久地不能为其后代展示光明的前景，将会变成什么样？

今天，工薪阶层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占有更突出的主导地位，虽然从岗位的储备来说，就业的临时性依然不占主要地位，但就业的无保障性和不稳定性趋于普遍化。定期合同和临时替工成为进入越来越难以达到稳定就业的劳动市场的规范。同时，工会的软弱和分裂空前严重，削弱了劳动者的自卫行动，而分包制和过小的企业（加盟制度）的增多分化了劳动集体，形成工会空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主阶级，特别是跨国公司形态下的企业主，以及遵循新自由主义或者超自由主义的右派或者左派政府，向雇佣劳动阶级发动了进攻，逐一撤销和废除了集体保护和保障，所谓的退休金改革、社会保险改革、失业保险改革，无不以此为目的，工作福利和劳动权利成为一纸空文。

一方面是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抗击这种空前的进攻，并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形态重建社会契约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对于雇佣劳动阶级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并提出共同的要求。由工薪阶层沦落为临时工阶层，事实上这表明必须对整个社会保护大厦进行重新思考，而一个附加的难题在于临时工的极端的分散，以及他们所处的劳动状况的小块分割。工会危机也导致他们必须重建集体自卫的工具。因此，这是雇佣劳动者——无论是临时工还是“固定工”（或者这样假想的人）——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十章

间歇演艺人员：一个“完满的” 弹性工作制实验室？

菲利普·库朗容

通过捍卫艺术家、音像和演艺业工人和技术人员的特殊的失业保险制度的一系列接连发生的动员活动，法国的文化部门自1990年代初以来贯穿着意义已经远超出大约10万相关职业人员的特殊利益的一场社会冲突。在2003年6月22日法国企业运动与三个少数派工会中央机构之间的议定书——在限制很严的意义上对这个失业保险制度进行所谓的改革甚至可以说给它套上了笼头——签字之后，这个运动在2003年夏季具有了特殊的规模和声势。得益于这个运动，就业的临时性问题在双重意义上闯入了公众的视线。

事实上，间歇演艺人员界贯穿着能够很好地说明新自由主义特定意识形态的所谓“现代性”陷阱的双重悖论。第一个悖论与部分间歇演艺人员本身对他们面临的不稳定就业状态的理解方式相关。虽然自由职业生涯也许是特别碎片化和缺乏保障的，但事实上并非被一致地认为是临时性的，或者说至少通常并不绝对地被认为是这样的，而这样的感觉不能完全归结为相关从业人员缺乏真诚或者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异化。第二个悖论则同动员的目标相关。一方面是一些进行动员的活动分子在间歇就业普遍化的背景下抨击演艺行业的工作临时化；而另一方

面，运动的主要诉求的目标显然不是发展永久就业——尽管有许多相当雄辩的说辞，但不能不看到“永久”观念在艺术界形象不佳——而是戏剧和音像从业人员失业赔偿法规的持久化。

2003年夏季冲突的根源：2003年6月26日议定书

国家失业保险协定附加条款第八条（关于戏剧艺术家、个人和技术人员）和第十条（关于音像和电影艺术家、个人和技术人员）所规定的演艺间歇人员制度，考虑到这个行业的若干特殊的限制，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特点与启动应支付赔偿的起点（前12个月中的507个小时）和工作时数的计算规则，特别是演出场次转换成工作时数（单独的演出场次换算为12小时，“群体的”演出场次换算为8小时）的规则相关，自1969年以来确立了一个失业期赔偿的例外制度。

自1990年代以来，这个制度出现了日趋严重的赤字状况，其原因是支付的补偿数额的上升与根据这些附加条款征收的分担款项增长之间的差距。这项赤字在1991~2002年从2.17亿欧元增至8.29亿欧元，需在各项制度补偿的框架内由总协议负担。这种状况促使主要是法国企业运动对这些附加条款经常提出疑问。

由法国企业运动与法国民主工联、法国企业行政及技术人员总工会和法国天主教个人联合会三个工会签订，而遭法国总工会和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否决的2003年6月26日议定书，于2004年1月1日生效，对演艺间歇人员的失业保险条款做了不同的修改，其中主要并最受争议之点是通过修改计算工作时数的参照期，提高了获取补偿的门槛。从2004年1月1日起，属于附加条款第八条的雇员，计算工时的日期从12个月降为10个月，属于附加条款第十条的雇员，则降为10个半月。

随着这个议定书的签订，演艺部门在2003年夏季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以致大多数夏季艺术节，特别是阿维尼翁艺术节不得不取消。2004年初议定书的生效并没有终止这个运动，但2003年夏季罢演的连锁式反应在2004年不复产生。到2005年末，正如反对这个议定书的组织，首先是法国总工会演艺工会联合会所担心的那样，从新条款中可以看到的结果清楚地表明，在此之前按照12个月工作满507小时即可领取补偿条款执行的数量很多的间歇演艺人员事实上被新制度排除在外，他们从此必须认可在10个月或者10个半月期间工作满上述同样的小时总量。与此同时，实行这项改革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制止原来的第十和第八附加条款造成的经费赤字的增加。

总之，这样的双重悖论使得间歇性就业成为一个颇有迷惑力的弹性工作制形象。就这一观点而言，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斗争所争取到的工薪法规的新自由主义企业意识形态上的一个成功之处，正如罗伯特·卡斯特尔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① 在于其借助部分伪装把自己树立为救星的能力。由于有关雇佣关系的当代法律框架赋予雇佣劳动者的权利和保障，既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价值分配的条件，也没有改变雇佣劳动者对于雇主的从属关系的不对称状况，而且福特主义的工薪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因此一些弹性就业形式通过弱化从属关系的时间形态，促使一些人减弱受到整天为一个雇主工作的无限期就业规范束缚的异化感。受雇于多个雇主，签订断续工作的劳动合同，这似乎同艺术界所固有的某种独立性和流动性伦理十分吻合。在这种雇佣制度普遍化的过程中，演艺间歇人员的状况成为上述悖论的典型事例。

^① 见前引罗伯特·卡斯特尔《社会问题的变形——雇佣劳动阶级编年史》（1995年）和《社会的不安全——什么东西得到保护？》（2003年）。

然而，1980年代以来从业者翻了三番^①的间歇演艺人员的状况，也提供了一个相反的教训：随着在数量日益增长的有劳动能力人口中分布的平均期限越来越短的合同增多，难道间歇就业不是代表了在数量不断增大的“后备军”压力下处于劳资关系弱势而像随手可以扔掉的“纸巾”一样的雇佣劳动者世界的形象吗？出自同一种状况的这些对立教训的并存，提出了两类疑问。^② 第一个疑问是两种极端的论点的可信性：一种观点认为间歇就业乃是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无限弹性的地狱；另一种观点则鼓吹间歇就业展示出后福特主义的、能动的、独立的、摆脱了资本统治的雇佣劳动阶层的形象。第二个疑问同间歇就业者“模式”的作用相关，也就是说这种就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广到其他职业领域。要进行这两方面的检验，必须探讨一下间歇演艺人员危机所提出的范围比较窄的若干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法国文化政策模式的基础。

弹性制与就业的分裂

如果说演艺和音像职业中的间歇就业的发展部分地来源于稳定的无限期就业的临时化，那么相关的各种就业形式的基础“从本质上说”实际上是间歇性。这一工作部门的专业人员文化上倾向于能动性，尤其不能忍受“传动带”的束缚，短期就业的不稳

① 根据让-保罗·吉约2004年11月提交法国文化部长的报告中引用的演艺解约人员数据库数据。参见让-保罗·吉约《确立戏剧、电影和音像部门的就业政策——提交文化和传播部长雷诺·多纳迪厄·德瓦布尔斯阁下的建议》，巴黎，文化部，2004年11月29日（Jean-Paul Guillot, 《Pour une politique de l'emploi dans le spectacle vivant, le cinéma et l'audiovisuel—Propositions à M. Renaud Donnedieu de Vabres, Minist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Paris, 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29 novembre 2004）。

② 关于这两种矛盾的教训的联系，见皮埃尔-米歇尔·门格《作为劳动者的艺术家肖像》（Pierre-Michel Menger, *Portrait de l'artiste en travailleur*, Paris, Le Seuil），2003。

定性也许荒谬地被看做获得成功和永葆职业寿命的保证，因此他们通常感到建立在劳动的弹性制与社会保障之间富有原创性的妥协基础上的就业管理模式，以及非典型就业形式具有很大诱惑力。^①

演艺和音像经济的核心问题——就业的分裂

2003年夏季的动员看来应该是间歇演艺人员危机对于更加普遍的工薪条件脆化运动的反响的组成部分，因为工薪条件的脆化今天同样影响到受稳定就业退潮和短期劳动合同增多冲击的“高等的”第三产业高技术领域。^②这一趋势在音像和文化产业中特别突出，而戏剧领域也不能幸免，除了法国戏剧院和几个大艺术剧场的芭蕾舞团，长期的喜剧和舞蹈团体几乎消失殆尽。相反，交响学界似乎幸免于难，依然是稳定就业的圣殿。

艺术和文化工作的这种不稳定化是与该部门的经济进入“后福特”时代同时发生的。在出版、音乐和音像生产业中，大众文化产业的整体生产模式，自1980年代初以来实际上让位于植根分包关系而受大营销公司支配的微型企业经济。这种“借助竞争网的卖方市场”结构，^③建立在与生产直接相关而风险较大和赢利较少的工序外包化基础上，促使提供给艺术家和技术团队的劳动合同期缩短。在音像部门，在得益于向电磁及后来的光导和数码技术空间开放的环境中出现的企业繁荣，也鼓励

① 皮埃尔-米歇尔·门格：《间歇演艺人员——一个例外的社会学》（Pierre - Michel Menger, *Les 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 Sociologie d'une exception*,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2005。

② 安妮·兰巴赫、马里纳·兰巴赫：《高智能临时工》（Anne Rambach, Marine Rambach, *Les intellos précaires*, Paris, Fayard), 2001；阿兰·阿卡尔多：《记者临时工》（Alain Accardo, *Journalistes précaires*, Bourdeaux, Le Mascaret), 2001。

③ 贝内迪克特·雷诺-克雷桑：《一个垄断发行网的卖方市场的动力学——法国书籍出版部门的案例》，载于《工业经济评论》第22卷（Bénédicte Reynaud-Cressent, *La dynamique d'un oligopole avec frange: le cas de la branche d'édition de livres en France*), *Revue d'économie industrielle*, volume 22), 1982。

了按照压缩音像生产大工序的劳动力固定成本的逻辑，来发展间歇性就业，以替代长期合同。

因此，可以看到文化生产界许多昙花一现式的企业盛极一时，这样的企业一般在规模上很小，其中最小的是“个人公司”。它们在一种依靠劳动合同的碎化作为动力的“卸包袱”经济中发展，需要大部分由间歇演艺人员失业保险来养活的“后备军”加以维持。皮埃尔-米歇尔·门格着重指出，^①这种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完全非集中化的弹性劳动市场梦想。这样，由于通过间歇就业人员申报的累计年工作小时数来衡量的活动水平的演变与参与诉讼者的人数的演变之间的差距日趋扩大，从而导致了文化工作的不平衡增长。其结果是平均工作期和个人补偿的急剧减少。^②

这种弹性劳动经济和卸包袱式组织的普遍化，同样产生了一个必然的后果——特别高的“流动”。就整个演剧艺术家的职业而言，可以估计约有1/4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在两年后被最终排除出来。“嵌入”的这种临时性^③通常成为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偏低的必然后果，而且进入劳动市场的选择机制的体制化越弱和对于从业的培训越差，这样的状况就越明显，譬如说它在喜剧演员中比在音乐家中更加突出。^④

① 见前引皮埃尔-米歇尔·门格《作为劳动者的艺术家肖像》。

② 1987-2001年间，间歇演艺人员所签订合同的平均数从4.4%上升到10.1%，而合同的平均期限从20.1天下降到5.7天。间歇演艺人员的平均毛工资在1989-2001年下降了约12%。前引皮埃尔-保罗·吉约的报告引用了这些数据。

③ 尚塔尔·妮科尔-德朗古：《临时性观念再探》，载于《劳动与就业》1992年第52期（Chantal Nicole-Drancourt, 《L'idée de précarité revisitée》, *Travail et Emploi*, n°52, 1992）。

④ 菲利普·库朗容、亚辛特·拉韦、约内拉·罗阿里克：《年龄性别——艺术家职业寿命的差异后果》（Philippe Coulangeon, Hyacinthe Ravet, Ionela Roharik, 《Le sexe de l'âge. Effets différenciés du vieillissement professionnel chez les artistes》, *Relief*, n°4, CEREQ, Marseille), 2004。

初看起来，戏剧和音像行业的发展似乎毋庸置疑是与这个部门的劳动条件、就业条件和工资补偿条件的脆化并行的。因而，对于一般演变的衡量遮蔽了间歇就业制度所覆盖的诸多情况的复杂性，从而必须把遵循稳定就业的弹性化逻辑的情况与在一定程度上“天生”就是间歇性的就业情况区别开来。在第二类情况下，对于就业的不稳定性的看法并非同样视之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方式，而是当作实现艺术才能的一个积极特性。

一种多样就业和流动性的文化

在演剧职业中，间歇就业的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模糊性同应该提及的一个历史因素相关：在这个行业中，间歇就业往往是在更加不稳定的状态之后出现的，这也许也是一个非典型的因素。间歇劳动合同在历史上曾经是整合以往处于雇佣制和与之相伴的社会权利（退休、失业保险、带薪假期）边缘的各种职业的雇佣劳动者的一个手段，在以往“黑劳动”、通常带有大杂烩式的父道主义光环的“入门费”或者“安置费”横行的职业世界中，它也许是逐步被树立为就业的“规范”的。这个事实与认为间歇就业形式的普遍化只是就业临时化普遍趋势的一种表现的观点大相径庭。^① 这个问题远超出了艺术职业的范围：正如大多数社会权利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一般地说，非典型劳动的发展在当代成为雇佣劳动阶级扩展的主要矢量。^②

① 菲利普·库朗容：《法国的爵士乐手》（Philippe Coulangeon, *Les musiciens de jazz en France*, Paris, L'Harmattan), 1999。

② 关于这个问题，见萨比娜·埃尔贝斯-塞甘《劳动合同的混乱形象》，载于皮埃尔-米歇尔·门格、让-克洛德·帕斯龙主编《研究的艺术——雷蒙德·穆兰祝贺文集》（Sabine Erbès-Seguin, *Les images brouillées du contrat de travail*），dans Pierre-Michel Menger, Jean-Claude Passeron dir., *L'art de la recherche. Essais en l'honneur de Raymonde Moulin*,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4。

此外，在艺术职业中，对于临时就业的看法普遍是模糊的，因为长期的稳定工作代表着一种负面的形象，背负着类似传送带式操作的恶名，是与艺术生活的神话水火不容的。职业行话中称之为“音乐技工”或者“16分音符公务员”的乐团的音乐家们，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倾向，而乐团生命的岌岌可危促使富有表现力的独奏的崛起。^① 同样，法国的戏剧界也经历了相当大规模的抛弃喜剧团僵化的表演模式的过程，特别是在1968年之后。稳定就业状况的这种贬值，从另一个视角被视为“有选择的”流动性，激励了在其他职业环境下自以为受就业临时性之害的人们。这种文化特征出现在大部分艺术职业之中，并进而见诸许多创作或者传播职业，将就业状况的不稳定性与建立在对于工作的高水平的满足感基础上的强有力的职业整合结合了起来。^② 就这个视角而言，与间歇就业联系在一起的流动性，比通过积累多方面的经验以营造角色的“声誉资本”来衡量能力的活动部门中“先验地”较少临时性的就业形式更加有利于稳定性、长期性和高补偿（工作收入与失业保险收入相结合）。^③

受雇于多个雇主的间歇雇佣劳动者制度也减弱了将雇佣劳动者与他们的“签单人”连接在一起的从属纽带的力量，而且在知名度现象促使雇主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力量对比重新平衡的职业领域，“签单人”概念本身部分地丧失了意义：知名度最高的艺术家的工作本身就是其贡献的最终“产品”，因而是几乎不可取代的，面对这样的明星，雇主的意志有多少分量？因此，

① 贝尔纳·莱曼：《光芒四射的乐团——交响乐队人种志学》（Bernard Lehmann, *L'orchestre dans tous ses éclats. Ethnographie des formations symphoniqu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2。

② 这里承认塞尔日·波冈在其劳动整合形式类型学中提及的各种不确定的整合状况。见塞尔日·波冈《临时雇佣劳动者》（Serge Paugam, *Le salarié de la précarité*, Paris, PUF), 2000。

③ 见前引皮埃尔-米歇尔·门格《间歇演艺人员——一个例外的社会学》。

这个部门的工作者感受到与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从属关系的某种消退，而遵循促使雇佣劳动与独立劳动的界线变得模糊的一些流动角色之间契约化的逻辑，通过完全不同以往的结合，同时兼有同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保障以及同独立劳动不可分割的独立性。

基于这一事实，艺术领域有时被视为一个实验场地，一个社会创新的实验室，能够促使雇佣劳动的某些新的组织形式和调节形式出现。这些新的组织和调节形式乃是一种“完美的”弹性工作制的雏形，“高屋建瓴”地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地区性就业不足的一条出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流动性和多元价值成为社会和职业整合的主要矢量的一种“后福特主义”的妥协。因此，戏剧行业成为主张“最低保障收入”^①、“普遍补助”^②和其他所有形式的“弹性保障”的辩护者们不可或缺地援引的例证。尽管如此，戏剧行业中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可以搬用到其他行业，看来至少是不确定的，其原因在于作为这些措施的基础性的制度性安排，特别是财政问题十分脆弱。

一个不确定的实验室

因2003年6月议定书规定的限制享受失业保障第八和第十附加条款的条件而引发的2003年夏季的强大动员，重新确立了事实上类似于一场典型的分配冲突的间歇演艺人员冲突的主要筹码。正因为这样，这场动员的力量及其在相关活动部门中确

① 雅克·罗班：《当劳动脱离后工业社会之时》，第2卷（Jacques Robin, *Quand le travail quitte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tome 2, Paris, Grit Éditeur), 1994。

② 让-马克·费里：《普遍补助》（Jean-Marc Ferry, *L'allocation universelle*, Paris, Éditions du Cref), 1995。

立为目标的相当广泛的共识，不可能掩盖贯穿这些职业的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这些所谓“弹性”职业生涯的两面性，即在独立的外衣下，迫使个人屈从于并非一定比最一般形式下的雇佣劳动弱的压力。

弹性职业生涯的不平等动力学

艺术、戏剧和音像界组成了极端两极化的职业世界，其中诸如收入或者工作量期望的变动情况所说明的成功的差异，是同个人知名度能否非同寻常地提升密不可分的。因此，它们受到工作和收入特别高度集中状况的影响。^① 活动和收入的这种严重两极化体现了艺术部门经济固有的特点：产品价值和报酬的不确定性引导着对于产品和明星艺术家的需求。^② 对文化产品的“需求”的扩大，当然有利于文化消费和活动的发展，但并不像人们错误地设想的那样，在艺术和文化部门的从业人员中消除上述现象，反而使之进一步加剧：文化活动的民主化和不喜欢标新立异或者追逐无名之辈的新追星族的出现，强化了对于可靠的价值和受追捧的艺术家的需求的进一步集中。

在这种需求严重两极化的环境下，间歇演艺家的劳动市场显示出那种“赢家通吃”（winner take all）市场的全部特征。^③ 在这样的市场里，垄断着主要工作和收入的超弹性工作制的“赢家”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是十分强大的胜利者，而“输家”

① 以音乐演奏家为例，根据200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20%的法国最有名的演奏家集中了这个行业总收入的40%。见前引菲利普·库朗容《法国的音乐演奏家——一个职业肖像》。

② 舍温·罗森：《超级明星经济》，载于《美国经济评论》1981年第5期（Sherwin Rosen, 《The economics of supersta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 1981）。

③ 罗伯特·弗兰克、菲利普·库克：《赢家通吃的社会》（Robert Frank, Philip Cook, *The Winner - Take-Al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则沦落为只能处于边缘地位的分裂的就业市场的后备军，成为一无所有的失败者。如果说成为赢家的艺术家通常凭借着他们的名望资本能够迫使雇主接受他们提出的高额报酬，而且在工作时间的管理和拥有的就业机会的选择上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那么输家遭遇的却是大都相同于“普通”临时工的情况。这种类型的不平等恰恰是“认知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们不愿意承认的，他们热衷于通过正在发生的劳资关系的重构来描述知识经济和非物质经济，据说在这样的经济中，能力和名望使得劳动者摆脱资本的控制，因此应该把注意力聚焦于名望利润的分配这个制高点上。^①

在同劳动市场的特定的二元化^②并非无关的这种知名度差异的分层之外，还应加上就业的分裂所固有的另一种“得到认同”的临时打工形式。绝大多数间歇就业的艺术家，为了保障自己能够长期依靠第八和第十附加条款规定的特殊失业保险制度生存，不得不承担从事多种不同工作的义务，同意接受往往同他们的职业认同相去甚远的活动补贴，例如教学、动画等工作，这在他们个人职业的财政平衡以及整个部门的经济平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③ 对于一个演剧艺术家来说，这类“边缘”工作的增多，逐渐腐蚀演剧艺术家工作的界限，从而造成偷换职业认

① 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理论，见克里斯蒂安·阿扎伊斯、安托内拉·科尔萨尼、帕特里克·迪厄艾德主编《走向认知资本主义——在劳动变化与领土之间》（Christian Azaïs, Antonella Corsani, Patrik Dieuaide dir., *Vers un capitalisme cognitif. Entre Mutations du travail et territoires*, Paris, L'Harmattan), 2001；卡罗·韦尔塞洛内主编《我们正在走出工业资本主义吗？》（Carlo Vercellone dir., *Somme-nous sortis du capitalisme industriel?*, Paris, La Dispute), 2002。

② 关于这个概念，见迈克尔·皮奥里《劳动市场的二元主义》，载于《经济评论》1978年第1期（Michaël Piore, 《Dualism in the Labour Market》, *Revue Economique*, n°1, 1978）。

③ 在向失业保险机构申报工作小时数清单中如何计算这类报酬成为2003年6月改革所引发的冲突的附带问题之一。

同的威胁。在喜剧演员、音乐演奏家和舞蹈演员中间,^① 这种因双重身份和从事真正的艺术活动边缘的各种不同工作而冲淡职业认同的威胁感尤为严重, 因为动画或者培训活动对于这些职业的社会需求最为强烈。

一种特定的稳定性趋向

除了同艺术职业的极端不平衡的动力学相关的种种限制之外, 艺术界仿佛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实验室, 尽管它像我们在这个部门所见到的各种就业形式一样令人捉摸不定。毫无疑问, 艺术界的各种就业形式并不像间歇雇佣劳动的普遍化所显示出的那种独特性。虽然同数量很多的不同雇主订立形形色色的约定的与日俱增的“自由职业者”的艺术家形象在这种就业形式的主流表象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大多数间歇演艺人员实际上正在通过反复利用同少数雇主建立的各种联系, 来重建某些形式的稳定性。作为一种极端, 这种稳定性趋向通过“特许人员”的案例表现出来, 他们在音像技术人员中为数颇多, 几乎只与同一个雇主签订合同, 包括在公共企业(法国电视台和法国电台)中也常见这样的现象。而且, 在运用间歇就业制度上的这类扭曲在2003年夏季的运动中被媒体大加渲染, 但它并非是音像部门企业所独有的垄断现象。1980年代初以来法国巴洛克音乐团体的崛起, 也得益于同样性质的扭曲。清一色由间歇演艺人员组成的这些团体, 实际上其生活费用主要由音乐家失业补助来负担, 但他们在大部分时间内通过内部关系在几乎长期的基础上进行工作。

更广泛地说, 对于艺术领域的就业市场的形式的分析表明,

^① 艾丽斯·布隆代尔、雅尼娜·拉努、约内拉·罗阿里克:《法国的舞蹈艺术家——对于舞蹈家职业的研究》(Alice Blondel, Janine Rannou, Ionela Roharik, 《Les artistes de la danse en France. Étude sur la Profession de danseur》, Rapport final, Centre de Sociologie du travail, CNRS-EHESS; DEP-Ministère de la Culture, Paris), 2003。

非正规的亲友关系网的形成借助间歇雇佣劳动者与为数有限的雇主的联系，减弱了同短期就业之间的流动相关的不确定性，成为持续出现于间歇演艺人员的劳动市场的模态形式。^① 作为得到形形色色交往关系保障的这种弹性制的交换条件，就业市场的参与者必须服从高度的约束，投入在强度特别是期限上不受任何同长期雇员相关法规调控的劳动，所以这种职业的稳定性是通过付出十分巨大的自主性的代价来取得的，这也是对于往往是不可预见的就业机会作出反应的条件。

“混合”身份的模糊效应

将艺术家的人格与他的作品混为一谈，成为艺术家社会形象的一个熟知的侧面。^② 这种混淆强调了艺术家的人格按照作为使命的劳动（即英文所说的 labor）与异化的劳动（即英文所说的 work）的经典对立而在工作中实现的一种形式，从而增加了艺术职业的魅力。^③ 但是，在它缩短了把个人与他的社会和职业角色分隔开的距离的同时，也鼓励了职业活动中的一种“混合”身份，把相当模糊的艺术界的模式搬到整个劳动界。如果说工作与生活的混合能够作为艺术活动中人格和职业实现的条件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菲利普·库朗容、约内拉·罗阿里克《职业轨道与劳动市场上的稳定性——法国音乐家的案例（1987~2000年）》，载于阿兰·德热纳、让-弗朗索瓦·吉雷、伊薇特·格勒莱、帕特里克·韦尔坎主编《劳动市场分析中的纵向数据》（Philippe Coulangeon, Ionela Roharik, 《Trajectoires professionnelles et stabilité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 le cas des musiciens en France, 1987-2000》, dans Alain Degenne, Jean-François Giret, Yvette Grelet, Patrick Werquin éd., *Les données longitudinales dans l'analyse du marché du travail*, Documents du CEREO, n°171, mai 2003）。例如，可以看到大多数间歇演出的音乐家的年工作总量的3/4是在不到5个不同雇主那里完成的。见前引菲利普·库朗容《法国的音乐演奏家——一个职业肖像》。

② 厄恩斯特·克里斯、奥托·库尔兹：《艺术家形象——神话与魔法》（Ernst Kris, Otto Kurz, *L'image de l'artiste, mythe et magie*, Marseille, Rivages), 1987。

③ 汉娜·阿伦特：《现代人的身份》（Hannah Arendt, *Condition de l'homme moderne*, Paris, Calmann-Lévy), 1961。

出现，那么当这种自我制约的形式得不到劳动所固有的奖励本身所平衡时，情况就不是这样。因此，建立在激励自律品格、多元价值和首创精神基础上的现代的许多管理实践备受艺术家生活模式的启发。这些技术的推广首先在干部——他们的权限由于本身包含着创新和责任的要求，所以先天地接近广泛的“创造性”的职业活动——中间进行试验，潜在地具有那种与自我开发相近的自我制约形式。

一种分配的冲突

间歇演艺人员的失业保险制度由于费用的原因而周期性地受到质疑，今天出现了结构性赤字，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个劳动市场的独特性：就业的增长反而荒谬地导致补偿费用的指数型上升。^①这种非同寻常的态势极其严重地威胁着这个特殊制度的生存及其依靠一般制度支撑的状况。从严格的会计制度的观点来说，2003年的改革未能消除的这种不确定性，足以成为把一个建立在收入社会化特别高的水平上的弹性就业成本管理模式的推广到其他劳动部门的障碍。

奇怪的是，受到艺术职业的例子启发而鼓吹弹性工作制的宣传家们很少提出这种推广的分配问题。然而，间歇演艺人员制度问题是完全由资方从失业保险全国协议第八和第十附加条款的财政赤字危机的角度提出的，这个事实表明暗藏在2003年夏季危机下面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分配的冲突。作为所谓“完美的”弹性工作制实验室，间歇演艺人员的失业保险制度首先是一系列斗争沉积的果实。这个部门的从业人员虽然为数不多，但具有广阔的社会视野，他们的动员能力自1960年代末以来已

^① 皮埃尔-米歇尔·门格：《间歇演艺人员——就业与得到补偿的失业的增长》，载于《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首发资料》1997年2月第510期（Pierre-Michel Menger, 《Les 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 Croissance de l'emploi et du chômage indemnisé》, *INSEE Première*, n°510, février 1997）。

经达到了足以局部确立价值附加再分配条件改变的假象，因为这种再分配成本按指数增长的部分在各种特殊制度的赤字由总的失业保险制度补偿的框架内，转嫁给了集体。就这一观点而言，失业保险所起的作用在于提出了公众对这个文化部门的支持力的某种减退问题，这同样也关系到2003年夏季动员所提出的种种问题的一个本质的方面。

法国文化政策的一场危机？

如果说通过将间歇演艺人员案例中得出的“教训”推广到其他职业领域，从而把艺术工作构建为即将发生的劳动变革的原型，这样的做法显得比较冒进，那么相反，毫无疑问的是199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危机十分深刻地对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所实施的文化政策的模态和目的提出了质疑。步安德烈·马尔罗之后尘所构建的法国文化政策模式，实际上随着时间的发展经历了某些变革。这些变革同戏剧和音像从业人员的特殊失业保险制度的财政危机并非无关。

文化生活分散化的社会后果

简而言之，从马尔罗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唯意志论通过建立诸如文化之家等象征性设施，通过剧院的分散化以及在全国各地发展音乐、舞蹈和戏剧艺术学院，通过在大多数地区城市拨款支持交响乐团，把高度自信借助民主的方式人人都有进入“高等文化”主要殿堂的可能与文化生活的极端集中化的组织和财政拨款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种建制曾经赢得了建立在分享既是“民族的”又是“共和的”文化观念基础上的某种共识，但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同时发生的两种演变的影响下逐步出现裂缝：一方面，在1980年代加强地方机构相关职能的分散化法规之后，出现了一个文化供应的分散化运动；另一方面，

则是与1981年的政治更迭同步的、受补贴艺术领域扩大到严格限定的“合法”文化部门之外。^①

要理解这两方面的演变对于戏剧和音像职业的就业条件的后果，首先必须看到文化供应的分散化涵盖了比国家补贴资源增多更加广泛的一系列演变。成为问题的不仅是文化政策角色的增多，而且是受惠于政治分权所创造的条件和艺术和文化生产本身的角色增多。继以主要授权某个个人长期运作的刻板的补助机构的拨款为核心的国家干预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干预方式：国家权力，主要是地方权力，首先是作为“促进者”而不是运作主体来进行活动。因此，分散化与未必在长期存在的机构中出现的创新精神齐头并进。以规划为主来进行组织的当代艺术经济，以及作为其特殊部门的戏剧和音像经济，依靠某些昙花一现的结构来支撑，而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法国可以说遍地开花的艺术节的增多，乃是这种现象的征兆。这些演变是同文化艺术就业的弹性化的明显趋势一起发生的，它们本身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19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业总量的演变与投入艺术就业市场的劳动力数量的演变之间存在着差距。

从文化民主化到文化民主

其次，可以享受国家补贴的部门的增多，体现了文化政策目的性的深刻改变，说明文化政策不再对文化部门的就业状况毫无影响。自马尔罗以来实施的文化政策的哲学基本上是追求一种被理解为给绝大多数人进入高级文化提供通道的文化民主化的目标，但自1970年代末以来已经被区别和被文化合法性批

^① 对于法国文化政策的社会历史分析，见菲利普·普瓦里耶《国家与法国的文化》(Philippe Poirrier, *L'État et la culture en France*,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France), 2000; 樊尚·迪布瓦:《文化政策——一个国家干预范畴的发生》(Vincent Dubois,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Genèse d'une catégorie d'intervention publique*, Paris, Belin), 2000。

判理论间接地加以质疑。^① 这些批判理论强调那种被认为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的“文化专断”的维度，将尊重地方或者地区认同性、少数民族文化和民间传统的文化发展观念同民主化政策行动对立起来。文化民主的逻辑与文化民主化的逻辑的这种对立，建立在一种特定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基础上，给予了主要是民众阶级的青年们倡导的社会文化激活政策以重要启迪。^②

尽管如此，从马尔罗那里继承下来的政策工具继续吸取着国家给予文化的财政支持的主要部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向高级文化领域之外的部门开放有点像是一个受骗者的市场，国家和地方机构只提供给这些部门某些有限的手段，而且最常见的形式是给予某些规划的对口援助，而不是给予某些机构的运作补贴。由此可知，对于这些新享受国家补贴经济的部门的干预模态，通过将有限的手段分摊给多个规划，间接地有利于非固定就业的发展。

进入艺术劳动市场障碍的减弱

最后一个因素将法国文化政策的模式危机同艺术劳动就业市场的状况联系在一起。文化供给的发展和新的部门向国家补贴经济的开放，是同艺术职业对于其从业人员的演变的某种失控齐头并进的。进入属于高级文化领域的职业一般是相当正规的，无论就名副其实的艺术职业——乐团的音乐家、歌舞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蹈家，还是更广泛的同文化行政管理相关的职业——与保护文化遗产或者管理大文化设施（博物馆、国家剧院）相关的人员而言，无不如此。进入这些大文化设施原则上

① 见前引皮埃尔·布迪厄《区别》。

② 关于文化民主化与文化民主对立的发生，见利斯·桑泰尔《从文化民主化到文化民主》，载于居伊·贝拉旺斯主编《文化民主化还是文化民主？两种公共活动逻辑》（Lise Santerre, 《De la démocratisation de la culture à la démocratie culturelle》, dans Guy Bellavance dir., *Démocratisation de la culture ou démocratie culturelle? Deux logiques d'action publique*, Sainte-Foy,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Laval), 2000。

是通过招聘竞争，而定期组织招聘可以调节进入相关职业的人员流动。然而，在高级文化领域之外的职业的就业人员却很少得到规范。因此，出现在表演职业中的就业人员数量增多，其根源部分在于群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发展，而作为其附带的产物则是进入艺术就业市场的障碍的减弱。

受雇于多个雇主的间歇雇佣劳动，在戏剧和音像部门逐步被确立为就业规范，但它依然是一个不明确的话题，游离于雇佣劳动分析的惯常范畴之外。如果说这种现象部分地来源于就业临时化的一般运动，那么在“认知资本主义”鼓吹者的眼里，它也主要体现了就业关系新形式的兴起，这些新的就业形式打破了雇佣劳动与独立劳动的界限，扰乱了资本—劳动对抗的分析，因为据说劳动者没有被剥夺技术资本（非物质劳动），就根本不会导致这种剥夺。

毫无疑问，这些论点过分夸大了艺术创作劳动的特殊性。在当代资本主义——不论它是不是“认知的”——中，艺术创作劳动依然牢固地服从于文化产业的生产逻辑，其积累的动力学同其他经济部门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除此而外，这些论点试图低估在这些职业中出现的不平衡发展现象和各种形式的自我开发。再者，将艺术和文化工作树立为“完美的”弹性工作制模式，对于在整个劳动市场上处于最脆弱地位的社会阶层来说不无风险。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家们正是根据可以强烈感受到流动性过大的状况，从而试图把就业的临时化说成是一种积极的前景。然而，少数赞成流动性和弹性制，并且想借助放松长期就业制约来享有独立性的艺术家，依靠的是他们的社会资源（关系网、名望资本）以及文化和经济资源，而这些是绝大多数雇佣劳动者，包括艺术部门内部的工作人员所不能拥有的。归根结底，这种把艺术界解读为超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组织的雏形的想法，难道不是最平庸不过地再现了圣西门早就提出的艺术和科学作为“民众向导”的过时空想？

教师斗争——
反对学校中的
社会再生产？

第三部分

Part 3

第十一章

安于学校的不平等？

让-皮埃尔·泰拉伊

除了大多数教师采取否认单一制中学的行动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在单一制学校建立和实施“反学业失败斗争”政策40年后，机会的不平等依然保持在没有变化的水平上，这难道不是堵死了学校民主化的一切希望？政治家和专家们提出的大部分解决方案，无不倾向于回到学生过早进行选择，或者说扩大中学的任务，使得每一个学生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子，即使他们在书面文化的基本科目方面存在着巨大困难。这是教育系统的许多专业人员的基本看法，他们虽然有愿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几乎都认为情况只能得到微弱的改善。

这种悲观主义促使比以往较少生物学色彩的论说得以流行。这些论说比天赋不平等论更加不厌其烦地指出存在着很难克服的某种“社会文化残缺”：像我们这样不平等的而且深受名副其实的社会解构分化影响的一个社会，怎么能够拥有平等的学校教育呢？论据是合情合理的，能够得到各种不同而多样的社会学研究的支持。自196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确凿地揭示了公众通过学校获取的文化和语言资源的不平等性。说出身自民众阶层的青年缺乏必要的准备来适应学校的要求，丝毫也不表明他们没有能力去完成适当的学业。但这远非是今天的情况：我

们要指出，除了10%~15%的文盲之外，1/2的青年被引导走上不能充分掌握书面语言 and 文化的短期职业或技术教育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属性而缺乏掌握的能力吗？这样的假设显然不可信。他们的出身并不妨碍他们掌握语言，也就是说并不妨碍他们像所有具有说话能力的人——不论其如何使用——一样，获得学校实施教育活动所需要的一切抽象和逻辑推理的能力。时势的艰难，生存条件的退化，日常关系的暴力化，凡此种种难道不成为正常使用这些资源的障碍吗？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说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困难儿童”，但是今天“困难学生”的数目远远超出了“困难儿童”的范围。

大量的困难学生是可以不存在的。他们之所以困难难道不是因为缺乏动因而没有充分调动智力活动吗？他们并非生来缺乏动因，但他们并非总是能进入自己期望的小学——相信将教会他们读写算的知识，给他们带来远大前途的小学。恰恰是不能掌握书面文化基础的痛苦经验，导致他们丧失勇气或者辍学。这是必须理解的导致他们受到挫折的学校本身的状况。两项纪录可以用来考察这个问题。

第一项是有关教育机构的物质、人力和教学资源的分拨的记录。事实上，教育供给的一般条件趋于同公众的社会素质保持一致。供给的多样性，各种较好的渠道的涌现，乃是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的专利；基础设施的质量，教学人员的配备率，最有经验的教师的配置，凡此种种同样也是高等社区的特权。

单一制学校的不平等性也同未必十分有意识的、隐含的歧视相关，部分教师对于民众阶层出身的青年存在这样的倾向。教师们根据学生所属群体在阶级关系等级阶梯上的地位来衡量他们个人和家庭的智力资源，对于那些“有钱的继承人”在评价可比的学习能力和指导上倾向于更加宽容。这种对学生贴标签的做法，产生了同样是十分敏感的象征性后果。相关的学生不会不关注老师对他们的期望，结果是这些期望内化为学生的

心理因素。如果它们是正面的，学生就得到激励和促进，反之则受到打击。

学生群体中的第三种歧视形式与教学实践活动本身中贴标签过程的影响相关，也就是说教师有着根据他们对学生资质的先入为主的评估来调整自己的教学进程的倾向：对待民众阶层的孩子或者被认为资质较差的学生（往往把两者归于同一类），绝大多数教师抛弃了对教其他班级所怀有的高度期望，而是设法调整部分教学大纲，减轻最富有理论性的内容，优先讲授最“具体的”东西，选择最有描写性和经验性的表述方法，用例子代替概念、图解代替证明。这种依据先入之见去适应学生智力的做法，据说完全出于最民主的动机，但却自以为是地促使学生之间的差距扩大，否则就无从解释把困难学生（或者仅仅是一般资质的学生）编入“落后”班级对于当事者产生的十分消极的后果。

不这样降低水平进行迁就的教师，在教育民众阶层出身的学生方面获得了显然更好的成果。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教师主导效应”，而且统计的测定证明了它们的十分重要的意义，依然应该考虑第二项研究记录。不论教师个人能力强弱，他们在不依他们为转移而由教育机构决定的共同条件下工作。教师在班级中的活动是由群众学校教育设施（官方机构，教育大纲，考试内容或者评估测试，使用的课本，督察训令，进入具有独特方式和效果的教师高等进修学院中培训，等等）远距离导航的。因此，应该考察知道这些设施的原则，它们的影响肯定是极其重要的。^① 对于民众 40 年来在单一制学校中遭遇的失败进行任何反思，都不能脱离实际，陷入抽象。

^① 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CDE）在 3/4 成员国中进行的《追踪学生学院成果国际计划》（PISA）最近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各国的国家初级学业体系“对于学习成果也许比国家或者家庭的财富”更加重要。

沿袭40年来单一制学校的路子制定的教学设施，大多来源于幼儿中心论和非指令教学法的武库。当下初级教育正在发生最剧烈的动荡。但最初的几年在学生的成长进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他们以后成败的关键。因此，即使从最起码的关注学校民主的角度出发，也不能省略对于今天在我们的初级小学中毫无争议的“积极”、“温柔”和“具体”教学法的实际效果的检验，而且不应该有任何禁忌。知识的简化、形象化和情景化成为教师的主导话语，并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语法教育的大踏步后退，为推崇所谓课文学习的整体方法观念，以及选择数学中的具体和游戏教学法进行辩解。事实上，这些大众教学法的施行难道不正是与真正进入高等知识殿堂的要求背道而驰吗？不学习语法，其结果是无从掌握书面语言；不严格学习书写—音位学译码，就为形形色色的诵读困难敞开了大门；不专心注意课文的物质性，几乎是逃避；不深入数学的理念性（“情景数学”练习不可能保证深入分析），学生就几乎不可能有掌握这门学科的前景。面对诸如此类的各种形式的大众教育，民众阶层出身的学生受到加倍的伤害：因为同已经先天整合进他们的思维习惯的其他东西相比，他们更需要基本法则和主要理论规范（例如语法）的清晰传输；因为他们本身并不具备辅助手段，来克服这样的教学法造成的困难。

我们看到，通过体制设施和教学实践的变革来促使学校民主化进程重新启动，这样的可能性是不可忽视的。这种举措由于可以料想到的将会引起的动荡，因而近乎奢望，支持者寥寥，学校的不平等今天在社会不平等的合法化中起着首要的作用。但它关系到绝大多数民众，他们始终期望每一个人获得知识和教育的权利——单一制学校构成享有这一权利的基础——最终得以贯彻。它可以期望得到众多教师的积极合作，因为它将促使教师的工作条件更加令人满意。

第十二章

学业成就的不平等与阶级意识

斯特法内·博内里

从社会阶级的视角分析学校为何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业成就的社会不平等的构成？反过来说，学校里发生的一切为何促进着阶级斗争的演变？特殊地说，是什么在上学期限与掩盖社会冲突的主流话语之间发生作用？这就是我们将要论述的问题。

从社会阶级的视角分析学校？

“社会阶级”的维度在教育的社会学分析中曾经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尤其是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特别强调了学校为社会劳动分工进行准备的功能，亦即促使社会秩序合法化，诱导民众接受不平等的统治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功能。^① 后来的许多

① 皮埃尔·布迪厄、让-克洛德·帕斯龙：《继承人》（Pierre Bourdieu, Jean-Claude Passeron, *Les héritier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4；前引皮埃尔·布迪厄、让-克洛德·帕斯龙《再生产》；克里斯蒂安·博德洛、罗歇·埃斯塔布莱：《法国的资本主义学校》（Christian Baudelot, Roger Establet, *L'école capitaliste en France*, Paris, Maspéro), 1971；克里斯蒂安·博德洛、罗歇·埃斯塔布莱：《小学正在分裂》（Christian Baudelot, Roger Establet, *L'école primaire divisée*, Paris, Maspéro), 1975。

研究着重指出了这些理论的一个盲点：学校和教室本身是一个没有得到研究的“黑箱”。但是，如果把问题移向理解在学校里构建的东西，那么往往通过钟摆运动掩盖了学校的冲突问题，甚至将宏观社会学层次上研究的决定论和规律性同对于教室和学生的行为方式的微观社会学分析对立起来。

在我们的分析中，^① 力求理解一个教室里发生的事情，并将这些情况看做是以一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学校与社会之间以及学校本身的演变所构成的各种关系作为背景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会地决定的学业成就的不平等。实际上，就我们试图接触的相当少的著述而言，^② 要么从社会阶级的视角研究学校的不平等，而不关注结构的不平等通过掌握学校知识的不平等来再生产，要么像教育学或者心理学进路通常所做的那样，把学习分析为似乎是在社会失重状态下实现的。我们则力求了解不平等是如何在学校形成的，而学校本身应理解为贯穿全社会并参与——只是以掩盖的方式——社会冲突的机构，

-
- ① 斯特法内·博内里：《从假定的学校状况到学生的先决条件——民众阶层学生的学习困难的复合构成》，2003年提交巴黎第八大学的教育学博士论文。论文的修订文本近期将在“论争”出版社出版。本文的例子均摘录自博士论文中收集并分析的案例。
- ② 伊丽莎白·博捷、让-伊夫·罗歇：《新中学生的学校经验——民主化还是大众化？》（Élisabeth Bautier, Jean-Yves Rochex, *L'expérience scolaire des nouveaux lycéens. Démocratisation ou massification?*, Paris, Armand Colin), 1998；让-克洛德·福尔坎：《学校与文化——英国社会学家的观点》（Jean-Claude Forquin, *École et culture. Le Point de vue des sociologues britanniques*, Paris et Bruxelles, De Boeck et Larcier), 1996；维维亚娜·伊桑贝尔-雅玛蒂：《学校知识——教育内容的社会筹码》（Viviane Isambert-Jamati, *Les savoirs scolaires. Enjeux sociaux des contenus d'enseignement*, Paris, L'Harmattan), 1995；贝尔纳·拉伊尔：《书面文化与学校不平等——小学“学业失败”社会学》（Bernard Lahire, *Culture écrite et inégalités scolaires. Sociologie de l'« échec scolaire » à l'école primaire*, Lyon, PUL), 1993；见前引让-皮埃尔·泰拉伊主编《法国的学校建设——设备批判》；让-皮埃尔·泰拉伊：《学校的不平等》（Jean-Pierre Terrail, *De l'inégalité scolaire*, Paris, La Dispute), 2002；达尼埃尔·辛：《民众社区——学校与家庭》（Daniel Thin, *Quartiers populaires. L'école et les familles*, Lyon, PUL), 1998。

同时又是一个教育、传输知识和行为方式的机构。学校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其中的某个单一维度。

因此，我们的论证集中于“民众阶层”的学生与学校之间学业成就不平等产生的环境综合原因。许多研究可能都是在这样的框架内展开的，但研究者不能同时对它们进行引导。在此之前，我们的注意力并没有直接放在教师、教学实践活动差异的后果上。相反，更多的是关注各种可能最正常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循环往复，各种大纲、官方指令、教科书、教师进修、社会上的矛盾价值实际影响的循环往复。为了揭示由学校设施的社会环境在学校中造成的差距，我们的这项研究是在出身自工作不稳定的平民家庭的学生集中的小学和中学进行的，而这样的集中化事实上是作为社会设施竞争现象的城市居住状况的社会分化所造成的。

就学的不平等、班级的不平等

学校里流行而且有时被教师们采用的通用话语，如今是学生或者他们的家庭所固有的“学习困难”。这样的话语掩盖了作为社会各阶级之间矛盾产物的某些过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学校乃至教室里无所不在，但随着部分的民主化及平民阶层的学生学龄的延长，在上述话语中被掩盖了起来。

根据我们的观点，对于学校的各种分析之所以应该做再生产社会学以往所没有做的工作，亦即应该以知识掌握的不平等为基础，首先是因为学校在近40年来得到了重大发展。从同一代人的2/3通过中學會考而获得业士学位，^①整整一代同龄人从

① 尽管学生中只有51%通过了普通中學會考，30%通过了技术中學會考，19%通过了职业中學會考，尽管种种不平等依然存在，但学业水平比几十年前有了很大提高。

初小到高中在同样的教学大纲下接受知识^①之时开始，学习范围本身的选择以另一种方式提了出来。从各种不同改革导致直到高中的一贯制学习年限之后，教育的“划一性”得到实现，而不再对用同样的内容来教育所有学生的模式进行反思。这种思维惰性体现为两种逻辑在教室里的共居。

单一学制：不关心差别？

第一种逻辑是“对所有人”实施“正规”教育。这就意味着按照享有人学和成功的一切前提要求的统治阶级和（或）有教养阶级的子女的模式，简言之也就是按照以往奉行精英主义招生原则的古典中学的模式来组织教育。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虑到学校越来越少地只关注一般的知识教育，而是必须同时促进学生的从例证到普遍和从普遍到例证进行推理，分类和组织各种原理，在各种不同的教学和课堂情景下转换知识等的的能力，那么今天对教育的要求水平在不断地提高。

然而，很难直接“传授”给学生这些能力，它们可能是很难教会的：学生们在运用归纳法而不再是演绎法的课堂里，被动地被置于这些以非形象的方式传授的知识和能力面前。无论如何，这些变化对于传统类型的办学方式来说是如此“明显”，以致很少有什么有效手段来培养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教师。究其原因，就在于学校被决策者或者有时被决策者的下属设想为社会地“中立的”，而实际上它的运作是从统治阶级和所谓的有教养阶层的需要出发的。按照这样的逻辑，学校永远是“不关心差别”的，^② 这是解释为何出现在掌握学业成功所要求的知识方面的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① 贯彻教育大纲从一开始就不平衡，从而导致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今天对于单一制学校的批判实际上是否并没有揭示体制的不够统一。

② 见前引皮埃尔·布迪厄、让-克洛德·帕斯龙《继承人》。

对于学校来说，根据书面“综合”的需要，辅以某些解释，引导学生投入可见的作业，显而易见旨在使学生“发现”必须调动某些不可见的隐蔽的各种不同情况。例如，在我们考察的六年级各个班级中，一堂地理课在学习“画地图”的同时，开始掌握地形概念。^① 为了这样做，教师引导学生去显示一个国家的地形图的特殊情况（用不同颜色标示不同的高度，画出一个图例，等等）。

学生完成的作业作为他们将能修改的唯一的轨迹，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地形的特殊状况来实现的。但教师或者更普遍地说学校（教学大纲，引导教师这样做的课本）的目的，事实上比记住大山名称和位置或者以往的“英国是由陡峭的小湾连接而成”之类的课文更加雄心勃勃得多。这就是说，通过引导学生投入画一幅地图的作业，促使他们构建地形的概念，而教学大纲同时提到通过学习这个国家的地图来掌握“绘制一张地图”的“技能”。^② 这种“隐蔽教学法”在于对学生隐藏了需要学习和理解的东西，把他们置于应该自己通过归纳“发现”知识的情景之中，以便他们自己重新寻求和“构建”知识（发掘和掌握知识），而不是死记硬背。但是，这个从构造主义教学学派继承下来的观念被学校庸俗化了，并被平庸的教师们（而不是富有经验的教学法专家等）这样付诸教学实践，同其原来的倡导者们的本意大相径庭。

实际上，将“积极”教学法神秘化，把它描绘成“以儿童为中心”的意识形态，^③ 导致这样一种构造主义观念，即认为从

① 我们的研究表明，这样的例子并非是某一门课所特有的，这个现象普遍见诸其他所有课程。见斯特法内·博内里《认知中断与学业中断》，载于多米尼克·格拉斯曼、弗朗索瓦丝·厄夫拉尔主编《失学》（Stéphane Bonnéry, *Décrochage cognitive et décrochage scolaire*），dans Dominique Glasman, Françoise Enevrard dir., *La déscolarisation*, Paris, La Dispute), 2004。

② 弗朗索瓦丝·罗佩、露西·唐吉主编《知识与技能——学校与企业中对这些概念的运用》（Françoise Ropé, Lucie Tanguy dir., *Savoirs et compétences. De l'usage de ces notions dans l'école et l'entreprise*, Paris, L'Harmattan), 1994。

③ 见前引让-皮埃尔·泰拉伊《学校的不平等》。

学生经验的东西出发，从特定情境中通过归纳“发现”知识出发，乃是无需验证的“事实”，其实只能“传授”那些熟知的学习内容（学校实际要求的東西）。除此之外，主流意识形态同样浸淫着这样的行为方式：劳动价值和学习技巧正在贬值。^①在课堂上，学生应该依靠什么来确定方向，以指导自己的认知活动，这一点变得模糊不清：除了作业还是作业，没有人十分明确地确定哪些是基本的东西，什么是这些作业的“框架”，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花力气去做这些作业。

不论“另类教育法”是否真正对民主化有所促进，它们往往十分热衷于开办从技术的观点来说是“另类”的学校，但由于体制本身而被庸俗化地实施的这种教学法像“传统教学法”一样，有时带有同学生的智能和预先假设的自发行为相悖的统治阶级“观念”的烙印，人们因此而感到遗憾。所谓的另类学校无非是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和参与不平等的实践活动中的某些变化。我们这样说并非是想给另类教学法的实践者们泼冷水，而只想指出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分析他们遇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在集中了对于社会化的学校模式不太习惯的学生的研究机构中，^②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画一张地图”就是“画这张地图”，这是十分明确的：他们从给定的地图样本出发，按照样本来辨认每一个地区并涂上不同颜色。学生以特殊的方式（按照一个确切的样本）投入作业，并且怀有很大的热忱，因为他们知道在后续的课程中将有书面检查，据老师说，到时候必须“画一张地图”。在对此感到困惑的学生中间，有一个叫阿米多

① 贝尔纳·拉伊尔：《初小的知识和智力技术》，载于阿涅斯·范赞坦主编《学校——知识的地位》（Bernard Lahire, 《Savoirs et techniques intellectuelles à l'école primaire》，dans Agnès Van Zaten dir., *L'école. L'état des savior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0。

② 见前引达尼埃尔·辛《民众社区——学校与家庭》。

的孩子，希望认真对待作业，花大量时间——结合给予自修作业的帮助——来学习“这张”地图，将此看做一门真正的学问（这也许是几十年前的要求）：默记地形，学习在哪样的“土豆”（山脉）或者“蓝带”（河流）上着色，记住它们在书本的什么地方，描绘着什么样的曲线。

简言之，阿米多依样画图，却不懂得使用解码规则来描述地形。他不会在其他情境中使用这些法则，因为他没有注意教师在课堂上作为普遍公式讲授的所有指数：“每逢一个标高‘500m’的地区，应该涂上淡栗色，因为这个标志意味着所描述的地方最多具有500公尺的高度。”我们的研究所追踪的学生——被认为潜在能力可能“有困难的”学生——一旦发现可能以下述方式复述的微指令，就不再听讲：书上某处的某个地区应该涂上某种颜色，因为教师说应当这样做，或者必须依样画图。这是一种社会认知的误读：^① 学生认为大家期望他们完成作业，而没有想到作业是旨在掌握知识、促进能力的手段，知识的脱情景化和重新情景化，将世界的某些客体（高低起伏不等的山脉）与他们通过科学学科和学校课程规范化的表象之间联系起来的一种智力活动。

然而，这样的误读是相互的：在教师（教科书、发布某些指令的督学等）看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情景应该足以使学生调动起自己的潜能。因为，蕴含着第一种逻辑——同学生一起做不论在什么样的学校里都应该做的事情——的模式，乃是在家里就作为学生来进行教育的少数孩子，至少他们在家里已经习惯于就学的方式：^② 言谈的方式，对于细节的注意，从列举的例子和轶事出发归纳出普遍性。各种形式的教育无不是以

① 伊丽莎白·博捷、让-伊夫·罗歇：《学习——造成分歧的误解》（Élisabeth Bautier, Jean-Yves Rochex, 《Apprendre: des malentendus qui font la différence》），载于前引让-皮埃尔·泰拉伊《法国的学校建设——设备批判》。

② 见前引达尼埃尔·辛《民众社区——学校与家庭》。

无需解释上学的理由这样的观念为基础的：在一切进行教学或者教育的情境中，肯定不可能或者不支持谋求解释一切，否则教育将变成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意味着规范，那么就不再仅仅是进行教学或教育的必要性问题，而是进入了社会地设定的公设领域。

举例来说，对于阿米多和他的同伴来说，不幸的是对地图的另一个内涵提出了疑问，那是人们从来没有让他们领会的。在阿米多看来，这很不公平：那不是他复习过的内容，也不是作业本身。在一般学生看来，那是显而易见的，大家期望他们的就是“按照字面意义”贯彻各种指令，这样足以保证成功。在教师看来，应该对另一个例证提出疑问，以检验学生是否不仅记住了例证，而且调动了潜能，还掌握了概念。显而易见，绘制这样一幅地图的作业不是一个自在的目的，而应该从中掌握被视为知识的一种学习形式（脱情景化的地图形式）。同样，知识脱情景化和重新情景化的智能活动方式，将世界的各种客体及其在一门由书写逻辑规范化的学科中的表象和教学联系起来，乃是不言而喻的，是进入六年级的前提条件。^①

学生应该单独——在造成压力的打分检查的时候，更不待言——克服这种困难，克服同这样的公设的对抗，把完成的作业与所要求的智能活动即期望的知识联系起来。对于教师来说，只需花费较长时间在班级里绘制第一幅地图就足够了：这也许是在社会成分较杂的一所学校里应该采取的方式。学校的行为方式无非认为理解课程所必需的潜能仿佛是“天生的”、“无需证明的”，或者是家庭为了知识教育能够进行而应该预先构建的。

我们这样说，绝对不是抱怨过去的学校，重新陷入古

① 这个例子适用于学校系统的各级设施：应该对今天用来进行运作的进入大学、公立中学、一般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的蕴含的预设要求提出疑问，因为它们假设所有的家庭都能够而且应该实现这种能力的传输。

代—现代、共和主义者与教育家之间的二分法，更不是要助长对于教学大纲的雄心的批判，而是只限于说明如果雄心勃勃的意图的声明掩盖了以有教养阶层的公设为标志的学校的运作，那么它们可能沦为意识形态的俘虏。因此，为了实现这样的雄心而选择的各种办学形式应该从它们生产或者再生产什么来进行分析，有时也许会违反它们的本意，因为它们无法回避决定着民众阶层的学生与学校发生冲突这样的状况的社会矛盾。这样的逻辑正在应用于所有学生，所以遭遇了不认同学校文化圈内人的错误的新的公众抗拒。其证明便是所有的学生都学业无成。

高估差别的危险

于是，学校就启动第二种逻辑——适应学校、班级的就读公众的假想特点。尽管其话语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但由于运用了另外的形式，这种逻辑所追求的不再是同样的目标。得益于家庭的学业教育者被说成是“杰出人才”，仿佛他们“天生”对于学校的开蒙“工作”就有某种藐视。于是，主流意识形态试图把学校贬低为只具“采光窗功能”，也就是说疏导“杰出”学生的才华之光，而对于其他学生则需开办另一种学校。

如果继续追踪地理课的例子，可以看到在阿米多的班级里教师的普遍性概括的口头陈述（旨在引导学生跳出特殊的例子的框框）使许多学生无所适从，因为它们并没有确切说明应该“做”什么，于是教师不得不把自己的指令解码为一系列分割和连续的微型作业，^① 从而导致学生进一步加深误读，陷入只适应

① 这样的适应同样也见诸所有的学科。在数学中，见德尼·布朗、玛丽-利斯·佩尔蒂埃、莫妮克·佩扎尔《优先教育网上的名人，他们是怎样做的？优先教育网上学校教师教授数学的实践——矛盾与一致》，载于《法国教育学评论》2002年第140期（Denis Butlen, Marie-Lise Peltier, Monique Pézard, 《Nommés en REP, comment font-ils? Pratiques de professeurs d'école enseignant les mathématiques en REP. Contradictions et cohérences》, *Revue française de pédagogie*, n°140, 2002）。

某种无需学习的作业的认知逻辑而不能自拔。

自体制统一以来，特别是从所谓积极的区别逻辑盛行的1980年代以来，“注意差别”从来不是体现为对于自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学校体制中通行的先天条件的质疑。^①这种适应性意识形态是以特殊论的方式行事，本身就确认各种不平等。这是一种根本性错误，因为无论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维护学校的民主化的雄心，还是甘于屈从于既存的种种不平等，它们始终停留在没有解决的同一个问题上——单一制学业的内容与所有人学业成功之间的关联性。

被统治阶级的学生不能掌握学校知识的问题，极少被当做对于学校机构整个运作提出质疑的观点来论述：这些学生本身被看做“困难生”。然而，被统治阶级与学校文化的距离，在一个阶级社会中依然是不可能缩小的。上述两种逻辑当中的第一种逻辑（无视差别）否认这一差距的阶级性，而学校没有责任创造条件来使学生掌握一切知识和技能。第二种逻辑（适应）则不承认各种社会差别的冲突性，把它们加以中和化，或者在“社会文化残缺”的意识形态论下，以本性主义的方式加以“伦理化”。这种逻辑预感和考虑到了文化的差距，但视之为只是一种家庭环境的缺陷或者牺牲品。

于是，教学以这样的方式来适应：不鼓励讲授那些被认为是距离民众阶层出身的学生所熟悉的事物太远的知识。由此，针对“诸如此类学生”的所谓“具体教学法”的观念应运而生，^②而且这种观念一付诸实践似乎就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它减少了学生将他们“实际应用”的“具体”事例与他们

① 譬如说，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教学大纲不再以有教养的家庭的孩子所蕴含的规范作为基础，而是相反，成为名副其实的“统一”的大纲，也就是说以完全不知道学校要求的学生的模式作为基础（脱离有教养家庭的孩子“熟知”的东西）。

② 见前引让-皮埃尔·泰拉伊《论学校的不平等》。

只是“面对”的写入教学大纲的一般原理明确联系起来的机会。一些学生因此而庆幸自己或多或少能够合格地完成教师布置的全部练习，但为了不致使他们泄气，他们并没有被明确地告知这样的练习目的只是引导他们去联想一种法则、属性。作业的最后这个要点，他们是不加深究的！

这种适应的意愿也许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但毕竟掩盖了作业的认知意义，如果没有人加以引导，这样的意义是难以窥见的。弱化使得民众阶层的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出身的话语，同样掩盖了这些学生想要获得学业成功就必须加以填补的文化差距：学校在遮掩社会冲突性的同时，参与了学习的不平等。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过去的学校明确提出部分地建立在社会主流观点基础上的毋庸置疑的原则，来表明其阶级立场的做法更正确；传统的教学法并非以所有学生掌握复杂概念为目的。因而，谈不上什么怀旧云云，更不是安于某些新形式的不平等。学校不平等的构成，恰恰在这一意义上向我们说明了阶级斗争的新模态。为社会解放开辟道路的力量，诸如觅求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来促进学校民主化的教师，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的实践活动在法律上是由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学校体制来决定的，所以必须对他们以民主化为目的的变革活动的效果进行反思，而不是仅满足于具有创新色彩和善良动机。

学校不平等与教室中的阶级意识

由此可见，应该从社会阶级的视角来进行论证，而不是单一而笼统地看待这些变革。譬如说，最近的各种不同的著述，其中包括本书收录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新的“自为阶级”（马克思语）出现的趋势。这个新的“自为阶级”正围绕着作为雇佣

者的认同性动员起来,^①而对于它的分析表明它正在超越组成它的各个阶层的分歧。因而,这个阶级是带着两重性出现的。譬如说,教师一方面大多数认同工薪阶级的一系列属性,但又强烈地表示自己并不是同临时工阶层的家庭属于同一个阶级: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想法指责关于社会文化残缺的论说和来源于这样的论说的适应性教育实践。

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认知维度的影响之外,还有对于学生在学校和社会中自我认识的方式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追踪小学和中学之间的学生将近两年之久。这项研究表明,学生们面对两种类型的学校话语,为他们提供既作为学生又作为孩子的两重性的解释。这样的话语通过掩盖社会的冲突性,阻碍阶级意识的形成。

第一种话语把他们经历和扮演的角色同脱离社会纷扰的教室的“共同生活”挂钩:促使学生认为各种价值只是班级内在地固有的东西;对他们只限于做个人的优缺点的心理化的或者中性化的比较(敏捷或者迟钝,有条不紊或者缺乏条理,循规蹈矩或者调皮好动,如此等等)。

第二种话语将学生视为社会文化残缺者来谈论。这种掩饰学校与学生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距的冲突性的观点,导致工薪阶级中间最不熟悉学校成规的阶层的子女被看做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的牺牲品,但通常是以怜悯同情的方式,而不是以同不平等进行斗争的方式。

这些话在教育实践中的第一种体现,乃是出于善良的动机,即不应该把学生作为社会存在的事实传输给他们。正是这

^① 保罗·博卡拉:《工薪阶级的认同性挑战——影响劳动者和工人阶级到达工薪整体认同性高度的分化和接近》,载于《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88~589期(Paul Boccaro,《Défis identitaires de classe des salariés. Des divisions et rapprochements affectant les travailleurs et la classe ouvrière à la montée de l'identité de l'ensemble salarial》, *Économie et politique*, n°588-589, 2003)。

样的话语伴随着各种适应性教学法：“这些孩子将很快面对生活的困难”（这种话语凭空假设他们注定要经受生活的困难）；“应该使他们同样感到幸福”（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未必能作为他们智力解放手段的教育，而是以另外的方式来使他们感到幸福）。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并不期望能够像教育其他人一样教育这些学生，却又唯恐直言这一点会使学生们感到灰心丧气，从而直接影响了教学实践活动，竭力要促使这些学生相信在学校里对于他们的要求就像在校外作为普通的孩子一样。由此产生了针对“这些学生”的花样繁多的教学实践，强调教学情境需从学生们知道的东西出发（为了不致使人泄气，掩盖了其目的性即是走向他们毫不怀疑其存在的东西）。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评估的愿望导致婉转地描述学生学习的困难。举例来说，一个需要帮教的班级不是直截了当地称为帮教班，而是用专门配备进行这种帮教的老师的名字来命名为伊夫班。课时更加密集，按照不等的要求水平来进行。

第二种体现则是认为必须按照学生“现状”（学校形成的他们的形象）来评价他们。于是，不向他们传输从他们身上得出的社会文化“残缺”的错误形象，而是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称之为“根”的东西，亦即伦理化的各种社会属性。正因为如此，在这些学生集中的学校里，教师有时通过对课堂上讲授的文化传统（或者各种节日的宗教传统）的公开赞扬，公然干预孩子们的私生活。

这些基本观念甚至可能整合学校的各种作业。在CM2班中，阿米多有一天上午缺课，那天全班在学时间单位的换算问题。下午，女教师在引导大家复习时出了一道“指名道姓”的新练习题，尽管这是要求全班都要做的：“阿米多一家去马里度假。飞机9时57分从巴黎起飞，经35分钟的中途停靠后，于下午16时31分抵达巴马科。试问行程经历了多少时间？”由此，阿米多感到自己以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得到

看重，记住了这道习题，但依然是模糊的。学校以这种方式促进小学生和中学生把自己看做不是来掌握传授给所有人的知识的“学生”，潜在地辅以出身自缺少学业知识家庭的“孩子”形象，而是看做在学校里对家庭之外的东西始终发生排斥反应的一个“孩子”：心头铭刻着彻底的排他性的一个来自异乡或者另一种社会环境的“土包子”。

孩子只要受到重视，感觉到对他个人的器重，就会觉得一切都很美好。但是，作为阿米多，他不能不考虑是不是有合格的分数，同女教师的关系好不好，她是“和蔼可亲的”，“她了解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当他的一个哥哥同他谈到进入六年级的前景，断言“这个学校里的所有教师都是种族主义者”时，阿米多认为他哥哥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和糟糕的成绩找辩解的借口。他同小学老师关系良好的经验使他相信，在中学里也将是如此。当时他没有去考虑面对教师的身份对立的模式。但他已经对不能通过掌握学校知识而解决的身份差别模式进行思考：“了解像我们这样的孩子”意味着存在一种信仰，认为学校里一切依然故我。而此时进入六年级之后，分数变得他自认为是“灾难性的”（因为中学的组织形式不太允许掩盖困难），排他感被调动了起来，不过这时是据此把自己的“失败”解释为牺牲品。因此，在地图事件和其他课程上的另一些同类事件之后，阿米多终于认为有些受宠的学生应该是事先知道答案的（不能想象他们能在对于他们同样是全新的知识方面调动某些先天的才能）。

老大哥们的话语，以及这些学生在校外习得的观念（特别是充当歧视和刁难的牺牲品），占据了上风。为了解释他们所说的打坏分数的教师们的“恶意”（因为他们认为以往得到好分数是出于教师们的善意，而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知识或者进入认知状态），学生们不得不诉诸种族主义的论据。

在追踪研究的学生中间，“白人”学生们也像阿米多一样有

着逆反举动：譬如说，他们认为教师抛弃了“像我们那样穿着的小伙子”。种族主义、服装隔离或者将这类社区居民打上某种标记，在这些青年的生活中并非总是单纯的幻觉。他们所说的诸如此类行为在学校里很少见，但这些观念是这些学生能够掌握的唯一东西，从而使他们领悟不到自己正在面对的是一个不知的精神世界，正在学习富有内涵的知识，而要掌握这样的知识必须克服社会各阶级之间对抗的社会暴力，也就是说必须认识到阶级冲突与眼下这样的学校的联系。

这一现象肯定受到学校外面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但学校也参与其中。在阿米多就读的中学里，六年级的5个班中有1个由“社区的比较优越的家庭”的子女组成的“优秀班”，这个中学的校长解释说，此举是因为他不得不面对这些阶层对他的学校唯恐避之不及的重要现象。为了避免得罪任何人，这一点从来没有明说过。然而，在学年行进的整个过程中，指责其他4个班级“调皮捣蛋”之声不断，在优秀班里集中的不是“不调皮捣蛋的”学生，而可以说是“已经在家里被教育成学校意义上的所说的守纪律学生”。

简言之，最“困难”的学生得不到其他的解释，在发现学校不需要他们在校外设想的那样的（属于这个或那个特殊群体）这一现实面前，他们只能重新求助于自己掌握的种种观念。他们一致的感受就是成为社会歧视的牺牲品，或是受到人格的侮辱（他们是畜生），或是被打入受歧视群体（作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于是产生了抛弃学校和学业的倾向——切断他们成功之路和助长阶级不平等的“反抗”形式。很快，在这些六年级的中学生看来，那个单独的优秀班是“白人和小丑班”，应该成为嘲笑的对象，是同伴眼里不屑于仿效的东西，因为一个被抛弃的学生如果循规蹈矩，很快就会遭到蔑视。不调皮捣蛋，不与同学玩耍，乃是背叛被学校抛弃和侮辱（坏分数）的同伴们的一个信号。

一些人对于公开的阶级统治并无歉意。然而，今天学校和社会考虑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建立在幻想学生能够不深入他们陌生的知识领域而获得学业成功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说，无需把握知识的紧张劳动，无需改变他们在校外习得的行为，使之适应学习书写逻辑所规范的知识固有要求。除此之外，这种谎言推卸了“责任”，将“罪责”归咎个人或者他们所属群体的假想的特性，从而掩盖了阶级冲突。换句话说，缺乏阶级意识，以及学校话语中流行的排除冲突的幻想，乃是学生的精神樊笼，阻碍他们意识到与学校的对抗是一种阶级对抗，无论从冲突发生的视角（使他们能够不是单独经受学校的评判），还是掌握智力解放的要素的观点而言，都是如此。

据说是为了保护这些学生，学校不允许他们接受可能使他们面对社会冲突的观念，尽管对于这样的社会冲突，他们不仅以后将要以一切方式进行对抗，而且在校期间也已经不得不面对，而且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教师都毫不怀疑这一点。学校并非试图掩盖阶级冲突和客观的社会属性的唯一机构。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与学校传输给学生的观念之间的强化效应。

因此，这些过程参与了学业成功的社会不平等的共同构成。但它们也有助于说明学校可能起到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是说通过宣扬跨群体共同生活的话语来传输一种抹杀冲突的调和观点，从而掩盖阶级博弈，分化工薪阶级的各个阶层，或者至少在未来的雇佣劳动者中间传播诸如此类的观念。

教师与社会矛盾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研究没有直接针对教师。研究一般行为方式中的再发现象，检验决定这些现象的环境模态，也就是分析学校与学生之间形成的诸如不平等和学生的社会烙印等观念。但我们并不认为教师只是学校的一个齿轮。他们不可能完全是这样，也不可能不再有其他作用。他们的实践活动始终

是情景化的：为了把握操作的种种可能余地，必须不否认决定论。

这个问题的责任不能单单归咎于教师：他们实施的大多数教育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整个学校体制（教学大纲，教育部的指令，督学，辅助学生的设施，教员的培训）和社会对于学校的期望决定的。所有的现象无不表明，学校显然推卸了教育学生在单一学制的学习年限内掌握被认为是所有公民不可或缺的知识的责任。教育部的连篇累牍的言论便是证明，尽管表面看来彼此有所不同：不论是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假想的教师的严重惰性，还是认为教师队伍杰出，并且激励他们创新，我们觉得始终是一种“教学分权化”的说辞，也就是说把寻求解决对整个体制质疑问题的“责任”推给地方和个人。

由此产生了许多后果。首先，促使教师相信自己是万能的，鼓励他们天马行空去“创新”，而无需一种总体的创新政策创造条件，以普遍推广具有普及意义的局部创新的事物。实际上，这随即促使教师产生无能感，面对无力造就所有学生获得成功的教学失败具有的负罪感。最后，由于这种负罪感和关于各种不平等的阶级话语的削弱，促使他们把学生的“困难”归咎于这些学生的固有“能力”弱（回到天赋意识形态），或者诉诸“社会文化残缺”的意识形态。

显而易见，帮助教师克服并非朝夕之间形成的社会认知误读，不能靠责怪他们来解决：这里存在着有待培育的行动观念问题，既不能沉溺于幻想来自我欺骗，也不能陷入宿命论。离开了教师，这项工作就无法进行：他们在向社会传播思维方式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的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教育之外，变革的前景在于通过帮助民众阶层、不熟悉学校规范的工薪阶级各阶层的子女，走向领悟学校和社会中的社会冲突意识，以及认识学校和社会在这样的

冲突中的地位和立场。不过，看来事实上只有通过教师更强烈地意识到他们在这种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许并非注定只是作为掩盖冲突的角色——才能达到改变学校和社会的目的。简言之，也许他们应该把自己看做与学生和“民众阶层”家庭一样，属于同一个社会阶级。

第十三章

教师运动

——反对自由主义的争论与争取承认的斗争

克里斯蒂安·拉瓦尔

导 言

2003年春的教师运动的意义问题像所有其他社会运动一样，乃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将提出若干假设，来说明这个运动与可以称为“社会运动”的以往一系列不同事件相比所表现出的“质的进步”，而1995年则是比照的基准日期，尽管不存在所谓奠基事件。首先应该着重指出的显然是教师运动的广泛性和延续时间之长，这两个方面在教育界完全是空前未见的。从2003年3月开始最初几次罢工，直到6月末教师和国民教育部门的其他人员，包括辅导员、护士、社会助理和学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斗争，在最高峰时期，导致大部分小学和中学瘫痪，而且他们之中有几十万人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除了这些量的特征之外，国民教育部门人员的罢工运动通过其实际行动和集体诉求，难道不正如马克思所说，表明“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①更确切地说，尽管没有达到

^① 卡尔·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载于《哥达纲领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巴黎，社会出版社（Karl Marx, 《Lettre d'envoi à W. Bracke》，dans *Critique des programmes de Gotha et d'Erfurt*, Paris, Éditions sociaux），1981，第19页；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版，第296页。

所要求的物质成果，这场斗争难道不是标志着一个“象征性的前进步伐”，从而赋予了斗争以更加鲜明的意义，推进了斗争主角的政治觉悟，乃至改变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性吗？

我们要在这里强调，2003年春的运动以政治化为其特征，沿袭了1995年12月的公共服务部门罢工的传统，其反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内涵比以往的历次运动更加鲜明。但我们所说的“政治化”，并不是指支持某个政治组织或形态的选择，而是理解为一种觉悟，也就是说意识到一切政府措施及其遭遇到的反抗无不与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相关，归根结底属于基本的政治选择。2003年的这场运动本身应该从远景的角度来进行观察。1998年的塞纳-圣德尼省的教师斗争，反对教育部长奥莱格斯的运动，以及1999年和2000年期间加尔省和埃罗省的家长和教师的大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勾画出了多年来教师界的动员轮廓。2004~2005年间战斗性的再次高涨，例如众多教师投入左派阵营，在对欧洲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中说“不”，同样应列入反对自由主义运动周期，因为这些动员虽然性质不同，但提出的问题却大多相同，构成了其中的各个环节。

我们在此不拘泥于行动形式问题、工会组织的作用和基层与上层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共同行动”的所有这些决定性问题显然同更长远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没有“统一工联”、“法国总工会”和“团结、统一、民主工联”的活动分子的介入，这个运动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规模。工会活动为业界团结所做的先期准备，罢工，全体大会，各个组织的立场和策略，个人的决心和临时集体的可靠性，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的游行示威，高峰期和再发动，向公共空间显示的象征性行动，斗争的所有这一切场景和侧面都是罢工运动的基本维度，无不同运动的意义相关。2003年教师运动的相对的新特点，无疑就是它的可持续性，以及它所标榜的同形形色色的改革对立，也就是说同既存情况决裂的彻底性。但是，我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运动

的主角所提出的各种主要论题上，大家将会看到这些主要论题表明对于法国、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实施的政策本质、一贯性和广度具有的敏锐意识，指出诸如此类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1945~1980年这一周期中构建或者发展起来的注重教育的社会国家解体。

运动的意义

试图说明一个混合的社会运动的基本意义，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它所动员的人员十分复杂，而发生的原因和关联的因素又极其多样。不过，有些解释谈到左右其方向的主导逻辑和主要力量，应该予以注意。一个运动的成效在于它将局部的、暂时的或者地区的状况同更广的环境相联系，将某种物质的实际诉求同奠定行动的合法性的符号表述和普遍意义结合起来。它能否载入史册，取决于能否有一个集体的表述来提出能得到主流表象信任的新的抉择，而不是将运动本身降低为一股势力与另一股势力之间短暂的单纯对抗。

众所周知，1995年以来的“社会运动”最稳定的特点之一，乃是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对于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被树立为权威的自由主义逻辑相对立的政治的肯定。就这样的观点而言，2003年的“教师义举”并没有背离该时期的这一特征。教师运动是一个突出的政治环节，亦即德尼·贝尔热所说的这样一个事件：既表示对于政府决策的拒绝，又揭示了从业人员和“现场”用户所感受到的矛盾的不可忍受性，显示了改变事物进程的集体意志。^①“教师之春”并没有导致一个规模更广的雇佣劳

^① 德尼·贝尔热：《现时的未来——对于一个运动的前途的反思》，载于《以往的未来》第33~34期，1996年第1期（Denis Berger, 《Le Futur au présent. Réflexions sur l'avenir d'un mouvement》, *Futur antérieur*, n°33-34, 1996/1），第9页。

动者运动和政府的让步，这个事实丝毫也抹杀不了上述特征。这个运动不断表明一种激进的集体反抗，反对减弱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更深一层说，则是表明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特征的十分严重的政治剥夺。就这一观点而言，它是1995年12月的动员与2005年5月29日全民公决结果之间的重要一环。

在这里几乎不可能展开对于作为运动根源的各项改革以及财政紧缩措施和职位压缩所起作用的分析，^①也不可能检验被认为是挑衅格扎维埃·达尔科和吕克·费里部长的态度和讲话的意义。^②但是，应该再次指出的是，动员起来的国民教育人员的原则和价值是同分权化和退休金改革计划迥相对立的。他们通过起而反抗十分直接地触及他们利益的菲永的退休金改革计划，明确表明反对以他们作为牺牲品的社会倒退。这项改革延续时间很长，包括至2008年的两年半费用分担期，还有同2020年远景相关的两年附加期，事实上它极其粗暴地打击了女性占有相当大比例的一个职业，何况这个职业的成员由于学业和为参与遴选竞争进行准备（这些都不计入退休金计算的年限），入行较晚。要么提前退休而接受减少退休金的财政处罚，要么获得60岁之后的超年限服务职业附加年金，改革的这种选择特别刺伤了大量的国民教育人员。

此外，他们通过反对拉法兰政府所实施的分权化的斗争，首先并非是为了维护那种理想化的共和制模式甚至是集权化的

① 从2003年3月开始，有时十分坚决和密集的地方斗争针对压缩职位和取消学监和舍监身份问题。这些斗争具有发动的作用，特别是在波尔多和波瓦提埃的学界。

② 例如，在当时分发给全体教师的吕克·费里的书中谈到了经费的缩减。关于动员教师的语句见贝特朗·热艾《教师“全体大会”》，载于索菲·贝鲁、勒内·穆里奥主编《2003~2004学年》（Bertrand Geay, 《Le “Tous ensemble” des enseignants》, dans Sophie Bérout, René Mouriaux dir., *L'année 2003 - 2004*, Paris, Syllepse), 2004。

官僚国家。只要稍微读一读运动的文件（传单、文献、歌曲等）就可以知道，罢工者所要表达的不如说是捍卫代与代之间、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的团结的愿望，以及对共同利益和普遍权利的重视。这种分权化实际上是在由于地方教育政策的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大和教育设施的投资出现越来越明显差异的环境下进行的。招聘非教师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工人和服务人员）的权力不再归属国民教育部，而属于各个部门或者地区，这一前景只能加重不富裕地区的不安。

以缩减教育公共基金为基础的退休金和分权化改革所构建的体系，在教师的眼里是同一个社会计划的体现之一。^① 这场斗争旗帜鲜明，要求捍卫社会正义和平等价值，以及特定的社会“公民”观念，也就是说把社会首先看做是代与代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团结互助的网络——阻止商品关系扩张的网络。^② 对于社会和公民价值的这种参照，通过全体大会的讨论记录，通过十分频繁的街头游行示威中的传单、歌曲、口号、小旗的内容和语调表达出来，正如一些评论所坚持的那样，凡此种种信息所体现的不是缺乏社会观点和替代性选择探索的工团自卫。

政府的许多右翼和左翼政治家，以及一些记者和研究人员试图促使人们相信，公职人员的社会自卫表达了一种社会保守的倾向。就“运动的集体主体性”观点而言，不能把不同事态混为一谈。教师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1995年以来的各种社会动员的延伸，这些社会动员对商业资本主义的危险以及企业私有

① 弗朗索瓦·拉布罗瓦耶、达尼埃尔·拉莱：《退休金的启示》，载于《新视点》第21期，2003年春季号（François Labroille, Daniel Rallet, 《Le révélateur des retraites》, *Nouveaux Regards*, n°21, printemps 2003），第21页。

② 关于争取共同利益和反对公共财富私有化的斗争的意义，见洛朗·泰弗诺《使一种声音得到理解——投入社会运动的制度》，载于《运动》第3期，1999年3~4月号（Laurent Thévenot, 《Faire entendre une voix. Régimes d'engagement, dans les mouvements sociaux》, *Mouvements*, n°3 mars-avril 1999）。

化和公共服务失调政策所导致的平等的断裂提出了疑问。无论是在运动内部亲历了各种事件的人还是站在近旁进行观察的人都可以见证，很少有一个教师罢工运动能够如此满怀激情地提出诸多社会和文明的根本问题。也许自1968年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如此强大的集体政治能量，只有2005年春就欧洲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之际的公众表现能与之媲美。要揭示这个运动的意义，只需重新回忆一下各省或者巴黎的示威游行中打头的横幅和旗帜上关于平等和教育权利的标语就足够了。请看当时的口号：“所有社区，所有地区都有同样的受教育权”；“他们关闭工厂，关闭学校，打破这些可怜人的饭碗”；“青年在服苦役，老人潦倒贫困，这就是这个社会，我们不要这样的社会”。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言语能比下面的口号能更好地表达大多数游行示威者——而不是少数激进分子——的心情：“父母失业，孩子受歧视，退休金锐减：不，不，不，我们不要这样的社会。”^①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完全的“社会”运动：它的公开表述毫不隐讳地强调团结互助——各种示威游行的著名的“全体大会”的团结互助。它谋求向整个社会表明自己是一个一再希望同家长们、其他行业和部门的雇佣劳动者汇合起来的象征性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具有谋求扩大为能够通过总罢工来要求政治变革的一个跨行业运动的特点。弗朗索瓦·拉布罗瓦耶和达尼埃尔·拉莱在事件发生当时“热”写道：“教师们今天发现，他们的话具有政治合法性，这使他们进入社会博弈；他们发现，通过公开讲述自己的痛苦，他们同时说出了其他人也需要诉说的痛苦。”^②

① 若泽·托瓦尔：《一个启示？矛盾、局限、潜力》，载于《政治——欧洲论争评论》第6-7期，2003年6-9月号（José Tovar, 《Un révélateur? Contradictions, limites, potentialités》, *Politique, Revue européenne de débats*, n° 6-7, juin-septembre 2003), 第189页。

② 见前引弗朗索瓦·拉布罗瓦耶、达尼埃尔·拉莱《退休金的启示》，第23页。

向其他行业的这种开放性，毫无疑问是由很大一部分舆论对于罢工的“民众性”的十分直接的关注以及说服学生家长相信斗争是为了共同利益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对于一些教师来说，进行几个星期的罢工，或者对于态度最坚定的教师来说，进行几个月的罢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罢工的经济成本太高，而心理成本也不低：使得通常是家境贫寒的学生失学，这对于许多罢工者来说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从而使他们陷入直接关注青年就学的责任感与争取更公正的教育体制的斗争两者之间的矛盾之中。在教师们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诸如此类的最困难的“意识状态”的集体解惑办法就在于肯定自己是“公共服务工作者”，不仅仅是谋求维护行业和部门的利益，而是主要旨在通过自己的斗争来确认关系到全体雇佣劳动者乃至一切居民的另一种政策的普遍原则。他们使用了一系列超越狭窄的学校范围的“宽泛”论据，把自己树立为特定的社会国家模式和以团结互助为基础的集体生活观念的捍卫者。

这也是运动的局限之一：正如1995年一样，产生于公共部门的这个运动除了某些高潮时刻或者在某些地方——例如马赛——表现出跨行业的强大动员力之外，并没有能成功地吸引私人企业的员工。因此，应该提到5月13日和25日对于动员的十分强有力的推动促使反对退休金改革和分权化的阵线有可能真正扩大。遗憾的是，可以说这个运动并未能大规模和持久地吸纳公共部门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国民教育部门的内部（技术人员和维护人员尽管是分权化直接针对的对象，但同其他人员相比，并未得到充分动员）。像在1995年一样，这种受到局限的吸引能力并未妨碍运动在舆论眼里的真正的普遍性声望。同样，罢工者“坚持”罢工连续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的空前的坚定性与运动的最终失败形成对照，留下了遗憾的记忆。

诚然，不应该沉陷于回顾的理想化。教育界罢工运动的广泛性不应同这个部门的任何团结一致混为一谈。根据许多现场

角色的证词，各个教师团体在行动目标和形式问题上常常意见分歧很大，而且并非所有成员都以同样的坚定决心投入罢工。此外，运动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未必明显地表达出来。例如，与工作条件越来越糟糕相关的职业磨损根本没有被提到。即使是在青年教师中间，也可以重新看到十分深刻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从而使人们怀疑能否用代际标准来研究教育界。

加速政治化

不能仅根据其参与的人数、持续时间和直接的成效来衡量一个运动的影响力。以表象和认同性的转换作为见证的符号表述即使不是更具意义，也是同样重要。运动的反对自由主义的维度，反对提倡市场和竞争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政策的力量斗争意志，证明了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集体反思的深化，以及罢工者试图树立他们的普遍原则来反对另一种取向的倾向。

许多因素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注意一下主导街头游行示威的口号，那么就会惊讶地发现，游行示威者挑战的主要不是部长们，而是指导那些备受争议的改革的哲学。1995年12月，许多人高喊“朱佩下台”；在1998~2000年的运动中，经常可以听到“阿莱格尔下台”的喊声；在2003年5~6月，一些人对部长们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高呼“拉法兰、费里、菲永下台”。但是，最终的冲突从一开始就表达为争取团结、平等、正义这些基本价值的诉求的斗争。这种诉求的凸显无疑是因为政府公开的自由主义政策唤醒了一种普世主义类型的反应，而教师作为脑力劳动者由于他们表达个人体验的特殊天赋和反映集体诉求和普遍理性的特殊功能，成为这样的反应的最“自然的”代言人。

然而，如果不将此看做只是一种与教书的习惯密切相连的言说普遍化倾向，那么就是自欺欺人。从政治上进行反思和理

解的集体活动，无疑是同样重要的。集中“火力”针对各种改革，可以更加清晰和彻底地揭露新自由主义所提出的社会计划与这些普遍价值之间的对立，而且也引起了积极的集体关注，来分析这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后果。这里还必须提到在学校内和学校外——会堂、体育馆、电影院、工会和协会的会所举行的许多会议，以及在2003年3~6月展开的关于退休金、分权化、公共服务、商品化现象的重要解释活动。同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会面，佩戴人字形臂章的工会活动分子的“巡行”，教师之间的辩论，全体大会的各种讨论，凡此种种无不促使一种政治意识加速形成，而最政治化的教师，工会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哥白尼基金会，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法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统一工会联合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以及数百位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经济管理、数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在关于社会保障运作和替代菲永计划的可能方案的宏伟的“弥补工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必须提到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退休金的反提案以及数以千计的影印副本在全法国的流传。在此时出现的经济学家们关于替代政府改革的可能方案的一些文章，例如让-保罗·皮里乌、勒内·帕塞、米歇尔·于松和贝尔纳·弗里奥的文章，引起广泛的反响，在数千所学校里引发了讨论。同样不应该忘记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或者反对改革的工会散发的各种文件，以及在这个阶段十分广泛传播的各种小册子和著述。^①还应该着重指出一出现就迅速发展起来的因特网网址和分发网络的重要意义，它们的关于动员状况的报道信息功能是同批判性分析的传导不可分割的。

就这一视角而言，教师的动员无可争辩是与另类世界主义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统一工联《退休金、伪问题、真团结》（*Retraites, faux problèmes, varies solidarities*, Paris, Syllepse/Nouveaux Regards, 2003），以及《新视野》（*Nouveaux regards*）第21期，2003年春季号。

运动所坚持的论点协调一致的。一段时间以来，另类世界主义运动已经发挥了凝聚行动意志、记述争论、传播反商品化主要观点的作用。这个运动的重大核心论点之一，实际上就是“学校的商业化”问题。这个论点稍后被广泛地收纳进2003年秋泰洛委员会编撰的《关于学校前途的国民争论》之中。这是另类世界主义运动和部分工会长期以来所坚持的论点。它从2003年春开始同政府的改革联系起来，从而能够从西方社会所发生的总体变革的视角来考察这些改革。学校不再是不受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侵袭而属于单独的国家政策范围受保护的對象。恰恰相反，经费紧缩，岗位减少，寄宿学校导师和走读学校学监编制（即所谓MI SE）的终止，以及分权化改革，无不以事实表明学校乃是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对象。倒退措施的这种客观上的集中需要重大的批判性反思，并保证了这一反思的成效，尽管它不属于批判的左翼圈和工会圈。

2003年的运动以比1995年成熟得多的方式“热线地”组成了一个实验室，在较大范围内启动了研究人员的工作、活动分子的行动与群众运动之间的一种新的关联模式，其动力学的态势和有效性与皮埃尔·布迪厄于1996年提出的观念相距不远：反思的能力，反对媒体灌输的斗争，特别是借助因特网创造研究人员与活动分子之间沟通的新模式。^①这种运动内部进行“民众教育”的功能所起的战略作用，显然是动员的重大收获之一，它促使某些组织措施和技术装备的产生，而这些措施和装备依然在“非左翼”组织和网络应对2005年5月末的全民公决运动中得到运用。

最后，许多观察家着重指出，朝气蓬勃通常是小学、私立和国立中学教师的特点。但应该牢记这样一个事实：教师和非

^① 皮埃尔·布迪厄：《研究人员、经济学与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全国三级会议”开幕词，巴黎，1996年11月23～24日（Pierre Bourdieu, 《Les chercheurs, la science économiqu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intervention inaugurale des États Généraux du mouvement social, Paris, 23-24 novembre 1996）。

教学人员的罢工运动融合了各代人，即使部分青年教师没有参加，也毋庸置疑具有青年运动的若干特点，无论就风格还是活力而言都是如此，而追求符号创意，关注思想的独立性和对国家机器的反思的独立性，以及通过全体大会要求直接民主则是其具体表现。贝特朗·热艾指出：“这个运动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也许是这种特殊的混合，它构成了新一代教师的反体制本能与教育界的工会和政治传统之间的互动。”^① 几代人的这种汇合成为传递战斗运动所固有的语言、思维和习惯的机会，同样也使产生自2002年4~5月的青年动员和反对伊拉克战争动员的新生力量从中获益匪浅。从某些方面来说，教师运动乃是一大部分青年——没有完全投身于诸如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等运动或者尚未组织起来——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斗争在职业领域里的表现和延伸。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2003年春季的运动是否成为一部分青年的重要集体体验，而且像所有这类动员一样促进了可能具有持久效应的政治社会化。^②

运动的局限

在2003年春运动进行期间和刚刚结束之后，强调一个轰轰烈烈但短暂的运动的种种矛盾、局限乃至不稳定的特征的，不乏其人。首先一个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国民教育人员固然同时发挥了核心和推动作用，但对于其他行业的人员没有1995年铁路工人运动所曾经具有的那种吸引力。它的主要局限导致了失败本身。但是，许多分析同样还指出，这个运动没有把握住学校民主化的关键问题——决定着反对学校不平等斗争的职业和

① 见前引贝特朗·热艾《教师“全体大会”》，第146页。

② 弗兰克·波普：《学校抗议与社会秩序——塞纳圣德尼的罢工教师》（Franck Poupeau, *Contestations scolaires et ordre social. Les enseignants de Seine Saint-Denis en grève*, Paris, Syllepse), 2004, 第44页。

教学条件问题。一言以蔽之，教师运动没有触及实施他们的职业技能及他们赋予这种职业技能的意义层面上的矛盾核心。

在若泽·托瓦尔^①以及热罗姆·德维奥和让-皮埃尔·泰拉伊^②看来，运动的局限之一在于它的主角本质上表明它是一个反抗乞灵于自由主义——他们没有明确加以否定——的政府进攻的社会抵抗运动，但没有能力进而批判学校的功能和提出替代性方案。运动的主角们承认这样的自卫行动与教师所感受到的状况相关，业界越是能直面理想和形式上平等的学校政策与教师和国民教育部门其他人员对社会不平等及其对于孩子和青年的文化影响之间的惊人差距，这种自卫斗争就越是强烈。但是，这些被动员起来的教师尽管在两个月的时间内颇为激进和活跃，却没有能够用一个建立在他们所感受到的矛盾的基础上的、有利于学校民主化的名副其实的反纲领来顶住政府的自由主义政策的进攻。热罗姆·德维奥和让-皮埃尔·泰拉伊所提到的这种无能的一个原因，是应该十分认真地加以对待的：在教育界，对于能够导致学校民主化的道路缺乏共识，以致教师的反自由主义动员对于能否实现单一制的学校本身产生越来越大的怀疑。^③

这样就重新回到了对于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实际效果问题，因为应该说这是“进行斗争的原因”的中轴、运动的合理性的主要支撑点。那么，应该赋予2003年运动中的这个如此重大的议题以什么样的意义？^④ 尽管我们不像某些意识形态专家毫不迟

① 见前引若泽·托瓦尔《一个启示？矛盾、局限、潜力》，第186~189页。

② 热罗姆·德维奥、让-皮埃尔·泰拉伊：《面对不平等的教师造反》，载于《外交界》，2003年9月号（Jérôme Deauvieu, Jean-Pierre Terrail, 《La révolte enseignante face aux inégalités》，*Le Monde diplomatique*, septembre 2003）。

③ 见2002年11月法国民意测验研究所——统一工联的调查。

④ 安尼克·达维斯：《究竟有何内容？》，载于《政治——欧洲论争评论》第6~7期，2003年6~9月（Annick Davisse, 《Mais sur quels contenus?》，*Politique, Revue européenne de débats*, n°6-7, juin-septembre 2003），第190~192页。

疑地所做的那样，以漫画的方式把这场运动说成是只关心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部门的保守主义，但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合乎情理的：是否应该透过那些被看做是另类全球化影响的论点的成功，看到掩盖学校矛盾的危险？“学校的商业化”，“服务业的私有化”，“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凡此种种的长远的参数难道不足以将对学校政策缺乏共识的状态淹没在“世界新主人”的抽象宣言的沸水之中？

这个问题越是能够得到一系列事实和论据的支持，就越是显得严重。教师确实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和意识形态上统一的团体。在这里不想援引那些社会学的分析，来证明教师界的巨大社会混杂型，教学条件的日益扩大的差距和职业关系的多样性，代际差距，以及立场的分化。不过，教育界“进步派”与“保守派”、“民主派”与“共和派”之间的分界线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在克洛德·阿莱格尔入主国民教育部和促使他卸任的动员期间重又凸显出来。

大家都记得1999年1月亨利四世中学教师们的“建设民主中学宣言”，它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将习惯上倾向于反对模仿英美模式的“开明中学”的工会力量重新集结起来。许多观察家也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震惊：人员的庞杂化与构成教育界基础的价值逐步解体这两者的结合，可能造成大多数人采取敌视学校民主化追求的立场。这些观察家也对2002年11月统一工联的调查感到震惊，这个调查表明54%的接受调查的教师鼓吹放弃单一制中学。不管对于这种结果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应该指出的是，许多学校的现实危机主导着学校的混乱，大众的学业失败，以及教师切身感受到的困难和痛苦，并未自发地导致他们采取进步的立场和态度。个人的逃避，可耻的退却或者幡然醒悟，乃是完全像集体投入一样有可能出现的态度。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所有这些态度，在不同时刻和不同环境下有可能在同一些人身上按照某种变化不定的平衡结合在一起。右派很理解

这一点，所以总是试图把最明确地表示敌视民主化的教师封闭在安全保障和道德说教的樊笼里，其口号是“恢复教师权威”。

政治化与现场矛盾

因此，根本问题是搞清楚 2003 年教师运动的这种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化与教师的职业体验和他们对学校民主化的态度究竟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大家也许赞成——即使不是更加倾向于——说，这种政治化远非同寻求“民主的”教学方案相对立，不如说是今天的教学革新条件之一。这样的乐观主义论点本身至少有若干论据。我们亲眼目睹的政治化新浪潮，是直接同对于地方范围内决定着大部分学业失败的大量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学校市场”的逻辑，应用于住宿和就学领域的竞争效果，由于漠视而造成的在社会混合方面唯意志论政策加剧的危险，国家在公共服务方面退却所引发的风险，构成了具体实施教学上越来越明显的维度。此外，集体斗争是一种手段，使得现行政策、社会结构和制约就学的空间、职业状态和结果的不平等之间存在的联系更加明显。并非必然具有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意识的前导，但确实存在一种新的叙述困境的政治姿态，这样的困境是教师们在他们的职业中日常体验到的，因为他们面对着“机会平等”的理想与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对“知识社会”的官方颂扬与对于掌握知识者的实际藐视之间的日益扩大的差距。一言以蔽之，教师们抨击的“自由主义”不是一个遥远的话题，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东西：这个词今天代表着造成学校不平等和职业状态退化的决定性因素的组合。换句话说，他们的批判姿态主要依据亲身的职业感受，而不是简单的外部“影响”。

因此，许多人反对那种认为对教育领域里流行的自由主义总体政策的认识与争取学校民主化的斗争之间不相关联乃至不

相容的观念。在2003年春季可以得出结论说动员首先发生在具有工会组织和很长的工会传统而敏锐感觉到不平等并作出反应的学校里，从1998年的“93”中学教师的斗争过程中或者1999~2000年间的动员中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最直接受到社会和民族隔离现象冲击的学校里，青年教师之所以投入斗争，是因为他们目睹最糟糕的教学关系。

更概括地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校和越来越多在那里从事教学的教师直接受到学校隔离后果的影响。于是，斗争变成一种手段，以表明他们拒绝国民教育行政部门的双重话语：既放手构建“共和国学校的少数民族新聚居区”，同时又试图不惜代价来缩小“学校的裂痕”。如果说历次罢工提供的部分数据表明，学校动员图并非与最明目张胆的隔离现象无关，那么面对公共服务的平等价值、争取受教育的真正普遍权利的斗争、捍卫团结和再分配逻辑，显示了这些动员的最为具体的特性。

还有两点证明了政治意识与对于教学条件平等的具体关注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是一个历史的原因：如果考虑到薪火传承的不同代的教师，那么通常是借助最政治化的人们支持才实现了学校民主化方面的最明显的进展。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最初几代共和派和社会党人教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组成工会的政治进步教师，以及对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国民教育部门人员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1968年造反派”教师。再一个是逻辑的原因：如果反对学业失败的动员今天不考虑在很大程度上起决定作用的外部的社会经济因素，将会怎样？可惜，今天的批判不是针对教师技能“职业化”的主导政策，就是与教学的技术化和对于学校的“教育使命”的诉求混为一谈，忘记了作为教师投入争取真正的文化民主化斗争条件本身必要的社会学意识和不可或缺的政治化。

教育界的新的政治化部分是因为今天已经到达解决与学业失败相关的种种问题的尝试的“教育学的”和“管理的”周期

的末尾。各种社会因素和隔离逻辑在决定失败中的分量之重，已经不容忽视或者继续在学校的层面上来以事论事，也就是说已经不单单是教学阵地里的局部行动。先是政治化随后又转向教育活动来“继续战斗”的几代前辈教师，今天感受到了他们的行动的种种结构上的局限。他们在试图从政治上改变社会的行动受挫之后，相信至少能够尝试在改变学校的同时，从学校着手改变社会。今天，在他们认为隔离和“硬性管理”的逻辑越来越强大，以致不可能仅在学校范围内和仅通过教学法来进行抵抗的时刻，看到教育界的这种介入，他们感到某种失望。这种失望正向着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的方向走去，老教师们本身面对多少同他们的上下级关系观念相矛盾的连篇累牍的指令越来越持怀疑态度。

西尔维·博德在他对于一所郊区中学的代际现象的调查中举的樊尚的例子是颇为典型的。这位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教师生于1951年，“从参与1968年5月事件的亲身经历中得出信念，认为社会能够而且应该改变，而这有赖于学校，因为只有学校才能给予民众阶级以了解、怀疑社会并进而实施改造的文化手段”。樊尚属于具有十分肯定的左派信念的教师。西尔维·博德写道：在左派看来，“在1990年代下半叶之前，教师的职业之所以崇高，是因为他们相信公立学校能够减轻社会不平等甚至改造社会。但在1990年代末，这样的信念看来业已消失殆尽”。^①

教师反对自由主义的意义

离开了职业和社会认同性的重新界定，这种再政治化是不

^① 西尔维·博德：《一所郊区中学中的两代教师》，载于《新视野》第25期，2004年春季号（Sylvie Beaud, 《Deux generations dans un lycée de banlieue》, *Nouveaux Regards*, n°25, printemps 2004）。

可能的。它实际上是对通常所说的教师职业“丧失意义”问题的一种集体回应。2003年的运动作为其催化环节的反自由主义综合，通过辨明并只认同比较平等地传输知识的那些观念，可以重新赋予教师职业以政治意义。因此，它是中小学教育界的符号重组的组成部分。正如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教师在一个与试图把他们封闭在纯技术和功能的认同模式之内的官方路线相反的基础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认同性。

要理解这一点，就应该思考反自由主义的意识是如何回应同从事教师职业，更确切地说同教师所遇到的社会和文化考验相关的一系列压力的。有待思考的第一个方面，乃是从事职业的条件和入行过程中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它显而易见反映了对于被认为是文化民主在一个共和主义机构中体现的种种目标的追求与被认为是越来越不平等的教育具体条件的现状之间的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着重指出，这无疑是同地理位置相关的各个学校之间的社会招聘差距的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所有的学校无不倾向于越来越不相信通过学校的组织或者教学变革来解决学校的这种社会分割的种种胡言乱语。事实上，尽管种种政策宣称旨在加强学校的自治，扩大地方“老板”的权力，增多家庭选择的可能性，展开学校之间的竞争，强化企业与学校机构之间的关系，但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些政策从左翼当政加以推行之初就脱胎于自由主义的模具。这是法国的实际状况。

第二方面的压力是同功能本身的定义联系在一起。教育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遭受被理解为共和主义审判官和文化祭司的传统职业身份的腐蚀。就这一观点而言，马克思关于一般抽象劳动增长的观点很适合于教师社会功能的演变。按照抽象劳动同质化的逻辑，教师被冠以“普通劳动者”的名称，不得不接受在私人生产组织和其他只关心赢利和生产率的管理机构中使用的语汇和方法。人们要他们抛弃对于某种“英雄”职业的怀旧，忘记“自己的角色的魔力”，不再把教育看做崇尚良知

和无私奉献的“不同于一般的职业”。

这种强制祛魅据说是大众化的需要，是教材的必然更重技术性和实用性的需要，简言之是适应所谓民主化的最本质的要求的需要。而所谓的民主化本身据说需要一种彻底非政治的职业观念，这也许并非是教师身份的最小的悖论。共和派的人文主义乃是19世纪末以来进步政治和工会力量智库的组成部分，但同“资本主义精神”亲密无间的那种所谓“现代性”的鼓吹者却公开宣称与人文主义的决裂势在必行。做一个“民主”教师，就必须抛弃肩负传承人文主义文明的伟大精神力量的特殊使命这一崇高理想。这就是新的信条。^①

必须改变职业文化，抛弃职业的特殊精神属性，这种一再重复的论断伴随着效益逻辑的植入，而这种逻辑同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排他性，乃是“土著”在被迫皈依统治者的话语和价值的整个过程中典型地呈现出的痛苦和抗拒的根源。随着经济指标在学界对抗文化价值而被强制引进，并且分量日益加重，以及企业型管理语言和技术的使用扼杀了所有不同声音，否定了教师亲身感受的教学经验，这种异化感与日俱增。从使用一种婉转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正确教学”——着手来粗暴否定教学经验和功能的符号形态，这种做法乃是对于国民教育行政管理和替换这类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用语的一切东西产生深刻分歧的根源。^② 这种分歧既导致后退行为和犬儒主义的滋生，又促使一些人投入斗争，依恋运动的民主形式，因为他们在其中能够“认识从教的困难”，“得到相互尊重”，“彼此相互倾听”。

① 这并不等于说排除了关于教学效果的关键问题，教育效果的前提是教育不能被看做“一个普通的职业”，也就是说没有教师个人的投入，就谈不上效果。

② 伊夫·克洛：《无需人的工作？工作和生活环境心理学》（Yves Clot, *Le travail sans l'homme? Pour une psychologie des milieux de travail et vi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5。

在这样的环境下，捍卫公立学校重又具有了迫切的现实意义，获得了某些新的形式。乞灵于或多或少得到认可的自由主义观念的现代主义改革家们，20年来不停地奔走呼号，断言学校必须进行改革，因为经济条件和指标业已改变。然而，对于那些从中显示出“拆毁公立学校”的危险的所谓改革的意义提出异议，势必要质疑被说成是变革公立学校——据说这叫做“退回送件人”——的主要力量和原因的论说。捍卫学校机构，反对被看做是普遍商业化的现象，这就是捍卫普遍文化教育的独立性，反对将劳动者的教育从属于积累逻辑的倾向。因此，捍卫学校的独立性今天具有了显然不同于单纯对高等文化的传统精英主义颂扬的新形式。诚然，混淆并不罕见，其来源既有对受到保护的“原始”学校的怀旧，又有把维护书本知识和学业的传授统统看做是社会保守主义的表现的现代主义者的论说。教师功能政治上的重新定义，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教育系统的“民主化”实际上是通过日益扩大的文化传输，而不是单纯的“流量管理”来体现的。

教师职业意义的这个维度是根本性的。如果说教育遭受了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对于一切公共服务的贬斥，那么否定其作为公共服务的特殊性，更加确切地说，否定其在人的智力培养方面所付出的劳动，刻意鼓吹一个既简约（在“技能生产”方面）又宽泛（在社会化和道德说教方面）的定义来规定其功能，对教育的伤害尤大。与此同时，教师深切感受到最贫困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恶化，伤害到某些部分居民的“社会遗弃”，媒体的文化素质低下和种种“商业价值”如何促使上学在民众阶层中间变得越来越困难。教师之所以行动起来，并非像以往的知识分子一样感到自己具有站在整个社会之上进行表达的普世使命，而是以十分敏锐的现实感的名义，肩负作为见证者向整个社会呼吁的责任和功能。

所以，经济逻辑日益严重地统治学校，丑化公共权力和罗

织公务员罪状的自由主义政策，降低用于教育的费用，凡此种对于教师的职业和社会认同性产生了矛盾的后果。教师越来越自我确认为“公共服务工作者”，而且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以这样的名义准备站在捍卫社会国家的前列。作为“公共服务工作者”的这种认同性，无疑是同负有神圣使命的魔法师的神话遭到腐蚀相适应的。但是，这也是一种模糊的认同，因为它接受了上层阶级贬低教师职业的看法。诚如克洛德·格里尼翁毫不含糊地指出的那样，教师职业被资产阶级的最发达的阶层视为一种名副其实的陪衬，一种“没有出路”和“不可想象”的职业。^①毫无疑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能够比皮埃尔·布迪厄说得更好了。他着重指出，组成国家的“左手”的人员只能生活在痛苦之中，其原因在于由于对效益和利润的追捧，“缺乏通常同战斗的奉献结合在一起的某种职业的无私精神就无法运转的工作岗位的基础本身”遭到了否定。^②然而，与其说我们从中看到的只是影响到整个国家工具基础的这种无可否认的物质和符号贬值的消极内化，毋宁应该认为正是一种尊严和荣誉的逻辑“积极地”引导教师挺身站到捍卫公共服务的前列，把在这个祛魅的时代遭到极大贬低的一个文化职业的崇高性转化为对它的社会作用的更加直接的政治的和社会学的肯定。

争取承认的斗争

教育界也许变成今天的社会矛盾最敏感的层面之一。在上面谈到的所有层面中，职业的社会价值问题，社会能够赋予这个职业活动的意义问题，乃是抵制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核心。不

① 克洛德·格里尼翁：《从“人民的学校”到“大众中学”》，载于《社会评论》1992年11月第3-4期（Claude Grignon, 《De “l'école du peuple” au “lycée de masse”》, *Critiques sociales*, n°3-4, novembre 1992), 第19页。

② 见前引皮埃尔·布迪厄《世界的贫困》，第222页。

言而喻，这些问题密切关系到其他职业，如我们在 2003 ~ 2004 年间戏剧艺术家和研究人员的动员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的抗议力量是巨大的。毫无疑问，这种力量与一系列越来越使人感到困惑的事实密切相关：这些职业的物质状况十分明显地退化，无论就报酬、地位、工作条件还是社会承认而言，都同关于“知识经济”和“文化例外论”的没有实际效果的夸夸其谈严重冲突。

教育界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捍卫学校文化宗旨的特殊性，进而捍卫这样一个理念：这个职业的“价值不能以价格来表达”，也就是说在一个商品社会中，具有无价之宝意义的东西不受单纯的经济逻辑制约。就这一观点而言，教师确实并不构成一个同质的群体：他们越是讲授远离经济和技术世界的知识，也就是说其社会价值同他们直接和可见的职业收益无关的知识，就越是倾向于推崇“超越商品价格”的东西的价值。诚然，这种文化无价的观念本身在一个以崇尚物质财富价值为中心的社会变得很难得到认同，但不仅仅是抽象的贬斥。当前批判商品化的力量来源于对社会再生产机制、教育具体条件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的体制“调节”的放任自流政策的十分具体的后果。学校的不平等问题，教育的文化和精神使命问题，教学人员的物质状况问题，凡此种种趋于合成为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文化在市场社会中的地位问题。的确，这种批判同教师工会和主张学校民主化的左翼政党的传统路线并不相悖，而是要求确立一种具有整合力的综合性话语，以能够为当前的学校变革提供历史的意义，并将这样的变革同教师的日常斗争和从教的具体环境联系起来。

这样一个争取承认的斗争旨在使文化、知识、道德价值摆脱商品的统治，激励教师投身于一个更加广阔的反功利主义性质的运动之中。“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不屈从于赢利和竞争的单一逻辑”，这看来是正在构建争取“共同利益”的艺术和科学界

的这些动员的共同心声。教育界、戏剧界和科学研究界的社会运动从根本上提出了非商业活动的价值这个决定性问题，争取这种价值构成了一场具有普遍意义的斗争——道德与物质、符号与金钱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斗争——主旨。更加确切地说，它使教育人员把捍卫公共服务的一般活动与争取承认他们的职业的智力劳动的特殊性斗争联系起来，从而超越了神性或者魔性的过时神话。这个任务必须以重新定义学校独立性的合法基础为前提。总之，它需要一种新的世俗化学说，以对抗“认知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

第十四章

重温平等

——2003年春的教师斗争

贝特朗·热艾

2003年春国民教育人员空前广泛的动员表现出若干特别显著的特点：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浩大声势，实际活动中大量使用全体大会和“参与斗争的各部门”之间的碰头会的形式，展开争论、象征性的宣传活动和联欢活动。它的另一个不同一般之处在于各个教师职业团体在一个参与者十分广泛的运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这在过去是罕见的，除非追溯到它们在1950年代末围绕反教会干预斗争所起的作用，但当时的环境和斗争形式毕竟与此不可同日而语。在工人斗争得到发展和社会国家建立的基础上，当时的斗争旨在保障源于第三共和国的办学原则和体制得到维护；而在2003年，公共服务生存问题本身是在出现雇佣劳动者的新的动员形式的环境下，由游行示威者提出来的，显示出了1995年11~12月斗争的后续效应和另类世界主义运动日益增强的影响。

因此，2003年春的罢工通过将属于工会诉求常备目录的问题，诸如教员的地位或者影响到教育的预算问题等，同1990年代以来通常被认为属于各种联合斗争协会或者政党的优先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公共服务“商品化”的质疑联系起来，成为教师斗争话语重构的契机。与此密不可分的是，这种符号重

构也是从考古学家到间歇演剧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各个行业的更广泛得多的总体动员所固有的，从而表明文化界和文化传播界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斗争已经载入反对破坏社会团结的基本反抗行动的日程。

试图认识一个这样的“运动”构成过程，而不是停留在描述各种动员的形式或者单纯追溯其社会历史根源，就应该了解“搞运动”的特殊模式，领会组织一系列行动并促使行动合法化的意义，以及依靠以往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行动参数来组织一系列集体活动的条件。悉心关注“社会运动”产生的动力学本身，这样的一种进路如果不预先同长期束缚——特别是在法国——“社会运动社会学”的种种规范性假设决裂，实际上就不能达到其目标。因为，应该少评估“方针”的一致性，而多分析“运动”的某种方向和趋于一致的政治活动组成的社会条件。如果不考察所分析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社会属性，不考察他们进行斗争的主要目的和他们规定这样的目的的方式，以及他们是否得到动员的历史状况或者他们对于动员的功绩的信念的变化，就几乎不可能断定运动的方针。

我们首先通过检验关于2003年初教师斗争的最常用的解释模式，将尝试勾画出这种类型分析的草图；然后重构其发生的历史环境；最后提出若干假设，来阐释各个教师团体在冲突时跨越代际界线的形成及整个运动期间工会活动的性质。这一分析一方面依靠对于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的主要工会出版物资料的发掘，另一方面则仰仗2003年5~8月主要在巴黎、维埃纳省和拉扎克高地进行斗争活动的参与者和目击者的一系列观察。

“搞运动”

要了解2003年国民教育人员的罢工和游行示威的广度，首先应该回顾一下2002年秋季的大致情况。为了反对取消20000

名教育辅助人员的岗位和 5600 个学监岗位而用身份尚模糊的 11000 个教育助理来替代他们，为了反对国民教育预算紧缩的种种措施，国民教育独立工会联合会（FAEN）、法国总工会教育和研究及文化工会联合会（FERC-CGT）、统一工联（FSU）、法国民主工联国民教育总工会（SGEN-CFDT）和全国教育独立工会联盟（UNSA-Éducation）于 2002 年 9 月 12 日组成统一阵线。随即组织了几次常规的示威游行，当时一方面是煤气和电力工人的各个工会，另一方面是铁路员工也组织了若干“行动日”，但在公众的争论中，大学和研究问题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① 诸如“团结、统一、民主教育工会联合会”或者“学校解放”等少数派组织和思潮则力争进行更加激进的行动，并同其他“斗争中的部门”沟通。整整一个冬季，行动的导向问题成为各个组织之间乃至每个组织内部冲突的主题，但一方面是保持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是少数派团体的破坏阴谋，推动着数量越来越多的学校中的动员氛围的发展。2003 年初，将近 10 万名国民教育部门的非教学人员转入地方集体的措施通告，被认为是肢解国民教育过程的开始，旨在抛弃整个教育公共服务部门或者将其纳入私有化轨道。此外，从 2003 年 2 月起，爆发了围绕退休金计划的争议。

第二个阶段始于 2003 年 3 月 18 日晚，当时勒阿弗尔港的一次 400 名罢工者的大会投票决定举行连续性罢工。随后，在 3 月 27 日，值社会救助员和心理咨询员“行动日”之际，通过跨工会组织的号召，运动在波尔多学区扩大；运动爆发于塞纳圣德尼的各个中学，马赛北部各社区的小学，以及维埃纳等具有强大的统一行动推动力的地区。尽管学校的春季假期推迟了运动的传播，但在大部分省区跨越了这个阶段。在这些省区，罢工

^① 关于这个运动的大事记更为详细的情况，见贝特朗·热艾《教师“全体大会”》，载于索菲·贝鲁、勒内·穆里奥《社会年》（Geay Bertrand, 《Le “Tous ensemble” des enseignants》, dans Sophie Bérout, René Mouriaux, *L'année sociale*, Paris, Syllepse), 2004, 第 135 ~ 147 页。

恰恰开始于假期之前，而在其他地方则事先发出了假后罢工的预告；在游行示威中表现出一种造反的精神；教育部长的形形色色的漫画像在因特网上流传，最终画在了游行队伍的标语牌上。一个富有团结力的口号随处可见：“一切社区，一切地区，都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一再举行的“行动日”或者扩散的持续罢工，逐步遍及全国。这些罢工有的是由多数派组织发起的，有的是由“协调会”或者“学校全体大会”促动的。5月13日围绕退休金问题组织的跨行业日，标志着教育部门人员中的动员达到顶峰。各个工会的统计表明，80%的罢工者属于这个部门。各个行业部门混合在一起，全国可以统计的约有100万~200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

5月13日之后，开始了第三阶段。“教师运动”普遍展开，虽然在形式上仍然很不一致，但包括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教育部门。它像射向菲永的退休金计划的抗议“投枪”，同时又围绕教育公共服务的前景提出了自己的诉求。但是，罢工只是有限地触及其他职业部门；各派工联的分歧很快在退休金问题上重新浮出水面；被寄予许多希望的法国总工会保持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从跨行业日到教育界跨工会日，从地方的跨行业罢工到全国性的部门罢工，跨行业运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依然在持续，而在这个运动内部，国民教育始终是最积极的部门，在一些省区还得到了学生家长的集体支持。全体大会和跨行业协调会的实际做法，在工会组织之外或者更经常的是在它们的倡议下推广开来。组织了有文物保护人员和间歇演剧人员参加的联合游行示威，野餐会，音乐会和讨论“新自由主义”的学校改革或者“服务贸易总协定”（AGCS）的辩论会，以及由工会、协会或者政治组织倡议的其他“论坛”。事实上，在跨行业的层次上从6月3日开始，在国民教育部门则从6月12日开始，出现了名副其实的退潮。在最活跃的省区，同间歇演剧人员相关的动员延续至7月中。在8月份，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农民联合会及统

一工联和团结工会等工会组织的拉扎克大集会，无论就其规模还是特色而言都是作为春季动员的延续出现的。

三种观点

为了理解这样一种动员的特殊逻辑，各种不同的理论应运而生，观察家们可以从中找到不乏合理性的解释，但很快就会发现它们各自的局限。

1. 为了维护教师身份的一种“行业性反应”

这种类型的批判性评价常见于主要报刊的社论作者，能够从社会运动的“行动主义”进路中找到其合理性，却是荒谬绝伦的。因为，如果我们按照作为这种类型进路基础的主观主义逻辑把它同参与行动的角色们的言论联系起来，那么可以看到它没有涉及运动的最显著的特点。从全体大会或者各种会议和“论坛”上连续几周展开的争论，以及最积极地动员起来的个人的主观经验来看，则相反表达了另一种感情：投入到一场关系到“社会命运”的斗争中去，通过生死攸关的反思，集体回归他们所肩负的使命的本质。此外，还应该指出，构成被动员群体的最大部分的教师并非是政府的学校机构分权计划的直接的或即刻的受害者。

如果说将教师运动视为集体维护身份的一种形式的假设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么就是为了理解动员的动力学，同样应该考虑维护身份与捍卫以公共服务、平等享有文化财富、团结互助概念为核心的普遍价值之间的既有联系。特别是在法国的教育工会传统中，像教师那样的职业群体构成了具有某种形式的普世倾向特点的群体，^① 或者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说，^② 他们的

① 贝特朗·热艾：《教育工会组织》（Bertrand Geay, *Le syndicalisme enseignant*,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②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理性——行动理论》（Pierre Bourdieu,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Essais》), 1994。

特殊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具有普遍性的利益。但不能忘记，这种类型的倾向赖以实现的符号组合最近阶段只有在某些十分特殊的环境下才能发现其效应，而其中的一个明显反例就是阿莱格尔部长所扮演的角色。关于这个阶段，我们将在后面重新谈到。因此，归根结底，诸如教师这样的职业群体在2003年运动类型的特殊运动条件下使得其行动普遍开展的能力，应该是进行分析的核心。

2. 发生于“雇佣劳动者反自由主义斗争周期”中的一场运动

这种假设强调雇佣劳动者身份的最具同类属性的方面，以及政治和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与主要是在1995年11~12月以后雇佣劳动界最积极地动员起来的那些群体之间的政治分野。“整个系列”的各种斗争无不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反对各部门斗争和反抗的分裂，但它们重新出现的间隔越来越远，主要依靠最直接受害的部门并从自己的历史中汲取养料。这一假设比较常见于积极参与运动的活动家，而且受到某种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长处在于阐明了这些不同类型的运动之间的历史关系。但是，必须摆脱周期概念可能陷入的一切机械论，特别注意这些运动彼此孕育和推动的过程，以及可以掌握和传输的经验资本的形成。同样还应该思考国民教育界动员的特殊性及其固有的历史，以及教学人员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整个系列”斗争形成的特殊逻辑。

3. “另类世界主义运动的影响”

这第三种假设在最显目的“政治家”中间比较流行，看来是参照了某种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进路，尽管传播相当广泛。它局限于简单的陈述，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老生常谈。确实，这个运动的明显特点之一是可以看到诸如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等运动所阐发的论点得到广泛传播，并被罢工者以迥异于以前阶段的方式加以吸收。但是，如果考虑到教师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构成这类运动内部最有代表性的群体，而且从社会轨迹

的视角着眼，在另类世界主义运动与诸如 2003 年那样的教师动员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外在性，那么这个假设多少是抽象的和同义反复的。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介入或者对之同情，以及教师与工会性质的斗争发生关系的特殊机制问题，也就是说在彼此表面看来不同的两个舞台上发展起来的双重动员之间正在构建的联系问题，以及沿着这种互动的路径构建制约对于现行政策的接受和反应的认识框架问题。

对于最流行的观点的这一批判性的审视，还引导我们提出一种整体的分析，亦即不仅关注教师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倾向、他们的组织方式和学校政策的本质，而且探讨这些政策在不同局势下的变化，它们对于工会阵地的结构、教师职业群体的各个不同部分认识学校体制及其发展的方式的影响，以及在组织集体行动的运动本身中影响这种认识的种种变化。

阵地状况

首先，我们要考察教育界各个职业群体特别是教师的主要特点，以及促使他们历史地形成不同特征的政治形态。由于教师在社会空间中的地位，他们具有一系列相对的特性。^① 他们作为国家雇员，凭借他们的文化资源，特别是通过学校机构获得和合法承认的资源，在社会空间中具有中间的地位。尤其特殊的是，他们的职业认同性在集体授予他们的教学权威性中找到其基础。这些十分普遍的特征使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所采取的立场的若干不变姿态，不仅是在法国，而且在可以进行比较的一切国家中无不如此：倾向于温和的左翼的稳定性和往往是不无冲突的对于国家的依附。

^① 贝特朗·热艾：《职业——教师：政治回忆与工会行动》（Bertrand Geay, *Profession; Instituteurs. Mémoire politique et action syndicale*, Paris, Seuil), 1999。

在1960年代之前，这些特性通过教师日趋上升的社会轨迹，通过他们同法兰西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构建起来的联系所代表的自己的政治历史，凸显于公众印象之中。由此可以理解，尤其是在教师职业中长期占据数量上的主导地位的小学教师中间，确立了以服从权威和共和派的进步主义的十分特殊的混合为基础的政治传统和一整套职业规则。几十年来，教师的社会来源和招聘方式不断发生改变，促使反制度的倾向得以发展；中等教育的教师群体变成多数，整个教师阶层趋于女性化；教师的政治世界是围绕维护来源于第三共和国的各种制度，维护共和主义工会本身所构建的协会、互助会和合作社混合体而确立的，逐渐促使这些群体愈益突出，因为他们的主要组织保证了其代表性。在这里只能勾画出其大致线索的这种演变，使我们可以认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观察到的大部分认同性危机和工会代表性危机。国民教育联合会（FEN）的分裂即是最明显的例子；由此产生了全国教育独立工会联盟（UNSA-Éducation）^①和统一工联（FSU）^②。于是，原来独大的工会组织让位于越来越分割成片状的工会组织，它们掌握的地盘较少，适应着更加工具化的诉求。^③

实现学校“大众化”的条件，今天贯穿整个教育系统的不平等，使用者的某些形式的消费主义的加剧，教育系统内部和外部的隔离过程中对机构冲击所造成的那种混乱，^④凡此种种加

① 独立工会联盟的教育分会，这个新的跨行业组织由国民教育联合会中原来的多数派创建。

② 统一工联，是国民教育联合会中原来的少数派，在分裂后不久变成国民教育内部多数派。

③ 关于教师工会的变化，并见勒内·穆里奥《法国的工会组织》（René Mouriaux, *Le syndicalisme enseignant en France*, Paris, PUF), 1996。

④ 阿涅斯·范赞坦：《郊区学校——学习期限与市郊的隔离》（Agnès Van Zanten, *L'école de la périphérie. Scolarité et ségrégation en banlieue*, Paris, PUF), 2001；前引斯特法内·博德《80%参加中学毕业会考……然后呢？——学校民主化的后代》。

剧了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下显现的丧失职业魅力的倾向。一种更加敌视制度的精神状态逐渐传播开来，并出现在范围相当广泛的教学人员中间，对于这些人员，当权者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答案来解决他们教学的困难，反而推行一种把管理学生流量和一切问题交给“地方”承担放在优先地位的模式，并以此来代替真正的学校政策。1990年代末，新的学校政策的“经营”性质越来越得到肯定，贯穿于整个评估指标的发展，以及计划管理的使用和人员的等级制配备的强化与给予学校越来越重要的自主权之间的对接。但是，尽管教师群体的政治代表权依然成为疑问，同“学校的民主化”联系在一起的获得解放的理想持续得不到实现，这种对于“改革”越来越抵触的精神状态只是星星点点地以集体抗议的持久运动的形式表达出来，1998年的塞纳圣德尼省的罢工，1999年的加尔省和埃罗省的罢工则是例外。

事实上，工会组织在这几十年的过程中经历了活动和方针的部分重组。一方面，国民教育联合会的分裂开辟了新的空间，使得工会组织能够更符合几代新人的诉求，而且更开放地面对直接接触及职业活动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也更能接受个人诉求的多样性；既借鉴教师工会活动的传统形式（全国性的大示威游行，推选代表，向国会议员提交请愿书，等等），又采纳当时更具左倾思潮特点的实践活动形式（全体大会，长期罢工，灵活构建动员阶段的代表推选方式）。

颇为奇特的是，工会的碎片化反而促进了几十年来在国民教育联合会内部进行殊为激烈的权力斗争的各主要派别之间关系的化解。另一方面，整个组织难于提出真正能够替代国民教育部政策的方案，而是局限于选择接受新的国家思潮所定义的那种“现代性”或者维护传统的体制调节，从而使自己陷入工团式的退却姿态的牢笼而不能自拔。诸如一级组织与二级组织相互对立那样的工会阵地最持久的分裂，找到了新的活力，至少从表面上看加倍激化了把“教育派”与“共和派”对立起来

的舆论争论的分歧。就此观点而言，阿莱格尔担任国民教育部长期间是最为典型的，因为这个时期犹如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关于建立单一制公立中学的争论产生时的情形一样，再度激活了早期的联合和分裂的宿怨。^①

政治格局与代际格局

在这样的条件下，可否说出现了某种“民主化轻骑兵”造反？2002~2003年政府的提案在哪些方面具有引发这场空前未见的群众性抗议的性质？无论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运动末举行的非正式会谈之际，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员的言谈中最突出的一点，乃是认为自己亲历了国民团结系统，特别是教育公共服务团结系统的多种形式的、大规模的和全面的进攻。如果想揭示吕克·费里和让-皮埃尔·拉法兰政府引发的对于学校和社会政策的这种发自肺腑的厌弃所可能具有的最显著的特性，那么一方面必须把这种类型的局势视为部分地潜在的一般抵触情绪激化的一种经验状态，另一方面则不能忽视这种政策借以表达的各种符号的叠加或者积累的效应：缩减预算，取消教学辅助人员的计划，由于几周前采取的取消聘约措施而造成一些类别的教学人员身份的悬疑，关于退休制度法规的改变，等等。这些措施——毫无疑问，部分是政治行动日程表无意的安排——的结合，恰恰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教育界内部开始流行某些理论，把政府奉行的政策解释为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导下，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领域国际范围内趋于不稳定和解体化的总体计划的一种体现。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从2002年秋尚未出现分权化和退休金措施问题之时就开始发生作用的混合动力学，不仅方便了对于人员的集体反应的组织，而且促进了政治危机感的传播。与此

^① 见前引贝特朗·热艾《教育工会组织》。

同时，也使得此前带有左派色彩的关于全球化的解释——对于政府各种措施的最危言耸听的解释——具有了合理的色彩。赞成地方分权派还是中央集权派，做革新派还是保守派，这不再是当时的主要话题。另类世界主义运动、各个少数派工会和统一工联的研究所内部所提出的解释模式则相反，容许赋予已经采取的措施以某种意义。诚然，不能无视固有的政治状况对于各类人员和组织的影响，当权的右翼比此前的“左翼多数派”政府更加清晰地表明自己乞灵于“自由主义”；它不享有左派能够拥有的政治信誉；如果说学校政策总体上依然沿袭以往采取的措施的同样倾向，那么从预算的角度来看，则迥异于过去。不过，这只是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的一个侧面：使得政治权力与大多数人彻底对立的冲突的形成问题，学校斗争阵营在自由主义者与反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两极分化问题。可以看到，这种两极分化丝毫不比前几十年期间有所减缓。

然而，同样必须看到教师群体内部可以观察到的倾向的多样性，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前所未见的代际冲撞；对待战斗行动和学校制度本身的态度，代际分化事先早已显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就群体中的最年长的人员而言，既可以看到看重他们的职责的法定规范、对学校的大众化现象所导致的变革感到震惊、对近十年来贯穿国民教育的接二连三的改革计划多少有点失望的教师，也可以发现与此不同的少数派：这些人依然迷恋于教师尤其是工会的传统形式的战斗性，或者在近年来参与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更新的战斗主义。^①

① 关于后一个问题，参见托马斯·马蒂《图卢兹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成员的争斗精神——一个“地方委员会”中的教师倾向、自我修炼和正统精神》，提交2003年12月3-5日举行的“另类世界主义动员”讨论会的论文（Thomas Marty, 《Le militantisme intellectuel des membres d'ATTAC Toulouse. Disposition enseignante, autodidaxie et légitimité dans un "comité local"》，communication au colloque 《Les mobilisations altremondialistes》，3-5 décembre 2003）。

就比较年轻的教师而言，最常见的倾向是那种对体制本身更为敌视但并非必然进行挑战，从而比工会机构更加功利主义的精神状态。其中的少数派在国民教育联合会分裂而进行连续重组之际，投身于部分更新的工会运动。这种工会运动与从事点状的示威游行组织的较为传统的活动，以及业界内部的论战和为支持者提供咨询的活动结合了起来。最后，还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比较年轻的教师，他们虽然未必参与诸如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一类的运动的活动，但在另类世界主义思潮已经拥有一定反响的环境中，在政治上被社会化了。

这种类型的代际结合已经出现在1980年代末小学教师内部的“教员—校长”冲突的案例之中。^① 可以更加广泛地提出假设认为，在整个社会阵营范围内确实存在的东西，在一个职业界也是如此：总危机乃是部门危机同步化的产物。但应该指出的是另类世界主义观点在教育界内部的形成和传播所赖以表现的那种反馈现象。看来，通过群体中最年长的某些成员而渗入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内部的“教师的倾向”，促进了将各种具有较浓的“工会”和反制度色彩的观点结合起来的整体观念——构成较年轻教师动员背景观念的强化。这样的观念显然疏远工会运动，但并没有同它最终决裂，从而使比较年轻的教师获得了同工会运动进行或多或少保持一定距离的接触的第一次经验。

战斗性知识与实践活动的构成

因此，认识2003年春那样的运动的动力学，要求还原进入行动的模态以及对于现行政策的认识所固有的认知维度，以掌

^① 贝特朗·热艾：《社会空间与“协调”——1987年冬的小学教师运动》，载于《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3月第86-87期（Bertrand Geay, 《Espace social et “coordinations”, Le mouvement des instituteurs de l'hiver 1987》,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86-87, mars 1991），第2-24页。

握解释和集体反思的工具。但是，这仍然低估了这样一种动员的特殊逻辑，从而使人感到似乎问题只在于运动自身之外制定的政治模式如何传播。如果不想面对断言“运动”本身是自在的、通过其自身进行活动并从自身感知的民粹主义和实体论的观点作出退让，^① 那么就应该确立认为动员进行行动的感知方式本身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观念，应该了解一种政治话语是如何确立的，战斗活动是如何构成的：这样的活动既制约着动员扩展的方式，又决定着可能在动员之后阶段再度被激活的各种行动形式。也就是说，应该揭示如何在战斗行动之中并通过战斗行动来调整动员起来的群体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形形色色的期望与倾向。

这也许是把地区平等问题与否认办学的自由主义政策问题结合起来的运动的中心议题。“所有社区，所有地区都有同样的教育权利”，运动的这个主要口号实际上直接继承了塞纳圣德尼、加尔和埃罗诸省罢工的核心诉求：这些教师工作岗位奇缺的省份的罢工人员，按照作为2003年运动先导的行动逻辑，要求在拨款方面“赶上”其他地区。这里，工会的干预基本上在于普及推广以往年代在地方上经过验证的有效的口号和动员方式。这个口号通过工会的渠道从2003年3月开始传播，在整个5月和6月期间通过小册子、招贴画或者传单在广泛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宣传。它以初春开始印发的多份时局说明和3~6月在全国举行的数千场关于教育的当前情况的辩论和经验交流为支撑点，后来又通过多次国际组织关于学校政策的研讨会得到完善。这些研讨会特意呼吁统一工联研究所的成员和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的活动分子给予帮助。

如在前述地方斗争的案例中一样，这一诉求成为呼吁服务对象和舆论支持的行动——从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行

^① 参见前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理性——行动理论》，第53页。

动的基石。这个口号发挥了特殊的符号效应。它实际上代表了作为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公共服务概念的组成因素的平等原则的一种实现形式，既反映了教育条件的可比性，又涉及了知识民主化计划。但是，这是一种认识到学校大众化和教育系统缺乏调节后果的现实诉求，呼吁优先考虑大都市郊区的社区状况，同时又不否认公平对待全国所有地区的平等要求的现实诉求。它同反对知识商品化而将其放在首位的口号相配合，把另类世界主义的分析成果纳入工会动员的日程。

从另一个方向着眼，同样应该强调工会活动在既是最“统一的”又是站在运动最“前列”的城市和省份中所采取的形式。不单是由各种组织来指导运动，或者说不单是通过罢工委员会或者全体大会来普遍颠覆这些组织，而是我们亲眼目睹的一种探索性的调节方式。以这样的形象出现的多数派组织，推动了主要行动，同时采纳了来自游行示威结束前的全体大会、最前哨机构罢工委员会、工会或者其他部门罢工委员会的建议。因此，工会领袖首先是“联合的牵线人”或者“斡旋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领导人”；从机构之间的谈判舞台或游行示威结束时讲话的舞台，到进行实地经验检验的少数派行动舞台，他们不断奔走其间；他们相继成为跨行业工会联合会、教育工会联合会和“斗争中的各个部门”协调的受理者，从而使这些组织的存在合法化，尽管他们并不是它们的鼓动者，但也丝毫不想使它们回到破坏自身合法性的自组织状态。这种多方面协调的混合姿态，尤其体现在采纳了一系列建议并分发到每个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手中的行动日程表中。

2003年运动的另一个富有特色的实践活动是各个机构或者“斗争中的部门”的全体大会代表的交流，譬如说小学教员参加中学全体大会，中学教师在公立医院的信息交流会上发言，税务部门工会活动分子在一所大学的全体大会上作报告，等等。这些实践活动，成为集体行动代表性的基础，可以称之为“黏

合剂”，乃是传统的工会逻辑、1980年代末以“协调”为特点的各种动员形式与另类世界主义混合组织内部组织形式之间的杂交。这样的行动既不是“金字塔式”结构的表现，也不是“基层主义”的泛滥，而是被理解为按照一种斡旋逻辑把它们接合在一起的意愿的产物。实际上，斡旋逻辑对于最终选择这种保持等距离并进行修正的博弈的工会领袖来说，是一种取得合法性的特殊资源。

最后，应该阐释2003年5月和6月期间，尤其是在支持音乐会、研讨—辩论会或者游行示威过程中文艺活动之际进行的动员工作的“文化”维度。我们不想坚持说这是2003年运动的特有的做法。但是，这些活动发生在教师与研究人员、文物专家和间歇演艺人员的行动汇合的时刻，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殊意义。它们也是年青一代教师的“艺术”天赋、^①由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在“民众的教育”大旗下再度纳入日程的干预方式及最老资格的工会活动家们所维护的行动形式之间汇合的场地。因而，它们强化了组成一个“文化”阵线的感情，而这是扎根于“职场”多样性的全新的口号。这个运动的特殊色彩，以及对于通过这些实践活动表达的期望的坚持，正如许多教师参加间歇演艺人员的集会、拉扎克大集会或者2004年初《反对向良知挑战呼吁书》成功地联合发表所证明的那样，无疑同这一系列实践活动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从而使部分异质的各种倾向的趋同成为一种客观现实。

因此，政治观点和政治划分的原则，以及2003年春进程中付诸实践的各种动员形式，可以同公共教育界的各个不同群体的倾向和他们的表达空间的历史构成以及随之出现的一系列实践的和符号的活动联系起来。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来理解这样一个运动的效果。根据它所采取的姿态，实际上可以强调此时

^① 参见前引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基亚佩洛《资本主义新精神》。

已经跨越社会冲突“关口”或者以罢工作为原动力的教育界几代新人的政治社会化。但是，同样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退休金问题上遭遇失败之后的退却的结果，在冲突最剧烈的部门中的张力加剧和工会组织率的停滞。

全球政治环境和这场动员产生的特殊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何教育界内部的政治生活又退回到特别沉闷的状态，但这不能使人忘记，群体的政治记忆依然以实践活动、行动形式和动员原则的形态呈现出来，将在现实中重新被激活和发生作用，凡此种尽管还没有起到对群体的社会生活的日常组织进行普遍调节的作用，却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组织集体行动。因此，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发生的教师职业结构的变化依然在继续，从而至少使他们对于乞灵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新的学校政策的集体反应问题依然保持开放。这里，正在发生作用的不仅是这些职业的政治传统和平等原则在其中所占有的地位的革新，而且还有他们在反对当代政治经济统治斗争中构建跨行业团结的能力。

阶级斗争的
全球化？

第四部分

Part 4

第十五章

美国工人阶级的重组？

玛丽安娜·德布齐

当前，由于工会运动的危机，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美国劳联—产联，AFL-CIO）内部正在展开十分激烈的争论。这场危机同其他国家也能见到的一些现象相关：产业转化，全球化，工厂外迁，技术变革，经济第三产业，失业，就业临时化，等等；但也同美国特有的一些因素相关：工会的作用和运转，劳动法规的制定，就业人口的构成，政治环境，等等。尽管因服务业雇员工会（SEIU）的约翰·斯威尼于1995年当选劳联—产联主席而燃起了种种希望，但工会运动的局面却每况愈下：会员锐减（只占雇佣劳动者总数的13%，私营部门雇佣劳动者总数的9%），会员可享受——尽管变化不定——的社会福利（医疗和社会保险，退休金，等等）荡然无存或者缩减。诸多因素促使大量工会会员对于工会运动的方向及其领导人优先选择的目标提出疑问。^①

争论主要围绕下列问题：“服务型工联主义”（service unionism），即类似于保险公司提供服务的工会主导模式，是否

^① 笔者在文中引用了发表在2003年11~12月号《运动》杂志上的《美国工会向何处去？》（《Où en est le mouvement syndical aux États-Unis?》，paru dans *Mouvements*, novembre-décembre, 2003）一文资料。

应该被“社会运动工联主义”(social movement unionism),即不是单纯以集体谈判为中心,而是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工会组织所取代?这种工会组织应首先关心没有组织起来的女工和移民等人员,这些人集中于服务业——其中3/4是“工人阶级”(working-class)岗位——的待遇最差的岗位。在生产部门中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受基层工人委派的民主工会,而今天大多数工会的运作是官僚式的和等级制的。所有的工会不再各自为政,而是谋求多种形式的跨工会合作,以及同社区、宗教团体和各种不同社团的合作。这样的工会将更富有斗争性和战斗性。诚然,传统的工会引导了极其艰难的1980年代及后来的一些斗争。为了唤醒大家的记忆,我们在此要重新提及1983年“灰狗”长途客运公司雇员罢工,1985~1986年荷美尔肉类工业公司工厂工人罢工,1989年皮茨顿矿工罢工,1992年履带拖拉机公司罢工,1997年联邦快递公司(UPS)罢工,2002年西海岸码头工人罢工。但是,这些罢工很少能取得胜利,不足以阻止大量会员提出种种疑问。^①

早在争论没有公开和尖锐爆发之前,无论是加入工会还是没有入会的男女工人从他们的切身感受出发,对美国传统工会的组织形式和方针提出了质疑。其原因是,同流行的观念相反,美国的工人并非对近几十年来遭受的多方面的打击逆来顺受。多个部门中的不同团体——尽管是少数派——面对就业变化的后果和老板的各种战略,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坚韧性、斗争性和创造性,尤其是感到最不稳定和运气最差的妇女和移民。他们往往得到工人阶级之外的社团的支持。他们寻求能够适应劳工界最近演变的新的组织方式,但也不完全抛弃某些传统的行动形式。

^① 纳尔逊·利希滕斯坦:《联盟现状》(Nelson Lichtenstein, *State of Un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工会化运动

近年来工会运动首先关注的要务之一就是即使不能解决,也要刹住会员急剧下降的势头。由此产生了作出更大的努力来组织新的工人群众工会的愿望。工会运动想继续生存,就必须促使服务业的工人群众组织工会,他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移民——1965年法令之后合法或者非法(没有合法证件)进入美国的拉丁美洲人(墨西哥人,危地马拉人,萨尔瓦多人,多米尼加人等)和亚洲人(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老挝人,柬埔寨人等)。试举两个典型例证:在硅谷组装或者搬运电脑的女工主要是拉美人、越南人和菲律宾人,最近又加上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肉类工业中,大部分工人是墨西哥人,加上少量中美洲人和最近从波西尼亚、越南和苏丹逃亡出来的难民。在这两个例证中,许多人没有合法证件。

原籍各异的服务业工人所做的工种也是最低下的:佣人,清洁工和物业维修工(janitors),医院、养老院和家庭的护工,餐厅和小旅馆的杂工,等等。在生产部门,移民多数在制衣、农业食品等轻工业和建筑业打工。他们或者毋宁说是她们,在新技术部门从事制造和组装电脑或者搬运和包装电脑工作的人数居多。^①在所有这些部门中,15%~20%的员工是临时工或者钟点工。

在1990年代的工会化大运动中,我们要提到肯·洛德取材

^① 艾琳·阿佩尔鲍姆、安妮特·伯恩哈特、理查德·J. 墨南主编《低工资美国》(Eileen Appelbaum, Annette Bernhardt, Richard J. Murnane eds., *Low-Wage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3; 格伦娜·马修斯:《硅谷妇女与加利福尼亚梦》(Glenna Matthews, *Silicon Valley Women and the California Drea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作为他的电影《面包与玫瑰》主题的运动：洛杉矶物业维修工的斗争。用约翰·斯威尼的话来说，1985年由服务业雇员工会发起的“为物业维修工讨还正义”运动，把物业维修工人的斗争转变为“一场争取民权的运动和文化十字军运动”。洛杉矶市中心的保洁和维修人员组织工会的运动标志着1990年的一个转折，当时一家大保洁公司的200名物业维修工开始罢工。他们组织了一场群众游行，而警察的残酷镇压使他们声名大噪。服务业雇员工会的介入和公众的支持帮助罢工人员获得了一份覆盖南加利福尼亚的将近2500名物业维修工的集体合同。1995年，当地的服务业雇员工会支部组织的罢工和民事抗辩策略的威胁，迫使七家最大的保洁公司和房产主协会对工会的几乎所有要求作出让步，其中包括确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和适当的社会和医疗保险。同一年，得到服务业雇员工会支持的华盛顿特区中心物业维修工也取得了一场重大的胜利。^①2000年，得到服务业雇员工会和卡车司机工会支持的8500名物业维修工再次举行为期三周的罢工，争取在新的集体合同中增加工资，并得到了满足。

物业维修工战略中的新因素则是决定争取全行业组织工会，亦即争取签订整个部门合同，而不是谋求通过逐个公司的选举并获得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的批准而使工会得到承认。这也意味着没有遵循“新政”所规定的程序，而是通过争取物业维修工权利来缔造一个社会运动。这个运动汲取了争取民权运动的启示，必然诉诸民事抗辩策略，也就是说不服从工会运动习以为常的法律程序。他们使自己的斗争转变为一场争取正义的十字军运动，而不仅仅是增加工资的请愿行动。他们以墨西哥裔的社团为依靠，力求赢得舆论的支持。

① 鲁思·米尔克曼主编《组织起来的移民——对于当代加利福尼亚的挑战》（Ruth Milkman ed., *Organizing Immigrants. The Challenge for Contemporary California*,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80~1990年代组织工会运动的其他顽强而富有战斗性的事例，还见诸拉斯维加斯餐饮和旅馆员工——男女服务员，厨师，洗碗工，收拾大饭店125000个房间的女工，赌场工作人员，脱衣舞舞女等——的斗争。以罢工、示威游行、大进军为标志的他们争取建立工会的斗争持续多年，显示出这个高等娱乐场所的工人的战斗性和团结力。这既仰赖于基层的投入，又得益于加入饭店雇员和餐饮业雇员联合会的厨工工会的坚忍不拔的积极活动。^① 对于争取没有建立工会的部门的支持者的关注，在这期间也见诸针对耶鲁和哈佛等大学的办公室人员的具有独创风格的某些运动，这两个精英堡垒尽管对于工会颇感厌恶，但对于工会开发其人员的能力并非同样深恶痛绝。

要把新的群体组织进工会，就必须确立新的组织方式，因为在群集生产中进行的集体谈判的结构和程序未必适用于服务业和新技术部门的作坊式生产的大多数工人的新情况和岗位的碎片化。

工人中心

看来更适应移民需要的一种组织是“工人中心”，它们正是在劳联—产联对非熟练移民工人组织工会不感任何兴趣之时，出现在“社团”群中。多年来，它们得到了各种社团及一些工会的支持。例如：1979年由制衣厂华裔工人创建于纽约的“华人职员和工人联合会”（CSWA），1981年由墨西哥—美国和墨西哥裔工人创建于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女工联合会”，1983年由韩裔工人创建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亚洲移民妇女协进会（AIWA），1990年当李维斯牛仔裤工厂关闭时由墨西哥裔女工在圣安东尼奥创建的“合力会”，1992年创建于洛杉矶把餐馆

^① 哈尔·罗思曼、迈克·戴维斯主编《光辉下的坚毅》（Hal Rothman, Mike Davis eds., *The Grit Beneath the Glitt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和电子业女工重新组织起来的“韩裔移民工人协进会”(KIWA),等等。还可以列举“泰国人社区中心”(泰国裔女工组织)、“菲律宾工人中心”及其他组织。

这些组织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由在“血汗工厂”打工的移民妇女创建,而且因常常是大获全胜的斗争而声名鹊起:1990年初抵制李维斯牛仔裤公司,以争取圣安东尼奥工厂关闭后的赔偿;1994年要求杰茜卡·麦克林托克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的斗争和1996年追究该公司责任的斗争;1995年维护被非法禁闭在加利福尼亚埃尔蒙德的一幢围着铁丝网的建筑中的泰国裔和拉美裔女工权利的斗争。这些妇女在服务业(保洁公司、餐馆)或者生产(制衣厂、电子元件厂)的特定部门工作,而且属于同一个族群。她们同宗教、学生和女权团体合作。这些团体的推动者往往在他们的祖国或者其他地方有过职业经验或者斗争经验。她们不能从事集体谈判,但为改善自己的劳动条件、捍卫自己的权利和纠正明显的不公正而奋起斗争。

工人中心也是社会救助中心,通过“食品银行”和合作社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女工,开办英语课程和关于她们的权利的知识讲座,努力赋予她们以保护自己和团结成整体的武器。但是,首要的是团结力和战斗性:动员女工,促使她们自己组织斗争并独立领导斗争。她们的行动通常是局部和短期的,但有时也走向比较全局性的行动:争取地方和全国劳动保护立法,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斗争。她们同创建于1998年、旨在反对美国和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剥削的学生运动——“反对血汗工厂联合会”联手工作。“反对血汗工厂联合会”得到纺织工会联合会的财政支持,帮助女工并促使美国消费者了解她们的工作状况。^①学生们还为争取他们所在大学支付给在校园里工作的打

^① 莉萨·费瑟斯顿:《学生反对血汗工厂》(Liza Featherstone,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 London, Verso), 2002。

扫清洁人员和餐厅员工以“体面的工资”而斗争，这些人员通常是移民。^①

加利福尼亚——社会实验场

近年来，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多，加利福尼亚似乎变成新的组织和斗争形式制订的一个社会实验室。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为物业维修工讨还正义”的工会化运动之外，我们还要着重指出1990年代下半叶在洛杉矶地区进行的值得关注的跨工会合作的意图。合作的目的是把工作集中在大量轻工业企业、家具、食品包装、制衣等工厂的“阿拉梅达峡谷”的工人组织进工会。在这里工作的70万工人中间，一半以上是拉美和亚洲移民。他们的工资最低，工作条件十分危险，因此工会活动分子和战斗社团试图把这些处于最弱势的工人组织进工会。

在“洛杉矶建设规划”（LAMAP）中，多个工会进行协作，并同关注劳工和城市规划问题的移民群体、宗教团契和大学研究机构的代表合作，提供了关于产业和企业结构以及城市地理的准确信息。必须找到不同于工会传统遵循的程序的其他进路。1994年提出的规划描绘了美好的前景，但随后在1997年由于时局和结构的原因被束之高阁。工会的介入不够持久，运动的财源得不到稳固保障。

与这个规划平行，在洛杉矶劳工—社区战略中心的倡议下开展了一场革新运动。运动的宗旨在于保障工人能够享有作为上班必要条件的适合的公共交通。多年来，“公交车乘客联盟”（BRU）展开了一场公民十字军运动，以改善乘坐洛杉矶贫民区公交车乘客的命运，这些乘客是公共交通管理部门的种族主义

^① 罗伯特·波林、斯蒂芬妮·卢斯：《体面的工资》（Robert Pollin, Stéphanie Luce, *The Living Wag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和歧视政策的受害者。^① 联邦法官最终责令洛杉矶市交通管理局购买 248 辆无污染新公交车来改善服务，这个靠公共交通上班的工人的多种族组织因此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把法律行动与群众动员结合起来的一个战斗运动的胜利。一方面，“公交车乘客联盟”同一个宗教团契和“韩裔移民工人协进会”合作，经过三年的实地调查和观察，以 35 万乘客——大多是穷人和有色人种——的名义提出了控告洛杉矶县城市交通局（MTA）的集体起诉书，指责公交系统具有种族主义的隔离和不平等性：对于占乘客总数 94% 的有色人种居住的贫民区，城市交通局只拨给了 1/3 的资源，而对于只占乘客总数 6% 的白人居住的富人区则拨给了 70% 的资源。领导劳工—社区战略中心的埃里克·曼把这种法律行动看做动员和引导乘客的手段。这个行动与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和集会等相配合，把公交车变成为战斗的场地。结果是从城市交通局那里获得了一项协议，承诺两年期间冻结票价，增加新车辆并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以在五年内改善现状。

新技术部门同样存在没有组织进工会和没有合法身份的工人，其中大多是妇女。她们工资待遇恶劣，缺乏预防所使用的有毒化学产品的灾难性后果的劳动保护，从事着电脑的生产、组装和包装。一些人在公寓、家庭工作，按时付酬，挣的更少。尽管做了许多尝试，但要把这个部门的任何一类雇员组织进工会都极其困难，原因是这个部门中与工会势不两立的态度从来没有松动过。劳联—产联曾经致力于解决占硅谷信息产业劳工 25% ~ 40% 的临时工问题。它建立了“工作伙伴联谊会”——

^① 罗宾·D. G. 凯利：《新城市工人阶级与组织起来的劳工》，载于《新劳工论坛》，1997 年秋季号（Robin D. G. Kelley, 《The New Urban Working Class and Organized Labor》, *New Labor forum*, automne 1997），第 14 ~ 18 页；蒂姆·康韦尔：《民众力量登上洛杉矶巴士》，载于 1999 年 10 月 17 日《独立报》（伦敦）第 23 版（Tim Cornwell, 《People Power Gets Aboard Los Angeles Buses》, *The Independent*, Londres, 17 octobre 1999, p. 23）。

一个作为职业介绍机构运作的组织。这个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说道：“我们为硅谷的企业提供它们按照市场价格所要求的雇员”，与赚取大量回扣的代理公司不同。“‘工作伙伴联谊会’的创始观念是要回收这部分钱，归还受雇人员。”“作为非营利性组织，我们不是以直接工资的形式把回收的钱分配给受雇人员，而是为他们开辟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医疗、退休金等）的通道……我们还用回收的钱来组织培训课程。”^①

联 盟

近 30 年来的许多斗争是由某些联盟引导的。这些斗争包含了社区、宗教、女权主义、生态等不同团体的合作，不论工会是否参与。一些横向的网络替代了垄断着决策大权的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工会组织。自 1970 年代末开始，“三州钢铁会议”制订了一个关于处于危机中的三个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西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工业的大胆而富有独创性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指导者是不倦的活动家、由历史学家改行而成为劳工问题律师的斯托顿·林德。一些钢铁专家、知识分子和宗教活动家进行了合作。由于银行和老板的反对以及缺乏联邦的支持，该计划无疾而终。1980 年代，随着一些工会活动家推动的“公正就业”运动的出现，各种联盟如雨后春笋般形成，联合了诸多社区、女权主义、生态团体和消费者组织。在这些社团中，有些曾经支持物业维修工人，帮助他们建立罢工纠察队、集会动员、组织示威游行和募捐等。^②

① 见《布律诺·奥当对工会活动家范帕里什的采访录》，载于 2001 年 6 月 1 日《人道报》（《Interview du syndicaliste Van Parish par Bruno Odent》，*L'Humanité*，1^{er} juin 2001）。

② 保罗·比勒：《保护事业》（Paul Buhle，*Taking Care of Busines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9，第 259 页。

在巴尔的摩，“争取改革现状社区组织联盟”（ACORN）自1970年起保卫着贫穷社区的居民，努力建立由社区居民自己管理的多种族的地方组织，以在公众生活中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组织同一个宗教团契——“争取发展领导才能巴尔的摩人联合会”以及地区行业雇员工会——“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AFSCME）共同合作，推动“争取体面工资运动”（campaign for a living wage）。^①也就是说向各个城市的市政当局施加压力，促使它们要求想要获得合同（例如在建筑方面）的企业承诺支付给它们的雇员以明显高于最低工资的薪金。一些联盟成功地促使诸如纽约、洛杉矶、波士顿、密尔沃基、明尼阿波利斯和波特兰等大都市通过了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尽管许多工人事实上从中得益有限，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进步。

制衣业的华裔女工得到了“女工联合会联盟”（CLUW）的工会女活动家组织、亚太美国劳工联合会（APALA）和华人职员以及工人联合会的社区组织的帮助。^②抵制恶劣对待其员工的杰茜卡·麦克林托克制衣公司的行动是由纺织和制衣工人工会，亚太美国劳工联合会、亚洲移民妇女协进会、平等权利协进会等社团，一些劳工活动中心（各城市的工会中心），各种不同的地方联合会和致力于关注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保障的组织联手引导的。^③

这些联盟在墨西哥边界外地区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基拉多拉斯的女工由于工会会员和属于工会、宗教、生态等不同组织的圣地亚哥活动分子的联合行动，组织了起来，进行自卫。同

① 斯坦利·阿罗诺维茨：《来自古代的骨灰》（Stanley Aronowitz, *From the Ashes of the O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98，第130页。

② 包小兰：《托住多半个天》（Bao Xiaolan, *Holding More than Half the Sk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1，第11-12页。

③ 凯特·布隆芬布伦纳等主编《组织起来走向胜利》（Kate Bronfenbrenner et al. eds., *Organizing to W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8，第75-77页。

样，通用食品公司伯兹艾分公司的个人得到了马基拉多拉斯的“争取正义联盟”及美国和墨西哥工会的帮助。^①

反对大公司运动

在不同于传统工会活动的斗争形式中间，不能不提到反对大公司运动（Corporate Campaigns）。它们始于1970年代，其创始者为雷·罗杰斯：当时暴发了反对美国南部的斯蒂文斯纺织公司的极其激烈的冲突，原因是这家公司调动一切手段，甚至不惜通过非法途径，拒绝承认工会代表公司员工的权利。随后，反对大公司运动的策略被用来反对贝弗利保健公司、荷美尔肉食公司和其他大企业。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呢？这种策略是在对企业的运转、企业同银行的联系、企业的债权人和股东以及董事会进行深刻调查之后，调整政治压力和股东的干预。也就是说找准能够对之施加压力的公司的薄弱环节，这些环节可能关乎企业的管理或者其领导者活动的道德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企业的不合法行为、机能障碍甚至营私舞弊，以及对待工人或者雇员的粗暴方式和践踏劳工权利的行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置雇主于无法面对股东、政治家和舆论的难堪境地，迫使其作出让步。此外，示威游行，散发传单甚至在股东大会上发言，也许还有消费者的抵制，则作为运动的配合。这种类型的运动主要是在公司拒绝同员工进行任何谈判时进行，因为著名的公司无不害怕看到自己的形象受损。^②

① 戴维·培根：《北美自由协定的孩子们》（David Bacon, *The Children of NAFT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第155~156页。

② 迈克尔·耶茨：《联合行动的原因》（Michael Yates, *Why Unions Mat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8, 第62页；前引鲁思·米尔克曼《组织起来的移民——对于当代加利福尼亚的挑战》，第84页。

什么样的工人意识？

同认识工人的主观意识和他们所具有的信念相比，描述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客观条件以及他们为了改变这样的条件而进行的斗争无疑更为容易。怎样透过这些斗争来审视进行斗争的男性和女性工人们的心态？如果用近五十年来大部分社会科学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观点来对此进行描述，那么美国的工人似乎成了变色龙，美国的工人阶级据说是一个正在衰落的阶级。在1950年代，工人阶级是不可见的阶级，因为它是正在形成中的中产阶级。有人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工人已经被整合，完全内化了中产阶级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到了1950年代末，工人乃至所有的大众群体重又变得可见了，政治学家们断言他们具有一种“独断的人格”（这个术语来源于西奥多·阿多诺的名著）。一旦他们能够组织群众运动或者通过集体行动来进行表达，就会以不民主甚至危及民主的方式行事。精英们则是民主价值的保障者。

稍后，观点陡变。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有人又大力鼓吹反对工会领导人的基层运动。工人的造反被解释为劳动者的民主渴望的表现。令人普遍感到吃惊的是，工人由“独断者”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和反独断派。同样是在此期间，反对劳动伦理学的造反，即名噪一时的所谓“蓝领变蓝”行动，被看做是当时的学生“运动”的一个副产品，是反文化和学生抗议影响的产物。除了几个思想不严谨的“激进分子”之外，并未提出这种态度的改变同资本主义的演变是否有关，是不是对于剥削强化的一种抵抗形式这一问题。到了1980年代，工人阶级又获得了一种新的不可见性。很难说为什么工人阶级大多丧失了以前赋予它的中产阶级的这种潜在本质。因此，工人阶级重又跌入社会黑洞之中：媒体不再谈论，噤若寒蝉。但是，这难道不是

在里根政府想方设法力求颠覆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否定其斗争成果的时代，工人阶级依然存在的最好的证明吗？

继这一连串的工人阶级形象之后，又有人把工人阶级描绘成一个正在陷落的阶级。这个阶级重新又变成不可见的阶级，但这一次是因为工人的堡垒沦陷了：各种矿山、宾夕法尼亚的炼钢厂相继关门，汽车制造厂裁员过半，底特律变成一座受灾最重的城市，到处都有企业外迁。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不再是以往的样子。奇怪的是，《纽约时报》今天重又发现了阶级在美国社会中的存在，连篇累牍发表相关的文章。其中心思想是各阶级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因为所有的阶级都在进行消费，所有的阶级都有某些雷同的生活方式，所有的阶级都信奉若干相同的宗教，如此等等。然而，各种不平等鸿沟日趋扩大，各个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显地存在着。它们被如此长期地加以否认，现在却又变得既可见又不可见。^① 工人阶级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但因此就消失了吗？上述学校斗争足以对这种说法提出质疑，尽管它们表明工人阶级经历了挫折和变化，并因社会背景改变而重组。服务业的待遇恶劣的非熟练雇员和工人，换句话说即“劳工阶级”，构成了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因此它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

虽然不能信赖大部分社会科学分析传统上所提供的工人阶级的观念，但不能因此而局限于把来源于欧洲左翼政治传统的一个概念框框套到美国工人头上。纵观大量的调查、访谈和工人的亲口证词，可以在他们大多数人身上发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对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无条件的拥护，深刻植根于“美国梦”的信念，对于个人主义万能的迷信，以及无所不在的

① 詹尼·斯科特、戴维·伦哈特：《美国的天梯很难爬》，载于2005年5月15日《纽约时报》（Janny Scott, David Leonhardt, 《American Ladder is Tough to Climb》, *New York Times*, 15 mai 2005）；并见2005年5月16、23、24、30日的其他文章。

通过工作取得成功的神话。^①

这一整套信念之所以长盛不衰，则是得益于那种把种种不平等说成是与神圣的“机会平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期的所谓共识文化，其他一切政治选择都被妖魔化。正如乔治·布什的竞选所证明的那样，1960年代以来在美国顽固地确立的保守主义氛围笼罩着所有阶级。有人说这是土生土长的道德主义和宗教信仰的遗产，也有人说这是几十年冷战和共和党人主政20年的产物。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还应当提到刻毒的反共主义的影响，作为这种反共主义的体现则是二战后对于进步的工会运动和激进分子的清洗，工会运动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无条件支持，以及1960年代的抗议运动之后的“反冲”(backlash)。另一些分析则更加直截了当地强调对于工人阶级影响尤大的三个重大变化的根本意义：争取民权运动及随后展开的给黑人和少数人种就业优惠待遇的“正面区别”运动(affirmative action)，1965年移民法后新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以及触及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道德革命(女权主义、性解放)。

毫无疑问，工会运动全盘接受的否定美国社会存在阶级的学说，^②促使许多工人丧失了对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了解。诚然，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通过许多机会表明了自己奋起战斗和进行十分艰苦和长期的斗争的能力。

莉莲·鲁宾是对美国工人家庭进行过大量调查并对许多家庭做过访谈的一位社会学家，她认为“工人对于自己的面貌认

① 珍妮弗·L·霍克希尔德：《何谓公平？》(Jennifer L. Hochschild, *What's Fair?*,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第186页。

② 1948年，在美国最大的罢工运动爆发阶段，产联主席菲利普·默里断言危机将被克服，因为据他说“在这个国家没有阶级”，“在这里，我们所有人都是劳动者”。转引自马戈·安德森《20世纪美国的阶级语言》，载于《社会科学史》1988年冬季号(Margo Anderson, *The Language of Class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Social Science History*, winter 1988), 第349页。

识模糊”。这位女社会学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对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否定，产生了一种混乱和矛盾的社会认同性”，由此造成工人阶级的成员对他们的社会身份感到焦虑，从而“减弱了他们集合起来为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能力”。^① 她同样还强调，由于政治环境和缺乏完整的替代性计划的设想，他们没有可以表达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话语。最后，她追溯了三十年以来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她的追溯与奥利维耶·施瓦茨、斯特法内·博德和米歇尔·皮亚卢的著述有着时间上的差距，但同这些劳动社会学专家在法国所观察到的感受——工人丧失了博爱精神——不无共同之处。^② 在一个由于切身感受到经济压力而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时代，美国和法国的工人产生了工人形象贬值的感情。体力劳动丧失了尊严，对于工人阶级价值的尊重被一笔勾销，工人的社会地位因此下降。美国的黑人和少数人种以及法国的移民和流浪者成为其主要牺牲品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政策的抬头，将工人阶级贬入了社会“无主地”（no man's land）。在法国，这样的感情促使民族阵线的得票率大增。在美国，这种“反冲”则体现为对于优先考虑到黑人和少数人种利益的种种措施的敌视，以及工人对于民主党的某种不满。在大西洋两岸，工人深感失宠于以往的政治盟友，遭到遗弃。

① 莉莲·鲁宾：《家庭价值与不可见的工人阶级》，载于斯蒂文·弗雷泽、乔舒亚·B. 弗里曼主编《蛮横无理的民主》（Lillian Rubin, 《Family Values and the Invisible Working Class》, dans Steven Fraser, Joshua B. Freeman ed., *Audacious Democra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7, 第40~41页。

② 见奥利维耶·施瓦茨《工人阶级变成了什么?》，载于2001年5月2日《人道报》第8~9版（Olivier Schwartz, 《Qu'est devenue la classe ouvrière?》, *L'Humanité*, 2 mai 2001, pp. 8-9）；奥利维耶·施瓦茨、斯特法内·博德、米歇尔·皮亚卢：《工人问题逐步退出舆论》，载于2001年3月6日第16版《世界报》（Olivier Schwartz, Stéphane Beaud, Michel Pialoux, 《La question ouvrière a été progressivement refoulée de l'opinion》, *Le Monde*, 6 mars 2001, p. 16）；并见让·卢日金内《工人阶级还是工薪阶层?》，载于2001年6月14日《人道报》第26~27版（Jean Lojkine, 《Classe ouvrière ou salariat?》, *L'Humanité*, 14 juin 2001, pp. 26-27）。

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对一家石油冶炼厂进行的十分有趣的调查报告的作者戴维·霍尔，也谈到了这些蓝领的“分裂的”工人意识。像其他社会学家一样，戴维·霍尔认为他们的阶级意识只在工作场所才表现出来，因为这种意识首先是以职业为基础的（occupationally-based）。无论是在他们自己中间，还是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及同他们的白人邻居相处中间，这些属于待遇最优厚者之列的熟练工人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就政治观点而言，他们感到自己是普通公民，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是同精英——不论是实业界、政府还是大学的精英——相对立的，而不是因为拥护某个党派或者某种抗议性意识形态。^① 这些工人今天只代表少数，诚然具有重要地位，但部分地也感到岌岌可危。

更加普遍地说，美国工人今天意识到作为他们的情况特点的种种不利条件。他们并非盲目，因为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那样，一半的居民长期以来认为“政府是由几家只顾它们自身利益的大公司指挥的”。^② 但这未必是比他们处于较低地位的人们所洞察到的状况。许多人依然认为贫困源于个人的失败，享受“福利”的人不值得帮助。如果说他们很敏于批判高层人物的傲慢自大，那么也不吝于谴责穷人，而且把帮助穷人的责任推给社会。^③

颇为荒谬的是，随着经济状况的下降，他们的不满和怨言不是针对上层，而是对下。近年来，这些蓝领不再发挥最前列

① 见2001年5月14日《民族报》第26版（*The Nation*, 14 mai 2001, p. 26）。

② 诺姆·乔姆斯基：《美国民主如何再次取得了胜利》，载于2001年1月14日《独立报》（伦敦）第25版（Noam Chomsky, 《How US Democracy Triumphed Again》, *The Independent*, Londres, 14 janvier 2001, p. 25）。

③ 莉莲·鲁宾：《处于短路的家庭》（Lillian Rubin, *Families on the Fault Line*, New York, Harper's Collins），1994，第197～198页；米谢勒·拉蒙：《工人的尊严——法国和美国的排外、种族、阶级和移民》（Michèle Lamont, *La dignité des travailleurs. Exclusion, race, classe et immigration en France et aux États-Unis*, Paris,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2002，第75、88、116页。

的战斗者的作用。最有斗争性的是移民男女工人和所谓少数人种群体。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受剥削最深重和最困苦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在祖国具有某种政治经验，或者他们也许毕竟过于相信美国民主的功效。不管怎样，他们为争取他们不能享有的权利而斗争。一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深刻感情促进着他们。他们不仅是为了工资而斗争，而且也是为了得到尊重而战。他们的运动是一个“争取正义的十字军”运动。在支持他们的宗教、工会和其他外部团体的帮助下，他们借用了争取民权运动的某些策略，毫不迟疑地使用了民事不服从方式，亦即故意违反法律，通过呼吁工人争取自己的尊严待遇来动员工人。在对他们实施镇压之时，他们求助于舆论。

结 论

近年来的社会斗争及随之产生的新组织形式说明了什么？工人阶级正在经历解体和重组的双重过程。尚未完全消失的产业工人不再是主角。各个民众阶层是由异质的群体组成的，而所有的群体无不贯穿着同种族、出身、职业等相联系的多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美国人与移民区分开来，但这种差异掩盖着其他的差异：性别，肤色，有工作还是失业，如此等等。即使在移民内部，民族和身份的差异也是多方面的。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些人具有合法的身份，而另一些人没有合法证件。职业（occupations）也贯穿着种种差异和等级：工作的性别分工，有没有技术，全日制就业还是临时工或者钟点工（大多是女性）。就产业部门的就业而言，外包制损害了互助团结。在服务部门，岗位的分散加剧了工人——不论是男工还是女工——的原子化。

然而各种斗争证明，特别是在移民和妇女中间，有些群体极其富有斗争性和战斗性，所以一些工会领导人及其盟友把工

会运动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例如，在1990年代，有的新闻记者为工会在服务业、办公室和政府雇员中间取得的成功欢呼。^① 劳联—产联的一位领导人宣称“移民是我们的未来”，^② 而一位女领导人则说“妇女是工会运动的未来”。^③

在像今天那样不利的环境中，这些群体不可能回应寄托在他们身上的所有希望，但他们表明工会运动的削弱并未导致工人动员力量的枯竭。他们所进行的各种斗争证明可以确立使人看到希望的新的组织和斗争形式，只要所有的群体不作茧自缚，把自己封闭在他们原生的社会中间。各个民众阶级的重组催生了新的组织（例如：工人中心），新的网络和新的联盟（组合），新的互助团结（三州钢铁会议，洛杉矶建设规划，公交车乘客联盟，马基多拉斯争取正义联盟，等等）。这些斗争是由基层引导的地方性斗争，依然是分散的。它们的分量还不足以构成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它们加强了否定老板万能的独断权力的抗议阵线，孕育了工会领导层与基层之间的争论，开辟了给社会运动注入新的生命力的途径。

① 约翰·B. 朱迪斯：《劳工能够逆转吗？》，载于1994年5月23日《新共和报》第25版（John B. Judis, 《Can Labor Come Back?》, *The New Republic*, 23 mai 1994, p. 25）。

② 转引自戴维·培根《洛杉矶劳工——新的战斗性》，载于1995年2月25日《民族报》第276版（Cité dans David Bacon, 《Los Angeles Labor. A New Militancy》, *The Nation*, 25 février 1995, p. 276）。

③ 这是载于前引斯蒂文·弗雷泽、乔舒亚·B. 弗里曼主编《蛮横无理的民主》一书中的卡伦·努斯鲍姆的一篇文章的标题。

第十六章

全球化与两性社会关系： 南—北视角

埃莱娜·伊拉塔

导 言

两性劳动分工的永恒性和多变性在我们以前的著作中曾经进行过分析。^① 我们在这里想从经验研究的成果出发，探讨今天在雇佣劳动界和两性社会关系因全球化冲击而发生深刻改变的环境下，有哪些东西正处于变化之中，又有哪些东西依然保持不变。

我们从男—女关系的进路和南—北视角出发，首先对于往往作为“杂物筐”出现的全球化概念进行考察。我们既把它视

① 埃莱娜·伊拉塔：《性别社会关系与劳动分工——对于劳动概念讨论的看法》，载于雅克·比岱、雅克·特谢尔主编《劳动危机》（Helena Hirata, 《Rapports sociaux de sexe et division du travail. Contribution à la discussion sur le concept du travail》, dans Jacques Bidet, Jacques Texier dir., *La crise du travail*, Paris, PUF), 1995；埃莱娜·伊拉塔、达妮埃勒·凯尔戈阿：《经过修正的两性社会劳动分工》，载于玛格丽特·马卢瓦尼主编《不平等的新分界线——劳力市场上的男人与女人》（Helena Hirata, Danièle Kergoat, 《La division sexuelle du travail revisitée》, dans Margaret Maruani dir., *Les Nouvelles frontières de l'inégalité. Hommes et femmes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8。

为一个分析范畴，同时批判它被当作规范模式的使用。^① 在当前的争论中，全球化取代了发展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地位，但依然作为一个有待提炼的概念出现，尤其是从全球化生产对于劳动和就业的差别后果来考虑的话。因此，妇女就业在国际范围内的深刻变化，成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很好的分析仪。国内市场对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建立的日益增强的依存，尽管与同质化的力量相悖，但不仅没有消除多样性，而且还加剧了男—女劳动、南—北劳动、就业和活动状况的异质性。如果说男性和女性轨迹的临时化和两性人员就业纽带的日益严重的不稳定性趋向于促使两者接近和加强团结，那么这两者内部的异质性正在进一步加深。这种在就业层面上的异质性，得到了对于男性和女性在进入全球化企业的生产和劳动过程方面的分析的证实。

经济学家和劳动社会学家对 1990 年代的研究成果表明，贸易的自由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促使妇女的就业和有酬劳动在世界范围内增长，很少有所例外。然而，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悖论，那就是伴随这种增长而来的却是这种就业的临时性和与日俱增的脆弱性。薪酬、工作条件和医疗保健的种种不平等，并未随着妇女就业的增加而有较大改观，家务劳动的负担并没有因为妇女——至少是部分妇女——在职业劳动领域的责任的加重而有所真正改变。家务劳动与亲情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妇女的这种永恒地位的关键。随着“看护”职业（作为有酬的对于孩子、病人和老人的看护的家务和家庭工作）的加速发展，这种关系被重新引入了职业领域。生育劳动的全球化乃是两性社会关系

^① 法蒂阿·塔拉伊特：《全球化》，载于埃莱娜·伊拉塔、弗朗索瓦丝·拉博里、埃莱娜·勒多阿雷、达妮埃勒·塞诺蒂耶主编《女权主义批判词典》（Fatiha Talahite, 《Mondialisation》, dans Helena Hirata, Françoise Laborie, Hélène Le Doaré, Danièle Senotier dir.,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féminisme*, Paris, PUF), 2000。

再造的一个重要方面。

临时的、不稳定的和弹性的工作模式，在北方国家以部分时间工作的面貌出现，而在南方国家则以没有身份和任何社会保障的非正规劳动的面貌出现。妇女雇佣劳动者的这种面貌与近年来高级智能职业和管理人员的女性化的重要意义之间的对立，也是不能不考虑的现象，因为这种“两极化”——正在教育领域发展的过程的部分结果——乃是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趋同的一个中心点。这些过程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不平等的加深，而部分是因为以临时就业（固定期限合同，替工，“救助”合同，等等）或者单独工作（家务劳动，遥控工作，等等）方式从事劳动而造成的女工的原子化，这非但没有阻碍新的集体行动的男女主角的出现，反而可能奇异地成为孕育这种集体行动的摇篮。

全球化概念——若干疑问

根据弗朗索瓦·谢奈援引的欧洲最大集团之一的一位经理的说法，^① 资本家所说的全球化/世界化^②无非就是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受约束地运动。在这个企业家看来，全球化即是“他的集团在他希望的时间建立在想要建立的地方的自由，生产想要生产的产品，在想要供应和销售的地方供应和销售，尽量少受劳工权利和社会契约的可能制约的自由”。批判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的定义同这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也主张冲破种种限制和界限：“全球化意味着各国市场的日益增强的依存，从而走向建

① 弗朗索瓦·谢奈：《资本全球化》（François Chesnais, *La mondialisation du capital*, Paris, Syros,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1997, 第22页。

② 我们在这里把全球化与世界化作为同义词使用。关于全球化与世界化之间差别的争论，见罗贝尔·布瓦耶《全球化——神话与现实》一文（Robert Boyer, *La globalisation: mythes et réalités*, Actes du Gerpisa, n°18, 1996）。

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① 正如这个定义所说，所谓全球化是指资本国际化的历史趋势，而在这个过程中目前出现的新现象则是“流动的加强，产品的多样性，进入这个运动的经济动因数量激增”。^②

实际上，至少有三个维度赋予这个过程以新的特征。首先，它受到新自由主义政府政策的驱动，导致了诸如贸易的自由化、经济失调、市场开放、跨国公司发展的某些新逻辑的确立等后果。与这些趋势相生相伴的是私有化、外包制的发展和生产的外迁化，由此产生了对劳动条件和大量卷入外包制大潮的妇女就业的负面后果。

其二，新信息和通信技术（NTIC）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的扩张，促使一切类型的信息和数据的直接流通及经济的金融化成为可能，从而造成劳动弹性化和就业临时化的后果。1990年代南方妇女投入工薪劳动的浪潮部分可以归因于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这种勃兴。

其三，国际机构所发挥的新作用，这些国际机构的活动与各个国家—民族和跨国公司的调节相平行，但并非始终协调一致。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主要是关注两性平等的欧洲新机构的行动，由于其越来越明确地关注两性平等的政策，因而对妇女的状况产生了某些积极影响。

因此，这个新的经济和财政架构所产生的结果因地区和男女性别不同而异。然而，尽管今天论述金融和经济全球化的著述多如牛毛，却罕有论者从男—女差异的视角来思考全球化。法蒂阿·塔拉伊特是提出从性别的视角来反思全球化范畴的少

① 阿兰·利皮耶茨：《沙漏中的社会——反对社会分裂的劳动分配》（Alain Lipietz, *La société en sablier. Le partage du travail contre la déchirure social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6, 第43页。

② 帕斯卡尔·珀蒂：《全球化》，载于《社会学词典》（Pascal Petit, *《Mondialisation》*, dans *Dictionnaire de sociologie*, Le Robert, supplément), 2000。

数经济学家之一。她从中区分开了“分析范畴”的侧面和“规范模式”的侧面（以自由主义的进路认可既定的秩序、宿命论）。这位女学者写道：“因此，全球化既是一个描述经济现象的分析范畴，又是一个为预设行为、定义规范和体制内容进行辩护的规范范畴。”^① 她特别描述了由于一方面口口声声要实施国际保护妇女公约，另一方面要诉诸一种全球化的规范而造成的怪现状，指出这种状况的结果是使得妇女在主流文化面前“失语”，无视每一种文化所固有的性别差异的表达方式。

全球化经济中的妇女劳动和就业

全球化过程产生了某些复杂而矛盾的结果，在1990年代对两性就业具有不同的影响。男性的就业出现了后退乃至停滞。但是，贸易自由化和国际竞争加剧的结果之一，则是促使世界范围内妇女就业和有酬劳动的增长，很少有所例外（撒哈拉南部非洲）。在一些发展中地区，妇女的工作率甚至堪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CDE）国家的情况相比。妇女对于劳动市场的参与，无论就正规部门还是非正式活动部门而言都呈现增长，而在服务部门中妇女就业激增。然而，这种参与主要体现为临时性的和不稳定的工作岗位的开辟，这样的工作不但报酬低下，而且得不到社会的关注，可能几乎得不到任何晋升和提拔的机会，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和拉丁美洲都只有往往是有限的社会权利，甚至没有任何社会权利。而且，可以说工资、劳动条件和保健的不平等根本没有改善。许多研究者从对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的研究出发，指出全球化对于妇女劳动者既是新的机遇，又是新的风险。劳动关系和保健方面的社会不平等看来在所谓弹性化政策的影响下愈益恶化。

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差距，同样也在欧洲内部表现出来。一

^① 见前引法蒂阿·塔拉伊特《全球化》，第121页。

方面是欧盟 15 国与东欧的差距：大众的贫困化和不平等的加剧在强度上有所不同；失业率在诸如保加利亚等国家中完全失调，在某些阶层或地区竟然达到 35% ~ 40%；另一方面，这种差距也在欧盟 15 国中间的北欧国家（丹麦、瑞典、芬兰和荷兰）与南欧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之间表现出来：前者的总就业率达到 77% ~ 81%，远高于后者的 62% ~ 66%。葡萄牙是南欧国家中的一个例外，就业率接近 77%，比利时则是西北欧国家中的例外，就业率只有 64.4%。^①

如果比较一下妇女的就业率，那么欧洲的这种南北之间的差距就更加明显，瑞典妇女的就业率达到 76.9%，而意大利只有 48.4%，两者相差超过 28 个百分点。法国的妇女介乎两者之间，就业率为 62.8%。北欧国家妇女的这种高就业率主要同部分时间工作的妇女比例相关，例如在荷兰，2002 年有 72.8% 的妇女是部分时间工作。这种就业模式在南欧国家不很流行，而在正争取加入欧盟的国家中更是少见。举例来说，在斯洛伐克共和国只有 2.7% 的妇女实施部分时间工作制。^②

1990 年代，作为弹性制工具的部分时间工作模式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日本和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各地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通过补贴来帮助企业实现至少三个目标：实施弹性工作制，降低成本，减少失业。一些家庭政策起到了改头换面的就业政策的作用，譬如说 1985 年在法国实施的教育父母津贴（APE）等，^③ 是很值得进行深入分析的，因为它们能够说明家庭生活与

① 见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出版的《欧盟统计局就业调查》，2001 年卷，2003 年卷（Eurostat, dans INSEE, *Enquête sur l'emploi*, 2001; 2003）。

② 见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出版的《欧盟统计局就业调查》，2003 年卷，第 210 ~ 211 页。

③ 征收金融税协助公民组织：《当妇女反对全球化之时》（ATTAC, *Quand les femmes se heurtent à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Fayard, Mille et une nuits), 2003。

职业生活之间关系的意义。^①

上面已经提到的欧盟 15 国与正在争取加入欧盟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总失业率方面尤其严重。2002 年，前者的总失业率为 7.6%，而后者高达 14.8%；这种差距也表现在南北欧之间，北欧的失业率相对较低，南欧则较高。举例来说，西班牙的妇女失业率为 16.3%，希腊为 14.6%，意大利为 12.6%，葡萄牙则是例外，妇女失业率仅为 5.3%。如果考虑到某些所谓“小活儿”或者使人望而却步的工作掩盖着的隐性失业，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数字势必更高。事实上，失业不可能同“就业的临时性”无关。随着同样也触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失调过程的演进，就业的临时性在欧洲日趋扩大。2000 年，法国只有 57% 的工作是稳定的，可以免除“特殊就业形式”的名称。所谓“特殊就业形式”依然是员工在 50 人以上的企业用工的主导方式。^②

两种趋势标志着就业状况。第一种趋势前面已经谈到，即两极化趋势；第二种趋势同当前的服务业工作，特别是与经济危机和衰退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近缘”工作的勃兴相关。在这里，两极化同样十分严重：一方面，银行和保险公司中的女性金融管理人员的数量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服务工作”的猛增。这种类型工作的增多的恶果是众所周知的：进一步加剧了一般同妇女劳动力相关的已经是不稳定的和受人藐视的状态。这类女性工作的不稳定性产生了劳动条件、医疗保健、工资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消极后果。

仅以一个方面——工资为例，近十年来劳动市场的演变成

① 埃莱娜·伊拉塔：《调停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活——从实地调查出发的假设》（Helena Hirata, 《Concilier vie familiale/ vie professionnelle: hypothèses à partir d'une enquête de terrain》, WZB-Centre Marc Bloch - GERS/CRNS, colloque franco-allemand 《Marché du travail, politiques familiales et rapports de genre. Regard croisés franco-allemands》, Berlin, 12 - 13 novembre 2004, paru dans *Feministische Studien*), 2005 年冬。

② 见前引法国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出版的《欧盟统计局就业调查》，2000 年卷。

倍地增加了“穷打工者”(working poors),更正确地说实际上是“穷女工”的数量。1998年,法国工人总数的16.9%是贫困者,也就是说他们的收入仅为平均工资的2/3,而女工中的28.5%处于这种状态。^①所谓的“贫困女性化”的发展可以在部分时间工作制——部分工资制——的惊人飞跃中得到部分解释:在法国,1980年有17.2%的女工实行部分时间工作制,而到1999年则上升至31.7%。这个数字在2003年随着缩短工作时间政策的实施而略有下降,降低至30%以下。1997年,77%的低工资工作是部分时间工作制的岗位。

在欧洲,作为户主的妇女(即所谓“单亲家庭”)同样是“穷打工者”的组成部分,她们约占欧盟总户数的14%左右(700万家庭)。^②这类妇女构成欧洲各国部分工作制女工的主要部分,并作为特别脆弱的女性职业投入的一极出现。诸如洛德丝·贝纳里亚等女权运动研究者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加剧状况同结构调整政策和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新的作用联系起来。然而,在关于两性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争论中,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增长可能是不平等的产物,换句话说,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性别的不平等可能刺激增长,而增长则可能加剧性别的不平等。”^③

① 皮埃尔·孔恰尔迪、索菲·蓬蒂厄:《低工资工作——妇女首当其冲》载于《劳动、性别与社会》杂志,1999年第1期(Pierre Concialdi, Sophie Ponthieux, 《L'emploi à bas salaire: les femmes d'abord》, *Travail, genre et sociétés. La revue du MAGE*, 1/1999),第35页。

② 纳迪娜·勒福舍:《单亲户》,2000年1月第100-101期(Nadine Lefaucheur, 《Les ménages monoparentaux》, *Lettre CAF*, n°100-101, janvier 2000),第6-7页。

③ 洛德丝·贝纳里亚、玛丽亚·弗洛罗、卡伦·格罗温、玛莎·麦克唐纳主编《性别——全球化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载于《女权主义经济学》第6卷,2000年11月第3期(Lourdes Beneria, Maria Floro, Caren Grown, Martha MacDonald ed., 《Gender, A Special Issue on Globalization》, *Feminist Economics*, vol. 6, No. 3, novembre 2000),第xi页。

有酬的工作可能意味着经济的独立，但并未很大地改善妇女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其原因在于要求技术熟练、责任心和独立性强的岗位大多分配给男工，而妇女只能获得要求熟练程度较低的工作，而在工业领域则是节奏较缓的工作。这个论断也适用于法国：作为法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就业调查补充的“劳动条件调查”表明，1998年24%的女工说她们在传送带上工作，而男工仅为7%。1978~1998年，这类女工的比例增大，尽管这种劳动组织方式只占法国今天工人阶层的10%。

最后，在此还必须提到无论在北方国家还是在南方国家都对妇女就业产生影响的两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同女性工作的两极化相关。在法国，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的就业调查报告，1998年就业的10%的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属于“管理人员和高智能职业”的统计范畴。女性的工作依然集中在个人服务、医疗保健和教育等部门。然而，走向职位分化的趋势今天构成一个大框架，其中的一极是工资比整个妇女劳动力优厚的女性高技术职业人员，包括工程师、建筑师、医生、教授、管理人员、律师、行政官员、法官等。另一极则是没有职业前途、报酬很低的临时工。随着部分时间工作制、临时性工作（定期合同制）、替工、各种不同的救助合同（编外人员合同、互助岗位合同、协议合同、保障合同）等的激增，这一极人满为患。在男—女两者之间的关系之上重叠着第二种矛盾关系——女性与女性的关系。

第二个趋势则是同当前的服务工作特别是与经济危机和衰退相联系的所谓“近缘”工作的兴起，这推动了没有得到职业技能承认的非就业人口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在诸如法国和巴西等国家，工业部门工作岗位的消失因服务业工作岗位的开辟而得到补偿。但在服务业中，两极化也很严重：一方面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女性金融管理人员的数量增多；另一方面是整个“服务业界”的“个人服务”的兴起。这两个趋势强化了女性就业增长的同时劳动条件退化和工作临时化的悖论。

跨国公司中的两性分工与劳动组织

我们在巴西、法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中进行的研究基本上证明，全球化意味着多种市场的存在，而不是劳动的同质化。如果说金融的流动不受国界的限制，而且具有即时性，那么因国家、性别、种族、代际而异的社会状况的不平等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甚至有所加剧；全球划分为美国、欧洲和日本（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若干国家）三大地区的三极化，通过国际范围内的实力等级和相互关联体系的确立体现出来。

熟练劳动的就业机会的分化，同样可以从现场调查出发在巴西得到验证。譬如说，我们可以将一家属于法国跨国公司的化学分公司的女工从1990年代初开始进入电器维修/保养岗位当作维修/保养工作分散化的产物来研究。要完成这样的职业活动，需要一定的技能，因此通过就读大学工程课程来获取新的大学文凭乃是受访的技术员们的履历的组成部分。然而，这种新的现实是矛盾的，将某些新的痛苦加在了完成一项男性技能的女工身上：这些完成了技术培训的青年妇女由于担心男工的竞争，懊悔自己从事“最糟糕的维修服务”。否定性别的身份乃是工作的不断要求：“必须具有一种十分职业的外貌，犹如一个做工的男人。”她们是“取笑”的对象，不得不习惯于穿上不能显示出身材线条的衣服，在为一次产业集团的聚会编写的文稿中，她们抱怨在女工占极少数的 workplaces 甚至没有女厕所。

我们在一家法国跨国公司的巴西和日本的两个农业—食品分公司中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巴西的男工和女工认为在当地的劳动市场的环境下，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然而，如果同法国的工资水平比较，他们的工资显而易见低很多（根据法国的跨行业最低生活水平规定的基本工

资，巴西比法国低 10 倍)。至于日本分公司的女工，她们尽管肩负的责任和技能要求都很高，但无论是职位还是工资都比男同事低。在工作条件方面，她们显然很不满。这家在日本的法国分公司的一名受访女工说道：“我们有规定的上厕所时间表：上午 10 点——10 分钟，下午 3 点——10 分钟。”而男工则“可以随便上厕所”。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个经济和技术水平远比巴西高的国家中，这类时间监控却只针对女工。

1998 ~ 1999 年在巴西的多家法国跨国公司中实施的一项现场调查，对兼并、收购和私有化的加速过程进行了研究，论证了这一过程对于所有的工人——不论男工还是女工——的影响，其结果是不但大量工作岗位被撤，而且劳动条件恶化、工资降低。我们所研究的 5 家法国跨国公司在工作前景方面无不呈现一种强烈不稳定（增长或者危机）、渺茫和风险丛生的景象，尤其是对于年岁较大、缺乏技能和学历较低的员工来说。工作弹性化的某些过程已经付诸实施，其中包括至今在巴西工业界很少使用的女工的部分时间工作和部分薪酬制。面对这样的工作风险，只能加倍努力来进行学业和职业的培训，而这样做需要作出重大的个人牺牲，在适当的系统职业培训的公共政策严重缺失的情况下，不但必须付出大量的业余和家庭活动时间，而且必须自己支付参加特殊课程学习的费用。

在调研过程中（1998 ~ 1999 年），受访的这些跨国公司的女工首先提出的是日益提高的学业要求，以获得晋升和胜任工作。一张大学文凭乃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制药分公司的女工为了获得一个“提干”岗位（“管理员”）所必需的，而 7/8 的生产女工（机器操作工）都不得不这样做。这种情况并非例外：巴西的超市连锁店同样要求有大学文凭才能获得收款员的岗位。就业危机的环境使得企业有可能使用这种挑选高学历人员的方法，来全面适应弹性生产组织的种种要求。

其次，受访女工提出了完成她们自己的这种培训的重重困

难，她们必须在自己的进修与她们的孩子的培养之间作出抉择。进入私立大学的每月费用相当于她们的月工资（在巴西，女工被排除在国立大学的少量学生名额之外，那里的入学考试极其挑剔，最终录取的都是来自高等阶层的学生）。此外，女性即使厕身技术员乃至工程师的岗位，肩负管理干部的责任（上述能源配置企业和农业—食品企业的例子），男性下属与女性管理者之间的劳动关系也会成为冲突的根源，很可能造成得到晋升的女干部的主动辞职。再者，领导岗位并非是女性能够轻易进入的，已经有足够的男性来竞争数量极少的这类位置。

探讨跨国企业中引入新的劳动组织和生产模式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两性社会关系同样也在男一女进入劳动过程的差异层次上发生作用。尤其是我们能够通过对于劳动的两性国际分工的分析，来验证工人随着技术和组织创新再培训的论点是大可怀疑的。这个再培训运动基本上只触及北方国家的部分男工。它对于女性劳动力的影响是十分矛盾的。

在巴西的几家法国跨国公司中完成的这项研究（1999 ~ 2000年），揭示了三种不同的工人劳动的组织方式。在一家饼干厂中，男性员工实行弹性制和分班劳动；女工则在速率和节奏设定的包装线上工作。在一家生产挡风玻璃的企业中，两性分工的模式颠倒了过来：一个女工“区”，一块白宫形状的飞地，要求进行灵巧、严格和洁净的手工劳作；男工的岗位则必须服从机器（挡风玻璃出炉）的节奏。但是，一种弹性的组织正在植入过程之中，男工将是一项积极培训政策的唯一受惠者。最后，在一家制药企业中，女性群体也被适应组织革新的再培训运动所触及，男工和女工都接受培训，但在执行岗位（机器操作工）与技术和管理者岗位（工长和工程师）之间的差距依然如故。这些案例表明，企业利用劳动的两性分工作为重塑新的劳动组织形式的强大动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以前存在的某些隔离和等级化形式。

育儿劳动的国际化与“看护”的外化

全球化过程加速了家务劳动日益增多的外化，以及育儿劳动的国际化。我们看到，在普遍发展“近缘就业”和“家庭就业”的公共政策的促进下，家务劳动岗位急剧增长。根据就业调查，2003年有将近120万女性从事个人服务。也就是说，法国妇女就业人口的10%担负这样的工作，与属于管理干部和高等职业阶层的女性人员的百分比持平。这个百分比高于女工的百分比。

对于1970~1980年代的两性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理论阐释，受到家务劳动和“看护”工作的这种外化和国际化趋势的强烈质疑。育儿劳动的全球化是与国际移民运动紧密相连的。“看护”工作的全球化今天成为许多研究的对象。它在探讨全球化的女权主义著述中的重要意义不仅与它在妇女有酬劳动中所引起的变化相关，而且也涉及它对于家务劳动负担的影响，以及女性群体内部出现分化所提出的理论和政治问题。

育儿劳动的全球化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其一是家务劳动的这种商业延伸——其中包括通过作为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的1990年代初开始的方兴未艾的国际移民潮——意味着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的家庭使用贫穷妇女的劳动。这促使具有较富有资源的妇女的一系列看护工作和家务劳动向较缺乏资源的妇女转移的模式得以发展。这种“转移模式”趋于即使不是代替，也至少是覆盖比较富有并需要较多地投入职业活动的那个妇女阶层的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之间的“折中模式”。

其二，这意味着建立情感和救援的全球链。今天，通过国际移民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提供给个人的服务——看护儿童、照料老人和病人等，我们面临着“看护”的普遍化及女性关怀他人的模式。这方面不乏例证：在欧洲占有很大比例菲律宾女

佣的家务劳动，日本的台湾护士或者在巴西出生的日本移民的第二代——“日裔巴西人”护士，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的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女管家等。我们面对的不仅是家务领域里可以观察到的女性“永恒负担”的商业化，而且也是以往的一种私生活关系模式在有酬劳动领域里的普遍化。

对于作为职业技能的妇女的特定能力（“关怀”他人，交际能力）的承认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而且毫无疑问是今天两性之间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一个本质的方面。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两性社会关系重构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公共领域承认女性在私生活领域实现的劳动，具有根本的意义。而家务劳动转变为商品劳动可能导致一种劳动的贬值，而另一种劳动得到承认。这样一个过程往何处去，基本上将取决于女权运动所确立的力量对比。

结 论

我们看到，“资本尽可能少受制约地进出自由”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就业、劳动、活动（职业活动/家务活动）、劳动条件等的影响并不相同。外包，居家分散工作，远程遥控工作，合同制非正式工作，失业和低就业的扩大，凡此种种导致了劳动空间和时间的原子化。

然而，正如卡特琳·基米纳十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全球也不乏抗争。”^① 这标志着全球化的另一个悖论：两性不平等确立和加剧之处也是新的集体构建之地。形形色色的反对全球化或者另类全球化运动形成了很大的规模，屹立于国际政治舞台。

^① 卡特琳·基米纳：《法国的非洲妇女协会——团结互助和个性化的新形式》（Catherine Quiminal, 《Les associations de femmes africaines en France. Nouvelles formes de solidarité et individuation》, *Cahier du Gedisst*, n° 21, 1998）。

“世界妇女反对暴力和贫困大进军”汇集了各地不同的妇女协会、社团和运动，提出了针对日益加剧的妇女劳动危机、工作临时化和弹性化的世界范围内的具体行动和替代性选择。这个行动从此预示着女性雇佣劳动者的形象，成为两性的一个劳动模式：脆弱、顺服、被役使和贫困的女工事实上可能预示着明天的整个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形象。

今天，在妇女的职业身份的发展与部分时间工作的脆弱的女工形象之间，在劳动界与资本进出自由之间，存在着冲突和斗争。如果说很难预料这样的冲突的结局，那么当前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争取另一种全球化的动员表明，一种新的力量对比正在形成，而妇女——不仅仅作为劳动一极的代表，而且作为女性——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这也是不同于资本国际化的其他阶段的明显差异。

第十七章

反对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归化

——一种颠覆性的社会学

玛丽亚·埃米莉娅·蒂茹

致 让-玛丽·樊尚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以马克思的著作为指南。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在全球化的扩张中并无什么奥秘或者神话可言，但如果舍弃了马克思所指示的路径，那就很难理解和认识种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在智利，全球化不是一个新问题。它在国家悉心构建旨在辅助政治经济权力的工具的整个过程中趋于成熟，并进而得到强化。任何人都不怀疑这一点。然而，不能不令人忧虑地看到，整个智利社会仿佛处于迷蒙半醒状态之中，将全球化感受和体验为一副向世界开放的万灵妙药，以为它使我们有可能一览无遗地展望世界，而反过来其他国家也将对我们另眼相看。于是，我们从此不再是以其独裁政权、异乎寻常的地理、美妙的足球和民间歌舞闻名的世界最后一个角落。为智利高唱赞歌的人们把这个国家描述为一个不断现代化的民族，大肆宣扬它的种种奇迹般的全面成果——仰仗一根魔棒威力的成就。我们似乎应该庆幸（上帝的恩宠？）终于服从了一种世界意志。但这种事态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可以具有另一种意义，也就是说这应归功于主要由秘鲁工人组成的贫困的移民群众，尽管他们遭到今天同样也正在遭受生活不稳定和失业之苦的智利工人的鄙视。

智利过去是，今天依然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有效的实验室。在这里可以看到从一开始就作为一项计划设计出来的蓝图的四个阶段是如何顺利实施的。首先是横跨 1974 ~ 1975 年和 1978 ~ 1979 年时期的反通货膨胀的休克政策。其二是单方面开放货物（商品）和金融的对外贸易。第三是包括战略性企业（如运输和通讯的典型案列）和公共服务企业（水电、煤气和电话）在内的私有化计划。第四是社会物品（教育、医疗保健和包括全部城市在内的国家行政管理）的私有化计划。然而，所有这一切要能够取得进展，必须把早在 1973 年政变之前就已经着手进行的一项适当的政策付诸实施，而 1973 年政变无非是这一过程的顶点。当时是鼓吹军人政治合理性的时代，也是大规模镇压社会运动、禁止一切政党和有选择性地消灭整整一代革命战士的时代。土壤已经部分地准备好，只待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来造势，形成足以促使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扩张得以进行的普遍恐惧氛围。

我们所指的这四个阶段是在仅仅 30 年的一段时间内展开的，其中经历了 17 年的独裁时期以及天主教民主党与社会党建立的联合政府执政的 13 年的民主时期。但是，不应该忽视后面这个新阶段，因为它适应了新自由主义在一个民主时期的强化，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扩张不限于例外时期。^① 显然，智利是在同一种趋于完全成熟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打交道，这种成熟的新自由主义是同 1990 年代在诸如阿根廷、厄瓜多尔和秘鲁等国家相继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迥相对立的。如果有人想研究资本主义的这种“高级”形态，那么智利是梦想之地。

^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拉斐尔·阿加西诺教授提交给 2004 年 9 月在巴黎（南泰尔）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论文：《智利例外？趋于成熟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幻想与缺陷》（Rafael Agacino, 《Illusiones y fisuras de una contra-revolución neoliberal madura》, section économie, atelier 12, [http://netx.u-paris 10. fr/actuelmarx/](http://netx.u-paris 10.fr/actuelmarx/)）。

我们许多人曾经认为，在独裁年代之后，不公正的状况即将改变，当时大部分民众通过全民公决满怀希望地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但从这个时刻开始，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公投局外，从而很快感到梦想破灭。民主的降临曾使人觉得最不幸的人们的命运应该得到关注，但结局是被套上了所谓弹性制和临时工作制的新的枷锁。诚然，人们可以根据“刚性”数据断言失业减少，在大学学习的青年人数日增，能够使我们恢复健康的诊所越来越多，辍学率降低（各个部门情况显然各不相同），如此等等。人类发展指数（HDI）显示，智利按照联合国的排名居第43位，属于拉丁美洲最高的水平，仅次于阿根廷。^①可以看到和感觉到这里的“稳定”，几乎像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及其忠实的追随者不受惩处一样“沉稳”。然而，事实上存在着智利社会的另一种面貌。

右派势必感受到同独裁者及其家庭卷入其中的“案件”相关的某些烦恼。他们不能不注意到皮诺切特将军在“苛政”年代积累了数目可观的大量金钱，存放于世界各国。为了开脱他们的重大罪责，他们不得不承认将军伪造证件，编造假名，同他的外国朋友们合谋，不惜使用各种手段迫使有朝一日将讲出这些丑闻的人们最终保持缄默，就像死在离奇情景下的那些职业军人所发生的一切一样。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职业军人的家属决定提出起诉。然而，人们很少谈到人的生命的代价：死亡之旅灾难性经历的代价，“神鹰”行动的代价，或者很可能给予罪犯们——杀害著名领导人的凶手们的“宽恕”的代价。我们不想在此过多地叙述可以在数不胜数的档案中找到的种种材料，从中能够通过真实姓名来确定杀害了一代人的凶手们的名单。在这些杀人凶犯中，很大一部分人依然逍遥自在，我们可

^① 人类发展指数高达0.831，名列包括对于生育、教育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生活期望在内的发展表的第43位。

以在国内的超市、电影院或者大街上遇见他们。也许不止一次，在圣地亚哥的无可挑剔的地铁里，我们就坐在他们身旁。

然而，以往进行的斗争是毋庸置疑的，尽管遗忘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智利的社会运动构成一股强大力量，促使包括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在内的内阁垮台。“工业阵线”和“居民运动”赋予那些在参与企业管理的同时要求有一个家的人们以核心的作用。1970年代初，争取有一个住所和成为工人的斗争实际上是同一回事。正是这些斗士要求阿连德总统让他们发挥原动力的作用，也正是这些人批评阿连德总统没有给予他们——曾经给予他一切支持和保障，直至为他护卫的人们——以应有的信任。也正是这些人今天依然孤军奋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依然活着，而当他们进行抗争时，被逐出公共场所并因为他们的不合时宜的行动而受到抨击。但这个运动的力量依然可以在毋庸置疑的记忆中发现，因为它在涌动：在这些工人和居民的记忆中是不会忘记这个运动的。这样的形势正是米尔所说的革命前夜。

但是，正如加夫列尔·萨拉查指出的那样，^①许多昨天的革命者今天已经烟消云散，远远欣赏着他们自己过去的行为、尚未成熟的“青年理想主义”的时刻，仿佛是在看一部他们乐于说三道四的影片，又仿佛是一枚枚纪念章，可以用来为他们进入权力小圈子服务：这样的小圈子很乐于洗耳恭听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冒险，这些经历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符号资本和文化资本，随后又转化为经济资本或者担任国家要职的政治资本。他们大肆吹嘘自己觉得是过错的东西，一有机会就在朋友或者很乐意同他们交往的听众面前讲述这些往事，特别当面对的是今

① 加夫列尔·萨拉查：《革命主体的改变——溃散者与新出现者》（Gabriel Salazar, 《Transformación del sujeto revolucionario, desbandes y emergencias》, *Actual Marx Intervenciones*, No. 1, Santiago, Universidad ARCIS, Ed. Lom), 2003。

天在联合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权贵之时。

事情千变万化。其中的部分变化正在被错误地排除在政治决策之外的这些工人阵线中生根发芽。当前臻于成熟和羽毛已丰的智利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以特定的方式成功地把智利社会掌控于股掌之中，以致使人们轻信顺从主义的恐惧症是某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青少年、儿童和病人自杀、变态反应、失眠和种种消沉失望有增无减。一些试图继续进行以往的战斗的组织，还没有能够集合起来，提出足以振奋集体行动的前景。

然而，面对世界资本主义列于首位的那些目标，不乏反应：城市安全和对于防卫“危险阶级”的普遍反思。不断蔓延的恐惧适时地改变了国家政策和社会面貌。“城市暴力”促使严密监控贫民区的政策应运而生。政府弹压不得不对付贫困的人们开辟的生路——街头摆摊、青年的粗野举动、游民或者儿童的街头乞讨，但主要镇压的是具有政治性质的“破坏秩序”行动：学生的大进军，贫困工人的游行示威，反对释放罪犯的抗议活动，等等。恐惧的原因依然存在于不稳定阶层的具有代表性的角色身上。于是，国家采取非常措施。对于贫困和恐怖主义的恐惧趋于普遍化，而通信工具起着传播这种恐惧的作用。

贫困形象在失业工人的身上得到体现，他们寻求活路，深受社会关系货币化之害，同时却又惶惑奔走，自信有能力“谋得”出卖几个小时劳力的机会。劳动力正在进入商品和劳动市场的普遍流通之中，而金钱依然越来越象征着劳动的外化，各种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或者各种物化思想之间的关系。于是，工人们彼此孤立，屈从于资本价值化的残酷法则。因此，问题并非单纯在经济方面，其根源在于促使富裕阶层的生活得以继续的人们的主观意识和觉悟。他们并未清醒地觉悟到这状况。

一些人选择了不合法的其他途径，因为他们排队等不到一

份临时的工作，或者因为收入太少起而反抗。在他们看来，所遭受的政治待遇无异于判刑，因为他们依然无力经受社会生活的压力。人们试图用保障公共秩序特别是经济秩序的手段和社会政策来对付他们。监狱尽管越来越表现得效力低下，但依然能够为老一套的做法服务，给它们披上合法外衣，把几千个消极悲观的穷人“关进笼子”候审或者服刑。把犯罪仅归咎于贫穷，把贫穷说成是一切犯罪的原因，这种治理贫穷的模式说明了为什么它具有“不合法主义”的色彩，却在各个时代通行无阻。穷人的种种痛苦变成了逸闻趣事，悲痛的事件不断重复着，其速度之快一如不断更换的报纸标题。

青年、妇女和儿童乃是新自由主义排除在其职能领域之外的广大世界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儿童是最易受伤害的，但当局同样剥夺了他们的童年。资本主义已经完全异化了一切前景计划，许多一无所有的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想法：劳动是他们能够糊口的唯一的最好手段。于是，劳动成为智利儿童的一项天经地义的活动，他们被学校抛弃，失去了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与市场本身所造就的梦想协调的有用人才的一切机会。

这就是说一大部分智利未来的人口注定将成为打工的劳动力，其原因并非在于制度把他们排除出了这个国家，而在于制度本身剥夺了他们固有的人的生活，把他们碾碎为个性愚钝的分子。这种资本主义没有痛苦、甜蜜地进行着再生产，多年来没有反压迫的社会运动和集体反抗，从而把这样一种个人推到了前台：循规蹈矩，好好工作，因为出色工作而被照相上榜的“月模范雇员”。他们工资微薄，没有合同保障，在等候缴税时玩玩填字游戏，仿佛这是劳动中所做的牺牲的补偿。

作为例证，我们在研究了童工特别是生活在街头的儿童的劳动之后，想考察他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看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是最坏的工作形式之一：儿童性交易。同贩毒和性剥削相关的经济网络所经营的这种卖淫活动呈大规模蔓延之势，

而国家和社会却漠然置之，其原因应该从经济状况的不稳定性中寻找。他们属于少数人种、文化和社会群体，被视为“下等人”。^① 这些儿童不讲大多数人的通用语言，他们的宗教和习俗特殊，他们来自被剥夺了公民权的群体，没有正常接受教育的权利。在这种性剥削的威胁下，他们成为黑帮能够轻而易举得到的俘获品：黑帮分子把他们单独关押，切断他们与外界的任何联系。他们没有任何自卫能力，任凭黑帮宰割。其结果是过早怀孕和被传染性病，导致夭折。他们由于出身和不得不顺从的奴役而受蔑视，回归“正常生活虽然在实践上并非不可能，但极其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费用”。

另一方面，性产业和儿童卖淫随着互联网的引入而更趋猖獗。早在1966年，斯德哥尔摩世界大会就要求世界各国关注亚洲的性交易和群集性的儿童性市场的扩大。家庭陷入愈益贫困过程的这些儿童，由于丧失了一切家庭情感和价值的依靠而极端绝望。这些儿童受到自己的父母或者家庭的剥削，也许不足为奇。就像在任何市场上一样，买卖儿童和少年同样服从于供求规律，参与者即是促成者。

智利在拉丁美洲实际上是一个增长中的国家，就业不足相对较低，所有的宏观经济结果表明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胜利。但是，如果从其残酷的一面来说，那么所付出的代价表明不平等正在加剧，其速度与经济增长同步。今天值得夸耀的是，正在顽强而令人瞩目地进行着斗争的群体的极其多样性：青年，因学费而负债累累的大学生，失业的成年工人，妇女，被迫从事性交易的儿童，付不起房租的房客，生态主义者，以及有组织的童工，等等。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条件下奋力前进，充分利用这种多样性，来聚合一切方面的力量。应该通过当局照例试图在“街头闹事”的借口下加以镇压和取缔的这些社会斗争，来

^① 乔治·西梅尔对此进行了考察，并使用了“外来者”概念（1999年）。

整合形形色色的新的斗争实践。

我们的看法也许被认为是悲观主义的。实际上，有许多事情有待去做。就笔者工作的领域而言，我们赞成雅克·比岱的观点：一切科学的学问可能都是颠覆性的。那么，什么是一种颠覆性的社会学？或者进而像罗伯特·卡斯特尔所言：“社会学家在描述世界之时，真的是在自我表露吗？”我们如何才能探讨具体问题，同时又促进科学认识的发展呢？

诚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说，^① 发明这样一种社会学思维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它既承认主观态度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但又寻求果断地超越物质—符号、理论—经验、整体论—个体论等的所有二分法，首先是克服最不幸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二分法。我们认为，应该从其对于在日常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观察到的统治方式（而不是全球化）的分析所作出的贡献出发，来评价研究人员的著述。这也就是说应该阐明统治关系，揭示其机制，提供认识工具并提出足以质疑这种统治的合法性的实践活动的建议。^②

① 皮埃尔·布迪厄：《言事》（Pierre Bourdieu, *Choses dites*, Paris, Les Éditions du Minuit), 1987, 第149页。

② 帕特里斯·博纳维茨：《皮埃尔·布迪厄社会学初讲》（Patrice Bonnewitz, *Premières leç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Paris, PUF), 1998。

第十八章

1970 ~ 2000 年的印度中产阶级

——介乎超凡入圣与威胁之间

热拉尔·厄泽

印度联邦及其 10.5 亿居民孕育了一个中产阶级。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最乐观的人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他们评之为儿童的飞跃成长，这个中产阶级是果实，是同“增长”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几乎必然的产物。那么，其他人又怎样呢？这是问题所在。一个普遍的、完整的和乐观主义的中产阶级的降生属于世界性问题。在世界各地，同它的出现或者期许相伴的是认同性的紊乱和社会诉求的高涨。暴力和动乱所承载的目标与它的概括的、婉转表达的或者强调的表象之间的张力十分巨大。考虑到这样的话语在今天的印度联邦无所不在，我们将特别关注一个共同的论题在南亚环境中的特殊发生过程。这个地区和印度人（占印度联邦人口的 4/5，而且是最古老和最繁荣的文明发源地之一）难道没有任何创造发明？他们难道真的只是改变和填满了外来干预者所提供的框框？

我们把若干场景设定于 1970 年。中产阶级的话语是借助英文报刊传播的，与抬高和鼓吹民粹主义的氛围既相对立又相配合。一个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国际金融机构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它也是各种咨询事务所兜售的设想。它的确立仰仗于北美的社会学概念在大学里的传播。它通过电影开始深入人心。这个“中产阶级”

身份模糊。它惶恐不安，感觉正受到腐败和高昂代价的威胁。依然存在战争（1971年），饥谨也刚刚过去（1967年）。它感到自己对于民族的信心发生动摇；确实，执政党内的派别之争使这样的信心几乎丧失殆尽。它更加怀疑正在经历保护主义阶段的联邦的某些产业成果。但它自以为代表着民族，是民族未来的化身。它变得贪得无厌，心里怨恨横生。它的要求日增。凡此种种依然是克制的。这个群体是弱小和特殊的。它保持着这样的意识。但从整体上来看，需要某些思潮、思想家和机构引导其面对现实。

这个国家的80%是农村地区。它的70%的人口同土地和农产品联系在一起。总人口中有1/3是农业工人——季节工和无地农民，1/3是小农，还有1/3则是各种各样的“其他人”。这里没有发生过工业化变革。第二产业的有酬劳动者和无酬劳动者——其中一半是从事家务劳动人员——勉强超过10%。工人阶层生活艰辛。他们艰难度日，却保持着一定的组织和文化的团结力。他们依然怀抱希望，成为一种社会模式的化身。工运中心主义的观念和崇尚劳动依然发挥着积极作用。由国大党主宰的政府和国家着重致力于对中产阶级的崛起不太有利的民粹主义的转折。小商贩、佣人、手工艺人数量众多，生活贫困。富裕的农民和乡镇商人约占总人口的5%。估计富裕和小康阶级的城市人口的数量大致与此相等。这个群体的部分成员正在为其他人仗义执言。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记者。这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群体，但其特权往往有限。在一个即使富人也不得不面对水泥、钢材、运输和电力匮乏，而进口又或多或少受到管制的国家里，如果不对其民族精神、历史遗产和认同过程进行考察，那么中产阶级这一观念不啻某种超现实主义的东西。

在英国人之前

在1757年至1818 ~ 1849年间完成的殖民化之前的南亚社会

中，将一大部分居民划入其中的中产阶级观念是模糊的，尽管毫无疑问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整个社会是等级化、社团化和宗派分割的，但社会关系并没有今天这样严酷。本着寻求拯救或者其他本体论观点所确立的统一的人类观今天依然存在，甚至很突出。譬如说，它鼓舞着信奉人形神的各大人格化宗教派别的“守贞专奉”（bhakta）信徒。这种“守贞专奉”信徒并不反对等级制的社会制度。推动这种信仰前进的既不是某个“中产”阶级，也不是某个“中产”的人，而是神的世俗化和人的神化这个双重过程。如果说对于成为中产者的关注只占据很小的位置，那么相反，成为核心的观念则是各种日常的关注的组成部分。

存在着多个社会群体候选核心地位，这造成冲突的不断上演。与这种核心地位伴生的是精神、身份或者其他的优越性。各种核心模式同样也是超凡人圣的模式。存在着多个群体模式。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受到非议。主要有婆罗门文士，统治者和武士，以及各种武装农民的强大群体等大多数人的模式。苦行者，遁世者（sannyasin）则是特殊的模式。他们既偏离社会表象的中心，又处于其核心。高种姓的成员，地主，商人，关系或者借贷的中间人，艺术家，任何地区的非外来的当地居民，同样构成潜在的中心和模式。在修道者成为无所不在的因素的一个社会中，世界被设想为围绕着一个神秘的轴心——须弥山旋转。我们由此可以很好地理解为什么在印度的全国通用语言和许多方言中，中产阶级被称作中心阶级（madhya varg）。扼要地说，我们的假设之一就是今天所说的“中产”是从早已存在的“中央”或“核心”一词继承而来。它传承了后者超凡人圣、相对的神圣性和构成“世界轴心”（skhamba）的能力的某些方面。

不论任何地方，也几乎是不论任何群体，都能构建世界轴心和超凡人圣的模式。从希吉莱（公元718年建于信德的阿拉伯王朝）历（即伊斯兰教历）1世纪开始，来自西方的穆斯林

倾向于使他们的世界围绕阿拉伯旋转。随着多个王朝的建立及后来在莫卧儿王朝（16 世纪的阿克巴王朝）时代的帝王职能的神化，印度的穆斯林政权试图重建核心——以它们自我为中心。欧洲的统治从来没有实现这种本土化。中心始终在将近 10000 公里之外的世界的那一端。中产阶级正是来自那里。它首先或者基本上是一个外来的阶级。

中产阶级的输入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在 19 世纪中叶随同宗主国的其他产品一起来到印度，见诸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当时正是宗主国发明市场意识形态并利用其霸主地位寻求自己的工业品销路的时代。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首先意味着资产阶级。1860 年代的英国，依然是贵族统治的时代，而王朝部分地代表的各个正在崛起的阶级则是由商人、行政官员、工业家和自由职业者构成。一个“中产阶级”与其余人的对比，概念化地表述了一个由贵族、平民（危险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群体”组成的三极社会。这个概念采纳了作为古希腊城邦繁荣基础的“中介”（mesoi）观念的某些东西。哲学家们所夸耀的“公民”乃是中庸之人，即所谓“中产阶级”。他们应该同贵族的浮华和平民的激情保持等距。他们代表着尺度和责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受雇人员的混合群体是早熟的。这个群体是在认同共同价值特别是共同习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 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借助宗教礼仪、生活节奏、对劳动的崇尚、清教主义、实用主义、对于出版和博物馆及展览馆的关注、对于法官和私有财产及诉讼的激情、特定的个人主义观念、俱乐部运动、午后茶、洁净的草坪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帝国利益的不平等分配，把十分富裕的人和近乎贫困的人结合在一起。中产阶级的表象还同把社

会的团结建立在其成员的道德基础上的一系列和谐观连接起来。因此，它们同卫斯理（循道宗的创始人）的教义和整个新教教义有着密切联系，较少神化色彩。它们不满足于把自己的起源部分追溯到被抬得很高的希腊古典思想，而自诩为“人间乐土”。

中产阶级的计划得到某些道德观念的解释或者辩护。博爱的观念与国家镇压机器异曲同工。不愿意和不能够把自己整合进资产阶级世界的人们是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社会中的大众。他们始终受到怀疑，被认为是有害的或者堕落的。这是一个内容变化多样的计划，但始终坚持要捕猎大众，把他们投入劳动，将他们变卖，派遣他们到殖民地远征和殖民，最后则改造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危险的品行。

这个计划同其推行者的言论从来相悖，却有着不限于表面影响的巨大影响。这是一宗极好的出口产品。如果说资产阶级是“不愿意被这样称呼的阶级”，那么“中产”阶级则相反，是自我夸耀、增殖、克隆和推广的阶级。这是一个具有特定宗教内涵的包罗万象的或者说混杂的类模式。强调品行和道德比财富更重要，这使它得到多数人的理解。

在印度，英国侨民首先是军官、行政官员和商人。军人大都是充斥贵族意识形态的军官。行政官员构成了一个手握大权、通常也是出身于最高阶层的权贵小圈子。商人比在宗主国更富裕得多。在印度的所有英国臣民享有同他们在本国的生活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他们的社会地位至高无上，政治上一切大权在握。他们不太关心成为榜样。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这种意识形态是通过教士、下级雇员和书面作品传播的。

1835年之后，印度的英国统治者开始依靠本地雇员，而这些雇员通常是印度教徒。印度不是一个移民的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缓慢而正常的发展，各种商业活动，各种作物的种植和税收的征缴需要后备。殖民制度首先利用保持着一定独立性的地方中介

的服务。本地的雇佣劳动者价格便宜，而且比较可靠。帝国的雇员首先是高种姓的孟加拉族人，一般称之为“巴布”（babu）即绅士。他们属于在“布哈德拉洛克”（bhadrakok）即“高贵者”的名称下结合在一起并被性力派（shakta）婆罗门牢牢控制的高种姓集合体。孟加拉（东北部）是高种姓群体被如此统合成整体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种姓阶级”这个概念毫无疑问有利于接受英国关于社会模式的种种观念。这些人既不爱土地，也不喜欢经商。他们是文士、诗人、藏书家。英国化和绅士的生活乃是被统治者的选择。地位很高的孟加拉族家庭的青年收入很低，待遇恶劣，通常生活在贫困的边缘，不得不屈就办公室雇员。工作节律像地狱般可怕。纪律被认为是可耻的。但是，“巴布”应该成为政府和殖民政权的基石，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则是政府和殖民政权的讽刺画。“崇尚仪式而目中无人的婆罗门”借助这样的形象攀登上了国家某个部门的职位。他们在达到目的的同时，强化了上述特征。

为了使高种姓的印度人能够获得这种低级职员岗位，必须建立一个英语教育体系。经过几番犹豫之后，正如它的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马克·奥利所希望的那样，教育首先关注制造拥有英式大脑的印度人，与此同时教会本土人安分守己、甘居下位。旨在提供办公室绅士的中学很快就在全印度推广，不只是传输文化和语言。它们很早就传播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印度的小职员在这里学到了在新职位上不感到屈辱的方法。他们阅读大肆吹嘘这种资产阶级能屈能伸的社会和本体角色的课文和报刊。因此，在不很富裕或者在新的法律框架下不善经营自己的遗产的高身份家庭中间，议题是从诸多社会轴心之一出发来确定的。价值实现和超凡入圣这两个层面彼此相会并发生交叉影响。“中产阶级”的传播在成为英国化的大染缸同时，保障了一种古老的等级制度——将婆罗门推崇为世界中心的等级制度——的再生或者重建。

“巴布”和他们的非孟加拉族的同事们通过英国的基督教教会中学的教育，接受了显著的改造。与他们对于“中产阶级”的认同相伴生的是继续乃至加强在高种姓和少数派宗教精英（穆斯林、锡克教徒）中进行大规模的招聘。1900年，低级官僚机构职员和商社雇员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2%。但是，他们已经产生了自己是极端重要人物的感觉。他们的老师一再谆谆教导，他们构成社会开明而富有教养的中坚。他们是报刊的几乎唯一的读者。极其多样的结社的重任大多落在他们的肩上。绅士们的世界十分开阔，也较少受“无产化”影响，因为他们有着铁饭碗和其他路子。

印度的英国中学不止培养“巴布”们习惯庸人的生活方式，它们还瞄准了精英阶层。19世纪末，很富裕的城市家庭和以往从没有做过这样选择的几乎所有土邦王公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英国去培养。私有制的推行和盎格鲁—撒克逊司法体系在城市社会中的实行，促使法律职业陡然膨胀。企业管理人员、医生、教师、新闻记者、中级行政官员乃至法官，缓慢地充实着另一个中产阶级候补阶层——无论就地位还是文化而言——的轮廓。1920年之后，工会活动家和政治家的地位上升。他们是大家族的成员，出身于“巴布”一样的高种姓，但更富有教养。这些精英的代表大都拥有土地、不动产或工商企业等独立的收入。从1860年开始，在孟加拉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稍后几年在帝国的其他部分，这些阶层的一部分在成为民族运动的骨干和鼓吹独立之前，从事文化著述和宗教（印度教、锡克教）改革运动。

这些英国化的新城市阶层在数量上比本身也属于少数的“巴布”更少。他们自认为构成一个中产阶级的早熟信念尤其令人注意。这种资格的认定既受到“巴布”的非议，又是以其固有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欧洲的行为方式通过掌握语言而内化，法制思维的习得，衣着服装的改变（饮食习惯不变，宗教上也

很少改变)比下级职员更加深一层。至少部分人是这样,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同欧洲人相比是平等的,并且希望与之靠拢。民族运动成为众多居民阶层的共同事业,但其方向往往在这些高层的英国化精英设计的框架内演进。这些高层精英握有话语权,拟定纲领和进行谈判。甘地、M. A. 真纳(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尼赫鲁和阿姆倍伽尔等民族运动的最杰出的人物,无一不是在英国学成的律师。在其他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中间,新闻记者和法学家为数甚多。至少可以说,他们内化了盎格鲁-撒克逊资产阶级的价值和观念。

在自认为“中产”的英国化阶层内,在立场中存在着某种类精神分裂症的东西。在印度,高种姓的家族中大都几世同堂,多个家庭共同生活。这种习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和保持遗产的方式。即使在城市里,印度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巴布”)也脱不了这样的习俗。这同维多利亚经典中的理想化的婚姻和家庭不相符合。这些阶层保持着文化底蕴深厚而被看重的印度斯坦人(穆斯林或锡克教徒)模式。他们作为自古就富有教养的高等群体,以本土人的典范自居。但是,他们制造出了只能引证莎士比亚和休谟的“英国大脑”。极端看重某些印度的东西、崇拜本土女神、抵制洋货即所谓“斯瓦德希”(svadeshi)的运动,试图把人类的一切发现和知识归功于印度和古印度人,凡此种种无不凸显出这种精神分裂。

这些阶层意识到自己是极少数。他们对于“中产阶级”的认同乃是一种识别符号和文化标记。他们既不梦想形成单独的社会,也不梦想构建一个普世模式。自命不凡的古老的“核心”精英阶层的成员们,深信不疑自己是国家未来的化身。与整天盘算着怎样能够获得承认而令人生厌的“巴布”群体相反,这个中产阶级经历了一个或者毋宁说一连串预言——民族主义、自足、进步、解放、宗教重建等的考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不同于工业巨头、大商人和大地主(zamindar)家族。他

们把自己定位于中产阶级，往往是为了反对这些群体的穷奢极欲的恶习、残酷的剥削活动和粗野文化。这个精英“中产阶级”反对工商业巨头和“封建主”，认同正直、克制等价值和某种清教主义。第三极则是平民或者“老百姓”。平民的整合是同城市的英国化的富裕阶层作为整个社会的中心和纽带的趋势性和不平衡的出现相应的。他们为显赫的保守分子们所左右，而城市资产阶级却对他们大谈前途和平等，有时还装出一副极端主义的姿态。

部分或者也许是大多数的“巴布”不想起而反对殖民政权。这些人是彻里彻外的下级和被统治者。而且，他们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自以为特殊的感觉，面对大量的不同和明显敌视的世界观而认同英国的价值和语言，或多或少促使雇员小资产阶级和赞成独立的英国化富裕阶层团结起来。这些忠实于“上流社会”（Saheb）的“巴布”没有被排斥或者受到惩罚。共同归属于高种姓或者其他古老精英阶层的属性发挥了某种作用。

在国家获得独立之时，30%~50%的婆罗门成年男子能够读书识字，占统治地位的种姓的农民成员的这个比例为5%~10%，而最低种姓成员中只有0.2%~0.5%的人识字。一些古老的指挥和组织习惯同这一状况密切结合了起来，促使高种姓占据了稳定的薪酬岗位，垄断了许多社团机构的自由职业以及政党和工会的领导岗位。

独立及其固有的行政活动

独立之后，“中产阶级”经历了一个相对去神圣化和民主化——同样也是相对的——过程。这个阶级充实了自己。它的地位趋于稳定，而其特殊性趋于弱化。精英阶层通过鼓吹发展和推进某种形式的天命国家，实现了自己的社会化。除了上层

政府部门，这个阶层还掌控了军队和大企业。就社会的视角而言，小资产阶级诸群体围绕着一种小富即安和社会服务模式旋转。他们力求同中产阶级近似，尽管两者相差甚远。其结果是白领雇员开始赋予小资产阶级群体以群众性的面貌。这些群体的很多成员加入了工会。与实现经济自足相结合的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保护主义似乎势在必行。但是，高种姓阶层依然保持着重要地位。有时，这样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这些高种姓不是一个精英阶层或者贵族。他们代表几千万人，其中有些十分贫困。

小富即安的模式在 20 多年间赢得了地盘。政府部门的各种工作，企业中的稳定工作和公共部门的生产性工作具有了重要地位。1970 年，1600 万得到良好保障的工作岗位养活或者帮助养活了 1/4 的人口。也许，其中 1/3 的人可以列入“中产阶级”这个社会学上可以接受而在本地得到承认的名称下面。它已经变得举足轻重。这个“中产阶级”不太具有生产性，但有益于社会。它显示出责任性，对某些形式的收入分配表示厌恶。

一直到 1980 年代初及稍后一段时间，在许多场合最被看重的人，乃是公务员或者公共部门的雇员。他们是“巴布”的现代化，从而使他们被列入一个模糊和不太受人赏识的范畴。但他们体现了参照一个看来可以实现的模式进行改善的具体可能。他们是可以贴近的人。人们可以梦想仿效他们。他们是经过招募的。他们有特殊的双手，染上了浅白色（至少在北方是如此），代表着某种学问和模糊的英国色彩。他们工作。有人说他们改变了这个国家。在 1970 年代，英国化的高种姓办公室雇员的地位开始发生改变。他们不得不同较少英国化色彩的阶层共事。民族语言（印地语）和地区方言获得了官方地位。用这些语言出版的报刊赢得了巨大影响，而广播电台以及后来的国家电视台进一步扩大或者充实了这种影响。独立之时规模极小的

教育体系迅猛发展。它使得青年学子们能够在一些小镇上完成较长时间的学业。如果说教学体系、传媒和行政管理依然有某些外来的、父道主义的和英国化的东西，那么比之以往已经显得有很大不同。精神分裂的态度业已消退。可以在公立中学里使用自己的母语完成优良的学业，可以把英语当作一种不很通俗的完全外来的习惯语来使用，可以获得一份工资不高却十分稳定的国家公务员的工作，可以考虑把这份工作传给自己的后代，然后自己在其他活动领域，例如在创意或者农业领域颐养天年、舒展情感。阶级的壁垒已经不是那么严密。城市与乡村十分接近。

除了这些收入微薄但却得到良好保障的白领之外，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依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阶层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它被看做即使是总理也似乎很看重的一种正直的雇员模式的化身。小商业构成中产阶级的第三个侧翼。其成员自成一格。他们较少受英国化及其文化的影响，往往更加接近于农民或者手工艺人。他们的家庭都是复合型的大家庭，在婚姻上则采取以乡村为中心的方式。其中富裕的或者正在发家过程中的部分，则与资本主义的网络和组织连接了起来。

1971年之后，随着强化的行政体制的建立，医疗保健服务和群众性教育的实施，以及工厂和矿业在一些偏远地区的移植，就业机会成倍增加。“中产阶级”谈论着自身的发展。通过征服大自然和教育来达到更大规模的无限进步，成为毋庸置疑的意识形态。这只是一个时间和手段的问题。大片森林被砍伐殆尽，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压力和人口膨胀尽管引起不安，但抵挡不住日益更新的使命感的召唤。保持一种英国式优越感，永远自我封圣的倾向，作为依然由高种姓构成的“中产阶级”品格的组成因素显得根深蒂固。这并没有被看做是严重的问题。尼赫鲁是婆罗门，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来自同一种姓。

在 1960 年代，农村统治种姓的许多成员，诸如西北部的“贾特”（jat），南部的“帕特尔”（patel）、“穆达里亚尔”（mudaliar）和“纳亚尔”（nayar），东南部的“卡玛”（kamma）和“雷迪”（reddi），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拉塔”（maratha），或者是北部的北方邦的“塔库尔”（thakur）和“雅达夫”（yadav），通过教育途径进入了城市中产阶层的行列。他们在肯定地区语言方面扮演了主角。一些很低种姓（“达利特”——dalit）的精英，得益于教育的提高和配额制，也应运而生。部落的成员（“阿迪瓦西”——adivasi）在国家和基督教传教活动中受益的地区同样得到了发展。一切人能够通过教育和某些关系获得好处，已经成为主流信念，但不应该奢望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一份固定的收益，一套没有现代化设备的经济住房，某些社会福利和邻里之间的尊重，乃是普通人追求的目标。早就存在着某些社群主义的战略（与在种姓或者宗教的基础上展开请愿或者政治行动的人们相结合）。这些战略在不引起争议，几乎是小心翼翼的情况下开始系统化。失业率并非无足轻重（官方统计为 2%），但对于“中产阶级”影响不大。文凭是稀缺资源。读书识字成为一张很大的王牌。最严重的骚乱集中在依靠土地生活不下去的农村。城市具有重要地位，但在人们的头脑里，“乡下”依然是基础和衡量一切的尺度。一大部分新中产阶级的成员希望退休后重新回到乡下。

中产阶级在行动

1960 年代中期，最初的断裂开始显现。这个国家尚未走出物质匮乏。工资低微。生活因得不到控制的人口膨胀、工业家们不切实际的空谈和中间商的盘剥而陷于贫困。人们开始谈论失业和缺乏保障。数字起初是微不足道的。随后开始成十倍地猛增。这引发了人们的愤怒。但这种愤怒夹杂着希望。出现

了群众性行动。工薪中产阶级投入政治行动和某些大的社会运动。

1970年代初，出现了高种姓的富裕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大规模运动。设施落后和肮脏不堪的城市的声誉不佳，但得不到灌溉的农村地区的状况变得更加恶化。乡村越来越经常爆发种种紧张压力，争地冲突，争取社会承认的突发对抗，宗教间的仇恨，激烈的地区主义，等等。1970年代初在许多地区实现的高种姓青年的普及教育，并没有开设经营农场的课程，虽然当时在市场环境下农场是能够赢利的。几乎不存在工业技能的职业培训。农业大学培养的是从事行政管理的工程师（农艺师）。在极大的紊乱之中，数百万农村家庭侵入了城市。大城市亟须良好管理，一些地区几乎无人过问，直到10年之后才严肃地提出治理灾难的规划问题。

1972年和1973年，物价飞涨和基本产品的严重匮乏变成全印度城市家庭的日常难题。黑市大行其道。1973年和1974年的通货膨胀超过20%。这种困难状况加上能源缺乏和交通堵塞，彻底搅乱了“中产阶级”特别是工薪白领阶层的家庭生活。这是有时令人十分压抑的强制计划生育抬头的时代。压力首先针对公务员和公共部门的雇员，然后是大公司的工人。自由职业者和管理人员几乎是唯一缴纳收入税的人员，他们再也高兴不起来。小商人对于民众阶层的怒气和混乱极其敏感。部分“中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工作和同其他阶层的接触，已经部分地去掉了超凡入圣的色彩，他们发现城市中的生活条件十分艰难，令人生畏。不再有农村基业的人们特别感受到了生活用品的匮乏。“纳夫尼尔曼”运动即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复兴运动，“桑普尔纳·克朗蒂·安多兰”运动即北部和东北部的比哈尔邦争取全面革命运动，以及1974年6月的铁路员工大罢工，这三个运动震撼了1974年。此外，这类运动还有许多地区性的不同表现。

古吉拉特邦复兴运动与比哈尔邦 争取全面革命运动

古吉拉特邦和比哈尔邦的运动是中产阶级诉求的最典型的表现。面对紧急状态，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把自己归入平民行列，而其构成中高种姓成员又占有压倒性优势。这两个运动很好地体现了这些特点。古吉拉特邦复兴运动将商人种姓和耆那教徒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富裕地区推上了舞台。比哈尔邦则相反，这是一个贫困地区，土地问题成为得不到解决的症结。在这两个案例中，物价飞涨和国大党一手操纵的政治体制的腐败，乃是早已存在的持久紧张局势的催化剂。

古吉拉特邦复兴运动爆发于1974年初。古吉拉特邦已经发展成为印度工业化最先进的地区。1969年，在阿默达巴德发生了印度独立后最严重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骚乱。古吉拉特邦是当时转入国大党手中的保守的中间派领地。这个邦的教育体系于1960年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3多的大学生，更大比例的教授属于婆罗门种姓，其中1/3是商人种姓的成员。然而，他们声称自己既是“中产阶级”，又是平民。

复兴运动围绕着三个轴心——大学生的诉求、物价飞涨和政治腐败——展开。这个运动以内容有着强烈的文学和先知色彩的全体大会为核心，很快变成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斗争，并随着军警开枪弹压及有时不啻火上加油的打砸抢活动而转成骚乱。抗议的青年们和藏红色的旗帜染上了当时并非是核心的印度教的色调。复兴运动成功地驱使邦政府下台，获得了较好的供应，但它的先知色彩导致平民阶层和低种姓成员的离队。尽管如此，它既起到了比哈尔邦运动的直接模式的作用，又成为一代青年的楷模。

在比哈尔邦，由于左派代表占有重要地位，而小资产阶级

更多出身于通常是食利者和印度教至高种姓的富裕阶层，所以政治局势更加复杂。主要冲突针对邦政府。争取全面革命运动结合当地的古老传统，集结了各种社团和工会，成功地推进了社会改革计划，并把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同复兴大写的“人”的意愿联系起来。各种理想主义的表现，警察的暴力和组织方面的创新十分令人瞩目。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在唤起虽然处于少数地位却也许更加能够自由地进行创新的印度斯坦族小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化过程

自我标榜为民族灵魂和指南的高种姓中产阶级的起义在紧急状态时期（1975～1977年）遭到禁止。英迪拉·甘地、她的小儿子桑贾伊及其1975年6月的政府将改革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甘地派赶出了政治舞台。此后的时期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是致命的。在这个时期，强制推行寡头政府、警察制度、垄断经济和技术官僚的粗暴作风。议会民主遭到批判，尽管许多人依然信赖这样的民主。这个例外时期第一次促使“贱民”和穆斯林这些贫困社群疏远国大党。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正在发生分化，有的支持当局，有的为争取自由而战。在1977年大选中获得辉煌胜利的人民党联盟保持着复兴运动和争取全面革命运动的部分理想。联盟内部的分裂，其组成成员中一些派别的业余色彩，一些政党为小商人大农场主牟利，很快促使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投向国大党的怀抱。由于广泛的社会冲突、持久的物质匮乏和高度的通货膨胀，人民党时代（1978～1980年）同样极其困难。但是，“中产阶级”既不是在政府中，也不是在行政管理机构中，而是在社会中经历了广泛的变革。

从1980年——这个日期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数据，不如说是一个标记——开始，越来越多的高种姓迁入城市定居。高种

姓的这种城市化，不是在像生活不稳定的劳工移民那样的艰难条件下完成的。尽管如此，随之而来的是多种形式的社会关系减弱，生活乃至居住环境的破坏。这是城市危机频发的时代（基础设施的内破裂，管理的衰败，生存环境和社区的退化）。许多家庭重又栖身分配给精疲力竭的流浪者的远离市中心的小屋。另一些家庭则居住在社群关系紧张，卖淫或者敲诈勒索猖獗的地区。有的重又陷入准贫民窟，马路上遍地粪便，喧哗吵闹充斥于市，还有毫无疑问同样令人心惊胆战的大量可以想象得到的危险，构成了那里的生存环境。人们进入城市，却没有变成城市人。高种姓和小富阶层不具备改变身份的魔方。由城市化失败的小人物构成的这个中产阶级跌入了地狱。

在整个南方，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安得拉邦，在走在运动前面的旁遮普邦，以及随后跟进的恒河北部地区，农民、受教育较少但数量众多的中等和低等种姓阶层终于起而同再生的“神圣的中产阶级”展开竞争。而所谓的“神圣的中产阶级”从来就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群体。我们可以看到在比哈尔邦的争取全面革命运动内部的广泛冲突。没有任何人能抗拒这种演变。这是一切政党的程序表。新进入“中产”行列的人们受教育少，没有经过训练。在他们看来，政治乃是在他们占多数的社会中自我肯定的一种手段。“贾特”种姓成员关起门来封闭式的投票做法，几十年来在国大党显要们的安排下极为流行。新的中产阶层往往是极度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奉献大量的金钱来建造庙宇。他们将自己的存在悬于半空。他们的趣味是低劣的，他们追求过度消费的愿望是一目了然的，他们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诉求是执著的。

在1970年代，自由职业得到了显著的飞跃，这种态势在1980年代进一步得到加强。在老的“中间阶层”内部，在“可以认为是超凡入圣的”种姓和相当富裕或者极其富裕的各个阶层中间，分化过程自1970年之后趋于强化。这些阶层的子弟在

极端严格的选择框架内接受了越来越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通常是由某个财团或者排他性的社团控制的私人教育网开始覆盖公立高等教育，后者依然受高种姓的严密控制，但比较普及。选择英语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做法，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再讲英语。但这种选择是实用的，它打开了通向高等职业和环境的大门。它部分地得到认同，因为由此可以得到外部的机遇和深刻的涵化。从1960年代开始，得益于这种教育体制的一些高种姓成员为英国、美国以及东非等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相对良好的市场高层管理人员。“中产阶级”的精英主义光环始终以英美世界为立足点。这种状况有增无减。它加剧了社会的不和谐。

在借助黑市和腐败环境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家致富的诱惑面前，一些新群体加入了公务员、雇员和曾经推进了1970年代的各种运动的自由职业者的行列。国家雇用的医生同时发展着私人业务，将报酬低微的公共保健任务置之不顾。他们用国家的基金开办私人诊所。部分公务员利用自己的职权，通过受贿而使收入翻倍，有时甚至成十倍地增加。“中产阶级”快速致富的第三个来源乃是1970年之后小企业的飞跃发展。印度提倡小规模的生产单位。一些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子弟正是由此而暴富。

真正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各阶层可以依靠具有内聚力的家庭结构和一些有效的种姓网络，特别是对于吸纳资本来说。许多极其富裕的家庭有着将自己的子弟安插进统治阶级的各个不同分支——军队、政府、行政或者金融机构——的习惯。这是在这些阶层中包办婚姻依然如此盛行的原因所在。

农村遗产的持久存在使得这个舞台更加复杂。在近30年来迁入城市的家庭中，大约有一半依然在农村保持着可观的产业。这些产业由父母或者上一代的共同继承人来经营管理。印度今天占主导地位的继承形式是对遗产进行分割。这是一种暂时缓和这种倾向的方式。雇用管家和分成租佃者或佃农则是另一种

办法，它对于保持着可盘活的产业而且想定期回到“乡下”的人们来说尤为重要。

古吉拉特邦的新运动与配额争议

1981年1月，即在英迪拉·甘地的国大党于1980年重新当政后，一些新的暴力活动震荡着古吉拉特邦。这依然是中产阶级在表达自己的诉求。中产阶级如今毫不含糊地为富裕阶层所左右。它现在很少谈到平民，除非为了肯定自己完全属于平民。在其他情况下，多半是进行抨击。印度教诸高等级阶层再一次首先发难。但是，动机和目标是因时而变的。安排专门提供给低种姓、部落（adivasi）和其他“后进”群体的招工配额，是邦政府于1980年决定的。44%的工作岗位是专门保留的。这些工作始终是竞争的对象，但部分岗位需要有相应的出身条件。高种姓的公务员候选者了解这种状况是在争取公正和平等大学生委员会展开的一次信息通报活动之后。信息是由不享有配额的雇员工会传出的。很快，骚乱具有了针对低种姓成员特别是这个群体的受过教育和具有专长的少数人的大屠杀色彩。正是他们施展阴谋诡计抢走了工作。何况，高种姓成员对于低等级群体特别具有依赖性。如果说所有人都靠低种姓成员来供给清洁工，那么高等级富裕家庭还需要大量的佣人。他们的费用上升了。此外，“这样的人”是否应该享有受保障的高等工作？愤怒的情绪达到了极点。高等级的青年们迎战警察，随后又同军队发生冲突。他们捣毁了数以千计的低种姓成员的房屋，杀死多人，打伤400多人。两个月的骚乱造成了45名牺牲者。

四年之后，即在1985年3月，爆发了一场新的暴乱，其触媒剂是医学院和工程学院的学生。以种姓为基础的招生配额同样存在于这些学院。配额并非常有。这种状况引起公愤。这场运动付出了105人被杀和2000人受伤的惨重代价，同时有几千

幢房子、商铺、卡车、公共汽车和古吉拉特邦最大的报纸被焚烧。“高等中产阶级”——这是他们目前对自己的称谓，尽管这样的称谓尚存疑——新生代的闹事者将怒火发泄在以前的不可接触者身上，但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穆斯林以及举行罢工反对暴力活动的工人。1985年5月，这个运动在政府作出的某些承诺的基础上结束。

古吉拉特邦始终是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身份紊乱和重组的显示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多。在普遍富裕、环境灾难和不平等日益严重的氛围下，一部分“中产阶级”开始武装自己，另一部分人沉湎酒色、酗酒吸毒（反对禁酒政策），第三部分人则不惜一切代价寻求配偶（2001年男女性别比跌落到10:8.5）。高种姓青年的这两次骚乱同时说明了中产阶级自我肯定的转折和这个阶级的分裂。其矛头所向首先是具有候补中产阶级身份的不可接触者。国家之所以成为敌人，只是因为它被指责为支持某个群体。民主的高论依然滔滔不绝，但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战，要求特权和特殊待遇是始终不变的目的。理想主义和责任感，哪怕是复兴运动那样的部分表现，已经一去不复返矣。

1990年反对曼达尔委员会的青年大暴乱重复和加重了这样的色彩。本人也是高种姓出身的V. P. 辛格领导的中左政府在1989年决定启动已经搁置10年的给予所谓“后进的”农民和手艺人种姓配额的计划。将有27%的行政工作岗位应该“保留”给他们。有两个集团竭力反对这个计划：主张统制主义或者对自由主义不感兴趣的公务员和高种姓落魄成员的压力集团（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以及以英文大报纸为堡垒的新自由主义分子压力集团。

在实施紧急状态之后，经济体制问题开始成为中心难题。1950~1980年代的印度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严格计划化的。这是一个处于农村社会包围中的孤岛国家。在这个国家中，

法规的制定者们可以赋予自己以一定的地位和相当微薄的经济利益。两种形式的“半寻租”——蓄意拖拉的官僚制度和投机事业——相互支持，又有所摩擦。在1977~1980年之后，各种摩擦变得极端严重。作为这个地区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经历的各种关系的一种改变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标志着新的高层精英在附着于“中产阶级”之前开始崛起。他们包括一批在里根时代的美国学成的、拥有很多文凭的高级管理人员、新闻记者和经济学家。他们声称国家是一个同发展对立的巨妖，因为它破坏交换。他们利用某些“中产阶级”成员的高消费欲望。他们嘲讽向穷人倾斜的再分配观念。印度的产品不坏，但不精致。1984年前后，一些青年人在某些大报上写道，他们想不通为什么禁止他们穿鳄鱼牌T恤。他们蔑视经济民族主义，有时表示想自杀。

这些趣闻轶事是重要的。它们被当作1991年“经济开放”——1985年的第一次浪潮之后成为国家政策——的论据。在与此相关的背景下，放纵性欲被归因于新自由媒体和北美的荒诞影片的煽情和搅乱。失业和高消费的欲望抬高了对于嫁妆的要求。住房的价格飞涨。新的成年人群十分庞大。在许多城市雇员家庭中，结婚的平均年龄上升。超过25岁的未婚少女增多。古老的清教氛围由于强烈的失望感而加倍浓厚。1989~1991年的苏联解体彻底逆转了许多小资产阶级心中的自我形象，民族和前途的形象。反对美国霸权的对抗力量的存在，在许多人——包括国大党领导人——心目中尤其珍惜。工人世界在被失业和暴力萦绕着的碎片化和“非雇佣化”的临时就业过程中稀释了。这个过程始于1960年代。它与苏联的终结无关，却毫无疑问加剧了没有其他替代性选择的感觉。在乡村衰落的同时，城市再次身价倍增。甘地道路终止了。小资产阶级愈益加剧的分裂，渴望高消费群体的出现和“中产阶级”一词外延的无限扩大，三者相辅相成。

自1989年以来，新自由主义集团对于曼达尔事件的干预日趋极端。有人扬言民族走向崩溃。有人带着似乎与已经投入的教育资金相称的火气，或是大谈“业绩”和公正，或是加以否定。一张美国文凭值一条超级“新生代”的绶带，不过两者肯定互不干扰。大部分反对派具有深刻却很少被人接受的信念：高等群体“值得”……高级公务员职位所赢得的社会承认。业绩概念似乎超越了薪水微薄的雇员与高级干部之间的差距，消解了处于贫困边缘阶层与小富阶层之间的种种对立。然而，与之相伴的是被认为腐败而缺乏竞争的国家雇员形象的泛化和贬值。

1990年7月，有利于提出配额制的一个决议的公布，在几乎所有的中学、大学和学院中引发了示威游行，这样的抗议活动只在南方的小部分地区得以幸免。许多女孩子破天荒第一次投入了这种类型的运动。这场动乱还把富裕的、不太富裕的或者往往十分贫困的新生代同诸如锡克教徒和基督教徒等偏离中心的富裕社群结合了起来。在北部和西北部，示威游行很快就转变成骚乱。除了许多警车之外，还有一些火车、县市政府和大学建筑被毁。整个恒河和中央平原的所有公路都被封锁。发生冲突以来造成150多人被杀的这种极端暴力活动，由于青年们大规模和戏剧性的自我献身而变得尤为惨烈。这是高种姓印度教徒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与新自由主义的巧言蛊惑合流了。170名大学生试图自焚或者服毒自杀，其中67人达到了目的，而辛格被英文报纸和印地语民族主义媒体（不很尖锐地）指责为杀害孩子和背叛他的出身阶层的刽子手。曼达尔的措施是民众性的。这样的措施将被接受。青年们懂得了制约。“中产阶级”正在失去其神圣性。国家同样也将失去自己的地位。高等级的富裕阶级将谋求需要熟练技能的私营企业的工作或者国外的职位。各个农民种姓的成员和极低种姓的精英，正在缓慢地逐步厕身于行政管理这个大齿轮系统之中。

巨富中产阶级

因此，1980年代的诸“中产”阶层在痛苦和惨烈的环境中，经历了日益严重的分化。在小职员和雇员阶层中，青年失业、街头暴力和敲诈勒索开始日渐猖獗。在1985年前后，公共部门的大罢工，锡克族骚乱，社群之间的冲突，皈依伊斯兰教等一再出现的社会创伤震撼了全国和高种姓印度教成员。小资产阶级诸阶层受这些事件的影响尤深。

就全局而言，整个“中产阶级”不再以某个人群和多种可能模式中的某个模式为中心，按照少数人当中的小部分人的怪诞习俗来垂直地组织自己。竭力自我标榜为“中产”并正在占领整个表象阵地的新阶层的崛起，促进或者加剧了这个过程。譬如说，在1980年之前，房地产经纪人和建筑商是业绩不佳的平庸人物，后来随同拆迁人员、贫民区纵火者、小储户和保险代理商这个星系一起，不断上升。利用他们的代议职能来做某种交易的政治家们依然如故。他们变成了统治者，而且越来越贪婪。理想主义，民粹主义和奉献等已经过时。竞争的意识形态压倒了一切。金融家、汇兑商和进口商同时跃升，尽管这是一个比较窄的圈子。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公民权倡导者占有独特的地位。他们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是法律的幻想家。在大多数人除了弄虚作假或者颠覆私有制就不能改善自己状况的某些阶层中间，他们经常摆出告发者的残酷姿态。他们是移民中产阶级的保卫者，因为这个阶级在各种变革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对贫民窟的存在感到震惊，面对种种暴力活动吓得心惊胆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公民权倡导者握有很大一部分199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安全话语权。在部分这样的群体中，分享或者互助即使是在族内种姓中间，也变成完全不合时宜的东西。

训练有素的精英向英美世界的权力和文化中心的迁移正在

加剧。高种姓的或者富裕的少数民族的大资产阶级的一些重要群体，最终被默认为中产阶级的模式。这个模式通过非常住本国的印度人、富裕的旅行者和大众传媒得到传播。他们是高级行政官员、工业家或者进口商。作为一种见证，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1991年指出，富裕的印度人比北美的富翁有更多的财产，而且更爱炫耀。然而，他所说的那些人不但过去都自称“中产阶级”，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这样说。这种有利于比以往更同质和阔绰的新统治阶级的观念的转变或者说欺世盗名，在曼达尔事件之后的政治舞台上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左派批判的消失，“历史上的”中产阶级的缺乏安全感，普遍的认同性困惑，凡此种种使得这种观念得以畅行无阻。人数众多而且精明的富裕民众阶层，逐步脱离了阵营。他们至少从这个印度——用英语来表达，相信“市场”，试图把某些“加利福尼亚式”的飞地移植到国内并加以保护——的空间中消失了。即使是极其婉转地说，这样的演变使雇员乃至自由职业者和小富的管理人员阶层感到不适，他们不能支持这种巨大浪费，也不能认同这个高等阶级的文化变革。

“藏红花色浪潮”

“藏红花色浪潮”，或者说从1984年开始的联邦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在政治、组织、认同和社群方面的崛起，乃是近20年来最大的运动。民族团结和卫教（以及创新）深刻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文化反革命是由出生于20世纪初和60年代之间的一些印度教群体发动的。它是与中产阶级的各种不同变化深刻地联系着的。发动1974年、1981年、1985年及1990年历次运动的那种类型的高种姓小商人和大学生，在各种组织的发展和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十分强大的作用。全国志愿者组织（Rashtriya Swayamsewak Sangh——RSS）、世界印度教论坛

(Vishwa Hindu Parishad——VHP)、孟买湿婆军 (Shiv Sena de Mumbai) 等组织, 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干部, 那么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围绕着公共服务部门的形象和结构运转。但是, “藏红花色浪潮” (这是当地的说法) 由于围绕得到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启发或支持的高种姓职员和商人的组织框架, 重组了一切等级、阶级和阶层的印度教群体及若干非印度教群体, 保持着与众不同的影响。它能够动员巨大的青年群体。

印度教民族主义扎根于 19 世纪印度教的若干改革和动员计划。它以鼓吹现代化的演说家们天花乱坠地描述的英国化的某些框架 (特别是生产力主义和强权逻辑) 为基础, 先是在东部和西部的殖民堡垒中发展起来, 然后持久地植根于北部和中部。处于英国化的教育体系和印度教改良主义十字路口的一些学习自然科学的造反派大学生、医生和其他青年, 不如说他们是空论家。商人、业主和食利者以及他们的弟子构成了第一批干部。南部长期以来没有太多地受到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 原因在于种族色彩的本土主义、渐进主义、地区主义和反婆罗门运动占有一席之地。1920 年代形成并在后来的 40 年间加以修订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世色彩”的学说, 期望印度大地成为宗教的源头, 而宗教则是一种文化和文明, 而不只是礼拜仪式和信仰的一个集合体。其他各种宗教可以存在, 但多数派, 也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所说的“圣地”的“合法的孩子”, 理应具有优势和崇高地位。这种民族主义的部分创始人既不相信神, 也不相信神话。他们的目的是利用经过重新诠释的符号的力量, 在“古老”内涵里注入“现代”原理。这是期望获得统治者地位的被统治者的计划。对于领导民族运动的英国化阶层而言, 两者之间存在着既是“下属”又是竞争的关系。

同伊斯兰教或者穆斯林对抗并非是印度教改革的核心, 但这种对抗在各种组织的诞生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全国志愿者组

织作为一系列社群间骚乱时的自卫队组织，诞生于1925年。当时，它是一种往往封闭的政治宗派，与同一时代在埃及（也是在英国统治下：其间有着某种机缘）建立的穆斯林兄弟会不无相像。它试图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hindu rastra），来代替英国的议会民主。但是，其要旨则是将被认为适用于所有印度教徒的礼仪、符号和综合文化的规范，贯彻到各个分支组织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个运动试图构建、动员被认为是同一个文化—文明集合体的两面的社群集合体和宗教集合体，使之标准化、集权化和大众化。

伴随奠立印度联邦基础的分治协议破裂而来的，是大量的宗教间冲突。这是运动发展的第一阶段。随后，它常常利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诸多冲突。许多印度教徒患有自卑综合征，面对只占少数的穆斯林（1961年，占人口的10%）既怕又恨。由一些穆斯林的好斗人士以及他们的精英对于印度教徒和巴基斯坦政策文化上的和宗教上的蔑视所引起的这类情绪，在没有安全感的小资产阶级和冲突不断的西部和北部城市中殊为流行。

在独立之际，甘地被暗杀，从而导致建立了全印大学生理事会（ABVP，1949年）和印度人民党（Bharatya Jan Sangh，1951年）运动的退却，以在大量发展分部和建立干预部门之前保护自己。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首先在高种姓的商人、地主和职员中间扎根。它在1967年以其不尚空谈的纲领——激烈反对巴基斯坦、公开拥护诸如保护神牛等高种姓象征——获得了第一次选举的胜利。在通过对民主的思考（尽管始终试图“超越”民主，但最终不得不接受它）而进行的某种理论“修订”之后，它在1974年的几次运动及随后对于紧急状态的对抗中名声大振。当时，一种多少有些奇特的封闭倾向尽管散发着法西斯主义的尸臭和对古老的英雄时代的怀旧气息，却成为能够标榜独创的一种社会运动。这样的倾向在人民

党这个由代表左翼、农民和中右的五个政党组成的联盟的经验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人民党的失败在全国志愿者组织及其前卫派别——1966年以来面临湿婆军的地区主义和城市运动的竞争——中引起新的面向社会现实的反思。历来以“民众”或者“民族”为标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自己的队伍向非印度教徒开放。始终坚持这样做的湿婆军有着强大的民间基础，开辟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民众化的道路。它对于各种象征性标志的大规模使用，它的细致而开放的组织方式，它在面临使用暴力时的毫无禁忌，凡此种种无不得到明显的模仿。

全国志愿者组织在1964年创立了世界印度教论坛。这个组织试图统一宗教礼拜，倡导互助，阻止转宗。1983年，值统一圣母大游行——以迎神的形式配上大量的视听手段，列队抬着一个装满恒河水的巨大羊皮袋走遍全国——之际，它发动了“藏红花色浪潮”。大游行激发了远超出活动通常参与者的巨大热情。从1984年开始，宣传集中于夺回恒河平原的一个小清真寺上。人们开始在滔滔不绝的演说中谈论“印度教性”（hindutva）。宣传家们解释说，这个清真寺建在原来的一座印度教寺庙的基石上。这些柱石依然可见。这个古迹被选作穆斯林狂妄自大和专横压迫的象征。由于某些复杂的原因，拆毁清真寺来重建一座印度教大寺庙的计划掀起了巨大的民众支持浪潮。数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同路人以及教徒参加了运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越发密集地进行符号创新、示威游行和宣传手段的寻找。烧制寺庙用砖（1987~1988年）便是一个利用事端的非同寻常的行动。27万村民和各地百姓被组织进各种委员会，也许人人都认为自己是能够洗雪殖民地耻辱的新历史的创造者。组织者们强调印度教徒（一切阶级、种姓、教派、部族、家族和迫不及待来到的其他群体）的团结，而事件本身提高了参与者的身价（烧制的砖是神圣的）。蜂拥而来的群众性朝圣使国家四分五裂，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暴力活

动。印度教成为争论的对象和极易转变为多疑的自尊的动因，至少造成了恐惧。有人同时试图解释为什么印度之母（Bharatmata）的圣地宗教同样也是一个预示和超越一切“世俗”烦恼的宽容模式。国家电视台在收视最高时段播放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数以千计的集会和迎神游行炫耀着团结、规划和加强“我们—印度教徒”的计划。对于这个国家的冲击却有增无减：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社群间的争斗，克什米尔暴乱，东北部的多次暴动，比哈尔邦的游击战，穆斯林和锡克人的凶杀，派往斯里兰卡的远征军的失败，同巴基斯坦的对峙，如此等等。1990年警察两次排枪射杀朝圣者，促使压力上升。1992年，争议中的清真寺被据说有10万之众的人群拆毁。这个悲剧之后接踵发生的是一些地区，尤其是在比哈尔邦和古吉拉特邦与穆斯林青年的十分激烈的冲突和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屠杀。

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和湿婆军）政治上的崛起始于1989年。1993年后继续上升，直至1998年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同盟上台执政。印度人民党，继后是世界印度教论坛脱离全国志愿者组织而独立。这个党同以前执政的党派相比，治国之道既说不上更好，也确实说不上更坏。有一段时间，它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它超越了烦人的新自由主义的圣经，但这只是一种幻觉。古吉拉特邦2002年的几次屠杀大致说明了1969年以来不断困扰着这个地区的形势和紧张局面。这些动乱见证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顽劣的极端主义，以及这个西部骚乱地区的富人们所怀有的恼怒和恐惧。“藏红花色浪潮”远不止变换了一个政府或者挑起了暴乱浪潮。恰恰是借助对于符号领域的卓越的操纵及印度教教徒形象的某种模糊却又实在的改变，这个浪潮对社会产生了冲击。在此后的20年间，它成为能够与追求美国梦的狂想和商业电影匹敌的想象力源泉。

印度教民族主义对于“中产阶级”的影响同这些组织在职

员和小商人中间的普及性相关。印度教民族主义计划赋予高种姓中产阶级的那些缺乏精神支柱的阶层以信念，这种信念虽然模糊而具有侵他性，却确立了完全的自信心。它还超越了穷人与富人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和曼达尔事件所揭示的种姓壁垒。在一个缺乏替代性选择的时代，对于部分印度人，首先是小资产阶级来说，似乎需要这些极端行为，以感觉到自己组成了一个民族。这个运动摇摆于狂妄自大与虚无主义之间，困难地行进着。我们不想对此进行详细描述。

这样的狂热和仇恨不可能不对配额受益者和穷人这两个多数群体造成损害而长期持续下去，于是矛头转而对准穆斯林少数民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个范畴，开始针对制造现代主义黄金时代美梦的说教。一个经过修订并结合现实的密集符号体系，试图把一切人的发展前景，对于高种姓的优越感和工作的关注，对于绝大多数人的印度教文化认同性的维护，移居国外者的文化定位问题及英国化较弱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等，统统覆盖和融合起来，出现了精英的某种程度的更新。在这个运动的框架内，高种姓成员与各种不可接触者之间，或者高种姓成员与形形色色的地区主义者之间的新联盟应运而生。正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及其对于得到社会承认的渴望，促使一个不可接触者阶层的妇女得以从 1995 年至今三次执政，领导北方邦及其 1.5 亿居民。

这个国家的所有“中产阶级”并不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但可以多次看到超越“中产者”内部的种种差异并将“中产者”同社会其他阶层联结起来的某些形式的统一行动。民族的和文化的宗教混合性发挥着良好作用。朝圣活动汇集了近千万人，他们在这些富有战斗性的行动中发现了某种形式的博爱。一些大富豪、资本家、极其时髦的人物和非常住国内的不可忽视的部分印度人（移居国外的侨民）也积极参与了“藏红花色浪潮”。一股“激流”的形象发挥了很大作用。它无疑是简单化

的，但并非假象。如果说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重新赋予高种姓成员以某种地位和尊严，那么它同样也以过去不可想象的方式使他们面对巨大的融合热情，加强了他们同其他群体——低种姓的农民和其他人——的合作。这些情感和事件承载了十分强烈的情绪的包袱。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只操纵了大学生和职员，来制造社会团结和认同的自信；同样可以看到相反的效果。

反穆斯林的侵他性，普遍的仇外情绪，无不具有某些可怕的后果。如果说出现了文化的粗野化和粗野文化的强化或者确立，那么试问这个运动是否也在一些受到混乱威胁的群体中多少引入了组织结构、规则、界标和栅栏。印度教教徒最终没有走上起义暴动的锡克教教徒的道路。种种阵发性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手段，用以克服某些骚动，特别是可怕的性压力。小资产阶级激愤到极点，被引入违法的歧途。他们终于能够购买鳄鱼牌T恤了。他们适应了极度竞争的氛围，不可或缺的乐观主义与世界末日的短暂却刻骨铭心的感觉在心头交替搅动。这些东西是联系在一起的。撇开了欲望的游戏和恐惧的根源，就不能理解种种暴行。

2004年，印度人民党失去了政权。它没有建成它的那座庙宇，但它的一些思想观念威力尚存。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推进并未刹住新自由主义高涨的势头。它也没有改变国家。它只是使新自由主义的色彩相对变淡，并使人们接受国家的相对贬值。金融家、实业家和高级干部依然被树立为榜样，而富裕阶层越来越频繁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

融合与重组

今天，印度中产阶级的状况是引人注目和混乱的。这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四分五裂的集合体，但它们是借助一系列越来越混杂的参照系和模式制造出来的。最富裕和美国化

的群体决定调子，毫不含糊地左右着整个阶层。他们不喜欢民主。许多人不再为投票选举而操心。他们试图将城市、市民权和公民权据为己有。他们驱赶贫民和无家可归者。1950 ~ 1980 年代的核心模式——稳定的办公室小职员——已经斯文扫地，被报刊、电影和新自由主义的导师们贬得一钱不值，但它对于诸如不可接触者的下层精英和小农等进入“中产地位”的新群体来说，依然是基本模式。俭朴的理想，稍许带一点苦行色彩，或多或少表现出自我满足，凡此种种变成不合时宜或者有时甚至是可笑的东西。“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随着配额事件的爆发正在按照社群激烈分化。膜拜市场发挥了作为一种脱身之计、自卫体系和自我肯定手段的作用。“神圣的中产阶级”感到备受羞辱。它眼见自己被祛除了神圣光环，强烈地感到不公。最有竞争力的人们的美国化，其他人的狂怒，治愈了社会创伤。

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其他阶层中的普及，导致整个中产阶级的新的圣化。“伟大的印度中产阶级”（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软件制造者和设计者阶层正在发布新一轮的先知预言。他们是新时代的化身。民族主义的忧虑并未消失。它正在改变。人们正在从抱怨和诉求的话语转向开心订货的话语。不必讨论什么超验的彼岸事物。不再有什么节制问题。关税的壁垒减少了。10%的人口确实手里有钱，而且一心想着发财致富，掌握更多的钞票。正在时兴的宗教膜拜乃是发财。它的代言人和宣传家则是高等中产阶级。同过去相比，它正在变成一个更加统一、更加人数众多和更加城市化的统治阶级。

中产阶级的下层——他们此时此地还是中产阶级吗？——试图保持一个为一切人服务的国家，一个为他们而战的国家，一个以“印度教特性”或其他足以燃起强大激情的象征性符号的名义建立在大众基础上的国家（锡克教运动同“藏红花色浪潮”十分相似，某些穆斯林的自我肯定行动、若干地区主义运动和种姓运动也是如此）。许多人在这样的演变中失去了某些东

西——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失去了社会承认或者安全。他们颇感疲劳。他们试图赶超巨富的掠夺者们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个过程可能产生种种张力和失落。部分青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如果同日益不稳定的经济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那么富裕和巨富阶层吹捧中产阶级的这种标签的转换，很可能导致认同性的其他扭曲。然而，以往的30年虽然骇人听闻，但毕竟说明了印度社会治疗创伤和创造机会的能力。

参 考 书 目

ACCARDO Alain, *Journalistes précaires*, Bordeaux, Le Mascaret, 2001.

ACHCAR Gilbert, *Le choc des barbaries. Terrorisme et désordre mondial*, Bruxelles, Éditions Complexe, 2002.

— *La nouvelle guerre froide*, Paris, PUF, 1999.

AGRIKOLIANSKY Éric, FILLIEULE Olivier, MAYER Nonna, *L'altermondialisme en France. La longue histoire d'une nouvelle cause*, Paris, Flammarion, 2005.

ALALUF Mateo, *Le temps du labeur. Formation, emploi et qualification en sociologie du travail*, Bruxelles, Institut de sociologie, Éditions de l'ULB, 1986.

AMIN Samir, *Pour un monde multipolaire*, Paris, Syllepse, 2005.

ANDRÉANI Tony, VAKALOULIS Michel (dir.), *Refaire la politique*, Paris, Éditions Syllepse, 2002.

APPAY Béatrice, *La dictature du succès. Le paradoxe de l'autonomie contrôlée et de la précarisation*, Paris, L'Harmattan, 2005.

APPELBAUM Eileen, BERNHARDT Annette, MURNANE J. Richard (eds.), *Low-Wage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2003.

ARENDT Hannah, *Condition de l'homme moderne*, Paris, Calmann-Lévy, 1961.

ARONOWITZ Stanley, *From the Ashes of the O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8.

ARTOUS Antoine, *Travail et émancipation sociale*, Paris, Syllepse, 2003.

ATTAC, *Quand les femmes se heurtent à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Fayard, Mille et une nuits, 2003.

AZAÏS Christian, CORSANI Antonella, DIEUAIDE Patrick (dir.), *Vers un capitalisme cognitif. Entre mutations du travail et territoires*, Paris, L'Harmattan, 2001.

BACON David, *The Children of NAFT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BAKHTINE Mikhaïl, *Le marxisme e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7.

BASAURE Mauro, « Fin de las clases ? », *Actuel Marx Intervenciones*, n° 2, Santiago, septembre 2004.

BAUDELLOT Christian, ESTABLET Roger, *L'école primaire divise*, Paris, Maspéro, 1975.

— *L'école capitaliste en France*, Paris, Maspéro, 1971.

BAUDELLOT Christian, MAUGER Gérard (dir.), *Jeunesses populaires. Les générations de la crise*, Paris, L'Harmattan, 1994.

BAO Xiaolan, *Holding More than Half the Sk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BAUTIER Élisabeth, ROCHEX Jean-Yves, *L'expérience scolaire des nouveaux lycéens. Démocratisation ou massification ?*, Paris, Armand Colin, 1998.

— « Apprendre : des malentendus qui font la différence », dans Jean-Pierre Terrail [1997].

BEAUD Stéphane, *80 % au bac... et après ? Les enfants de la démocratisation scolaire*,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et Syros, 2002.

BEAUD Stéphane, PIALOUX Michel, *Violences urbaines, violence sociale. Genèse des nouvelles classes dangereus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3.

— *Retour sur la condition ouvrière. Enquête aux usines Peugeot de Sochaux-Montbéliard*,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9.

BELL Daniel, *Vers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6.

BENHAMOU Françoise, *L'économie du star-system*, Paris, Éditions Odile Jacob, 2001.

BÉROUD Sophie, MOURIAUX René, VAKALOULIS Michel, *Le mouvement social en France. Essai de sociologie politique*, Paris, La Dispute, 1998.

BIDET Jacques, *Explication et reconstruction du Capital*, Paris, PUF, 2004.

BIDET Jacques, TEXIER Jacques (dir.), *La crise du travail*, Paris, PUF, 1995.

BOCCARA Paul, « Défis identitaires de classe des salariés. Des divisions et rapprochements affectant les travailleurs et la classe ouvrière à la montée de l'identité de l'ensemble salarial », *Économie et politique*, n° 588-589, 2003.

BOLTANSKI Luc, CHIAPELLO Eve,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limard, 1999.

BONNÉRY Stéphane, « Décrochage cognitif et décrochage scolaire », dans Dominique Glasman, Françoise Ceuvrard (dir.), *La déscolarisation*, Paris, La Dispute, 2004.

BONNEWITZ Patrice, *Premières leçons sur la sociologie de Pierre Bourdieu*, Paris, PUF, 1998.

BOUFFARTIGUE Paul (dir.), *Le retour des classes sociales. Inégalités, dominations, conflits*, Paris, La Dispute, 2004.

- *Les cadres. Fin d'une figure sociale*, Paris, La Dispute, 2001.
- BOURDIEU Pierre, *Contre-feux 2*, Paris, Raisons d'Agir, 2001.
- *Propos sur le champ politique*, Lyon, PUL, 2000.
- *Raisons pratiques. Sur la théorie de l'action*, Paris, Seuil, coll. « Points Essais », 1994.
- (dir.), *La misère du monde*, Paris, Seuil, 1993.
- *La noblesse d'Éta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9.
- *Choses dite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7.
- *Ce que parler veut dire.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82.
- *La Distinctio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9.
- « Avenir de classe et causalité du probable »,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vol. XV, 1974.
- BOURDIEU Pierre, PASSERON Jean-Claude, *La reproduction*,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0.
- *Les héritier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4.
- BRONFENBRENNER Kate et al. (eds.), *Organizing to W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RUNHOFF (de) Suzanne, GARO Isabelle, SERFATI Claude, WAGNER Anne-Cécile, ZALIO Pierre-Paul, *Bourgeoisie : état d'une classe dominante*, Paris, Syllepse, 2001.
- BUHLE Paul,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 BURAWOY Michael,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 « Terrains of Contest : Factory and State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 *Socialist Review (USA)*, vol. 11, n° 4, 1981.
- CAILLÉ Alain, « La sociologie de l'intérêt est-elle intéressante ? », *Sociologie du travail*, n°3, 1981.
- CAPDEVIELLE Jacques, *Modernité du corporatism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Po, 2001.
- CASTEL Robert, *L'insécurité sociale. Qu'est-ce qu'être protégé ?*,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3.
-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 Une chronique du salariat*,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5.
- CHENU Alain, *Les employés*,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94.
- CHAUVEL Louis, « Le retour des classes sociales ? », *Revue de l'OFCE*, n° 79, 2001.
- CHESNAIS François, *La mondialisation du capital*, Paris, Syros, 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1997.
- CHOPART Jean-Noël, MARTIN Claude (dir.), *Que reste-t-il des classes sociales ?*, Rennes, Éditions ENSP, 2004.

CLOT Yves, *Le travail sans l'homme ? Pour une psychologie des milieux de travail et de vi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5.

COING Henri, *Rénovation urbaine et changement social*, Paris, Les Éditions ouvrières, 1966.

COLLOVALD Annie, *Le populisme du FN. Un dangereux contresens*, Bellecombe-en-Bauges, Éditions du Croquant, 2004.

CONCIALDI Pierre, PONTHEUX Sophie, « L'emploi à bas salaire : les femmes d'abord », *Travail, genre et sociétés. La revue du MAGE*, 1/1999.

CONTREPOIS Sylvie, *Syndicats, la nouvelle donne. Enquête sociologique au cœur d'un bassin industriel*, Paris, Éditions Syllepse, 2003.

COULANGEON Philippe, *Sociologie des pratiques culturelles*, Paris, La Découverte, coll. « Repères », 2005.

— *Les musiciens interprètes en France. Portrait d'une profession*,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04.

— *Les musiciens de jazz en France*, Paris, L'Harmattan, 1999.

COURS-SALIES Pierre, « "Individualisme possessif" et démocratie », Colloque international à Sofia (5-7 septembre 2003), dans Anna Krasteva, Antony Todorov, *Conflits, confiance, démocratie*, Sofia, Éditions Nouvelle Université Bulgare, 2004.

— « Un futur antérieur et un présent », dans Pierre Cours-Salies, Michel Vakaloulis [2003].

— « Droits sociaux d'hier », dans Tony Andréani, Michel Vakaloulis [2002].

— « Temps de travail et nouvelles segmentations sociales », *Sociologia del lavoro*, n° 74-75, 1999, repris dans Claude Durand, Alain Pichon (dir.), *Temps de travail et temps libre*, Bruxelles, De Boeck, 2001.

— « Travail, économie et politique », *Critique communiste*, n°152, 1998.

— *La liberté du travail* (coord.), Paris, Syllepse, 1995.

— *La CFDT. Un passé porteur d'avenir*, Paris, La Brèche, 1988.

COURS-SALIES Pierre, VAKALOULIS Michel (dir.), *Les mobilisations collectives. Une controverse sociologique*, Paris, PUF, coll. « Actuel Marx Confrontation », 2003.

CRETTEZ Xavier, SOMMIER Isabelle (dir.), *La France rebelle*, Paris, Éditions Michalon, 2002.

CROZIER Michel, HUNTINGTON Samuel, WATANUKI Joji,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5.

DARES, « Les conflits de travail en 2002 et 2003 », *Premières Informations-Synthèses*, n°18. 4, 2005a.

— « Les conflits de travail en 2004 », *Premières Informations-Synthèses*, n°45. 1, 2005b.

— « Les conflits de travail en 2001 », *Premières Informations-Synthèses*, n°34, 2003.

— « Les conflits de travail en 2000 », *Premières Informations-Synthèses*, n°9. 1, 2002.

DECOUFLE André, *Sociologie des révolutions*, Paris, PUF, coll. « Que sais-je ? », 1968.

DENIS Jean-Michel (dir.), *Le conflit en grève ?*, Paris, La Dispute, 2005.

DUBAR Claude, *La socialisation, construction des identités sociales et professionnelles*, Paris, Armand Colin, 2002 (première édition 1991).

DUBOIS Vincent, *La politique culturelle. Genèse d'une catégorie d'intervention publique*, Paris, Belin, 2000.

DUCHESNE Françoise, VAKALOULIS Michel (dir.), *Médias et luttes sociales*,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2003.

DURAND Jean-Pierre, *La sociologie de Marx*, Paris, La Découverte, coll. « Repères », 1995.

DURKHEIM Émil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aris, PUF, nouvelle édition, 1930.

ELIAS Norbert, *La société des individus*, Paris, Fayard (Pocket), 1991.

ELIAS Norbert, SCOTSON L. John, *Logiques de l'exclusion*,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7.

FEATHERSTONE Liza, *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 London, Verso, 2002.

FERRY Jean-Marc, *L'allocation universelle*,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1995.

FOREST David, *Le prophétisme communicationnel. La société de l'information et ses futurs*, Paris, Syllepse, 2004.

FORQUIN Jean-Claude, *École et culture. Le point de vue des sociologues britanniques*, Paris et Bruxelles, De Boeck et Larcier, 1996.

FRANK Robert, COOK Philip,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GAUTHIER Élisabeth, LOJKINE Jean (dir.), *Classes sociales, retour ou renouveau ?*, Paris, Syllepse/Espaces Marx, 2003.

GEAY Bertrand, *Le syndicalisme enseignant*,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nouvelle édition).

— *Profession : Instituteurs. Mémoire politique et action syndicale*, Paris, Seuil, 1999.

GIDDENS Anthony, *La troisième voie. Le renouveau de la social-démocratie*, préface de Jacques Delors, Paris, Seuil, 2002.

— *Beyond Left and Right*, London, Polity Press, 1994.

GRASON Daniel, MASSERA Bernard, *Chausson : une dignité ouvrière*, Paris, Syllepse, 2004.

GROUX Guy, LÉVY Catherine, *La possession ouvrière. Du taudis à la propriété (XIX^e-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1993.

GULLUY Christophe, NOYÉ Christophe, *Atlas des nouvelles fractures sociales. Les classes moyennes oubliées et précarisées*, Paris, Éditions Autrement, 2004.

HALBWACHS Maurice, *Classes sociales et morphologi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2.

HETZEL Anne-Marie et al, *Le syndicalisme à mots découverts. Dictionnaire des fréquences (1971-1990)*, Paris, Syllepse, 1998.

HIRATA Helena, « Concilier vie familiale/vie professionnelle : hypothèses à partir d'une enquête de terrain », WZB-Centre Marc Bloch-GERS/CNRS, colloque franco-allemand « Marché du travail, politiques familiales et rapports de genre. Regards croisés franco-allemands », Berlin, 12-13 novembre 2004, paru dans *Feministische Studien*, hiver 2005.

— « Rapports sociaux de sexe et division du travail. Contribution à la discussion sur le concept du travail », dans Jacques Bidet, Jacques Texier [1995].

HIRATA Helena, KERGOAT Danièle, « La division sexuelle du travail revisitée », dans Margaret Maruani [1998].

HIRATA Helena, LABORIE Françoise, LE DOARÉ Hélène, SENOTIER Danièle, *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féminisme* (dir.), Paris, PUF, 2000.

HIRSCHMANN O. Albert, *Face au déclin des entreprises et des institutions*,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1972.

HOCHSCHILD L. Jennifer, *What's Fair ?*,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HOGGART Richard, *La Culture du pauvre. Étude sur le style de vie des classes populaires en Angleterr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70.

ION Jacques, *La fin des militants ?*,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coll. « Enjeux de société », 1997.

ISAMBERT-JAMATI Viviane, *Les savoirs scolaires. Enjeux sociaux des contenus d'enseignement*, Paris, L'Harmattan, 1995.

KABEER Naila, « Travailleuses du tiers-monde : pour ou contre l'instauration de droits fondamentaux du travail », *Les Mondes du travail*, Amiens, Université de Picardie, n° 1, 2006.

KELLY John, *Rethinking Industrial Relations. Mobilization, Collectivism and Long Waves*, London, Routledge, 1998.

KOUVÉLAKIS Eustache, VAKALOULIS Michel, « Le retour d'une affaire classée », *L'Homme et la société*, n° 117-118, 1995.

KRIS Ernst, KURZ Otto, *L'image de l'artiste, mythe et magie*, Marseille, Rivages, 1987.

LAHIRE Bernard, « Savoirs et techniques intellectuelles à l'école primaire », dans Agnès Van Zanten (dir.), *L'école. L'état des savoir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0.

— *Culture écrite et inégalités scolaires. Sociologie de l'« échec scolaire » à l'école primaire*, Lyon, PUL, 1993.

LAMONT Michèle, *La dignité des travailleurs. Exclusion, race, classe et immigration en France et aux États-Unis*, Paris,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2002.

LEFEBVRE Henri, *L'irruption, de Nanterre au sommet*, Paris, Syllepse, 1998 [1968].

LE GOFF Jacques, NORA Pierre (dir.), *Faire de l'histoire I, Nouveaux problèmes*, Paris, Gallimard, 1974.

LEHMANN Bernard, *L'orchestre dans tous ses éclats. Ethnographie des formations symphonique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2.

LENEVEU Claude, VAKALOULIS Michel (dir.), *Faire mouvement, Novembre-décembre 1995*, Paris, PUF, 1998.

LICHTENSTEIN Nelson, *State of the Un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LIPIETZ Alain, *La société en sablier. Le partage du travail contre la déchirure social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6.

LIPPMANN Walter, *Essays in the public philosophy*, Boston, Little Brown, 1955.

LOJKINE Jean, *L'adieu à la classe moyenne*, Paris, La Dispute, 2005.

— *Le tabou de la gestion. La culture syndicale entre contestation et proposition*, Paris, Éditions de l'Atelier, 1996.

— *La révolution informationnelle*, Paris, PUF, 1992.

LOUIE Miriam Ching Yoon, *Sweatshop Warriors*,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1.

MANN Patrice, *L'action collective. Mobilisation et organisation des minorités actives*, Paris, Armand Colin, 1991.

MARUANI Margaret (dir.), *Les nouvelles frontières de l'inégalité. Hommes et femmes sur le marché du travail*,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8.

MARTIN Hans-Peter, SCHUMANN Harald, *Le piège de la mondialisation*, Paris, Actes Sud, 1997.

MARX Karl, *Le Capital*, Paris, Éditions sociales, 1976.

— *Le 18 Brumaire de Louis Bonaparte*, Moscou, Éditions du Progrès, 1955.

MARX Karl, ENGELS Friedrich, *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 Paris, Nathan, 1982.

MASCLET Olivier, *La gauche et les cités. Enquête sur un rendez-vous manqué*, Paris, Éditions La Dispute, 2003.

MATHIEU Lilian, *Comment lutter ? Sociologie et mouvements sociaux*, Paris, Les Éditions Textuel, 2004.

MATTHEWS Glenna, *Silicon Valley Women and the California Drea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ENGER Pierre-Michel, *Les 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 Sociologie d'une exception*, Paris, Éditions de l'EHESS, 2005.

— *Portrait de l'artiste en travailleur*, Paris, Le Seuil, 2003.

— *La profession de comédien. Formations, activités et carrières dans la démultiplication de soi*,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97.

MILKMAN Ruth (ed.), *Organizing Immigrants. The Challenge for Contemporary California*,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TTER Swasti, ROWBOTHAN Sheila (ed.), *Women Encounter Technology : Changing Patterns of Employ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1995.

MOURIAUX René, *Crises du syndicalisme français*, Paris, Montchrestien, coll. « Clefs-Politique », 1998.

— *Le syndicalisme enseignant en France*, Paris, PUF, 1996.

— *Syndicalisme et polit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ouvrières, 1985.

MOURIAUX René, PERNOT Jean-Marie, « Le tabou des relations syndicats-partis en France », dans Michel Vakaloulis [1999].

NAIR Sami, *L'Empire face à la diversité*, Paris, Hachette, 2003.

NAVILLE Pierre, *Vers l'automatisme social ? Problèmes du travail et de l'automation*, Paris, Gallimard, 1963.

NEGRI Antonio, HARDT Michael, *Empire*, Paris, 10/18, 2000.

NOIRIEL Gérard, *Les ouvriers dan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6.

PAUGAM Serge, *Le salarié de la précarité*, Paris, PUF, 2000.

PELLOW N. David, SUN-HEE PARK Lisa, *The Silicon Valley of Dream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PERRIN Évelyne, *Chômeurs et précaires au cœur de la question sociale*, Paris, La Dispute, 2004.

PETIT Pascal, « Mondialisation », dans *Dictionnaire de sociologie*, Le Robert, supplément, 2000.

PINÇON Michel, PINÇON-CHARLOT Monique, *Sociologie de la bourgeoisie*, Paris, La Découverte, coll. « Repères », 2000.

— *Voyage en grande bourgeoisie. Journal d'enquête*, Paris, PUF, 1997.

POLIAK F. Claude, *La vocation d'autodidacte*, Paris, L'Harmattan, 1992.

POLLIN Robert, LUCE Stéphanie, *The Living Wag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POIRRIER Philippe, *L'État et la culture en France*,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France, 2000.

POUPEAU Franck, *Contestations scolaires et ordre social. Les enseignants de Seine Saint-Denis en grève*, Paris, Syllepse, 2004.

PUDAL Bernard, *Prendre parti. Pour une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 PCF*, Paris,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1989.

QUIMINAL Catherine, « Les associations de femmes africaines en France. Nouvelles formes de solidarité et individuation », *Cahiers du Gedisst*, n° 21, 1998.

RAMBACH Anne, RAMBACH Marine, *Les intellos précaires*, Paris, Fayard, 2001.

ROBIN Jacques, *Quand le travail quitte la société post-industrielle*, tome 2, Paris, Grit Éditeur, 1994.

ROLLE Pierre, *Travail et salariat. Bilan de la sociologie du travail*,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88.

ROPÉ Françoise, TANGUY Lucie (dir.), *Savoirs et compétences. De l'usage de ces notions dans l'école et l'entreprise*, Paris, L'Harmattan, 1994.

ROSANVALLON Pierre, *La question syndicale*, Paris, Fayard, 1988.

— *La crise de l'État-providence*, Paris, Seuil, 1981.

ROTHMAN Hal, DAVIS Mike (eds.), *The Grit Beneath the Glitt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ROY Donald, « Quota restriction and goldbricking in a machine shop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67, n° 2, 1952.

ROZÈS Stéphane, « La renationalisation du débat européen », *Le Débat*, n° 136, septembre-octobre 2005.

— « Malaises dans la mondialisation », *Contretemps*, n° 2, 2001.

— « La grève par procuration à l'égard des mouvements sociaux révèle un nouveau cycle idéologique de l'opinion », dans Michel Vakaloulis [1999].

RUBIN Lillian, *Families on the Fault Line*, New York, Harper's Collins, 1994.

SCHWARTZ Olivier, *La notion de « classes populaires »*, habilitation à diriger des recherches en sociologie, Université de Versailles/Saint-Quentin-en-Yvelines, 1998.

— *Le monde privé des ouvriers. Hommes et femmes du Nord*, Paris, PUF, 1990.

SCOTT C. James,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Yale, New Haven, 1990.

SENNETT Richard, *Le travail sans qualité*, Paris, Albin Michel, 2000.

SERFATI Claude, *La mondialisation armée. Le déséquilibre de la terreur*, Paris, Textuel, 2001.

SÈVE Lucien, *Commencer par les fins. La nouvelle question communiste*, Paris, La Dispute, 1999.

— *La personnalité en gestation. Je/Sur l'individualité* (dir.), Paris, Messidor/Éditions sociales, 1989.

SILVER Beverly,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作者简介

斯特法内·博内里 (Stéphane Bonnéry) 巴黎第八大学教育学讲师。主要著述有：《认知失速与学校失速》，载于多米尼克·格拉斯曼和弗朗索瓦丝·厄夫拉尔主编《失学》，巴黎，争论出版社，2004；《一个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对于法国学校“失速”的制度性答案》，载于《国际教育评论》杂志，第35期，2004年4月号。

斯特凡·布坎 (Stephen Bouquin) 庞卡底大学社会学讲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乔治·弗里德曼实验室成员。在《前面的未来与政治——欧洲争论评论》上发表过各种不同的论述。他撰写的《螺丝帽的华尔兹——汽车工业中的劳动、集体行动和资本积累》一书近期将在西勒塞出版社出版。

菲利普·库朗容 (Philippe Coulangeon)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变革社会学观察中心研究员。近著有：《文化实践社会学》，巴黎，发现出版社，“方位标”丛书，2005；《法国的音乐演奏家——一个职业肖像》，巴黎，法国文献出版社，2004。

皮埃尔·库尔-萨利 (Pierre Cours-Salies) 国家级政治学博

士，社会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圣德尼）教授。主要著作有：《等级的底层——下层状况的社会构成》（与斯特法内·勒莱联合主编），图卢兹，艾莱斯出版社，2006；《集体动员——一场社会学论战》（与米歇尔·瓦卡卢利斯联合主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昨天的社会权利——斗争与前景》，载于托尼·安德烈亚尼和米歇尔·瓦卡卢利斯主编《重建政治》，巴黎，西勒塞出版社，2002；《社会职业范畴》，载于埃莱娜·伊拉塔、弗朗索瓦丝·拉博里、埃莱娜·勒多阿雷、达妮埃勒·塞诺蒂耶主编《女权主义批判词典》，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劳动自由》（主编），巴黎，西勒塞出版社，1994。

玛丽安娜·德布齐 (Marianne Debouzy) 巴黎第八大学（圣德尼）荣誉教授，美国社会史专家。主要著作有：《美国的野蛮资本主义——1860~1900年》，巴黎，瑟伊出版社，1991；《美国的劳动与劳动者》，巴黎，发现出版社，1990。

贝特朗·热艾 (Bertrand Geay) 普瓦提埃大学社会学讲师，知识、认知与社会关系实验室主任。从事教育现象的政治维度——学校政策、职业认同、社会化过程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教师的工会组织》，巴黎，发现出版社，“方位标”丛书，2005；《小学教师的职业——政治记忆与工会行动》，巴黎，瑟伊出版社，1999。

热拉尔·厄泽 (Gérard Heuzé) 在法国国家研究中心担负研究任务，图卢兹人类学研究中心和印度与南亚研究中心成员。与此相关的主要著作有：《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劳动冲突》（与拉贾帕特·拉伊·贾嘉和马克斯·津斯合著），巴黎，卡塔拉出版社，1993；《现代印度往何处去？》，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93；《印度的劳动者》，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1992；《世纪大罢工》，巴黎，拉马丹出版社，1989；《另一个世界的工人》，巴黎，人文科学之

家出版社，1989。

埃莱娜·伊拉塔 (Helena Hirata) 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性别、劳动、流动性实验室主任。她的主要研究课题是：劳动与失业国际比较；性别与全球化；劳动与情感。近著有：《妇女与全球化》，载于玛格丽特·马卢瓦尼主编《妇女、性别与社会——知识状态》，巴黎，发现出版社，2005；《女权主义批判词典》（与弗朗索瓦丝·拉博里、埃莱娜·勒多阿雷、达妮埃勒·塞诺蒂耶合作主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2004年增订再版。

克里斯蒂安·拉瓦尔 (Christian Laval) 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索菲亚波尔研究室和法国统一工联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世界教育新秩序》（与路易·韦伯合作主编），巴黎，西勒塞-新视点出版社，2002；《学校不是企业——进攻公共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巴黎，发现出版社，2004。

让·卢日金内 (Jean Lojkine)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社会运动研究中心、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荣誉主任研究员。自1980年代以来，他从事社会—技术变化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联系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别了，中产阶级》，巴黎，争论出版社，2005；《时代之战——寻求尺度的劳动》（与让-路易·马来特拉合著），巴黎，拉马丹出版社，2002；《资本主义批判社会学》（主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2；《管理的禁忌——介乎争论与建议之间的工会文化》，巴黎，工场出版社，1996；《手握文凭的青年》，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信息革命》，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2。

热拉尔·莫热 (Gérard Mauger) 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兰西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欧洲社会学中心所长助理。

他还是“行动理性”管理委员会委员。近著有：《提于新形式》（执笔），载于《社会科学研究学报》第136~137期，2001年3月号；《阅读社会科学》（与路易·潘托合作主编），第3卷，1994~1996年，巴黎，艾美斯科学出版社，2000；《阅读史》（与克洛德·F.波利亚克、贝纳尔·皮达尔合著），巴黎，纳棠出版社，1999。

勒内·穆里奥 (René Mouriaux) 1966~2001年任法国国家政治学基金会研究员，从事工会运动、罢工和政治思想史研究，著有将近20部著作，其中包括：《1945年以来的法国工会运动》，巴黎，发现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4年再版；《法国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学论集》（与索菲·贝鲁和米歇尔·瓦卡卢利斯合著），巴黎，争论出版社，1998；《法国工会运动的危机》，巴黎，蒙克里斯蒂安出版社，1998；《工会运动与政治》，巴黎，工人出版社，1985。他和索菲·贝鲁一起主持西勒塞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年鉴》编辑工作。

斯特法内·罗泽斯 (Stéphane Rozès) 舆论专家，1990年以来任巴黎政治学院讲师。近著有：《面临资本主义新进程考验的工会问题》，载于《运动》杂志第43期，2006年1月号；《欧洲争论的新的民族化色彩》，载于《争论》杂志第136期，2005年9~10月号；《政治危机之根源》，载于《争论》杂志第134期，2005年3~4月号。

埃弗利娜·佩兰 (Évelyne Perrin) 任职于巴黎装备部。她发表的主要著作有：《作为社会问题核心的失业者和临时工》，巴黎，争论出版社，2004；《临时性——社会运动的观点》，巴黎，西勒塞出版社，2002；《生产网与城市地域》（与米歇尔·佩拉蒂合著），图卢兹，米莱耶大学出版社，1996。

阿尔曼多·费尔南德斯·斯坦因科 (Armando Fernández Steinko)

马德里康普鲁顿塞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经济

和企业参与经验——一个世纪驯化的三个周期》，马德里，21世纪出版社，2001；《巴斯克问题的死胡同》，巴塞罗那，老笨人出版社，2001。

让-皮埃尔·泰拉伊 (Jean-Pierre Terrail) 伊夫林省圣康坦凡尔赛大学社会学教授。近著有：《法国的学校——危机、实践、前景》(主编)，巴黎，争论出版社，2005；《学校：民主的筹码》，巴黎，争论出版社，2004；《学校的不平等》，巴黎，争论出版社，2002。

玛丽亚·埃米莉娅·蒂茹 (Maria Emilia Tijoux) 智利社会学家。在皮诺切特政变后流亡国外多年，曾在法国工作。她饱受恶劣的社会环境之苦，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她执教于圣地亚哥阿尔西斯大学(社会学讲师)。她完成了多篇有关智利童工的论著，其中包括2005年的学位论文。她是《今日马克思对话》杂志的创始人和推动者。

米歇尔·瓦卡卢利斯 (Michel Vakaloulis) 社会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圣德尼)政治学讲师。他主要从事发达资本主义理论和集体行动社会学研究。近著有：《国营企业中的青年》，巴黎，争论出版社，2005；《集体动员——一场社会学争论》(与皮埃尔·库尔-萨利联合主编)，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走向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确立一种解放政策》(与让-玛丽·樊尚和皮埃尔·扎尔卡合著)，巴黎，菲林出版社，2003；《传媒与社会斗争》(与弗朗索瓦丝·迪歇纳合作主编)，巴黎，工场出版社，2003；《摩拳擦掌的右翼》(与奥利维耶·弗拉松合作主编)，巴黎，西勒塞出版社，2002；《重建政治》(与托尼·安德烈亚尼合作主编)，巴黎，西勒塞出版社，2002；《后现代资本主义》，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

译名对照表

A

- AAH (allocation aux adultes handicaps) 残疾人成人补助
- ABVP (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 印度全国大学生委员会
- Accardo, Alain 阿卡尔多, 阿兰·
- Accor 阿科尔集团
- Achcar, Gilbert 阿什卡, 吉贝尔·
- Acker, Françoise 阿克, 弗朗索瓦丝·
- ACORN (The Allianc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
争取改革现状社区组织联盟
- Adam, Gérard 亚当, 热拉尔·
- Adivasi 部落
- Adorno, Theodor 阿多诺, 西奥多·
- AFL-CIO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
- AGCS (Accord Général sur le Commerce des Services) 服务贸易总协定

AFSCME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r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

Agacino, Rafael 阿加西诺, 拉斐尔·

Aglietta, Michel 阿列塔, 米歇尔·

Agrikoliansky, Eric 阿格里柯利扬斯基, 埃里克·

AIWA (Asian Immigrant Women Advocates) 亚洲移民妇女协进会

Alaluf, Mateo 阿拉卢夫, 马泰奥·

ALENA (L'Accord de liber-échange nord-americain)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llègre, Claude 阿莱格尔, 克洛德·

Allende, Salvador 阿连德, 萨尔瓦多·

Althabe, Gérard 阿尔塔贝, 热拉尔·

Ambedkar, Ahimrao Ramji 阿姆培伽尔, 比姆拉奥·拉姆吉·

Ambrière, Francis 安布里埃, 弗朗西斯·

Amin Samir 阿明, 萨米尔·

Andréani, Tony 安德烈亚尼, 托尼·

Anderson, Margo 安德森, 马戈·

Andhra Pradesh 安得拉邦

APALA (Asian Pacific American Labor Alliance) 亚太美国劳工联合会

Appay, Béatrice 阿佩, 贝亚特丽斯·

Appelbaum, Eileen 阿佩尔鲍姆, 艾琳·

Arborio, Anne-Marie 阿尔博里奥, 安娜-玛丽·

Arcade 阿尔卡德饭店(集团)

Arendt, Hannah 阿伦特, 汉娜·

Aron, Raymond 阿隆, 雷蒙·

Aronowitz, Stanley 阿罗诺维茨, 斯坦利·

- Artous, Antoine 阿尔图, 安托万·
- ATTAC (Association pour la Taxation des Transaction Financières
pour l'Aide aux citoyennes et citoyens) 征收金融税协助公
民组织
- Auley, Mac 奥利, 马克·
- Azais, Christian 阿扎伊斯, 克里斯蒂安·

B

- Babu 巴布, 绅士
- Bac (baccalauréat) 业士
- Bacon, David 培根, 戴维·
- Bakhtine, Mikhail 巴赫蒂纳, 米哈伊尔·
- Balladurisme 巴拉迪尔主义
- Baltimoreans United in Leadership Development 争取发展领导才
能巴尔的摩人联合会
- Bao Xiaolan 包小兰
- Barbichon, Guy 巴尔比雄, 居伊·
- Barrès, Maurice 巴雷斯, 莫里斯·
- Basaure, Mauro 巴索雷, 莫罗·
- Baudelot, Christian 博德洛, 克里斯蒂安·
- Bautier, Elisabeth 博捷, 伊丽莎白
- Beaud, Stéphane 博德, 斯特法内·
- Beaud, Sylvie 博德, 西尔维·
- Bell, Daniel 贝尔, 丹尼尔·
- Bellavance, Guy 贝拉旺斯, 居伊·
- Beneria, Lourdes 贝内里亚, 洛德丝·
- Benvenuti, Jean-Claude 邦弗努蒂, 让-克洛德·
- BEPC (brevet d'études du premier cycle) 法国中学第一阶段结

业证书

- Berger, Denis 贝尔热, 德尼·
Berlusconi, Silvio 贝卢斯科尼, 西尔维奥·
Bernhardt, Annette 伯恩哈特, 安妮特·
Béroud, Sophie 贝鲁, 索菲·
Beverly 贝弗利保健公司
Bhadralok 高贵者
Bhakta 守贞专奉信徒
Brahman 婆罗门
Bharatya Jan Sangh 印度人民党
Bidet, Jacques 比岱, 雅克·
Bihar 比哈尔邦
Blair, Tony 布莱尔, 托尼·
Blondel, Alice 布隆代尔, 艾丽斯·
Boccaro, Paul 博卡拉, 保罗·
Boltanski, Luc 博尔坦斯基, 吕克·
Bonnéry, Stéphane 博内里, 斯特法内·
Bon, François 邦, 弗朗索瓦·
Bonnewitw, Patrice 博纳维茨, 帕特里斯·
Bossuet, Jacques-Bénigne 波舒哀, 雅克-贝尼涅·
Boudon, Raymond 布东, 雷蒙·
Bouffartigue, Paul 布法尔蒂格, 保罗·
Bouquin, Stephen 布坎, 斯特凡·
Bourdieu, Pierre 布迪厄, 皮埃尔·
Bové, José 博韦, 荷西·
Boyer, Robert 布瓦耶, 罗贝尔·
Bronfenbrenner, Kate 布隆芬布伦纳, 凯特·
Brunhoff, Suzanne de 布吕诺夫, 苏珊·德·
Buhle, Paul 比勒, 保罗·

Burawoy, Michael 布洛沃伊, 迈克尔·

Butlen, Denis 布朗, 德尼·

C

Caillé, Alain 卡耶, 阿兰·

Capdevielle, Jacques 卡普德维尔, 雅克·

Castel, Robert 卡斯特尔, 罗伯特·

Caterpillar Tractor Company 美国履带拖拉机公司

Causse, Lise 科斯, 利斯·

CDD (contrat à durée détermine) 固定期限合同

CDI (contrat à durée indéterminée) 无固定期限合同

Cellatex 塞拉泰克斯化工厂

César, Christine 色萨尔, 克里斯蒂娜·

CEVIPOF (Centre politiques de Sciences Po) 法国政治学基金会
政策研究中心

CFDT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 法国民
主工联

CFTC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es travailleurs chrétiens) 法国天
主教工人联合会

CGC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e cadres) 法国企业行政及技术人
员总工会

CGT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法国总工会

CGT-FO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Force ouvrière) 法国
工人力量总工会

Chaib, Sabah 谢伊布, 萨巴赫·

Chauvel, Louis 肖韦尔, 路易·

Chazel, François 沙泽尔, 弗朗索瓦·

Chenu, Alain 舍尼, 阿兰·

- Chérèque, François 谢莱克, 弗朗索瓦·
Chesnais, François 谢奈, 弗朗索瓦·
Chiapello, Eve 基亚佩洛, 夏娃·
Chirac, Jacques 希拉克, 雅克·
Chomsky, Noam 乔姆斯基, 诺姆·
Chopart, Jean-Noel 肖帕尔, 让-诺埃尔·
Clot, Yves 克洛, 伊夫·
CLUW (Coalition of Labor Union Women) 妇女联合会联盟
Coing, Henri 科英, 亨利·
Collovald, Annie 科洛瓦尔, 安妮·
Concialdi, Pierre 孔恰尔迪, 皮埃尔·
Confédération Européenne des Syndicats 欧洲工联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Patronat Français 法国雇主总联合会
Cook, Philip 库克, 菲利普·
Cornwell, Tim 康韦尔, 蒂姆·
Corsani, Antonella 科尔萨尼, 安托内拉·
Coulangeon, Philippe 库朗容, 菲利普·
Cours-Salies, Pierre 库尔-萨利, 皮埃尔·
Coutant, Isabelle 库唐, 伊莎贝尔·
Coutrot, Thomas 库特罗, 托马斯·
Cretiez, Xavier 克雷蒂耶, 格扎维埃·
Crozier, Michel 克罗齐耶, 米歇尔·
CSA (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 法国视听最高委员会
CSWA (Chinese Staff and Workers Association) 华人职员和工人
联合会

D

- Darcos, Xavier 达尔科, 格扎维尔·

- Davis, Mike 戴维斯, 迈克·
 Davaise, Annick 达维斯, 安尼克·
 Deauvieu, Jérôme 多维奥, 热罗姆·
 Debouzy, Marianne 德布齐, 玛丽安娜·
 Decoufle, André 德库弗勒, 安德烈·
 Degenne, Alain 德热纳, 阿兰·
 Dejours, Christophe 德茹尔, 克里斯托夫·
 De la Pradelle, Michèle 德拉·普拉代勒, 米谢勒·
 Delor, Jacques 德洛尔, 雅克·
 Denis, Jean-Michel, 德尼, 让-米歇尔·
 Deutsh, Karl 多什, 卡尔·
 Dewerpe, Alain 德韦尔普, 阿兰·
 Dieuaide, Patrick 迪厄艾德, 帕特里克·
 Dobry, Michel 多布里, 米歇尔·
 Dubois, Vincent 迪布瓦, 樊尚·
 Duchesne, Françoise 迪歇纳, 弗朗索瓦丝·
 Durand, Claude 迪朗, 克洛德·
 Durand, Jean-Pierre 迪朗, 让-皮埃尔·
 Durkheim, Emile 涂尔干, 埃米尔·
 Duroy, Lionel 迪鲁瓦, 里昂内尔·

E

- EDF (Electricité de France) 法国电力公司(集团)
 Eisinger, Peter 艾辛格, 彼得·
 Elias, Norbert 埃利亚斯, 诺贝尔·
 Erbès-Seguin, Sabine 埃尔贝斯-塞甘, 萨比娜·
 Establet, Roger 埃斯塔布莱, 罗歇·
 Etzioni, Amitai 埃特齐奥尼, 阿米塔伊·

F

FAEN (Fédération autonom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国民教育
独立工会联合会

Featherstone, Liza 费瑟斯顿, 莉萨·

FERC-CGT (Fédération de l'éduca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a
culture) 法国总工会教育、研究、文化工会联合会

Ferry, Jean-Marc 费里, 让-马克·

Ferry, Luc 费里, 吕克·

Fillicule, Olivier 菲利厄勒, 奥利维耶·

Fillon, François 菲永, 弗朗索瓦·

Floro, Maria 弗洛罗, 玛丽亚·

Forest, David 福利斯特, 戴维·

Forquin, Jean-Claude 福尔坎, 让-克洛德·

Forum Social Mondial 世界社会论坛

Fourastié, Jean 富拉斯蒂耶, 让·

Fourcaut, Annie 富尔科, 安妮·

Fourier, Charles 傅立叶, 夏尔·

Frank, Robert 弗兰克, 罗伯特·

Fraser, Steven 弗雷泽, 史蒂文·

Freeman, Joshua. B. 弗里曼, 乔舒亚·B.

Friedmann, Georges 弗里德曼, 乔治斯·

Friot, Bernard 弗里奥, 贝尔纳·

FSU (Fédération syndicale unitaire) 统一工联

Fuerza Unida 合力会

G

Gamson, William 加姆逊, 威廉·

- Gandhi, Indira 甘地, 英迪拉·
 Gandhi, Mahatma 甘地, 马哈特玛·
 Gandhi, Rajiv 甘地, 拉吉夫·
 Garo, Isabelle 加罗, 伊莎贝尔·
 Gauthier, Elisabeth 戈捷, 伊丽莎白·
 Geay, Bertrand 热艾, 贝特朗·
 Giddens, Anthony 吉登斯, 安东尼·
 Gignoux, Claude-Joseph 吉纽, 克洛德 - 约瑟夫·
 Giret, Jean-François 吉雷, 让 - 弗朗索瓦·
 Glasman, Dominique 格拉斯曼, 多米尼克·
 Gorz, André 戈尔兹, 安德烈·
 Gouirir, Malika 古伊里尔, 马利卡·
 Grasson, Daniel 格拉松, 达尼埃尔·
 Grelet, Yvette 格勒莱, 伊薇特·
 Greyhound “灰狗” 长途客运公司
 Grignon, Claude 格里尼翁, 克洛德·
 Groux, Guy 格鲁, 居伊·
 Grown, Caren 格罗温, 卡伦·
 G 10 Solidaires (Union Syndicale Solidaires 10) 10 国团结工会联盟
 Guenfoud, Karima 冈富, 卡里马·
 Guesde, Jules 盖尔, 朱尔·
 Guibert, Madeleine 吉尔伯特, 马德琳·
 Guillot, Jean-Paul 吉约, 让 - 保罗·
 Gujarat 古吉拉特邦
 Gulluy, Christophe 居吕伊, 克里斯托夫·
 Gurvitch, Georges 居尔维茨, 乔治·

H

Habermas, Jürgen 哈贝马斯, 尤根

Halbwachs, Maurice 阿尔布瓦克斯, 莫里斯·

Hall, David 霍尔, 戴维·

Hardt, Michael 哈尔特, 迈克尔·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尔, 马丁·

Hermlin, Stephan 赫尔姆林, 斯特凡·

Hetzl, Anne-Marie 赫策尔, 安娜-玛丽·

Heurtin, Jean-Philippe 厄尔坦, 让-菲利普·

Heuzé, Gérard 厄泽, 热拉尔·

Hilal, Nadia 伊拉尔, 纳迪亚·

Hirata, Helena 伊拉塔, 埃莱娜·

Hirschmann, Albert O. 伊什尔曼, 阿尔贝·O.

HLM 廉租房

Hochschild, Jennifer L. 霍克希尔德, 珍妮弗·L.

Hoggart, Richard 霍格特, 理查德·

Hormel de l'industrie de la viande 荷美尔肉类工业公司

Hotel Employees and Restaurant Employees Union (HERE) 饭店
与餐饮业雇员联合会

Huntington, Samuel 亨廷顿, 塞缪尔·

Husserl, Edmond 胡塞尔, 埃德蒙·

Husson, Michel 于松, 米歇尔·

I

INSEE (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Etudes économiques)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

Intérimaires 临时替工

Intermittentes du spectacle 间歇演艺人员

IRES (Institut de Recherches Economiques et Sociales) 经济与社
会研究所

- Isambert-Jamati, Viviane 伊桑贝尔 - 雅玛蒂, 维维亚娜 ·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rgan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
 IUFM (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Formation des Maitres) 法国教师高等进修学院

J

- Jaine 耆那教教徒
 Jananta 人民党
 Jat 贾特
 Jaurés, Jean 饶勒斯, 让 ·
 Jenkins, J. Craig 詹金斯, J. 克雷格 ·
 Jinnah, Mohammed Ali 真纳, 穆罕默德 · 阿里 ·
 Jospin, Lionel 若斯潘, 利昂内尔 ·
 Judis, John B. 朱迪斯, 约翰 · B.
 Juppé, Alain 朱佩, 阿兰 ·
 Justice for Janitors “为物业维修工讨还正义”组织

K

- Kabeer, Naila 卡贝尔, 奈拉 ·
 Kamma 卡玛
 Kelly, John 凯利, 约翰 ·
 Kelly, Robin D. G. 凯利, 罗宾 · D. G.
 Kergoat, Danièle 凯尔戈阿, 达妮埃勒 ·
 KIWA (Korean Immigrant Workers Advocats) 韩裔移民工人协进会
 Kouvélakis, Eustache 库维拉基斯, 厄斯塔什 ·
 Kris, Ernst 克里斯, 厄恩斯特 ·
 Kurz, Otto 库尔兹, 奥托 ·

L

- Laborie, Françoise 拉博里, 弗朗索瓦丝·
- Labroille, François 拉布罗瓦耶, 弗朗索瓦·
- Lada, Emmanuelle 拉达, 埃马努埃莱·
- Lahire, Bernard 拉伊尔, 贝尔纳·
- LAMAP (The Los Angeles Manufacturing Project) 洛杉矶建设计划
- Lamont, Michèle 拉蒙, 米谢勒·
- La Mujer Obrera· 女工联合会
- Lauder, Jacqueline 洛费尔, 雅克利娜·
- Laval, Christian 拉瓦尔, 克里斯蒂安·
- Lazzarato, Maurizio 拉扎拉托, 莫里齐奥·
- Lechien, Marie-Hélène 勒希安, 玛丽-埃莱娜·
- Le Cref, Jean-François 勒克雷夫, 让-弗朗索瓦·
- Le Doaré, Hélène 勒多阿雷, 埃莱娜·
- Lefaucheur, Nadine 勒福舍, 纳迪娜·
- Lefebvre, Henri 勒菲弗, 亨利·
- Le Goff, Jacques 勒戈夫, 雅克·
- Le Lay, Stéphane 勒莱, 斯特法内·
- Lehman, Bernard 莱曼, 贝尔纳·
- Leneveu, Claude 勒纳弗, 克洛德·
- Léomant, Christian 莱奥芒, 克里斯蒂安·
- Leonhardt, David 伦哈特, 戴维·
- Le Quentrec, Yannick 勒康特雷克, 扬尼克·
- Letéxier, Jean-Louis 勒特克西埃, 让-路易·
- Lévy, Catherine 莱维, 卡特琳·
- Lichtenstein, Nelson 利希滕斯坦, 纳尔逊·
- Lipietz, Alain 利皮耶茨, 阿兰·

- Loach, Ken 洛克, 肯·
 Lojkine, Jean 卢日金内, 让·
 Luce, Stéphanie 卢斯, 斯蒂芬妮·
 Lynd, Stanghton 林德, 斯托顿·

M

- MacDonald, Martha 麦克唐纳, 玛莎·
 Madhya varg 中心阶级
 Maharashtra 马哈拉施特拉邦
 Maire, Edmond 梅尔, 埃德蒙·
 Mallet, Serge 马莱, 塞尔日·
 Malraux, André 马尔罗, 安德烈·
 Mandal Comission 曼达尔委员会
 Mann, Eric 曼, 埃里克·
 Mann, Patrice 曼, 帕特里斯·
 Maratha 马拉塔
 Marcadet, Christian 马尔卡代, 克里斯蒂安·
 Marry, Catherine 马里, 卡特琳·
 Martin, Claude 马丁, 克洛德·
 Martin, Hans-Peter 马丁, 汉斯-彼得·
 Marty, Thomas 马蒂, 托马斯·
 Maruani, Margaret 马卢瓦尼, 玛格丽特·
 Masclet, Oivier 马斯克莱, 奥利维耶·
 Massera, Bernard 马塞拉, 贝尔纳·
 Matonti, Frédérique 马东尼, 弗里德里克·
 Matthews, Glenna 马修斯, 格伦娜·
 Mauger, Gérard 莫热, 热拉尔·
 Mayer, Nonna 马耶尔, 诺纳·

- McAdam, Alberto 麦克亚当, 艾伯托·
McCarthy, John 麦卡锡, 约翰·
McClintock, Jessica 麦克林托克, 杰茜卡·
MEDEF (Mouvement des Entreprises de France) 法国企业运
动
Melucci, Alberto 梅鲁奇, 艾伯托·
Menger, Pierre-Michel 门格, 皮埃尔-米歇尔·
Merton, Robert K. 默顿, 罗伯特·K.
Mil kman, Ruth 米尔克曼, 鲁思·
Mitterand, François 密特朗, 弗朗索瓦·
Moineau, Laurent 穆瓦诺, 洛朗·
Mont Meru 须弥山
Morris, Aldon D. 莫里斯, 奥尔东·D.
Mouchard, Daniel 穆沙尔, 达尼埃尔·
Moulin, Raymonde 穆兰, 雷蒙德·
Mouriaux, René 穆里奥, 勒内·
Mudaliar 穆达里亚尔
Mueller, Carol McClurg 米勒, 卡罗尔·迈克勒格·
Murnane, J. Richard 墨南, 理查德·
Murray, Philip 默里, 菲利普·

N

- NAFT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
Nair, Sami 纳伊尔, 萨米·
Naville, Pierre 纳维尔, 皮埃尔·
Navnirman 纳夫尼尔曼运动 (古吉拉特邦复兴运动)
Nayar 纳亚尔

- Negri, Antonio 内格里, 安东尼奥
- Nehru, Jawaharlal 尼赫鲁, 贾瓦哈拉尔·
- Nettl, John Peter 内特尔, 约翰·彼得·
- Nicole-Drancout, Chantal 妮科尔-德朗古, 尚塔尔·
- NLRB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美国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
- NMS (Nouveaux Mouvements sociaux) 新社会运动
- Noiriel, Gérard 努瓦里耶, 热拉尔·
- Nora, Pierre 诺拉, 皮埃尔·
- Notat, Nicole 诺塔, 妮科尔·
- Noyé, Christophe 努瓦耶, 克里斯托夫·
- Nussbaum, Karen 努斯鲍姆, 卡伦·

O

- Obershall, Anthony 奥伯沙尔, 安东尼·
- Odent, Bruno 奥当, 布律诺·
- OEuvrard, Françoise 厄夫拉尔, 弗朗索瓦丝·
- Olson, Mancur 奥尔森, 曼库尔·
- OQ (ouvriers qualifiés) 熟练工人
- OS (ouvriers spécialisés) 专业技工
- Oussekiné, Malik 乌塞金纳, 马立克·

P

- Paradeise, Catherine 帕拉代斯, 卡特琳·
- Passeron, Jean-Claude 帕斯龙, 让-克洛德·
- Passet, René 帕塞, 勒内·

- Patel 帕特尔
- Paturot, Jerome 帕蒂罗, 热罗姆·
- Paugam, Serge 波冈, 塞尔日·
- PCF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法国共产党
- Peltiel, Marie-Lise 佩尔蒂埃, 玛丽-利斯·
- Penjab State 旁遮普邦
- Peraldi, Michel 佩拉蒂, 米歇尔·
- Perrin, Evelyne 佩兰, 埃弗利娜·
- Petit, Pascal 珀蒂, 帕斯卡尔·
- Pézard, Monique 佩扎尔, 莫妮克·
- Pialoux, Michel 皮亚卢, 米歇尔·
- Pichon, Alain 皮雄, 阿兰·
- Pinçon, Michel 潘松, 米歇尔·
- Pinçon-Charlot, Monique 潘松-夏洛, 莫妮克·
- Pinochet, Augusto 皮诺切特, 奥古斯托·
- Piore, Michael 皮奥里, 迈克尔·
- Piriou, Jean-Paul 皮里乌, 让-保罗·
- PJJ (Protection judiciaire de la jeunesse) 青少年司法保护
- PME (petite ou moyenne entreprise) 中小企业
- Poirrier, Philippe 普瓦里耶, 菲利普·
- Poliak, Claude F. 波利亚克, 克洛德·F.
- Pollin, Robert 波林, 罗伯特·
- Ponthieu, Sophie 蓬蒂厄, 索菲·
- Poupeau, Frank 普波, 弗兰克·
- Poyraz, Mustafa 普瓦拉兹, 穆斯塔法·
- Proudhon, Pierre-Joseph 蒲鲁东, 皮埃尔-约瑟夫·
- PUCA (Plan Urbanisme Construction Architecture) 平面城市
建筑
- Pudal, Bernard 皮达尔, 贝尔纳·

Q

Quiminal, Catherine 基米纳, 卡特琳·

R

Raffarin, Jean-Pierre 拉法兰, 让 - 皮埃尔·

Rallet, Daniel 拉莱, 达尼埃尔·

Rambach, Anne 兰巴赫, 安妮·

Rambach, Marine 兰巴赫, 马里纳·

Rannou, Janine 拉努, 雅尼娜·

RSS (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全国志愿者组织

Ravet, Hyacinthe 拉韦, 亚辛特·

Redid 雷迪

REP (Réseau d'éducation prioritaire) 优先教育网

Retière, Jean-Noel 雷蒂埃, 让 - 诺埃尔·

Reybaud, Louis 雷博, 路易·

Renaud-Cressent, Bénédicte 雷诺 - 克雷桑, 贝内迪克特·

RMI (revenue minimum d'insertion) 最低收入补助

Robin, Jacques 罗班, 雅克·

Rocard, Michel 罗卡尔, 米歇尔·

Rochex, Jean-Yves 罗歇, 让 - 伊夫·

Roharik, Ionela 罗阿里克, 约内拉·

Rolle, Pierre 罗勒, 皮埃尔·

Rogers, Ray 罗杰斯, 雷·

Ropé, Françoise 罗佩, 弗朗索瓦丝·

Rosen, Sherwin 罗森, 舍温·

Rothman, Hal 罗思曼, 哈尔·

Roy, Donald 罗伊, 唐纳德·

Rozés, Stéphane 罗泽斯, 斯特法内·

RTT (Réduction du temps de travail) 缩短工作时间

Rubin, Lillian 罗宾, 莉莲·

Rucht, Dieter 鲁赫特, 迪特尔·

S

Salazar, Gabriel 萨拉查, 加弗里埃尔·

Sannyasin 遁世者

Sanpurna Kranti Andolan 争取全面革命运动

Santerre, Lise 桑泰尔, 利斯·

Schuman, Harald 舒曼, 哈拉尔德·

Schwatz, Olivier 施瓦茨, 奥利维耶·

Scotson, John L. 斯科特桑, 约翰·L.

Scott, James C. 斯科特, 詹姆斯·C.

Scott, Janny 斯科特, 詹尼·

SEIU (Syndicat des Employés de Service) 服务业务雇员工会

Sélim, Monique 塞兰, 莫妮克·

Sennelt, Richard 塞内, 里夏尔·

Senotier, Danièle 塞诺蒂耶, 达妮埃勒·

Serfati, Claude 塞尔法蒂, 克洛德·

Sève, Lucien 塞夫, 吕西安·

Simmel, Georg 西梅尔, 乔治·

SGEN-CFDT (Syndicats généraux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法国

民主工联国民教育总工会

Shakta 性力派信徒

Shaktisme 性力派

Shiv Sena de Mumba 孟买湿婆军

- Silver, Beverly 西尔弗, 贝弗利·
- Simon, Michel 西蒙, 米歇尔·
- Singh, V. P. 辛格, V. P.
- Sirot, Stéphane 西罗, 斯特法内·
- Skhamba 世界轴心
- SMIC (salaire minimum interprofessionnel de croissance) 跨行业
最低生活水平
- SNCF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
- SOFRES (Société française d'études par sondages) 法国民意测验
研究公司
- Sommier, Isabelle 索米耶, 伊莎贝尔·
- Sotteau-Léomant, Nicole 索托-莱奥芒, 妮科尔·
- Spitaels, Guy 斯皮塔埃尔, 居伊·
- Stein, Lorenz Von 斯坦因, 洛伦兹·冯·
- Steinko, Armando Fernández) 斯坦因科, 阿尔曼多·费尔南德斯·
- Stevens, J. P. 斯蒂文斯, J. P.
- Stiglitz, Joseph 斯蒂格利茨, 约瑟夫·
- Strobants, Marcelle 斯特罗邦茨, 玛塞勒·
- SUD (Solidaires, Unitaires, Démocratiques) 团结、统一、民
主工会联盟
- SUD-Education 团结、统一、民主教育工会联合会
- Supiot, Alain 叙皮奥, 阿兰·
- Sweeny, John 斯威尼, 约翰·

T

- Takur 塔库尔
- Talahite, Fatiha 塔拉伊特, 法蒂阿·
- Tangny, Lucie 唐吉, 露西·

- Tarrow, Sidney 塔罗, 西德尼·
Tarty, Isabelle 塔蒂, 伊莎贝尔·
Terrail, Jean-Pierre 泰拉伊, 让-皮埃尔·
Texier, Jacques 特谢尔, 雅克·
Thévenot, Laurent 泰弗诺, 洛朗·
Thin, Daniel 辛, 达尼埃尔·
Tijoux, Maria Emilia 蒂茹, 玛丽亚·埃米莉娅·
Tilly, Charles 蒂利, 查尔斯·
Tombazos, Stavros 通巴佐斯, 斯塔弗罗斯·
TOS (techniciens, ouvriers, services) 技术人员、工人、服务人员
人员
Touraine, Alain 图雷纳, 阿兰·
Tournier, Maurice 图尼耶, 莫里斯·
Toussaint, Eric 图桑, 埃里克·
Tovar, José 托瓦尔, 若泽·
Trat, Josette 特拉, 若塞特·

U

-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TE 纺织和制衣工人联合会
UNSA-Education (Union Nationale de Syndicats Autonomes) 全
国教育独立工会联盟
UPS (United Parcel) 联邦快递公司
Uttar Pradesh 北方邦

V

- Vabres, Renaud Donnedieu de 瓦布尔斯, 雷诺·多纳迪厄·德·

- Vadée, Michel 瓦代, 米歇尔·
 Vakaloulis, Michel 瓦卡卢利斯, 米歇尔·
 Van Zanten, Agnès 范赞坦, 阿涅斯·
 Veblen, Thorstein 凡勃伦, 索尔斯坦·
 Vercellone, Carlo 韦尔塞洛内, 卡罗·
 Vergne, Francis 韦尔涅, 弗朗西斯·
 Verret, Michel 韦雷, 米歇尔·
 Vincent, Jean-Marie 樊尚, 让-玛丽·
 Virno, Paolo 维尔诺, 保罗·
 VHP (Vishwa Hindu Parishad) 世界印度教论坛

W

- Wachtel, Nathan 瓦克泰尔, 纳坦·
 Wagner, Anne-Cécile 瓦涅, 阿内-塞西尔·
 Wagner, Anne-Catherine 瓦涅, 阿内-卡特琳·
 Watanuki, Joji 德井丞
 Weber, Florence 韦伯, 弗洛朗斯·
 Weber, Max 韦伯, 马克斯·
 Werquin, Patrick 韦尔坎, 帕特里克·
 Wright, Erik Olin 赖特, 埃里克·奥林·

Y

- Yadav 雅达夫
 Yates, Michael 耶茨, 迈克尔·

Z

- Zald, Mayer 扎尔德, 迈耶·

Zalio, Pierre-Paul 扎利奥, 皮埃尔 - 保罗 ·
Zarka, Pierre 扎尔卡, 皮埃尔 ·
ZEP (Zone d'éducation prioritaire) 优先教育区